

坛 坫 绘 影

国际外交家胡世泽

目 录

致谢		i
年表		ii
获得的荣誉勋章		iii
第1章	童年时期	1
第2章	日内瓦	11
第3章	伯尔尼	21
第4章	华盛顿	30
第5章	重庆	35
第6章	战争结束	42
第7章	托管部	50
第8章	以色列	56
第9章	朝鲜	62
第10章	托管部—1951	68
第11章	托管部—1952	80
第12章	托管部—1953	86
第13章	托管部—1954	92
第14章	会议事务部	101
第15章	技术合作	112
第16章	后记：徐入黯夜	123—126

致 谢

1989年5月，也就是家父去世十七年之后，中国人民政府派在联合国服务的邱应觉先生见到了我。当时邱先生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政治委员会的副司长，他与家父从未见过面，但是他告诉我，在联合国机构中至今仍浸润着胡世泽先生的品格和遗风。这种出自一位坚定共产党人对于一个毕生反共人士的评价是非同寻常的。邱先生以父辈的诚挚态度建议说在我们的家庭中应该有人撰写家父的传记，我们有责任把他一生的事迹介绍给中国的公众。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已经变得开朗，人们对于在海外卓有成就的中国人的生平都怀有浓厚的兴趣。

家父留下了大量涉及他外交生涯的档案文书，以及许多详实的日记。1972年他逝世后，我们决定把这些文件资料捐赠给设于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市的“战争、革命与和平胡佛研究所”，以便日后研究历史的学者们能够利用。

牢记着邱先生的劝告，我决心设法完成这项任务，深信家父九泉有知，也定会赞成我这样做的。关于这本书写成后如何翻译成中文和在国内出版，邱先生给了我一些有益的指点。我幸运地从台北的太平洋文化基金会获得资金支持，使我得以进行调研旅行。我制定出了我的旅行计划和调研方案，决定从翻译家父的法文日记着手，开始这项工作。

1990年3月，我前往加利福尼亚钻研存放在胡佛研究所的卷宗与日记。我也拜访了家父的老友和同僚刘锴大使，从他那里我了解到家父在中国代表团和联合国时的一些幕后情况。在这次访问中，我还和约瑟夫·史迪威的女儿艾莉森交谈了一个下午，她熟悉蒋介石，并对40年代的中国形势有亲身的体会。

1990年末，我去台北查阅政府档案。我住在叔父胡世勋的家里，他以前是驻外大使，当时正供职于外交部。承蒙他的关照，我得以进入政府的档案馆，每天在译员吴雅梅的伴随下，乘坐世勋叔的高级豪华轿车前去档案馆。我在那里发现许多家父亲笔撰写的，从凡尔赛和约到30年代初期这段时期的官方文件。还找到几箱有关先祖父胡惟德生平经历的卷宗。

1991年我利用假期在纽约研究联合国的档案，并乘机会见一些家父昔日的同僚和朋友。有一两位拒绝我的访问，其他的也仅能提供一些泛泛常谈。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并愿意讲述重要事实，特别是顾维钧博士的女儿顾菊珍女士，她是家父最亲密的朋友与合作者之一，不仅自童年时代就认识家父，而且从1947年起曾与家父在联合国托管部共事，她退休时是托管部非洲司的司长。她的学识与正直令我极为钦佩。另一位是钱泰大使的儿子钱家驊，他也是我家的朋友，曾与家父先后在伯尔尼和联合国共事。钱家驊以无比的坦诚对家父所经历的国际舞台进行了公正分析，使我得以洞悉家父的工作环境。我还要感谢洛兰·谢伊，谢咸达，文纪洛，锺嘉谋，菲利普·德·塞纳，艾琳·贝和于梦玲等人给予的帮助。

1992年，我因进行调研工作去到日内瓦的国际联盟档案馆，还再次访问了胡佛研究所。这时我有幸会晤了伍启元教授和董霖教授，他们分别是家父在联合国和重庆时的亲密同僚。

我尤其感谢菲比·菲利普斯和我的侄女润珍，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在本书的写作上自始至终给予我支持和鼓励。

我特别应该感谢我的朋友林恩·布谢尔，她承担了删除原稿中大量繁冗细节的任务，这些细节尽管对我个人来说颇为生动，却有妨碍正常叙述之虞。她作为一位老练的新闻工作者，

帮助我把调研的资料裁剪、润色成为成品。

我还要感谢我的顾问，阿莫利布罗斯的简·塔特姆，感谢她的卓越才能，乐天性格和奔放的热情。

最后，我不能不表达，我衷心感谢我家的所有成员，其中包括杰里米·埃尔德里奇，他提供了许多轶闻和往事，使家父的形象能够更加丰腴。

年 表

- 1894年 11月18日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先祖父时为中国驻美使馆秘书）
- 1899年 前往莫斯科
- 1905年 毕业于俄国皇家小学
- 1912年 毕业于圣彼得堡安娜中学，得凯撒奖
在俄国期间曾数次去到日本（先祖父自1908年起任中国驻日本公使）
同年前往巴黎，就读于私立政治学院外交系，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获金质奖章
- 1916年 获巴黎大学法学院法学士学位
- 1918年 获法学博士学位，得古朗库尔奖，和博士论文奖。博士论文题为：
“中俄近代关系之传统基础”
夏季在牛津和剑桥
- 1919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任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助理秘书
- 1920年 任出席国际联盟布鲁塞尔会议中国代表团团员
- 1921年 任出席禁止贩卖妇女儿童会议和国际财政会议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
任出席国际联盟头五次大会以及国联召开的许多其他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
任中国驻比利时公使馆三等秘书，但由于随后的任命未到职
任出席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
- 1922年 任中国驻柏林公使馆二等秘书
- 1923年 晋升一等秘书
- 1924年 晋升中国驻柏林公使馆代办
- 1925年 任北京政府外交部参事，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关税会议
- 1926年 任关税特别会议编纂处副处长
同年任督办中俄会议事宜公署专门委员
- 1927年 任外交部条约司科长
- 1928年 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兼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秘书
改任外交部秘书兼总务司交际科科长

- 1929年 派为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
- 1930年 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 1931年 任谈判中东铁路问题中苏会谈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
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团秘书长
出席国际联盟有关中日争端的所有会议
- 1932年 任国际联盟中国全权代表办事处处长
兼任驻瑞士公使馆代办
任日内瓦国际劳工会议首席代表
在国际联盟鸦片和其他危险麻醉药品顾问委员会代表中国
- 1933年 升任驻瑞士特命全权公使,仍兼国际联盟中国全权代表办事处处长
在国际联盟社会问题顾问委员会等各种委员会上代表中国
- 1942年 回重庆,任外交部常务次长
- 1944年 任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和顿巴敦橡树园会议中国代表
- 1945年 任出席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秘书长
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同盟条约会议,任专门委员和官方译员
- 1945.1946年 任出席伦敦联合国筹备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联合国大会代表。授大使衔。
- 1946年 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主管托管和非自治领土情报事务部
- 1947年 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前往巴勒斯坦,出席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
- 1948年 以同一身份前往朝鲜,出席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
- 1955年 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主管会议事务部
- 1962年 任联合国技术合作专员
- 1971年 12月31日自联合国退休
- 1872年 6月9日以癌症病逝于美国纽约

获得的荣誉勋章

- 蓝绶带宝石勋章(中国)
- 景星勋章(中国)
- 王冠勋章(伊朗)
- 尼罗河勋章(埃及)
- 白狮勋章(捷克斯洛伐克)
- 王冠骑士勋章(比利时)
- 乔治一世勋章(希腊)
- 国家太阳勋章(秘鲁)
- 南十字勋章(巴西)
- 三级荣誉勋位勋章(法国)

第一章 童年时期

家庭背景——母亲之死——欧洲教育

胡世泽 1894 年 11 月 18 日出生于美国华盛顿，是当时中国驻美国公使馆秘书胡惟德十二个孩子中排行第一的长子。由于他的出生地在美国，人们常误以为他是美国公民。然而根据外交规定，即使是在美国首都，因他是出生在中国外交使团的领域内，仍是中国国民，这就满足了他父母的爱国愿望。

这个情况纯属偶然，就像一个人有可能出生在计乘车或者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上一样，实际上，从他的成长过程看，胡世泽决不能算作是美国人，他已记不起在美国的幼小孩提生活，后来他接受的是东方的、斯拉夫的、拉丁的文化教养，但从未受过北美文化的熏陶，儘管他最后变得对美国的生活感到安适自在。

就在我父亲降生的三个月前，中国和日本互相宣战，这是两国在朝鲜竞争角逐十年的结果。对中国而言，这是一场灾难。欧洲国家和美国曾试图调停，但无济于事。日本人在陆海两方面均占有优势，很快就在几个战略地区获得胜利，形势对中国已变得无望。

虽然他们强烈意识到祖国的危机，我的祖父，祖母还是沉浸在盼望已久的第一个孩子降生的喜悦中。祖母已有五次小产，原以为她再也不能生育孩子。这次怀孕时她就忧虑得不能入睡，夜复一夜地醒着躺在床上祈祷。她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但是就在婴儿降生三天后，中国军队在鸭绿江边和旅顺港遭到惨败。祖父说：“我们要为这个男孩取名维克托 (Victor, 胜利者)。他是我们信念的象徵。我们必须打败日本人。”

将近 5 个月后，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虽说“胜利者”象征着终有一天会要复仇雪耻，但是中国不得不为这一天等待了五十年。

父亲将要演出他的角色的背景，无论从任何标准来说都是丰富多彩的。他的父辈跨越两个时代，先是古老的满清王朝，然后是取代它的新建共和国。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危险时期但祖父努力做到对两个政权保持忠诚。他一直是清朝最后一位太后的忠实官员，当父亲出生时，他已成为一名政治家和小有名声的外交家。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能讲英语和法语的外交官之一，祖父是适合外交工作的理想人选。在他的外交生涯中，曾在诸如英国，日本，俄国，秘鲁和法国等几个国家代表中国。

祖父的童年时期生活在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早逝后便由母亲和祖父抚养成人。幸运的是他的祖父能够教他中国古文，使他得以受到教育。怀着企望成功的雄心壮志，勤奋攻读，使他在学校中崭露头角。当他被送到上海学习外交事务时，他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辛勤工作是成功的关键，这是祖父要传授给他儿子的另外一课。

虽然祖父已肯定地摆脱了原先的贫困，但从未背离童年生活的影响，他热爱农村。父亲一直感到在大城市的氛围中最为安适，但祖父的最愉快时光却是在乡间住宅度过的。这所宅子是在他的第一个妻子去世后得到的，一直保持到二十五年多以后他自己辞世。他常在这里独居静养，一住多日，特别是在他的晚年。

这所住宅原是一座寺院，并且有若干亩土地。祖父常常在附近的田野漫步，成为人们熟悉的一位人士。他从未忘记他的卑微出身，总是悠然地拄着手杖，像和外交官们谈论国事那样与当地的农民们闲话桑麻。

父亲两岁时，祖父被任命为驻俄国的中国公使馆参赞 (后升公使)，于是全家迁往圣彼得堡。父亲对圣彼得堡的最早记忆是一个将要结束的时代。沙皇，拉斯浦丁，柴可夫斯基，以及那个正在逝去的时代的所有传奇故事，给他逐渐灌输了对斯拉夫精神的怀旧情结。虽然他的信仰是正統的儒家思想，但他深受教皇格里高里圣歌的感动，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总是前

去参加俄国东正教的复活节礼拜。

也是在圣彼得堡，父亲经历了他的第一次人生悲剧。当他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儿时，在一个严寒的冬天夜晚，他的保持着中国文雅习俗的母亲坚持要陪送一位使馆客人去到前门她穿着单薄的中国布鞋缓步通过前花园。那天寒风凛冽，她回到屋中时已冻得发抖。当天夜里她高烧得不能入睡，过了几天就出现肺炎症状，儘管进行了紧急抢救，还是不到一个星期就故去了。父亲从来没有从突然丧母的痛苦中恢复过来。终其一生，他都感到从未有幸享受一份真正的母爱。虽然他后来曾在回忆中深挖对母亲的记忆，然而都无可避免地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影子。他对母亲仅有的一点印象，大部分都是来自别人的叙述。那是一位文静娴淑，待人诚挚的妇女，曾经满怀生下儿子的喜悦，可惜只是悲剧性的昙花一现。

祖父同情他儿子幼年失母的悲痛，但他是个老派的人士，不大容易表露感情。虽然父亲后来描述他和蔼可亲，但他是个严厉的父亲。父亲作为祖父的长子和他的第一位妻子的唯一的一个儿子，从一开始便觉得家庭对他寄予厚望的。

父亲的母亲去世后，按照习俗，祖父本可从俗把他的妾（她后来为他生了六个孩子）扶为正室，然而此事却使他左右为难。因为作为外交官的夫人应该具备某些条件，例如外语，而妾则不一定必须懂得。显然受过教育是必需的先决条件。经过认真的考虑，一位朱小姐被选择为第二位正室夫人。

朱小姐出身于上层家庭，受过美国的大学教育，精通中国和欧洲文学。她不仅具备文化教养，而且家庭富有。她的父母当然希望她嫁给一个有钱的男人，并不满意她自己的选择。她委身于我的祖父这一事实，说明她受到的教育使她思想进步，能够重视祖父的其他令人钦佩的品质。

儘管从常规意识而言，祖父决不是一个恋家的男人，可是在此后许多年中，只要他有时间和心情，总是十分关注他日渐扩大的家庭中的八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带着一大帮孩子挤在私家小轿车里，豢养的小狗跟在后面，一起去北海公园游玩；这是年幼孩子们的乐事。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是祖父六十岁时生的。

父亲由于和他的年幼弟妹们存在着年龄差距，又因他长期生活在欧洲，所以当他暂时回到中国时，总是尽量和他们一起玩，给小弟弟们翻筋斗，当马骑或玩纸牌魔术。发现孩子们看到他用灵巧的手法从胸前口袋中或耳朵后面翻出一张红桃幺的惊奇神情，他玩得越发来劲直到有一个孩子紧盯着神妙的纸牌，识破了他的诡计，拍着手尖叫道：“我看见了，我看见了，骗人，骗人。”这样一来父亲作为魔法师的声名便立刻破灭，但周围回响着欢乐的笑声。

他特别喜欢比他小十岁的奥古斯丁（Augustin，学名世熙），而且事实上在给他这个弟弟起名字的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父亲虽然没有杰出的音乐天赋，但他在一件事情上都追求完美。那时他正在钢琴上执着地练习歌曲“啊，你爱奥古斯丁”，使家中其他的人也不得不以之作为娱乐。所以当这个家庭中第二个男孩子出生的时候，似乎很自然地就给他起名叫奥古斯丁，因为这个名字已经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中。

除了年龄上的差距和对他作为长兄而给予的尊重外，父亲和他的弟妹还有一种文化上的差距，他是在国外出生并接受教育的；而他们的文化则是中国的。甚至他所说的中文也和他们的不同。因此本来可以缓解他沉默寡言天性的热情和亲昵，也就不存在了，甚至反而增加了他的孤独感。他和孩子们在一起并不感到轻松自在。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和自己的孩子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疏远。

祖父的继室虽然喜爱她丈夫前妻的儿子，而且常常把他当作自己三个儿子的学习榜样，但在父亲心目中她并不能代替亲生的母亲。这位继母目光敏锐，言语犀利，父亲在对她表示尊敬时，总觉得感情中似乎缺乏一种对自己生母的那种亲子之情。到我的祖父去世后，随着不可避免的角色颠倒，父亲才成为她的顾问和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加深了30年代父亲在日内瓦时，他们经常通信联系。在北京的继母倾吐了在日本人入侵中国之际，对她的儿女们的担心和教育他们的艰难。在支绌的经济状况下，她只得向父亲寻求帮助和征求意见。

实际上父亲自六岁起所受祖父的影响大都是在祖父离家的时候形成的。祖父自1890年出国任驻英使馆随员，1894年任驻美使馆秘书，1896年任驻俄使馆参赞，1902年升三品卿衔

使俄大臣，1907年内调外务部右丞，旋又出使日本，他频繁地往来于欧美各国，使父亲对他的外出已习以为常，以致后来竟认为他在家是例外，而不在家倒是正常。

虽然祖父的事业和他第二次的婚姻使他明显处于优越的环境，但家庭中并没有奢华的习气。他欣赏社交和宴会的快乐，也同样喜欢恬静的乡村情趣。他仍然保持着农民的节俭习惯，即便在他离家外出时，也确保家庭事务的处理不得有任何社会上常见的浮华奢侈作风。

当时大多数外交官去国外赴任都带着他们的儿子，可是祖父不打算打断父亲的教育。1907年他被任命为驻日公使时，便将父亲安置在圣彼得堡他的老朋友特鲁别茨科伊亲王和王妃的家里。

这种家庭环境的改变对某些孩子可能会形成心理创伤，但对父亲来说，却给他提供了自幼儿以来所没有感受过的幸福。特鲁别茨科伊王妃结婚时十七岁，亲王比她大二十岁；虽然他们的年龄差距很大，却是一对恩爱夫妻。王妃与罗曼诺夫家族有亲戚关系，很有教养，待人彬彬有礼。但年轻的乐观情绪和幽默意识冲破了她所属阶级的清规戒律，她天生地充满柔情，锺爱她自己的两个儿子。当父亲来到他们家时，她把这种爱心也延伸到他身上。

父亲很喜欢她，儘管在这样幼小的年纪，他不明白为甚么特鲁别茨科伊一家和其他俄国贵族对罗曼诺夫皇室会有不懈的忠诚。在俄国教堂做礼拜时，随着低沉的赞美诗，缭绕的香烟和金色的圣像，为沙皇及其家庭的祈祷占了礼拜活动的大部分内容。如果说父亲对他们崇拜的对象抱有怀疑，却从未怀疑过礼拜的表面仪式。东正教礼拜的庄严气氛淹没了他，这种记忆伴随了他一生。特鲁别茨科伊一家和他当时就读的高级贵族学校的大多数同学在俄国革命中被毁灭的事实，使他终生对共产主义抱有反感。

在安娜中学，父亲除了获得友谊外，还开始学到后来证明对他是如此宝贵的语言知识。这所学校原先是德国人办的，所以德语自然成为那里讲授的语言之一。虽然不是军事学校，但学生们穿着统一的军服，看起来像一所兵营。如果说学校本身仍然保持着代表过去时代的象征，学校的课程安排倒不是那样，父亲享有受到这个国家一些最优秀教授进行教育的荣幸其中之一是当时的一位著名诗人，学校规定他讲授古典文学，但他对现代文学的热爱充满他的课程。父亲作为他的最可造就的幼小學生，被点燃了对文学的热情，这种热情贯串了他的一生。

作为小男孩，这些小学生都只被呼以教名，一旦到了十三岁，就被称以全名，包括教名，父名和姓，但不包括任何头衔，以表示相互尊敬和平等的社会阶级。

学校里不需要严格的纪律制度，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来自上层社会，在家里从摇篮中就学习了礼貌和顺从。儘管父亲既不调皮也不捣乱，但他的问题是喜欢说话和与人交往。他不惯于安静，因此常被老师命令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中罚站，让他呆在那里，直到能够控制住他的舌头为止。

这种事总是令人难堪的，他害怕回到家中再遭到申斥，儘管申斥一般并不严厉，只是来自特鲁别茨科伊亲王的责备和取消他饭后游戏或星期日去滑冰的权利。

特鲁别茨科伊家的府第和当时其他俄国贵族的府第一样，宽敞，而且在冬天总是温暖的。房间里到处燃着明火，充满木柴的烟味。在寒冷的季节，还安装上双重窗户以抗御外面的冰雪严寒。窗户的两层玻璃之间有浸透着化学药品的棉花，防止结冰。

正如大多数贵族家庭一样，使用着比家庭成员还多的仆人。除了必有的保姆之外，还有一位家庭教师，通常是年轻男人。冬季天黑得早，当气温降到负25度以下时，孩子们便呆在家里，由家庭教师辅导。

吃饭时，家庭教师和保姆与家庭成员坐在一起。保姆都是外国人，来自良好的家庭并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教育水平。在非常富裕的家庭中，每个孩子都有一名保姆。在饭桌上全家按传统只说保姆国家的语言，从而强调了对她的尊敬与感情。这也是父亲后来在他自己的家庭中坚持的传统。虽然我们都能够说几种语言，并且喜欢在别人面前把几种语言混杂着说，以此取乐，但从不允许我们在保姆面前这样说。

特鲁别茨科伊家的英国保姆格利佛小姐来自格拉斯哥，是位很讲究规矩的女人。父亲就是跟她学会了说非常流利的英语，以致1912年他在安娜中学毕业时，被选出来用俄语和英语发表告别演说。

如果说格利佛小姐博得了父亲的尊敬，那么，勒妃夫小姐则博得了父亲的倾慕。勒妃夫小姐具有一半法国和一半波兰血统，曾在俄国受过教育，是一个父亲也渴望同样做到的世界主义者。她有着黑色的眼睛，柔和而带有浪漫情调的口音。她的飘拂长裙和离去时留在空气中

的淡淡香水气味，使她成为父亲少年时期的仰慕对象。问他为甚么如此迷恋这个新来的保姆他梦幻般地回答说：“因为她太美了。”看来父亲对于美色的喜爱在小小年纪时就萌芽了。

但在勒妃夫小姐之后的德国保姆克伦佩雷尔小姐却没有能引起父亲同样的反应。他声称克伦佩雷尔小姐不喜欢他，所以他也不喜欢她。看来在父亲的感情中，美色倒也不是不可思议的必然出发点。

特鲁别茨科伊亲王曾在英国学习，一丝不苟地遵从吃正餐时衣着整齐的英国习惯，并且希望全家也都如此。然而，儘管表面气氛显得正规隆重，但吃饭时总是一段快乐，混乱，而且常常喧嚣的时刻，在人们喋喋不休的说话声中，父亲的声音一直是最为突出的。

每个孩子，包括父亲，在府第中都有自己的房间。当度假时，全家人连同保姆、家庭教师以及仆人们，全都前往在芬兰和在波罗的海海滨的家庭别墅。在那里，男孩子们被鼓励参加体育活动，特别是骑马。父亲后来决定买他自己的比赛用马，便是受童年时养成的爱好骑马的影响。

拳击也使他感到兴趣，后来在巴黎他还不断寻找拳击伙伴；不过他们大多显得粗暴和未受过教育，故而在拳击场外很少来往。一天在练习拳击时，父亲偶然失手，在他们之中一个人的鼻子上给了很重的一击，这时他立即垂下手臂道歉，但粗暴的对手却乘机回敬了他一击上钩拳，把他打倒在地失去知觉。

特鲁别茨科伊亲王虽然家庭富有，但仍追求作为高级文官的事业。这倒不是由于任何经济需要，只是希望做一个为国家服务的人。父亲在特鲁别茨科伊家养成的许多方面的价值观他自己在其他情况下有可能是得不到的。其中之一便是形成了他后来致力于为国效力的基本志向。

这些男孩子们在十五岁前上学总是由人接送。路上经过基洛夫芭蕾舞团和稍远一点的暗杀拉斯浦丁的尤素波夫住宅。在冬季，照例有几碟热松饼帮助消除在回家路上受到的寒气。父亲与尤素波夫家的友谊一直保持到革命后他们逃往巴黎。过了尤素波夫住宅便是罗曼诺夫家族的宫殿。

父亲在圣彼得堡的最后几年正是中国的满清王朝临近灭亡的时期。那里和俄国一样，旧秩序即将崩溃。

中国得以避免彻底的革命，先祖的斡旋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到那时为止一直效忠于清朝最后的太后，当时是他告诉她满清王朝的大势已去，如果要避免流血，退位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这样做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很容易使祖父丢掉他的脑袋。他告诉太后她的真实处境，而这样做的风险很大。人们都不敢这样做，是祖父代替总理大臣袁世凯承担了这项任务。除了勇气外，这件事还显示了祖父的才能。虽然比不上革命者和先驱者，但他尽了一切力量使显然势同水火的各派协调起来，并找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

1911年中华民国艰难诞生后，祖父得到了报偿，成为旧政权留下的少数成员之一，在新政府中被委以显要职位。到了20世纪20年代，他还曾短期担任内阁总理，达到他事业的顶峰。

这些年中，父亲几次探望他在北京的父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儘管始终不允许他独自步行去学校，可是从十四岁起，他却常常单独乘船旅行。在国际上纷扰不宁的多事之秋，他常携带一支实弹的手枪，以备一旦受到攻击时用以自卫。在一张他少年时的照片中，他胸前的口袋上，一条白色手帕的旁边，便露出一支手枪的枪口。他的面孔看起来严肃而悠然。他的经历在早年便培育了他的自强自立，并逐渐成熟，使他在以后的岁月中获益匪浅。

在安娜中学完成了中学教育后，父亲告别圣彼得堡的同学们去巴黎与他的父亲会合，当时我祖父是驻法公使。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同学们可悲的永世诀别。

当时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政府正处于混乱状态，临近崩溃边缘。祖父衷心拥护民主政治，他向上级发回许多电文，试图使他们相信必须采取更为现代化和民主化的路线就像他曾利用他的说服能力，避免了1911年的彻底革命那样，他又利用这种能力劝说中国政府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战争，正是由于1917年的参战，中国后来才得以摆脱一个落后国家的地位，作为一个国际大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

父亲在巴黎的大学岁月，培育了他文化修养的另一个方面。他的童年时期是在怀旧的斯拉夫传统中度过的，被反复灌输的是热爱俄罗斯文化，革命前的文学艺术和萦绕心头的教堂曲调；而巴黎则给了他理智方面的教养，他的弟弟世熙在巴黎读公立中学，他们的关系逐渐变得很亲密，在随后的岁月中，继续不分彼此。世熙后来陷入不幸的婚姻，生活放荡和负债

累累，使他深感痛心。

由于父亲在俄国学习时期已能讲流利的法语，他顺利地适应了法国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他感到和法国人，特别是法国漂亮女人的社交很谐调，直到老年他还非常喜欢和她们交往。父亲正是在这里定下了他未来生活模式的调子。这种生活模式常常更适合于花花公子而不是外交官，但是他具有一种潜在的意志力量，使他的生活和事业都牢固地保持在正轨上，这是与世熙不同的。

他在政治学院和巴黎大学法学院上学时，为了提高他的英语水平，曾到牛津和剑桥去度过他的暑假。他感到英国的生活方式非常文明，特别是在剑桥，他发现那位称为海费尔德夫人的女房东极为仁慈，富有英国文化的魅力。海费尔德夫人是个寡妇，她的丈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年战死。她把位于特朗品顿路的乔治王朝时代的堂皇住宅分成若干房间，供年青的大学生们租住。儘管海费尔德夫人迫于环境，把自己的住宅拿来出租，但未必能从中获得多大收益。这些年轻人所付的房租很少，像所有的年青人一样，吃得却很多，即使在半夜油煎咸猪肉的香味也很可能像在早餐时一样，渗透到楼梯间。父亲在这里开始尝到熏鲑鱼的滋味，后来只要他去到英国，总要寻访一家早餐能提供美味熏鲑鱼的旅馆。

五十年后，我开车送他去到剑桥的海费尔德夫人住宅，那所房子还像当年他的学生时代一样，矗立在那里。他注视着房子，眼中充满怀旧之情。我们没有从轿车里出来。

父亲终生钦佩英国人的温文尔雅和坚毅容忍，儘管中国人曾在英国殖民主义者手中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和背信弃义的行为，他还是赞扬英国军人和平民在战时的勇敢，坚持认为他们的士兵是所有国家士兵中纪律最好的。受他父亲开明思想的影响，他断言英国的政治制度是一切民主制度的典范。他尊敬英国人的谋求妥协和适应情况变化的能力，尤其称赞他们的“君子协定”行为，认为这是在其他国家罕见的。

在牛津和剑桥，父亲结交了许多英国人和非英国人朋友，这些人 与他保持了终生友谊。过去的大学朋友们在国际会议中重新出现，儘管有时是在政治上对立的方面，但他们之间的联系总是密切的。1930年在北京，以及后来在40年代他被召回遭到战火破坏的重庆时，他高兴地发现这些老朋友之一的伯克利·盖奇(后为伯克利爵士)仍在那里的大使馆任职；他们两人不仅有共同的政治利益，而且都是乐天而随和的人。像这种从青年时代建立起来的友谊，大有利于减轻战争年代的苦恼。当然，由于这种亲密的友谊，使伯克利·盖奇成为英国外交界中杰出的中国通之一。

虽然父亲的享乐意识和追求欢娱的能力已经变得带有一些传奇色彩，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从来不犯工作和娱乐不分的错误。父亲在联合国作为他那个部门的首脑，后来以选择最朴素的女郎作他的秘书而闻名。有人问他这是何故，他解嘲地说为甚么要在一个人的路上设置诱惑呢。同样，他对政治的关注是严肃的，不因私人关系而抱有偏见。他上大学时最关心的事情是他的祖国的情况，以及日本对这个国家的威胁。

祖父意识到他的儿子真诚地愿为国家效力，决定试一试，把他安插在外交机关。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一个人由身居高位的人推荐进入仕途是正常的和必要的。但受过西方教育的父亲对于这种做法感到不安，不过他接受了这种流行的亲属提携的做法。他的出身背景向他逐渐灌输了一种“高贵者理应高尚大方”的责任感，应当尽可能地帮助亲戚和朋友。在他的大半生中，一直陷于要求觅职、升迁和推荐的为难处境之中，甚至到了向他进行贿赂和引诱的地步。在原则和人情的左右为难之间，他力求走出一条中间道路，通常这意味着尽可能地徇情助人，然后又感到懊悔。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几年，父亲继续生活在巴黎，在那里得到特鲁别茨科伊一家惨遭屠杀的消息，使他无比震惊；他曾把这个家庭当成他自己的家。最初只证实亲王和王妃在革命的动乱中遭到杀害，后来他才知道，他们的几个儿子，还有他的大多数同学，他这一代的精英，也都丧失了生命。他始终没有弄清他不喜欢的克伦佩雷尔小姐的结局，这位德国小姐曾是最后一个保姆，并一直留在亲王家里。但当他想象她可能遭到的命运时，当年作为孩子时对她的苛刻看法使他久久地萦绕在心头。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1918年，他从大学毕业，获得法学和政治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集中论述了中国和俄国这两个他心目中最亲密国家的关系。由于学术成就显著，他被授予了古朗库尔奖和金质奖章。祖父为他的儿子感到自豪，儘管以他的为人，在口头上并不这样说。父亲也同样地缄默不言，他已经长大成人，认为他的成就不过是实现了他父亲对他的期望。只是在父亲去世后，我才在他的个人财物中发现一个精美的金质挂件，上面刻有他的

名字，是圣彼得堡法贝尔热工场的制品。1913年他在安娜中学作为班里最优秀的学生，被授予这个人人都想得到的凯撒奖。他从未对我们提起过这个奖品，我只是在一本《名人录》的词条中得知这次获奖。

父亲完成他的学业后，更渴望从事他所选择的职业。他的政治洞察力已为俄国发生的极其可怕的事件所磨砺。这时祖父已是巴黎外交使团的团长，父亲可谓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当时，和平会议即将在巴黎举行。

1918年夏天凡尔登战役之后，人们感到战争终于将要结束。10月，奥地利求和；11月，战争出人意料之快地结束了。祖父得知协约国将要成立一个最高委员会，考虑和平条款，就致电中国政府，请他们任命一位代表参加委员会。顾维钧博士奉命立即前往巴黎。

父亲被任命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秘书时，他的发展机会来到了。尽管他初出茅庐未经历练，但他的西方式的机智和不寻常的语言才能，很快就使他崭露头角，受到人们欢迎。虽然他与之共事的人们都是他父亲的朋友，他敏锐地意识到需要让他们看出他是能够胜任的。他最明显的短处是对于中文文书的知识不足，这是他在欧洲受教育时，遗憾地被疏忽的一个领域，因此他难以阅读中文文书。他发誓要尽快纠正这个缺点。

对于顾维钧博士，父亲发现他既是良师又是益友。顾博士仅年长他几岁，但已被公认是给战后中国代表团争光的最杰出人物。在父亲的整个生涯中，遇到任何不明白的问题，总是暂停下来，向顾博士请教。他们后来继续紧密合作，特别是在国际联盟，直到1946年父亲离开外交部，服务于联合国秘书处。1972年在父亲的葬礼上，顾博士发表了感人至深的悼辞，缅怀这些年来他们为中国所做出的努力。

顾维钧在解决一些中国内部问题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且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一切国际活动中领导中国代表团。他作为驻华盛顿大使，度过他外交生涯的最后年月；退休后还在海牙国际法院担任过法官。

由于顾维钧和我祖父胡惟德一道说服中国政府在1917年参加战争，因此颇受各大国的尊重。他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有私交，威尔逊总统曾支持中国对抗日本的领土野心（尽管效果有限），作为回报，他要求顾维钧支持他建立一个维护和平的世界组织。但极富嘲弄意味的是，美国总统虽然开创了国际联盟，却未能说服参议院批准参加这个组织。

然而，还是多亏了威尔逊，日本才未能把中国排斥在1918年的巴黎和会之外，尽管和会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不仅对中国，而且总的说来对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是如此。但最低限度中国能够出席和会，已得到国际的确认。

当然，顾维钧的目的是为中国争取最有利的条件。其中最令人担心的事情是日本企图保留它在山东的经济权益。尽管他警告说，这样只能有利于在东亚建立一个日本帝国，参加谈判的各国代表还是犯了致命的错误，而且不是唯一的错误。

巴黎中国留学生的示威活动和父亲以及其他中国代表们竭力争取改变巴黎和约的努力均告失败。战争结束时普遍存在的如释重负心情导致人们错误地相信战胜一方国家的所谓善意。

凯恩斯在其预言凡尔赛和会所犯错误的可怕后果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写道：
我们感知或关注我们自己眼前福利问题以外之事的的能力被一时锢蔽了。

父亲在他自己的日记中简单写道：

战争过后人们就希望忘却残忍的暴行。

父亲和他的外交官同僚们一样，尽管同情产生这种态度的欣喜与宽慰心情，还是预见到这种态度可能引起的巨大灾难。但那也是一个令他振奋的时期，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很少能够轻易地跻身于他们的行列。他的外交生涯从1919年的巴黎和会发轫，标志着他与欧洲发生长期关系的开端。

1920年，他被任命为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联盟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他在那里迅速成为鸡尾酒会上的宠儿，他的流利法语，风趣机智和擅长社交的才能使他成为当地贵介中受欢迎的客人。他在工作中严肃认真的品质肯定地得到上司的赏识：遇事考虑周全，严守

时间和尊重上级及同僚。

他的热情奔放和精力充沛，几乎是难以抑制地发泄在其他活动中。组织体育竞赛，桥牌，乒乓球比赛的必然是他。当然，还包括去夜总会。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聚会的客人，也被某些吃过他苦头的朋友戏谑地称为“恶作剧的能手”。

在日内瓦时，一天晚上父亲在城里一家最好的餐馆设宴招待十四位客人，其中之一是他的挚友和同僚金问泗。因为下午开会，他可能要迟一点到餐馆，拜托金问泗代作主人并开始宴会。这样做本是适当的，但直到夜阑更深父亲始终没去。金问泗处于不得不付账的窘境，而他身上带的钱却又不夠(那时还没有信用卡)。父亲总喜欢在人们的哄笑声中讲述这个故事，但他不得不承认，有时他也是他的朋友恶作剧的受害者。

1921年，父亲任职日内瓦，并因而兼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团的专门委员，这保证了他在国际联盟中有一个席位，能够参加在欧洲举行的大部分会议。

1921年中快得令人眼晕的升迁以他被任命为出席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的秘书达到顶点。这意味着他即将回到他的出生地，虽然会议从一开始对于中国人就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但有望重访华盛顿，则令他心情十分激动。

截至1921年，父亲和他的同僚以及许多有远见的外交家们，对于巴黎和约的不合理所产生的忧虑，已被证明是有充分根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站在协约国一边的日本，基于它在和平会议上提出的无理要求，现在已能通过控制海洋而主宰东方。它控制了所有前往中国和西伯利亚的海上通道，并掌握着从朝鲜到满洲的路径，而且可以从山东操纵北京。借助于它在山东的铁道权利，还能切断中国中央政府和华南的联系，并且能从滨海的福建省，对华中保持有效的支配。中国几乎没有愿意出面阻止日本这一势头的朋友。日本的同盟者英国不愿意得罪它；俄国则在1904-05的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起不了甚么作用；而美国在远东的兴趣又只限于他的商业市场。

综上所述，华盛顿会议可以说对中国没有好的前景，尽管父亲乐于有此机会回到他的出生地，可是他发现对美国的生活方式很不适应。不过，在政治上他一直认为美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希望；但是这一回，任何乐观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从表面看，召开华盛顿会议是为了在太平洋维持现状，实质上它保证了日本避免可能的英美联合海上进攻。对于限制陆上军事力量，并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因此日本可以放手建造适合用来对付大陆的潜艇和飞机，这种军备扩张将产生影响深远的可怕后果。

再者，父亲还意识到他的国家似乎没有发出任何呼声，要不就是它的呼声仍然大部分没有被人听到。在中国各大城市享有特权的大多数西方国家，更希望让中国保持半殖民地状态这就是令这位具有热情和理想的年青外交官深感沮丧的现实，尽管他个人的事业正继续以迅速的步伐向前发展。

1922年父亲被调往柏林，担任中国公使馆的二等秘书。确实是出于本性，他到任后立即开始认真学习德语，这门语言的基础知识他是在安娜中学以及跟克伦佩雷尔小姐学到的。意识到能够流利地讲德语，在和女士们搞好关系上是个有利的条件，无疑对他是一种鼓励。像往常一样，他活跃在当地的社交界中，发现有着充足的练习德语的机会。

他到达柏林不足一年，职务一再升迁。先是升为一等秘书，接着升为代办。看来父亲似乎是心想事成，仕途顺利。他考虑到随着每次升迁，正一步步靠近国际大事的核心，于是开始坚持写日记。

他记下来的这个时期给他印象最深的事是调解中国留学生在使馆外面的政治示威活动。父亲信奉言论自由，他冷静地通过使馆的窗户向外观察，看到示威有向可怕方面发展的危险已经发生了扭打，警察正要过来逮捕带头的人。父亲担心学生们这样做会中别人的圈套，所以不能给抗议者火上浇油，他知道德国警方对闹事者将施加严厉的处罚，于是他下楼去到街上，进行调解。他对警察们劝说道，学生们闹事是出于年轻气盛，并无任何邪恶意图。警察终于不情愿地撤退了。

在这些学生中有一张面孔是父亲在以后的生活中注定要再次遇到的，那就是周恩来的。

1925年，父亲在柏林的单身汉日子突然过早地结束了。他收到他父亲一封出人意料的来信，召他立即返回北京。作为外交舞台上社交最为广泛，受人欢迎的年轻单身汉之一，父亲

决不缺乏有吸引力的女友。但是，在柏林很少有条件适合的中国女人，而且不管怎么说，他的西方教育使他觉得和欧洲人在一起，比和他自己的同胞在一起，更感到自由自在。他已经决定在安家之前，过一段愉快的日子；但事情的发展出他意料。当时他正和一位德国贵族的女儿深陷爱河，有段时间他们两人痛苦得不知所措。父亲知道他的家庭不会同意这桩婚姻，可是他下定决心给他父亲写信，求他准许与这个德国姑娘结成连理。

对我祖父来说，这件事情是不容商量的；而父亲尽管年已三十一岁，但受传统的浸润太深，不敢公然反抗。他被解除职务返回北京，祖父当时是中国外交总长，父亲在北京被安排进外交部，担任出席中苏会谈的专门委员。

那是个痛苦的打击。生活似乎已在如此之多的方面对他敞开大门，现在又突然关闭了。他在北京的生活比在柏林的生活受到更多的约束。他再次和他的父亲、继母一道住在家里。虽然在表面上他和继母的关系还算谐调，但他清楚地知道他必须服从命令，而且要举止端庄，态度孝顺。

他感受到的所有失望，都深深地埋藏心底。虽然爱上“莉莉”还是几年以后的事，但把时间花费在焦思苦恋上，不是父亲的性格。

回家后，父亲按照礼仪惯例拜访了他的许多年长亲戚，他们都明确地告诉他，人到了三十一岁，该是找一个合适的中国妻子的时候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被邀请参加一连串的社交聚会，在那里，许多母亲们被鼓励带着女儿来物色女婿。父亲具有西方模式的浪漫气质而且一直怀念以前的情人，不大喜欢这种受人摆布的婚姻制度。然而，他表现得随和，假装对安排好的介绍感到兴趣，觉得这不需要他做出任何承诺。

当然，所有介绍给他的年轻女士们都有相当的家庭背景，可是经过了一年，这一连串的社交聚会，没有产生期望的结果。亲戚们感到困惑，暗中猜想父亲或许根本不打算结婚，要不就是想要寻找并不存在的十全十美的姑娘。介绍给他的人中有一位张女士，在巴黎时她父亲是我祖父下属的一等秘书，但这位小姐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还有一位廖小姐，她父亲是高级外交官，也是胡家的朋友，但父亲觉得他们之间没有甚么感情可言。

间或，父亲要去上海出差。那里有他的几个亲戚和朋友，其中有他的叔父和婶娘，这对夫妇没有孩子，按照习俗他们过继了父亲的弟弟世熙。婶娘是个喜好交际的女人，常在许多亲友的家中玩麻将牌，并且很喜欢闲聊。

在上海，一个命中注定的夜晚，父亲带着他的婶娘去到一家时髦的饭店出席宴会。在那里他坠入了情网。一位年轻的小姐意外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她的美貌使他见了寸步难移，正是所谓一见钟情。

这个姑娘便是陈秀英，上海外交特派员的次女，能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受到许多外国使馆中未婚男子的爱慕。那天晚上她被一位年轻的纽西兰外交官邀请到这家饭店，参加由他举办的宴会，他正在毫无希望地单恋着陈小姐。秀英的姐夫汪秦泽带她来这里，还要护送她回家。婶娘认识陈小姐，她的母亲是她的麻将牌友。

虽然父亲不像陈小姐的一些其他求婚者那样身材高大或面目英俊，但秀英暗中对他的殷勤态度感到满意，赞赏他的思维敏捷和用说笑话与讲故事来博得她喜欢的本领。以往她曾经遇到过许多很有前途的青年男士，然而没有一个像他这样令人倾倒。通常父亲总是喜欢和男人们谈论政治，那天夜里他舍不得离开，和陈小姐整整聊了一晚上，顾不上其余的客人，以致竟然使秀英遭到其他在场女宾善意地取笑。

紧在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去找秀英的母亲陈夫人表示求婚。陈夫人最初的想法是，没有一个年过三十的男人能够仍是单身汉，她怀疑父亲在国外已有妻子，而她的女儿必须是正室夫人，不能是别的，这一点是定不可移的。

婶娘向陈夫人保证，胡世泽确实是单身。父亲也向她保证说，他绝不纳妾。在当时的中国，新娘和婆母住在一起是习俗，但秀英是现代妇女，曾在上海的西式学校受过教育，她决定不遵守习俗，提出他的结婚条件是：她和胡世泽必须在北京有单独的住宅，不和公婆住在一起这种对习俗的藐视，在中国的上层社会是前所未有的。许多年里，秀英的这种要求在上海，甚至在上海以外的地区，都被认为是一件极不体面的事。

一俟这些基本条件私下得到同意，婚事的磋商，包括约请必不可少的媒人，便有了很快进展。秀英的父母正在担心他们的24岁女儿已经年龄不小，如果不在这个已晚的时期结婚，可能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夫婿。他们知道并且满意胡世泽的家庭背景，对他的国外经历印象很深，相信他会前途无量。秀英还没有完全被说服，因为他在家里颇受娇纵和溺爱，从未被要

求承担过任何责任。但她不愿意蒙上老处女的名声，而且对胡世泽明白表露的忠诚感到满意觉得这个男人是她可以完全控制的人。

父亲不得不回北京去工作，但婚礼计划继续进行。魏道明夫人是父亲在巴黎的大学同学，也是中国的第一位女律师，并且是胡、陈两家的朋友，表示愿意当他们的正式媒人。许多年后魏夫人仍把那种过时的习俗当作笑柄，开玩笑地要父亲对她这个大媒表示特别的敬意。

婚礼在1927年6月1日举行，距他们第一次见面仅仅三个月。这是那年的一件大事，是一场类似于前一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的现代化婚礼。新娘穿着一件齐膝长的白色婚礼服一副纯真少女的派头。新娘的头纱覆盖着前额，向后拖出几码长，似乎这对新人和他们的婚礼是特别为时装杂志的封面设计的。

使父亲感到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的父亲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祖父在财务上依靠他的妻子，并且住在属于她的住宅里。继祖母显然觉得去上海一行的花费太大。世熙叔是父亲的男傧相，是除新娘之外胡家参加婚礼的唯一成员。父亲因为他的父亲不参加婚礼而伤心得流下眼泪，这是母亲仅有的一次见他流涕。她责怪父亲的继母，认为那样做是一种令人伤心的行为。母亲还深深感到，因为婚礼是在上海社交界众目睽睽之下举行的，他们不来参加，便是对她个人有意轻视。

在汉口度过情调浪漫的蜜月后，父亲回到北京投身于他的工作。这对新夫妇住进属于父亲继母的住宅的一部分。按照约定，没有要求母亲和长辈们住在一起，单独给他们修建了一个院子。

直到1937年，这个家庭仍然十分富裕。这所在父亲继母的父亲去世前就属于她的住宅宽敞而舒适，有美丽的花园，一个小池塘，集中供暖设备，还有一辆小汽车和电话，雇着两名男仆，两名女仆，一名厨子，一名花匠，一名司机和一个老看门人。

尽管这个地方有许多诱人之处，父亲和他的新娘并没有长期住在那里，在他结婚那年，他再次获得晋升，担任条约司副司长，次年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和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

那个时候的北平是座迷人的城市，特别是对于那些享有东西方两个世界最佳事物的外国外交官们，更是如此。父亲很高兴重新遇到一些他做学生时在巴黎和剑桥结识的朋友，其中包括几乎到处都会遇见的伯克利·盖奇。盖奇和他一样喜欢骑马和结交漂亮女人，并且注定会在父亲的生活中不时突然出现。

在国内逗留的六年中，父亲的主要问题，说来似乎有点不大合乎情理，是不熟悉中国人的心理。他觉得他的灵活性足以适应东方和西方的传统，但像许多外国的外交官一样，他发现中国的官场很难应付，尽管他已经受到人们，甚至那些不赞成他的人们的青睐，他的一些同僚还是对他的西方作风有所疑忌，尤其是那些没有在西方受过教育的人。

虽然这时从政治上说，中国已经下定决心努力向民主政体发展，而且作为民主政体之特征的总统、总理、国会、内阁也都已经具备，但是缺少作为其深厚根基的代议制传统。父亲从内心深处意识到他在西方更感到安适自如，然而，他还是以他特有的专心致志态度，开始提高他的中文。因为在阅读公文时，由于缺乏中文知识，常给他造成困难。他还利用他父亲收藏的碑帖，规规矩矩地练习书法。他后来一直坚持这样做。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曾被允许在砚台上给他磨墨，条件是不许说话，因为练习书法必须在绝对安静中进行。

不久。母亲发现她已怀孕，但在第三月就小产了。她很想回到她父母家里，而且她姑母又是位助产士。当她再次怀孕时，就宣布在大部分怀孕期间和分娩时，要住到上海的娘家。她觉得需要娘家的环境，在那里她曾得到娇纵和溺爱，这仍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所以，永匡(Peter, 彼得)和我都出生在上海的外祖父母家里，那里的一切对母亲都是安全而又熟悉的。她总是要甚么有甚么。

母亲的身体一向不算强健，生永匡后变得很弱。她告诉父亲说，她感到确实无力拉扯一大帮孩子，想就此打住，父亲表示同意，但希望再有一个女儿。当第二个孩子是女孩时，母亲深感宽慰，她想：“现在我已尽到责任了。”

彼得这个名字是母亲取的。她喜欢阅读英文书籍，认为这是一个高贵的英文名字。我的名字“莫娜”(Mona)则是随着父亲的一位丹麦朋友的名字选定的。她嫁给了英国的博尚勋爵，我第一次见到莫娜·博尚时，已是一个结了婚的妇女，住在伦敦。她经常邀请我参加她的贵

妇人午餐会，在这种场合每个人都带着帽子，而我对此毫无准备。我曾无意中听到她为我辩解：“她虽然是个中国人，但她出身于上等家庭。”

我的外祖父母在上海的住宅是一座庞大而凌乱的三层楼房，位于法租界。内部很不整洁，看上去像是居住得很久很久了。正如在圣彼得堡一样，家里的仆人比家庭成员还多，他们构成这个家庭的一部分。也像所有体面的家庭一样，家里有一个裁缝，以满足我们所有的缝纫和制做衣服的需要。一个来自天津的妇女，她的唯一职责是为外祖母梳头，在精心梳理的髮髻上编入玉制的装饰物。

外祖父陈世光曾经当过上海市市长和外交特派员。因而，他有许多外国授给他的勋章，酬谢他为上海的外国人提供了舒适的生活条件，诸如排水系统，道路，电力和煤气。尽管外祖父身居高官，他在家里却没有任何发言权。外祖母是不容争辩的当家人，毫无异议地受到敬畏和服从。她的时间消磨在打麻将牌和为年轻的一代物色合适的结婚伴侣上。她没有儿子或许是件好事，否则，按照中国习俗，她的儿媳定会受到她严酷的辖制。

1930年，父亲被任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1931年4月，他出席中苏会谈，携带着母亲同去莫斯科。他在苏联首都逗留了几个月，那里寒冷而荒凉。父亲自从1912年离开圣彼得堡后，这是第一次回到俄国。他看见俄国人民原有的愉快活泼精神在革命后竟然遭到如此破坏，感到十分震惊。在圣彼得堡，他循旧路重访特鲁别茨科伊的府邸（他在那里曾经度过悠长的童年快乐时光），路过被长期废弃的尤素波夫住宅和阴森宏伟的罗曼诺夫宫殿，父亲感到心中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忧伤和痛楚。革命曾经作过如此多的许诺，然而给予人民的则似乎很少很少。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街道上遇见的俄国人，他们走得何等提心吊胆，他们的脸上何等地缺乏欢乐和希望。”他天生是个乐观和向前看的人，决不会再次以这样忧郁的心情回忆过去，重寻旧梦。

他们在俄国逗留时期的一个积极方面是，证实了母亲学习语言的天生能力。在几个星期内，只通过听其他人的说话，她已能用简单的俄语表达意思。父亲很受感动——他似乎已经找到了理想的外交官妻子。但母亲不喜欢她在俄国的日子，或者说，长时间等待父亲返回旅馆，当时她不敢独自出门。她决定将来不再陪伴她的丈夫外出执行短期任务。

无论他们的婚姻生活后来如何发展，由于性格的不同，母亲首先决定，让父亲独自去占据政治舞台，而不给予他那种作为一个年青外交官可能会感到需要的支持。这是他们关系中一个难以修补的裂痕。

父亲游刃有余地从事着他的工作和职务，并不顾及家庭生活中的失望，和工作过程中的艰苦。然而，在他表面上冷静达观态度的下面，一直有着一种对未来的担心，因为他的未来是与他的国家的未来连结在一起的。他也为个人的经济发愁；外交部经常拖延发薪。而他是在他们的管辖之下，在很大程度上全凭他们的高兴。

他按照规定做好每一件事，希望能早日得到一个外放的职务。1931年，莫斯科会谈结束时，他的努力得到了报偿。父亲被任命为驻日内瓦国际联盟的代表，专门负责麻醉品事务。日内瓦即将成为他们以后逗留十多年的所在地。

第二章 日内瓦

中日战争——国际联盟——胡惟德逝世

1931年9月，紧接莫斯科会谈之后，父亲奉命出席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危险麻醉品顾问委员会。会后即将回国之际，发生了一件引起国际上巨大反响，并深切影响到他以后事业的大事。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显然未得到东京命令的情况下，乘中国和世界上普遍政治混乱之机，占据了东北的一部分。

事变的一连串事件肇始于爆破南满铁路，接着日本军队就侵占沈阳和其他城镇。这是中国和日本之间非正式战争的开始，从而完全改变了远东的形势。

1932年1月，日本人占领山海关，完成了他们对中国东北南部的控制。2月，溥仪被扶植为所谓的‘满洲国’摄政，一切重要行动都在日本顾问的控制之下。3月，中国在淞沪战役中失利，被迫撤出上海。

中国决定向国际联盟呼吁，父亲被外交部任命为顾维钧博士执行这项任务的助手。国联的局势由于日本的拒绝撤兵和中国的除非日本撤兵否则拒绝谈判而陷入僵局。

父亲和顾博士都认为大多数日本领导人是赞成谈判的，但东京的外交政策，受着力量日益增强的日本军部的左右。而且由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支​​持不力，从而纵容了他们的侵略。

父亲在日内瓦代表中国权益的工作由于中国内部持续的不团结和互相对抗，遇到许多困难。那时非常需要强硬的外交政策，而事实上中国甚至还得努力使国际舆论承认它是个国家。在那些日子里，父亲和密码译电员经常通宵不眠，发电报请求政府指示，复电到来后，有时竟与以前的指示相矛盾。显然，在政府的权力斗争中，那随后的决定可能是由不了解国际形势的人作出的。

来自南京的混乱指示的典型例子是，有一度政府命令它的代表，力促国联通过对日本实施制裁，而随后由于华北军事局势的恶化，又改变了主意。

在几次关键性的辩论时，蒋介石不是外出，去照应北方的军事局势，就是到别处与共产党作战。由于没有其他国家制止日军在中国的推进，也由于中国不能举国一致，日本的进攻基本上未曾受到阻挡。

最后，国际联盟决定派一个以李顿伯爵为首的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顾维钧博士是调查团的顾问，后来成为中国驻国联行政院的代表。

调查团的结论有利于中国，因此国联命令日本应该停止对中国的军事压迫。然而美国不是国联成员，妨碍了对日本采取联合行动；而且英国不大愿意背叛他们与日本的同盟，因为这两个国家在远东有着共同的殖民利益。国联不再命令日本撤出中国东北，而代之以提出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即建立一个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但由日本控制的自治政权。这个方案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都没有解决问题。

日本的反应是，在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这个举动是对国联机构和权威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日本的例子鼓励了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侵略行为。

发现日本人使用鸦片和其它毒品当作在中国东北进行统治的一种手段后，冲突越发激烈。这是欧洲新闻界刚刚意识到的一种新军事武器。日本有组织地把毒贩派往中国东北，将毒品像廉价的纸烟一样卖给中国士兵，然后，吸毒的士兵会逃走或者不战而降。其后四年间，在中国东北的鸦片生产提高到每年三十吨。士兵，贫民，老人，绝望的人，道德沦丧的人，全都成为受害者。

毒品已经变成一个专门的问题，父亲成了这个问题的专家。1932年他被任命为中国在国际联盟鸦片和其他危险麻醉品顾问委员会的代表，直至战后。这时毒品已不仅是政治问题而且也成了社会问题。

1935年，国联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另一桩侵略行为：意大利向东非派遣军队。这是阿比西尼亚危机的开端。

因为意大利企图征服阿比西尼亚的决心变得越来越明显，国联对它实施了制裁，但其中存在着漏洞，意大利不顾国联几乎全体一致通过的制裁，继续一意孤行。

顾博士和父亲在这场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有明显联系的辩论中，夜以继日地工作。这是国联第二次被证明不起作用，成为所有参加国家的耻辱。施加的制裁显然无效，所以企图通过制裁来解决中国东北问题也是不会有结果的。

1936年7月，蒋介石成功地完全控制了广东和广西。但这年9月，日本提出七项问题，要求解决。

在面临日本侵略之际，蒋介石企图把国内各个党派联合集中起来的困难，以1936年他在西安被张学良扣留而达到顶点。张扣留他是为了迫使他向日宣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传奇性的事件之一。人们认为蒋是抗日人民阵线的唯一领袖，甚至共产党也承认这个事实；在遍及全国的效忠示威运动之后，蒋介石终于安全无恙地被释放。

这个事件导致政府与共产党之间暂时和解，共同抗日，然而各个派别之间仍然难以形成统一的政策。有些主张绥靖，另外一些则主张坚决抵抗。

这时父亲每周都进行几次演讲和广播，主张国际上团结一致维护和平，因为亚洲的紧张局势已影响到欧洲，反之也是如此。父亲认为俄国是当时唯一能够，并且愿意帮助中国和捍卫华盛顿条约的西方国家。这项条约保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1937年8月父亲在“国际学生之家”发表的关于中日危机的演讲，曾被广泛报导。其主要论点是，日本需要中国作为它的原料供应地，过剩人口的殖民地，以及在日本和俄国一旦发生战争时，中国不能对它形成危害。它的“不能友之，则必杀之”哲学，是十足的国际强盗逻辑。

在这个世界历史上特别困难的关头，中国对于国联并无过多奢望，但它曾经指望国联至低限度能让外界了解中国的实情，以便引起国际的注意与同情，或许能够得到一些物质或政治上的好处。

1937年7月，日本人占领了北平和天津，但中国的抵抗看来很坚强。8月11日，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不断发生小规模的战斗，中国人一直在抵抗。一架日本飞机在保定被击落。日本人对保定的空袭未能造成太大破坏，说明我们的防空力量正在加强。

南口抵住了日本人的多次进攻。据日本的军事专家估计，铁路车站虽已占领，但三个“关口”将难以攻克。在北平北面二十公里的清河镇，日本军队在重占该地之前曾上百次被击退。他们现在已经撤走在南口的侨民。

事实上，日本正在从中国各地撤退侨民。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形势进一步恶化，也就是说因为他们害怕通州杀害日侨事件的重演。8月9日的《时报》道出了真正原因，即日本侨民遭到联合抵制，使他们不堪承受。这类事件正在中国各地发生，说明民族意识的觉醒。

8月14日，各家报刊报导了在上海爆发的战斗。父亲写道：

与1932年的淞沪战役相似，但这次中国军队采取了攻势，正在进攻日本人的工厂并封锁长江下游的航道，还烧毁了吴淞的桥梁。报刊说，这场战争每天消耗日本人一百万英镑。

截至8月底，来自外交部的消息证实，中国军队已经进抵黄浦江边，将日军分割成两部分。父亲以满意的心情记下：

《巴黎回声报》首次报导了中国士兵企图冲破敌人防线的英雄行为。这些行为通常是予以记载的，而日本人则为他们的神风突击队员树立纪念碑。

当时一般的态度都倾向于对中国更加同情，这是令人振奋的。父亲写道：

在英国，《泰晤士报》的社论变得越来越强烈地反对日本。他们认为上海的战斗是可怕的，使人们回想起世界大战。他们报导说，即使是在上海的外国人，也感到恐惧。冯玉祥将军视察上海的我方军队时说，我军士气高昂，战士们视死如归。

总的说来，我们战斗得越好，得到的同情就越多。愿意帮助中国的瑞士人民正向我提出要进行捐助。报刊上充满对中国士兵为保卫他们的每寸领土而进行英勇决死战斗的报导。如果我们再有充足的军事供应就好了。

中国出现的团结抗战新精神，使他感到高兴。他也对任何可能暴露中国缺点的事情倍感痛心。1937年8月，所有的报刊都登载了一架中国飞机把炸弹误投在上海公共租界，造成数百人伤亡的事件。父亲痛心地下记：

他们承认这是一次误投，但这将表明中国没有做好。

一个星期后，一则未经证实的报道说，日本飞机曾使用毒气炸弹。几天后又传来英国大使在其小轿车中被两架日本飞机开枪击伤的消息。使中国飞机误投炸弹的恶劣影响稍被抵消。父亲写道：

尽管日本人声言他们是认为蒋介石在那辆小轿车里，这件事在英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因为日本并没有对中国宣战，英国人不把这看做是正当的藉口。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人也被激怒了，他们甚至责怪英国人软弱！《泰晤士报》的社论说，日本可以决定谁是它的敌人，但不那么容易找到朋友。战争结束时，真正的困难便将到来。

父亲致电在伦敦的郭泰祺大使说：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可以就日本人使用毒气的事件，在报刊上发表一个声明。逐渐增长的乐观情绪暂时破灭了。8月27日的报导说，北平由于某个中国领导人的出逃，已未经战斗而撤出。

父亲在伯尔尼出席了一个由埃及代办阿萨勒举行的招待会。他在日记中写道：

阿萨勒请我留下用餐，但我拒绝了，因为我没有享受的心情，尽管有一些富有魅力的朋友在场。使人愤怒的是，据说北平失陷是由于有人叛逃，而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这只能在外人面前证明，日本关于中国不团结的断言是真实的。报刊公布说有三千至五千日本军队进入北平。没有军乐，只有一种骚乱的气氛。中国老百姓都怀有敌意呆在家里。

尽管形势普遍显得暗淡和阴郁，但是父亲对于中国终将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没有动摇。

那天我对礼宾司长斯塔奇说，我们会打败日本鬼子的。战后我再次见到他，并提起我说过的那句在当时曾使他颇为惊奇的话。他承认我是对的。

8月30日，从同盟社传来中国已与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最初中国否认此事，但接着予以证实。父亲写道：

第二天《今日报》刊登了条约中的一项秘密条款，大意是俄国将提供一百架飞机，用存放在那里的黄金抵付。

9月，日本人占领了张家口和大同，到10月，石家庄与榆次相继失陷，看来他们将要攻取太原。

然而父亲还是乐观地写道：

形势的发展从外交和军事观点而言，比我当初所想的要好。在外交方面，日本飞机轰炸中国城市，产生了与预期目的正好相反的效果。中国平民并没有被吓倒，恰恰相反，他们比以前更增强了抗拒侵略的决心。此外，轰炸激起了全世界的义愤，已出现了抵制日货的运动。国联的报告，肯定比我们所希望的更对我们有利。国联大会开始时我觉得列强不打算干任何事情。可是在结束时，形势完全改变，我们认为已获得目前情况下最大限度的支持。

在军事方面，我们并没有真正战败。虽有一些战略上的撤退，但损失早在预料之中。中国军队在各地的抵抗都很英勇，没有像某些欧洲人预言的那样，出现投降或逃跑行为。

现在，值此布鲁塞尔会议前夕，我们还不确知我们将要做些甚么。但有两件事情是肯定无疑的：一是认真对待其他国家的调停；二是拒绝接受任何违反华盛顿条约的解决办法。美国认为日本不是不愿意由一个没有敌意的国家出面调停。这是件新事！另据宣称。在上海的英国军队曾射击从头上飞过日本飞机。我不认为这会影响到整个形势，但我们还须等着瞧。重要的是克服失败主义，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坚持下去。昨天，上海的来电说，支持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的运动正在发展，还说，我们将不接受妥协。

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国联和美国都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但未能实现调停。到了11月，上海和苏州先后失陷。11月20日，中国首都由南京迁往重庆。一个月后，在骇人听闻的有关日军暴行的报导声中，南京也陷落敌手。

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恰恰是这些失败，导致了政府以前所不能作到的，全中国人民，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大团结。至少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得到了全国一致的支持。尽管1938年1月青岛失陷，日军沿长江推进，父亲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的抵抗正在超过一切预测。我们现在的武器装备好了一些，并且有了较多的飞机。我们在几条战线上已转入进攻，夺回一些重要的战略地点，迫使日本人退却。他们至今还未能渡过黄河。在中国现在已再没有人谈论妥协。

唯一的坏消息是中国的法币贬值，但我认为那是金融家们的策略，我们会商定一个一致的意见的。莫里斯·普里瓦在他的书中预言，1938年3月11日欧洲将出现严重事件（在奥地利），3月底中国将获得胜利。让我们盼望能够如此，因为他预言了中国的胜利。

除俄国外，列强为我们做的少而又少，他们送来的只有药品。国际局势的发展还不如我们的抗战那样令人满意。

1931年中国在日本的侵略面前没能得到有效的支持，不仅证明国联先天性的软弱，而且证明了它的许多成员国的虚伪。日本是英国的一个重要盟国，英国希望一旦日本在中国东北安顿下来，就会转向北方对付苏联，并尊重英国在远东的利益。英国和法国一心反苏，并且念念不忘它们在远东的殖民地利益，所以不愿谴责日本。只有美国真正同情中国，但无法在国联采取行动。那时是父亲生活中的一段黑暗时期，他的悲观情绪只有在给他弟弟世熙的信中表达出来。

1938年3月，一个“维新政府”在南京出台，这是日本人重演早些时候的“满洲国”故技。

当时世界正被德国兼并奥地利和英意条约弄得晕头转向。英国人希望这个条约能够消除意大利在地中海和近东对他们的敌意。日本人趁欧洲的这个混乱之机，重新向前推进。

5月，日军占领厦门和福州，随后于6月占领开封与安庆。

9月，由日本人操纵在北平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打算使中国成为日本的保护国，作为设计中的“东亚新秩序”的一部分。

正当欧洲普遍关注德国-捷克危机之际，广州和汉口先后落入侵略者之手，这终于引起西方国家的抗议，因为它们看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但抗议对东京并不起作用。

1938年9月慕尼黑协议达成，国际联盟遭受了危及它存在的最后打击，世界已面临战争。

在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困难时期，永匡和我基本没有意识到发生在我们周围的重大事件，虽然我们从很小就习惯于从收音机收听每小时一次的新闻简报，并且知道当广播进行时保持安静。

就父亲而言，尽管担心国际局势，但这些年正是他自己的事业开始飞黄腾达的时期。

1932年，他除任驻伯尔尼公使馆代办外，还被任命为国际联盟中国全权代表办事处处长。到1933年他被晋升为特命全权公使。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瑞士将是他的家乡。

他的新任命不仅使他经常往来于伯尔尼和日内瓦之间，而且承担着大量的工作和责任。因为中国外交部对于应付国联的各种国际问题缺乏充分准备，主要依靠诸如父亲这样的一些代表团成员来负责维护中国在那里的地位。

父亲三十八岁时即成为国家的代表，负责协调中国代表团在国联和国联秘书处的活动，接待聚集于日内瓦开会的中国外交官，与中国图书馆的学者们保持联系。对他在时间，精力和社交技巧上的要求越多，他似乎就越高兴。他很容易和当地社交界及知识界的人士交上朋友，中国在欧洲的其他使馆人员都经常期待着他给予帮助和忠告。

那时，在他写给世熙叔的信件里，谈到他的打算是在他为中国所承担的任务中，加上一二“国际味道”。他对自己掌握语言的能力颇感自豪。一些外国代表，特别是苏联派驻国际联盟的大使李维诺夫曾经说，如此完美的俄语——革命前贵族们说的标准俄语，竟出自一个中国人之口，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这种语言能力偶尔也有它的不利之处。当父亲和他的朋友颜惠庆在日内瓦剧院看戏时，无意中听到他们后面的一位俄国女士对她的同伴小声说，“我喜欢中国男人，但这两个人是我所见过的最丑陋的中国男人。”待到幕间休息，当她取出一枝香烟时，父亲上前为她点火，趁机用完美的俄语，对她发了一通议论，作为回敬。

瑞士自然是他的常住之处。他的与众不同的世界主义性格在此如鱼得水。后来，当他做外科手术，不得不接受8次输血以挽救生命时，他打趣地说，他的血管里有比大多数瑞士人

更多的瑞士血液。这个国家是难以形容的美丽，它的人民诚实而且勤奋。在国联内部，他处于欧洲外交活动的中心位置，很容易到其它欧洲国家的首都去。

然而，也有不尽如人意之时。1933年5月，他写信给我祖父，抱怨说由于兼任二职，引得别人开玩笑，说他挣两份薪水。但事实并非如此。晋升的唯一真正好处是，在国际外交圈子中占了优先地位。因为有百分之五十的官方事务是在社交聚会中进行和解决的，地位与身份是个重要条件。

在欧洲的中国外交官，大部分是一些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能干而热心的人士。他们不仅在一个不熟悉的陌生国家中处理他们面临的难题时互相依靠，而且在对付他们所属的外交部的共同问题上——薪水很低，并且从不按时支付，还很少给他们精神上的支持——彼此照应。父亲觉得，仅靠只够其他国家外交官经费一小部分的钱是很难维持与其地位相当的必要场面的。甚至连开展反日宣传的经费也弄不到，而这是迫切需要的。

在外交官群体内就像在一个家庭中那样，当然也有败类，嫉妒，流言蜚语和两面三刀。有一次父亲不得不协助地方当局把一名中国留学生送进精神病院。有些中国侨民，甚至有些外交官，在财务上是不可靠的。父亲常常不得不想方设法作到预算平衡，并且保持一份严格认真的收支记录。有一次一位外交官谢维麟出于无奈要从留学生的款项中借钱，父亲不得不做恶人而予以拒绝，从而遭到一些非议。更糟糕的是，他必须承担他前任的债务，但这件事事先并未明确，以致严重地损害了他和他的上级施肇基博士的关系。

好像他的财务负担还不够重，那年父亲接到祖父的信说，他正遭到财务上的窘境。他辛苦积攒下来的钱完全投资到俄国卢布，法国法郎和中国股票上，而这些现在都已失去价值。他只得求助于他的长子。父亲担心老人被迫去为日本政府做事，于是汇给他几百美元，以备他一旦需要时，作为去瑞士的旅费。这笔钱是父亲好不容易筹措的，他希望祖父能够体谅，不再多要。别人遇到这种事可能会觉得沮丧，但父亲的乐观精神大体上未受影响。

那时他的生活极度紧张，尽管在日内瓦的任务已经使他每天要工作十六到十八个小时。但由于定期前往伯尔尼而使他更加忙碌。他在那里要经常撰写文章，进行广播，用英语、法语和德语发表有关中日冲突的演说，以期为中国的事业争取可能的支持。他每天仔细检查欧洲的新闻媒体中关于中日冲突的言论，进行评价、分析，并向外交部报告。只要时间许可，他便亲自给报刊投稿。他约定时间会晤政治编辑和记者，希望能够影响他们；并且经常寻找那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分子，希望能感化他们。他接连不断地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和需要经费以便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但政府一直对此置若罔闻。

在1933年的整个5月份，他持续出席鸦片委员会，这正是他所以来到日内瓦的原因。委员会面临的问题是监督鸦片的生产与销售，而由于中国是个主要的鸦片生产国，使得委员会难以对非法的毒品买卖实行监控。父亲介入关于鸦片问题的顾问委员会，使他毕生对此问题十分关注。不管他是否预见到日后毒品的泛滥，他总是谆谆教诲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毒品的可怕，即使到了60年代，吸用毒品已经成为时尚，我们也决不敢丝毫沾染。

他离开国联后，仍继续关心毒品问题，并就此问题与他的朋友，美国政府毒品委员会首脑哈里·安斯林格保持通讯联系。由于他们的努力，他和顾维钧博士终于成功地通过国联行政院禁止从朝鲜向中国东北输出鸦片。

因为他的时间如此紧张，难怪他在1933年给世熙的信中写道，他在两年中未曾有过一天休假，从未在午夜一点钟以前睡过觉，有时甚至要通宵达旦。当然这只不过是随便说说。他还说，尽管如此，他仍挤出时间继续学习中文，现在已能阅读正式文件。他也提到，曾经要他前往莫斯科，但因为他是中日关系专家，必须留下来指导代表团的新成员。

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常常提到他关心中国与俄国的关系。俄国文化已经融入他的血液。他对俄国人的知识和了解比他对中国人的了解还深，并且曾在1918年的博士论文中专论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然而，他对祖国的忠诚使他深深地怀疑苏联领导人。他曾对这种怀疑感到内疚。但是当国共合作到来之时，他还是同样地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他所受到的教养使他很自然地对共产主义抱有反感。

从传统上看，中国曾经欢迎俄国在北方的作用，视为防止日本侵略野心的保证。1920年以前，俄国在中国享有许多利益。尽管后来的中国政府害怕共产主义在中国传播，但到1924年还是基本上恢复了两国的关系和俄国的特权。

在其后的两年，苏联政府曾积极支持中国的国民革命，但是随着蒋介石的出现，国民党

开始清洗它所受到的苏联影响。俄国代表遭到驱逐，两国关系迅速衰退。

俄国对中国的态度，主要取决于其与日本的关系。正是日本的殖民目标对两个国家都构成威胁，才促使他们认识到需要恢复邦交。1932年中国和俄国恢复外交关系的消息，受到父亲的热烈欢迎。

父亲在这个时期的日记中透露，他“得益于秀英的没有在场而见到了某些人”。但是他在给我母亲的信中却又说得很恳切：“我是一直是很庄重的，你尽管放心……廉价的姑娘有病，好姑娘不出来。”

这时，无论他沉迷于何种放荡的消遣，终于被11月间我祖父突然逝世的噩耗所惊断。祖父曾是他童年时期的榜样和偶像。

祖父在他的一次定期乡间修养时，觉得有些轻微头疼。祖母用家里的小轿车把他接回；他们去看了邹匡襄大夫（音译）。他诊断后说，有些低烧，不久就会减退。

然而三天后，祖父的头部肿胀起来，住进了法国医院，仍一直由邹大夫照料。他继续坚持说情况并不严重。然而第二天凌晨，病情变得危急，被送回家里。当天（11月24日）上午在家中逝世。

始终没有作出最后的诊断，一家报纸的报导猜测，可能是由于染头髮中毒，但祖父从未染过头髮。其他报纸则猜测可能是炭疽病或牙齿感染。虽然后来父亲坚持到邹大夫家寻求第一手资料，但他始终没有作出确诊。

父亲在接到噩耗后，按照中国传统立即递上辞呈，并致电政府请求准许他回国奔丧。可是外交部深知国联正在辩论的问题对中国至关重要，命令他留下来。同时，即将在开罗召开的万国邮政联盟大会也必须有一个能讲法语的中国代表。父亲还是鸦片问题专家，这个问题预定于5月1日在国联进行讨论。此外，“满洲国”问题随时都可能提出，父亲更是必不可少之人。

中国的葬礼仪式繁多，一队杠夫把祖父的棺材从家里抬到一座寺院，暂时停在那里直到下葬。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各界显要人物，所有下台的军阀和诸如胡适博士等知识界名流，都按中国的习俗送了輓联。终其一生，父亲一直为未能参加对祖父的最后送别而感到悔恨与内疚。

他给世熙叔写信说，他不认为他是不可替代的。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也吐露出这实际上正是他所最为担心的问题。他担心回国奔丧会使他在日内瓦的职位被别人占去，担心被撇在一边受到冷落，担心他的薪金不能照常支付，所有这些担心都与他深切的尽孝意识相抵触。他的冠冕堂皇托词是他把国家摆在了家庭之前。并且引用祖父1902年对陆徵祥的劝告，要他为了同样冠冕堂皇的理由，不回去参加他父亲的葬礼。

一旦到了开罗，父亲的敬业精神便使他忘掉了个人的悲伤。这次会议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与其他国家代表团平起平坐的会议。所有的工作都是以法语进行的；父亲那神彩毕露的发言给外国的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位代表说，父亲的法语讲得比比利时的代表还好！有位南非代表称赞他的发言机智而敏锐。中国代表团第一次感到取得了杰出的成果。在社交场合，父亲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特别是英国驻埃及的高级专员迈尔斯·蓝普森爵士；他还被国王授予“尼罗河勋章”。

在从塞得港前往伊斯坦堡的归航途中，他得以对耶路撒冷，伯利恒，拿撒勒和贝鲁特进行了六天的观光游览，并与朋友们相聚和接受邀请。接着又去安卡拉，在那里他骑了马，并出席在柏林时结识的朋友们为他举行的宴会。他那一辈子也约束不住的好胃口，最后总能得到满足。

夏尔加朗路

随着国联会议的结束，政府批准父亲回国。1934年7月他抵达上海，得以和母亲以及我们兄妹团聚，并一同去看望他的继母。在我们离去之后，父亲开始与他的继母有了充满深情

的信件往还，这种通信一直持续到十年后他的继母逝世。从这时起父亲实际上已经成为一家之长，不仅负责对他的继母和 11 个弟妹提供财务及教育方面的忠告，还要负责为他们物色丈夫和妻子。

在从上海到日内瓦的旅途中，有另外两个人和我们同行。一个是祖父的厨师朱师傅，他是一个出色的厨师，渴望去国外工作，所以我们带上了他，还有他的女儿阿薇，做我们的保姆。阿薇不像他父亲那样醉心于前往国外，但他们使她相信，有机会出国是她的幸运。我们乘船经由印度，穿过苏彝士运河。海上航行历时二十四天。这期间阿薇每天晕船。我们以为一旦登陆她就会复原，可是在日内瓦，阿薇的晕船变成了思乡病，我记得她经常哭泣。我们耐心地等了好几个月，可是她下决心不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生活，即使归途意味着另一次漫长的海上航行。

因此，我的父母决定为我们另找一个保姆。我们有一些好朋友，维吉埃家有一个照料他们最小儿子的瑞士保姆。他们告诉我们，这位瑞士保姆有个妹妹名叫玛莎，可以试试。我们请玛莎前来面谈，她立刻喜欢上了我们，从那天起终生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我们居住的夏尔加朗路的那所房子（现为梅林公司办事处）位于日内瓦的一处清静高雅的地区。毗邻意大利领事馆，距离俄罗斯东正教的教堂只有几百码。厨房在地下室，两个客厅和餐厅以及餐具室在一楼，外面有个小花园。

二楼是全家的居室，在一个角上是我自己，我哥哥和玛莎的大卧室，带有毗连的浴室。在广阔楼层的另一端是母亲的大卧室，沿着一面墙有从地面到天花板的落地窗，也有一个毗连的大浴室，对面是带有走入式衣橱的梳妆室。母亲的房间是全楼房间中最好的，她很少走出她的这块地方。在我的记忆中，那些日子她一直卧病在床，我们尽可能不弄出响声，以免打扰她。

梳妆室隔壁是一个父亲用作书房兼卧室的略小房间。他这个个人的地方沿着阴暗的楼梯平台呈月牙形。

顺着楼梯走上三楼，是八个分开的办公室，都塞满旧办公桌和用旧了的设备。在通往下面较宽阔半圆形楼梯的拐弯处，我们常常坐在黑暗中观看下面举行的鸡尾酒会和晚间宴会。看见那些穿着晚礼服的女士们和衣着考究的男人们，真是令人兴奋。从那些日子起，社交活动一直给予我很大的乐趣。

偶尔，我们也被炫耀在来客的面前，事先都被梳洗打扮整齐，并且教导行鞠躬礼或屈膝礼，以及和客人讲话的正确方式。在少有的场合，我们甚至可以被允许参加正式的鸡尾酒会和围着会场传送小吃。瑞士人和其他欧洲人似乎很喜欢诸如油炸猪肉丸子这类中国小吃。他们之中有些人会贪馋地跟着我转。父亲是所有聚会的生命和灵魂——说笑话，逗趣，调情，而且总是笑容满面。

在办公室上面一层有汽车司机的住室。我们生活在一起很拥挤。办公室职员没有单独的入口，我们也不是独门独户，所以没有甚么真正的秘密。二楼上孩子们的浴室和厕所之间，有父亲的两位男职员居住的小房间。我们必须等待轮流使用共用的厕所。我猜想我们住得这么近有时会使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感到厌烦。由于令人担忧的国际形势正在导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有许多重要的事情需要专心处理，所以我们这些孩子被严格禁止在办公室的楼层出现。

有时当每个职员都已离去，而且我们知道父亲不在这所房子里时，永匡和我便会偷偷摸摸地去到楼上，在废纸篓中搜寻邮票，加以收藏。我们这样做时总是提心吊胆，害怕被发现。我们在儿童时期，一般是行为端正的，最大的制裁是威胁说告诉母亲，这就足以使我们循规蹈矩。和现在的孩子们不同，似乎无论是谁都不会不服管教。每个人都做到自我约束，如果有任何苦恼，也只是沉默地忍受。

在夏尔加朗路的房子里，我能记忆起来的唯一“问题”是缺少钱。这是一个经常的，令人烦恼的问题。每次我发现母亲哭泣，总是为了钱的问题。我意识到同样的困苦也存在于父亲的那些有家室的职员中。他们都是些颇为自豪的人，觉得能在驻外使馆工作是种荣幸，但他们不得不为此做出许多牺牲。

在某些方面，我们因为周围的人多，也得到一些好处。秘书们出出进进时经常对我们说些令人高兴的话。我作为一个小姑娘，长得酷似父亲，得到所有人的关心。虽然我们从父母那里得到很少的温暖和亲近，但从玛莎和秘书们那里却得到许多慈爱，尤其是巴丹小姐和沙扎隆小姐。有时玛莎因为参加晚会外出，便由她们照顾我们。这是一件乐事，因为她们显然很喜欢我们。家庭内唯一的其他慈爱来自世熙叔叔，他在圣让·德吕兹有一幢别墅，我们有时不

由父母陪伴就到他那里去。

一年后，厨师朱师傅请求父亲准许他离开，以便在日内瓦开设第一家中国餐馆。他并未真正指望我们让他走，因为没有合适的人替他，而他显然又是我们家很得力的人。可是父亲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他的创业行动，并给予了一切他所能给予的帮助。这体现出父亲平等待人的品格，而母亲则完全是抱怨朱走之后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不便。

朱师傅的餐馆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当时在欧洲还有另外两三家中国餐馆，但他的餐馆最出名，特别是他做的春卷，皮像纸一样薄，吃起来又酥又脆，只有他知道制做的秘诀。

朱最后和他的瑞士情妇结了婚，因为他在中国的妻子不愿到国外来生活。这位瑞士籍的朱太太对于他的成功贡献很大，她和她的丈夫并肩工作，担负起一切必要的杂务。当他们所作的艰苦努力给他们带来名声和财富后，他们能够每年关闭餐馆六个月，到他们位于阿尔卑斯山的别墅中休息。20世纪60年代朱师傅去世后，他的儿子全家出来帮助朱太太经营餐馆，现在已是一座堂皇的两层大楼。

尽管现在日内瓦已经有差不多40家中国餐馆，但朱家餐馆依然存在，现在已年过八旬的朱太太每天仍然在这家“天朝饭店”中操劳。

朱师傅离开我们后，我们能够找到的最佳接替者是个性格乖僻的瑞士人，名叫罗伯特，无论何时只要他心情不好，便会大发脾气。有一次他把一个热汤锅投向玛莎，因为她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进入厨房。幸运的是那个热汤锅落下来的时候没有烫着她。我们这些孩子都尽量对他敬而远之，将就吃他做的时好时坏的饭菜。

侍女朱莉是个看起来脏兮兮的日内瓦姑娘，没有甚么特长，不大愿意干活。我六岁时得知她有一个男朋友，因为她在他的摩托车上出过一次事故。我们经常看见那个小伙子在厨房周围逗留，玛莎觉得奇怪，为甚么他一大早就在这里。由于憨直天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知道那个小伙子和朱莉同居，并且乘机吃用厨房里能够给他提供的每一件东西。

几年后，朱莉离去结婚，我们和她失去联系。玛莎介绍了一个她的熟人，瑞士籍德国人海蒂来接替朱莉。她是个高大的金髮碧眼姑娘，很容易动感情。还极为笨手笨脚，经常溅洒和打破东西。她的任务之一是在开饭时，端着托盘向我母亲的房里送饭。送饭途中如果她没有碰撞墙壁和门框，溅洒菜汤或打破碗碟，那可是罕见的事。尽管她不那么能干，做事却很努力并且是个诚实、可爱的人。父亲抱怨她的笨拙，但我们保留了她，后来我们迁移时，还把她带到伯尔尼。

汽车司机迈克斯是个看上去可疑的人物，原来他是一个纳粹的支持者，经常带姑娘上到顶楼他的房间。通常都由他开车送我们上学，玛莎常常得上楼去叫醒他，那时我们都已穿戴好衣帽在下面等待。乘坐正式的外交官汽车去到学校总使我心里忐忑不安，而我哥哥却似乎没有感到有甚么不合适。最后我劝说迈克斯在拐角处让我们下车，这样，其他孩子就会以为我们是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来的。玛莎仍然坚持要护送我们到学校门口。我很想象别的孩子一样，没有仆人，或者哪怕只是一个打扫卫生的女用人护送。因为在我们进到学校的院子以前玛莎不肯放开我的手，我总是害羞地向同学们解释说，她是我家打扫卫生的女用人。玛莎听到这话很不高兴，她要人们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是我们的保姆，不愿意在社会地位上被降级为家庭用人。

我的生活经历完全被局限在家庭雇员的有限世界里。父亲会抱怨他们，但并不干预他们的事。因为他自己的工作过于繁忙。只要工作能够理顺，他对家庭的事情毫无兴趣，也不参与教育他的孩子们学习正当的行为举止，不过他能很快地发现任何小的差错，而一句不满意的话便足以使我们规规矩矩。我们这些孩子把他看成是一个冷漠的、独断专行的人，并且认为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我们生活在被他责难的恐惧中。

可是我们的教育问题确实让父亲操心。他自己受的教育是享有特权的教育，是专为富家子弟安排的高人一等的教育。令人奇怪的是，他出自这种教育，却在许多方面变成了自由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无论怎么说，他没有阶级意识。他的哲学是，不论我们生活在哪里，我们都应该利用机会理解当地人民。在瑞士他要我们进入瑞士系统的学校，特别是因为这种教育系统非常完善。我们开始是在国际学校上学，因为该校开设英语课，还因为父亲的同僚也把他们的孩子送到那里。可是一年后，父亲不能容忍这种美国式学校的灵活进步、自由放任的气氛，我们被迅速转入以注重自律精神和以加尔文主义职业道德为特点的瑞士国家系统的学校。

在母亲的健康状况下降之际，父亲对工作倒似乎更专心了。在一定的程度上，这两者是受母亲治病需要用钱连结在一起的。在与外交部的通讯中，父亲不断提醒他们支付自1931年以来拖欠的应付款项。

意识到健康问题的重要，父亲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在湖边租一座别墅，让家人在那里度过夏天。租的别墅总是在从日内瓦开车前去的适当距离内，父亲在那里度周末，偶尔也在那里消磨非休息日的夜晚。尽管鸡尾酒会和宴会常常使他离不开日内瓦。

位于科佩、埃尔芒斯和科西耶的别墅也被用来举行社交集会。中国和欧洲的朋友们常来这里过上愉快的一天，他们躺在帆布吊床上，玩槌球游戏，游泳或划船。经常充满热烈谈话的嘈杂声。这种场合总是由朝气蓬勃、精力充沛的父亲出面主持，甚至为这些成年人组织各种竞赛活动。母亲常常提醒我们说，能有这样的地方消夏是幸运和非同一般的。她知道艰苦的日子就在后头。

因为永匡是个多病的孩子，到了冬天我们总是在山间度过几个星期。永匡和我在年龄很小时便学会了滑雪和溜冰。这常常打断我们的学校课业，但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和体育活动则使永匡长成一个高大、体格健壮的少年。前往维拉尔和舍西耶尔的山间胜地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山路常常覆盖着冰层和新雪。父亲在冬季的几个月中不能和家人消磨同样多的时间但他和母亲每天通电话，母亲总是给他列出一份物品清单，要他在下次来时带来。他们为这些物品设计了数字代码，其中大部分是小山村中买不到的日用品。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临近战争状态，瑞士政府禁止用外国语言进行一切电话交谈。在正常情况下，我的父母相互讲话用汉语或英语，现在他们必须讲法语，而这样做很勉强，并且引起许多笑话。

1936年5月，母亲决定去做甲状腺肿手术。她一直都不强健，并长期受着神经衰弱的折磨。经诊断，她的甲状腺紊乱可能是导致她那些病痛的原因。

瑞士的第一流专家被请来做这个手术，但很快就明显地看到，她的医生原来许诺的“简单”手术变得相当复杂了。首先，这个手术必须在局部麻醉下进行。需要切除的甲状腺肿紧靠声带，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在整个手术过程中，她必须醒着，不断地试验她的声音，以免误伤声带。

母亲从来不是一个勇敢的人，这种手术的创痛经历和其他一些烦心之事，影响了她一生的精神与身体健康。她手术后的恢复期长达好几个月，在此期间她只能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她的血球计数表明又出现了并发症。她似乎已不能恢复她的精力。医生们也拿不出甚么解决的办法。

1937年1月，正当母亲的身体开始恢复得有点正常的时候，父亲自己又被匆忙送往医院，接受肠梗阻的紧急手术。后来玛莎多次说起那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她的眼里还总是充满同样的惊恐神色。玛莎曾受过护士训练，在母亲生病和康复期间，她一直是个核心人物。一天晚上，父亲呻吟着说他的腹部疼得厉害，要玛莎给他一些蓖麻油来止痛。

玛莎不习惯于和她的东家争辩，可是觉得这样做不对头，没有给他蓖麻油。第二天父亲感到疼痛加剧，而且肚子鼓胀。玛莎急忙给家庭医生亨尼弗打电话，亨尼弗建议找一位外科医生。玛莎推荐了马丁大夫。他下午来到时，命令立即进行手术。

玛莎陪父亲前往医院，她后来回想起当时的汽车颠簸，一定加剧了他的疼痛。她允诺一俟手术结束，便立即给母亲通电话。手术持续了五个小时，在此期间，母亲几次打电话，都没有得到消息。

当马丁大夫终于从手术室出来时，他说父亲活下来的希望很小，而且父亲心脏的功能已经丧失。他接着解释说，病情如此严重，以致在他切开腹部时，肠子从腹腔中迸了出来，他虽然已经尽可能地加以修补和清洗，但不敢说有多大的生存希望。

玛莎不忍心把真实情况告诉母亲，但在此后两个星期父亲挣扎在生死线上时，事情已经瞒不住她。那个时候玛莎呆在医院，亲眼目睹使馆全体工作人员带着沉重的表情，接连不断地前来探望和离去。她说，她从未见到过一个人如此被他的属员爱戴。

两个星期以后，父亲的病情奇迹般地出现了轻微好转，随后一天天好起来，开始复原。马丁大夫大为惊奇。他说这样的情况，一百万人中仅有一个人能够死里逃生。从那以后，他一直是我家的亲密朋友。每逢他去瑞士，父亲定不可移地总要请他吃饭。在父亲的一生中，这并不是仅有的一次，让医生们对他的非凡体质和复原能力感到惊异。

这个事件的真正受害者是我母亲，她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从那以后，她的健康每况愈

下。

时隔不久父亲便恢复了他的工作。还是像以前那样地不眠不休。在 1937—1939 年间，他做了十几次以上的演讲和广播，除了关于日益增长的日本威胁外还涉及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反对使用毒品的重大问题。他在国联提出保护妇女和儿童的议题，在为红十字会筹款运动中发表演讲，并且参加了巴黎、牛津和剑桥老同学的聚会，当年他在那些地方曾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些人现在像他一样，代表着他们各自的国家。

1940 年父亲收到日内瓦办事处将要关闭的消息，百感交集。回顾起来，当时战争已经无可避免地发生，并且终于证实，在维持世界和平上，国际联盟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诞生于 1919 年和平条约的国联，一直是受法国和英国的操纵，因而主要地是一个欧洲的组织。它的最大失误是坚持要求德国支付沉重的战争赔款。另一个重大失误是，奥地利帝国解体，而德意志帝国却未被触动。国联所承担的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要在一个巴尔干化的欧洲维持现状。英国和法国发现要在任何问题上达成协议，越来越困难。

到 1937 年，国联秘书处的新楼，行政院新会议厅和新大会堂都已经竣工可以进住时，而国联则已经衰落。各大国对它已经失去真正的信任，而且不打算放弃它们的任何主权或特殊利益。

1939 年 9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宣战以后事态的发展经过，人们都已经很熟悉。希特勒不到一个月便征服了波兰，俄国人在 9 月 17 日从对面一边侵入波兰，和德国一道瓜分了这个国家。

11 月 30 日俄国侵入芬兰。这时希特勒已经决定经过荷兰和比利时进攻西方。攻击的日期原定在 11 月 12 日，但随后延期了 14 次，最后，继入侵挪威与丹麦之后，在 1940 年 5 月开始。德国装甲部队通过亚耳丁向前推进，于 5 月 20 日抵达法国海岸。比利时军队在一周后投降。5 月底英国军队从敦克尔克撤退后，德国军队突破索姆河的新法兰西防线，于 6 月 14 日进入巴黎。随着 6 月 14 日墨索里尼的宣战，世界大战正式打了起来。

第3章 伯尔尼

多变而不幸的年代——瑞士能保持中立吗？——一个时代的结束

1940年夏季，在接二连三的国际事件演变下，父亲对奉命关闭日内瓦办事处并迁往伯尔尼，并不感到意外。他花费几天的时间把办事处的所有文件进行整理分类，列出一份应保留文件的清单，其余的予以销毁。他特别注意保存他与他的上级施肇基发生误会以后全部情况的记录。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必须亲自去做，因为只有他才能决定哪些应该保留，哪些可以抛弃。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向世熙私下承认，他不愿意离开日内瓦。但由于他一贯的乐观天性，他对朋友们说，伯尔尼是个值得在那里工作的，讨人喜欢的首都，还强调说，政府这样做是最好的处理办法。他一向是个忠顺的公仆，虽事出无奈却仍从好处着想，全心全意地投入他在伯尔尼的特命全权公使工作。

1940年11月13日，意大利入侵希腊后一个月，父亲抵达伯尔尼。他在日记中写道：

“13”对我总是幸运的。希望这一次也会如此。我正开始新的生活，要养成新的习惯——例如坚持写政治日记。一俟我得到外交部的授权，我将为公使馆寻找一处与我们的国家相称的馆址。

不久就找到一处馆址，当地报刊前来对这位新来的外国公使的住所和家属拍了照片。当把文章和照片送给国内的亲友看时，他们都表示由衷的赞许。尽管战争的炮声隆隆，人们都认为瑞士将卷入战争，父亲依然满怀希望。甚至来自国内的消息，传说日本人正在撤退，也似乎令人感到更有指望。

公使馆坐落在一个幽静的高级住宅区，远离商业中心。尽管房屋本身不算很大，但却颇为庄严堂皇。它位于一条树木茂盛的小巷尽头，一棵巨大的橡树荫蔽着铺满砾石的前院。这是一个处在几座豪华宅第后面的幽静场所。公使馆的后面是一片绿草如茵的起伏丘陵，有充足的场地供我们任性奔跑，是我们做游戏的理想地方。我们在日内瓦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自由，在那里我们的活动受到限制，只能局限于狭小的花园和周围建筑拥挤的地方。

使馆职员中有位李润明，他在日内瓦办事处即将关闭前加入该处。虽然是加拿大出生的广东人，思想却出奇地保守，具有旧式的忠诚美德，庄重而且勤勉。临近出国前他和一个上海姑娘结了婚，一旦在伯尔尼安顿停当，他便召唤她前来。她把他们的女儿留给她的父母照看，自己出来了。到伯尔尼后这对夫妇很快又有了三个孩子。父亲为了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允许他们住在公使馆里，以便节省在外面租房的租金。这笔人情债后来得到了充分的报偿。

李家的孩子进入当地的学校，直到他们离开这个国家时，仅能讲瑞士德语。然而李先生和李太太在语言交流上却有困难，李太太只能讲上海话，而李先生则讲广东话。他们都不懂得对方说的是甚么。这无疑是他们长久的美满幸福婚姻生活的奥秘。

李太太成了我母亲的密友，因为他们两人都是上海人，并且没有其他中国女士可以做伴。冬季，李家和我们一道前往山间休养地。可怜的李太太容易晕车，乘汽车在急弯陡路上行驶对她来说无异苦刑，但她从未抱怨过。

在伯尔尼时的一等秘书任起莘先生是个很热情和易激动的人，他从中国出来时没有带太太，而是和他的中国女管家同居。他在家中请客时，他们的举止就像夫妻，但她从未陪他外出或在正式的场合露面。这种安排已被人们认可，在中国驻外的外交官中也不算罕见，似乎是以某种方式解决他们单身在外的孤寂问题。

使馆职员中的一个低级成员是个年青的男人，名叫钱家驩。当时他刚二十出头，新从曼彻斯特大学毕业。他的父亲是钱泰大使，我们家的老朋友。钱泰大使曾和我的祖父胡惟德是朋友，但他的外交官生涯则属于我父亲这一代。这就引起了称呼的问题。父亲觉得由于钱泰是他父亲的朋友，理应称为叔叔，以对他表示应有的尊敬。然而钱泰大使不肯接受这份敬意，于是关于称呼问题发生了愉快的争论。最后他们以互称叔叔来解决这个问题。

钱家驩在伯尔尼开始他的外交官生涯，自那时起一直在我父亲的庇荫下工作。我父亲去世后，他盛赞我父亲从事艰巨工作的能力，对部属的信任，以及平等待人的作风。

钱家驩是个才华横溢和思维敏锐的年青人，他的唯一短处是腼腆和缺少进取性。作为一个成功外交家的儿子，人们希望他继承父业。但是学术或文学对他的一生也许更为合适，因为他有着精于推理和想象丰富的头脑，而这正是年青一代所应该具备的。然而，他终于别无选择，只能和现实世界打交道；他一定是常常感到这个世界不是他的理想的世界。

作为他的任务之一，可怜的家驩被要求给永匡和我上中文课。这想必使他难以承受，因为我们对这门课程毫无兴趣，看不出学中文有甚么意义。好在钱家驩是个软心肠的人，通常我们总能说服他出去和我们一块踢球。他甚至带我们去咖啡馆，让我们第一次嚐到可口可乐。后来，当我们长大后，我为曾经给他造成的麻烦向他道歉，他也为曾是一个不合格的老师表示歉意。

我们在伯尔尼家里的厨师谭师傅是个中国人，母亲把他叫做杰克，后来又变成了雅克，这样比较容易记。雅克是个好厨师，但他不喜欢孩子们出现在厨房里。有一次我在好奇心和无聊感的驱使下，冒险进入这个禁区。他的反应是把切肉刀猛地往木砧板上一剁，并且用凶猛的眼光瞪着我。我的好奇心一下子被吓得无影无踪。永匡不像我那样有冒险性或反抗性，而且早就知道了雅克的脾气。

在厨房外面，雅克则对我们很友好，不当班时常陪我们玩。他的法语说得很糟，不久我们也学会了他的蹩脚法语，并用这种洋泾浜法语和他说话。这样常惹得他生气，因为他想学正规的法语，但我们却拿这种怪腔怪调当作取乐，而且确实有趣。他颇为孤寂，经常说起留在中国的妻子和女儿。玛莎曾经对他有意，愿意和他谈恋爱，但是他与她合不来。

家里的另一个专职用人是德国籍的犹太人汉斯·瓦尔德海姆。他是个中等年纪，前额有些微秃的拘泥细节的男人。他之来到我们家是经另一个外交官的介绍；因为考虑到边界那边几英里处，纳粹正在迫害犹太人，这位外交官认为住在那里的汉斯是个值得帮助的人，因而把他推荐给我们。

很快汉斯就显示不是个生来就该当仆人的。他有一种天生的忍耐力和自信心，然而他忠实地承担了他的男仆角色。他并不掩盖他是一个同性恋者的事实，他和一个年纪比他大几岁的著名而富有的瑞士律师同居。

汉斯特别喜欢谄媚父亲，总是以第三人称称呼父亲为“阁下”，这取得了他意想的效果。母亲则经常觉得受到汉斯的威胁。对她，作为一个女人，似乎总要给她出难题。

一天晚上，父亲和母亲陪同一群来访者前往伯尔尼唯一的夜总会。他们到达后不久，汉斯也进入了夜总会，并在落座前走到母亲身边，对她深鞠一躬。母亲心中不悦，觉得汉斯是在把她当作地位相等的人对待，于是要求离开这个地方，以防万一汉斯会来邀请她跳舞。

玛莎也难以和汉斯相处，他们互相使对方难堪。玛莎不赞成他的“作风”，他对我们这些孩子的过分钟爱，也让她恼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汉斯仍留在瑞士，终于从他的律师朋友处继承了少量财产。他成为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参加了新教教会的一个派别，并把他的全部财产捐赠给了教会。

总的说来，他们是一些各式各样的人，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欢乐。

一经在伯尔尼安顿下来，父亲就开始接待和拜访他的外交官同行。他们对他们之中一些人的评价是冷酷无情的：例如罗马尼亚公使波西被他轻视为“一个冒险家，对世俗的虚荣比对

任何事情都更感兴趣！”而不加理睬；至于智利公使波斯塔，父亲的说法是，“很少见到有人如此卑鄙，看上去他像个同性恋者。”

在另一方面，新任瑞典公使以其才智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而保加利亚公使基塞瓦诺夫，则被认为是一个真诚和“富于同情心”的人，并在以后的几年中与他有许多交往。

他们谈论的主要题目不可避免地是战争。父亲的日记大部分写于这个时期，几乎逐日叙述了那些在这场冲突中被卷入或将被卷入的国家的命运变化。

普遍的看法是，瑞士本身不至于遭到入侵。因为德国需要与外部世界联系和向国外的第五纵队发送经费，而且大多数纳粹领导人都把他们的财富存放在瑞士的银行里。

1940年11月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招致人们推测俄国与德国将签订协议。莫洛托夫在柏林火车站检阅仪仗队的举止，使他受到大部分欧洲人的嘲笑。父亲写道：

十分明显，他不知道该做甚么。最后他行了一个军礼，可是穿着平民服装并戴着礼帽！电台的时事评论员描绘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其他的推测涉及到日本人是否确实在从中国撤退，他们是否企图进攻缅甸，以及德国人是否要在希腊帮助意大利，德国是否仍然打算入侵英国。

在国内战线方面，消息正在好转：

钱泰和克莱因今天来访。他说中国的军事形势很好，还说我们对应付任何不测事件已有所准备，我们没有进入印度支那的唯一原因是由于美国现在不愿改变现状。一年之后我们将能生产足够的汽油，达到自给自足。不能相信日本能从陆上进攻缅甸，因为这个地区山岳太多。蒋介石的精神状态极佳，比以往更为乐观。他认为即使我们所有的对外通道都被切断，我们仍有足够支持一年半的资源。

就欧洲战争的进展而言，基塞瓦诺夫认为德国仅能做三件事情：1、进攻土耳其，夺取苏彝士运河；2、进攻俄国，这种可能性很小；3、入侵英国。他认为德国将做的是第三件事，而且要趁英吉利海峡出现大雾的时机。他对我说，我是伯尔尼消息最灵通的外交官之一。其他的人甚至对政治不感兴趣。

父亲不赞成他的许多同行的观点，他们担心德国人战败将使中立国易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冲击。

基塞瓦诺夫说，保加利亚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亲俄分子，感激俄国把他们从土耳其统治下解放出来；另一种是亲德分子，特别是领导人，如果他们不害怕保加利亚的布尔什维克化，他们将更加亲近俄国。他同意我的看法：苏联已经不再不计代价地策划其他国家的布尔什维克化，不过决不会错过每一个自发出现的机会。

我说，就我而言，我宁愿要一个布尔什维克化但是独立的国家。像法国这种状况，只不过是德国的附庸国。害怕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给欧洲造成比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身更大的伤害。民主主义者的错误对希特拉和墨索里尼的取得权力与保持权力负有责任。

美国公使哈里森回忆起德国人在凡尔赛会议上，为得到较好的条件已经利用了布尔什维克幽灵。德国人现在坚持说，希特拉如此厌恶莫洛托夫访问所起的反面效果，以致想要进攻俄国。据我看他现在不会进攻俄国，尽管他能够打败它。但以后形势变得更有利时，他肯定会要进攻。如果德国现在进攻，它能得到英国和美国部分舆论的支持，因为那些人一直害怕布尔什维克主义。从宣传观点来说，现在进攻是明智之举，但从政治和军事观点来看，现在还不是进攻俄国的最佳时机。

1940年12月，父亲被引见给维希政府的代表鲍姆公爵，他惊奇地发现这位代表比他所预料的要和蔼得多。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告诉我，德国人愿意让国联保留在日内瓦。我详细地说起我们孩子的教育情况和在伯尔尼物色一所学校的困难。他向我推荐了在弗里堡的学校。

我有一种感觉，法国人，即使是维希的那些人，并没有变心，只是假装愿与德国合作，而同时在等待较好的时机。法国官方报刊反复宣传他们必须与德国人合作，正说明这不是人民的想法。

那年父亲正好在圣诞节之前访问了维希，他对法国人的印象是：

他们已变得不那么活力充沛，更多的是沉默。人们感到似乎有甚么东西在吞噬着他们。对于像法兰西这样足以自豪的民族，这倒是一种好兆头。在里昂，我们在梅雷餐厅花四十法郎吃了一顿午饭，一道别有风味的凉菜，很好的清炖鸡，然后

是蔬菜和水果。没有黄油，没有奶酪，没有肉；不过咖啡是加糖的。食物不如以往丰富，但味道很不错。后来他们问我是否吃饱了，这表明法国人把食物看得何等重要，也表明他们还不习惯于食物配给。

在维希我下榻于大使饭店，那里大部分住的是外交官，气氛相当热烈，好像我们是来参加葬礼或生日宴会。在门厅里我遇见那位负责公共关系的官员，他说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因为有个算命的人预言，德国将会崩溃。我对他说我们还必须尽力促成它的崩溃，他换了话题。

显然贝当曾告诉希特拉，他准备对德国让步，但不对意大利让步，因为他们没有赢得任何胜利，并且他将拒绝转过身来反对他们以前的盟友英国。据说希特拉回答说，他能够理解。

在和顾维钧的谈话中，父亲觉得顾维钧关于德国人在占领区行为的评论很有意思：

在圣让·德吕兹，他看到德国人的行为举止比日本人在同样情况下的做法要好得多。据他说，两个德国兵在理发店里挨个时，曾询问他们是否可以吸烟。在商店购物，德国人像别人一样排队。

顾还认为，万一德国人在欧洲获得胜利，形势也不会变得对我们更坏。到了那时，德国人将不再需要日本，所以他们没有理由放弃中国，德国自己也需要中国的市场。

1940年12月12日中午，我在一个小饭馆喝啤酒吃三明治，肥胖的老板娘高兴地说，意大利人在埃及遭到痛击。晚上，大使饭店的看门人说了同样的事。他说英国无线电广播宣布，抓获五万意大利俘虏，还说意大利国王将要退位，那将是墨索里尼的末日。据说德国有三个军团驻扎在意大利，保卫意大利的港口，防止英国人入侵。现在没有人相信德国会进攻俄国。

旅馆里没有黄油，没有糖，牛奶是脱脂的。今晚我和奥特罗格在一间小餐馆吃饭，连同一瓶葡萄酒共花了四十六法郎。他说法国的崩溃主要是精神上的崩溃，并同意我的看法，慕尼黑会议后法国人给予达拉第的热情欢迎是精神崩溃的先兆。我认为他像所有的法国人一样，希望德国人失败，但是不知道如何使这个愿望实现，于是采取骑墙态度。即使是赖伐尔，也说不出他想要干甚么。我有一种印象，当时机到来时，他们的立场就会完全改变。

12月14日，事情有了使人震惊的变化，父亲写道：

我来维希本是想看看那里的情况，却发现我自己正处在当时的最大危机中。似乎昨晚贝当逮捕了赖伐尔。德国显然在为他们的军队要求过境权，因为他们必须阻止意大利的革命。谣言疯狂地四处传播：说赖伐尔正在巴黎煽动一个阴谋。是德国人自己向维希提出了警告，他们怀疑赖伐尔搞两面手法。谣言还说赖伐尔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接受了德国的三项要求——军队乘火车通过；军队经公路通过；交出法国的舰队。其中仅实行了第一项。据说今天已有三十列火车通过。还说两个星期前已有两师德军通过。

人们说瑞士边界上驻有德国军队，是准备从辛普伦隧道通过，但瑞士人威胁说要把隧道炸毁。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返回瑞士。今天这里没有火车。

这天的晚些时候，父亲写了以下的记述：

今日下午六时安然返回。听说有四十列满载德国士兵的火车通过法国，开往意大利。维希政府的内阁危机解除了。贝当在今晚6:45的无线电广播中说：

“法国人民们，我刚刚做出一个决定，我相信作出这个决定是为了我们国家的最大利益。皮埃尔·赖伐尔先生不再是我们政府的一员，这件事毫不影响我们与德国的关系。我仍然掌握着政权。”

于是，赖伐尔这个“假定继承人”被抛弃。并且撤消了规定他为贝当继承人的第四号宪法法案。赖伐尔的政治生涯从而终结，因为德国人自己似乎已不信任他。甚至有谣言说，他和戴高乐有联系。由于弗朗丹现在成为法国的外交部长，法德关系将不会有麻烦。据说赖伐尔曾经坚持要求贝当必须在巴黎参加赖恩斯塔格公爵骨灰在荣军院的葬礼，并且将贝当逮捕，让位给赖伐尔。

危机很快得到解决。火车，电报，电话照常运行。我也回到了伯尔尼，并不十分疲惫。贝当已恢复了一些威信，因为正是赖伐尔在致力于削弱他的权力。

伏尔泰曾经描写法国人像变色龙，能呈现各种颜色，可以应付任何事情。我不认为法国人坏到那种程度。只要给以适当环境，任何群众都有可能变得歇斯底里，法国人也不例外。

在和霍尔玛共进午餐时，我对他说，法国是被抓住了睾丸，这就是它不敢做任何事情的原因，尽管它没有失去身体上的任何部分。这个睾丸就是被德国人当作俘虏拘留的一百八十万青年男子。其次，贝当在演讲中提到的‘激烈的国内政治原因’，可能是指赖伐尔的背叛。最后我问他，贝当说政府的变化会不会影响法德关系，是否意味着会影响与意大利的关系？

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战时政治的易变性在一次意料不到的事情变化中显露出来。推测和谣言再次成为消息的主要来源：

下午 10:30，我们获悉德国驻巴黎大使奥托·阿贝兹于今晚抵达维希，前来营救赖伐尔。人们推测希特拉已致电阿贝兹，赖伐尔是唯一真正与德国合作的人。他们说反对赖伐尔的只是戈林。我们不知道阿贝兹将提出甚么要求：释放赖伐尔？让赖伐尔回到政府？还是由德国作出其他让步，以换取解除对赖伐尔的监禁？我们觉得，重新起用赖伐尔将使贝当为难。他们早就想逮捕他。这件事使赖伐尔更加亲近德国。法国报刊谈论内阁的变化对他们很不利。《巴黎晚报》因为发表了报上对此事的评论而受到指责。

事实上每个人都为赖伐尔被捕感到高兴，但现在发生了新的复杂情况。法国人被捆住了手脚。总有一天他们会失去耐心。这是最后一根稻草，没有人能说接着将会出现甚么情况。英国无线电广播称弗朗丹是亲英分子，法国人担心会因此使事情进一步变得复杂。

1940年12月16日：据说阿贝兹偕同十名专家，并以德国士兵在他的汽车踏板上架起机关枪作为“合作象征”，而一起到来！他们说贝当不会让步，至少不会在有关赖伐尔的问题上让步。

然而像往常一样，甚么事都没有一定。第二天父亲写道：

贝当被迫屈服，赖伐尔恢复自由。他仍然是与德国人进行谈判的谈判者，似乎曾经邀请他返回内阁，但遭到拒绝。未来将告诉我们，究竟是谁的威信，赖伐尔的还是贝当的，受到了损害。

1940年12月8日：赖伐尔和阿贝兹一道，乘阿贝兹的汽车前往巴黎。因此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卖国贼’。人们推测他将要在巴黎建立一个类似于汪精卫式的傀儡政府。

1940年12月31日：我已两周没有时间写日记。我从维希去马赛，接着去坎城。我对法国的印象是，法国人已被他们的战败吓得不知所措，并且估计英国也会很快被打败，所以对胜利者正在采取一种顺从的态度，希望保住能够保住的东西。英国的抵抗使他们逐渐醒悟，即使德国正在赢得这场战争，也不愿做与德国妥协，结成联盟的事。此外，一百八十万法国战俘是德国人手中的人质，法国人也不愿意危及这些战俘的安全。所有法国人都希望英国胜利，或者毋宁说希望德国战败；只有极少数商人情愿与德国人共事。在非洲正集结着一支法国军队，期待着在时机到来时，对德国，或者对英国作战。

1941年的年初是欧洲的紧张时期。从德国人的狂轰乱炸中幸存下来的英国，正寄希望于德国的经济会最终崩溃，以及美国或俄国将站在他们一边参加战争。德国入侵的威胁仍然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当时并不知道，自1940年10月以来，希特拉一直全神贯注于入侵俄国的‘红鬃子’计划，这个计划将在5月15日开始执行。

1941年1月，父亲前往罗迦诺察看海德特提出要借给公使馆的家具。

海德特刚从德国和荷兰回来。他说在德国火车上，人们都衣装整齐，情绪甚佳。

食物比一年前要好，也比荷兰的好。他还看不出如何能在军事上击败德国，但从经济观点上看，德国前景是暗淡的。人们估计一旦机翼结冰的重量不再影响飞行，英国人就会对德国加剧轰炸；他怀疑到那时德国的士气是否还能像现在这样高涨。德国的工人中只有一半是纳粹分子。希特拉最近对工人的演讲并未使他们满意。工人说他们不会被言辞欺骗。荷兰原先储备了可供两千一百万人民食用三年的食物，但德国人已经把它全部掠走，现在则仅能维持三个月。比利时没有食物储备。他说瑞士用不着担心，但瑞士的报刊应该少为轴心国的失败而表示高兴，因为这样会激怒德国人。沙赫特说，如果瑞士的举止安分守己，德国不会对它采取行动。

1941年1月27日。今天我从罗迦诺返回时，在火车上与一个意大利飞行员共进餐。他从巴丁来，去探望在巴塞尔的父母。他获准休假是因为他已服役两年，表现出色。他希望战争结束，并说他不明白我们为甚么要打仗。他很可能以为我是日本人。

一个月又过去了，父亲的日记上一点甚么也没记。到了3月，德国人几乎同时在西非沙漠，南斯拉夫和希腊发动进攻。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父亲都在伯尔尼，但在4月4日他记录了一些形势的发展：

中国打了几个胜仗，最显著的胜利是在江西。南斯拉夫发生政变，意大利在海上，并在阿尔巴尼亚吃了败仗，英国人已在阿比西尼亚向前推进。

南斯拉夫人，更确切地说是塞尔维亚人，是唯一显示了真正勇气的人。他们和德国对抗，没有被侵入。如果所有的国家都具有同样的态度，德国就不会如此得手。倘若捷克人在慕尼黑妥协的时期有这样的勇气，世界历史可能就会有所不同了。

1941年4月10日，父亲记载了德国人在北非的进展和萨罗尼加的陷落。

这个时期的政治混乱，形势的瞬息万变和了解事件真相的困难，在那个月的晚些时候，更加显露了出来。大肆宣传的日本松冈大使与斯大林的会谈没有甚么深远的意义，这一点父亲从一个情报来源得到了证实。

我起草了一份大意如上的电报给外交部，但电报刚刚送走两分钟，我就获悉俄国和日本签定了中立条约，谢天谢地，我总算能及时停发这份电报。

人们普遍认为是俄国向日本提议签定中立条约，藉以威慑德国人。其实日本在中日冲突中已被如此削弱，即使签定了条约，它也不可能从事任何行动。俄国也知道这点；但我怀疑德国现在会进攻俄国，正如它要向苏彝士扩展。

英国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剧烈空袭。这次战争的消耗大大超过上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后必将处于更严重的衰竭状态。以后将轮到由中国来扮演主要角色，因为中国的市场将给不再制造武器的欧洲工人提供工作机会。

5月，父亲像世界上其他的人们一样，被一桩非同一般的举动引起极大的兴趣：

鲁道夫·赫斯单独驾驶飞机离开德国，在英国格拉斯哥附近着陆。德国报刊把他描述成一个疯子，并一再地说他已经患病多年。如果那是真的，人们难以理解为甚么希特拉会提名赫斯，在他万一发生不测事件时，为排列于戈林之后的继承人。英国公使凯利考虑问题总是有点过于简单，他认为赫斯的这次飞行说明他知道德国将要战败。既然他已逃离，除非纳粹政权被推翻，他已不能回去。因此他可以把他知道的全部秘密泄露给英国人，从而得到最大的好处。

我认为赫斯很可能与希特拉不和，所以离开了他，以免与他的决定发生牵连，并保全自己的性命。但他想必相当勇敢而且爱国，除非他认为希特拉的垮台将使德国获救，不会泄漏任何秘密。

我倾向于认为，最后决定战争结局的将是经济状况。如果德国占领区的人民长期挨饿，他们就要起义，宁可冒被枪杀的危险，也不愿慢慢地死于饥饿。如果英国能坚持到11月，它将赢得这场战争。即使德国人去到非洲，英国人也会在那里制服他们。德国人正在远离他们的基地，因此他们的困难日益增大。

1941年5月14日，父亲在伯尔尼的新住宅举行他的首次宴会。宴会很成功。他记载如下：

餐后我们谈论政治，马森抱怨说，不负责的瑞士报界人士将会因为对德国表示敌意而给他们提供借口，把这个国家拖入战争。倘若发生战争，瑞士人就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战斗。但是他们必须避免是由于他们的过错而引起战争。拉齐维尔评论说，德国人总是能够找到借口的，如果瑞士人为了避免提供借口而总是一味退让，

他们就永远也不能证明自己是合理的。

我参加讨论，并且举了两个被强奸的例子：一个妇女在被强奸前打了施暴者的耳光。有人责怪她，是由于她打了施暴者的耳光，她才被强奸。另一个在对方的压力下屈服，没有勇气打耳光，但同样不能逃过被强奸。

1941年5月20日，我们驻柏林大使馆的丁文渊博士前来赴宴。他说德国的食物比瑞士少，他们每周只有五百克肉类（包括熟肉和鸡蛋）。他说德国将在6月份进攻俄国。是由于南斯拉夫战役推迟了原定的进攻。德国要持续向前推进直抵乌拉尔和巴库，然后进攻直布罗陀。苏彝士将留待明年占领。

他认为赫斯不得不逃离德国，因为他的生命有危险，并不是为了安排一项和平条约。希特拉正在安抚他，免得他泄露秘密。这便是德国报刊为甚么对赫斯如此温和的原因。

在6月中旬，父亲写道：

不管丁博士怎么说，看来德国进攻俄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但在1941年7月2日，他写道：

德国真的动手了！我的预言不过如此而已，虽然大部分外交官都和我有同样看法。显然是德国国防军要进行对俄国的战争，以期粉碎共产主义。

在同一天的日记中，父亲记载说轴心国及其所属的仆从国家终于承认了汪精卫政府：

他们现在承认汪精卫这一事实表明，德国对俄国的战争已使德国从迁就俄国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因为俄国反对这样的承认。

俄德战争的结局几乎肯定地取决于俄国是否能保住它的军队，而且做到我们在对日本的战争中曾做过的事情：‘退却，但不屈服’。德国人承认俄国人打得很好。而且决不投降。

1941年7月15日。我们驻德国的大使馆和两个领事馆已撤到这里几天，准备返回中国。关于战争的前途，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我们的驻柏林大使陈介极力表明，汪精卫之被德国承认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他做了一切努力。因为日本需要这种承认。陈大使曾通知德国外交部，如果承认汪精卫，必将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而中德之间的良好关系是经过多年努力才建立起来的，一旦破裂，至少要影响到一个世代。

百分之九十七的德国人痛惜我们的关系破裂。许多人来到车站为使馆人员送别，有些人甚至流下眼泪。我们和德国断交，德国并不想和我们断交。

驻德使馆的一些人员，如桂永清将军，认为德国人不久就会来到瑞士。谭伯羽夫人说，一位消息灵通的德国人对她说，不要在瑞士停留太长时间。也许他的意思是指她将不再能够通过西班牙和葡萄牙。陈介认为直到战争结束德国也不会入侵瑞士，特别是当他们正在节节胜利的时候。在柏林，人们说只有当德国进攻意大利时瑞士才可能有危险。

7月16日父亲得到确实的证据，德国的储备正在枯竭，并希望在俄国找到原料。他简短地记载说：

德国人将感到失望，因为俄国人毁灭了一切可以资敌的东西。倘若德国人不能在俄国获胜，战争可能很快结束。

俄国士兵打得如此之好，以致德国人总是想方设法为他们的失利寻找荒谬的辩解，就像日本鬼子在汉口打了败仗后，楞说我们有猩猩后备队一样。有些人认为俄国士兵作战勇敢，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后面有机枪督战的缘故。

一个曾转战各条战线的德国士兵说，从未见过任何战役像俄国战役那样残酷激烈。他们利用任何手段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今天的德国报刊宣布，俄国人正在不公平地指责德国人使用毒气，以便为他们自己使用毒气寻找借口。我们要看看究竟是谁首先使用了它。这将是一场全面破坏的战争，在战争中俄国人将仿效我们的焦土政策。

克莱因和丁博士说，德国的食物匮乏比1918年更为严重。虽然食物配给量比1918年多，但是在商店中则买不到。现在人们每周有400克肉类，1918年只有350克；但1918年人们仍能在农村买到食物，而现在则农村也没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民仅在1914年后受到苦日子折磨，而现在自1933年以来他们的食

物就实行定量供应。

日本再次更换内阁，我的看法是，由于有一个海军大将在外务省，表明他们打算向南方发展。松冈确实想避免与美国对抗，他的辞职暗示新的日本内阁要执行一项更‘积极’的政策。

1941年8月5日，父亲写道：

我的预测是对的，日本已在印度支那从法国那里得到新的让步。为了证明让步有理，法国人提出一个实在拙劣的解释：他们说，日本已经承认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和法国的主权。还说他们相信日本会保护印度支那。他们还提到英国和中国对这个地区的威胁。

昨天我在琉森见到克莱因，他秘密地告诉我，齐峻带着一份报告回重庆，赞扬在中国、英国和美国之间达成一项不单独媾和的协议。人们猜测沙赫特曾写给蒋介石一封私人信件，劝说蒋提出一项各方都能接受的，关于建立公正与持久和平的建议。果能如此，则希特拉将下台，我们也能避免战争的延长，德国也可避免最终的战败。如果这项建议能够实现，克莱因要我负责进行联系。沙赫特的意图肯定是想利用我们来阻止德国的战败，并为他们自己谋取权力。

我曾为请求瑞士保护我国在德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利益一事与瑞士的政治部进行磋商，但克歇尔说，由于德国已经承认汪精卫政府是中国的国民政府，他们不会同意由一个第三国来代表‘蒋介石政权’的利益。现在德国已比以前走得更远，原先他们仅承认汪精卫是个地方当局。

1941年8月29日。一星期来人们谈论的是德国正在准备一场冬季战役。这里的报刊公开提到，德国人已从瑞士订购可移动的轻便营房，从瑞典订购六十万副滑雪板，从法国订购雪橇和皮衣，等等。

前天，我和从法国回来的国际联盟主席波利蒂斯共进晚餐。他认为要到1943年才能打垮德国。我对他说，我认为战争将在1942年秋季结束。德国国防军不等被打垮便会起来推翻希特拉，缔结体面的和约。我说，如果政治家们仍像战前一样愚蠢，二十五年后我们将会有一场世界战争，即便英国是胜利者。

从德国传来消息，开始出现灾难性的变化。1941年8月15日父亲写道：

克拉韦尔夫人对我说，某些消息来源完全确实，德国人正在杀害他们自己的病残人民，以免不得不饲养他们。然后用他们的脂肪提炼润滑油！真是在战争时期冒出来的野蛮人。

我们的男管家汉斯也证明克拉韦尔夫人传来的谣言，他说他曾听一个来自德国的人讲过，医院里的医生正在被迫使用注射的手法来杀死老人，患不治之症和遗传病的人。

1942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进一步证实了这个谣言。

尽管阴暗的消息经常记载在日记中，而且瑞士的形势继续难以断定，但总的来说，父亲在伯尔尼比在日内瓦愉快。因为气氛更好，他的属员们更加团结和睦。其他大使在转移他们的妻子或为他们的孩子求职时，常常请他提供意见和予以帮助。更重要的是，在1941年，他拯救了一些犹太朋友如瓦尔鲍姆夫妇的性命，他求他的朋友，驻里斯本大使李锦纶为他们做了去美国的安排。

然而，1941年下半年，正当他在伯尔尼感到十分惬意自在的时候，收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

9月初我收到钱泰一封电报，提醒我说，蒋介石要把我召回。此外，郭泰祺认为在外交部服务一段时间对我更有好处。第二天我从他们那里收到正式电报。我不知道他们作出此项决定的真实理由，我到了中国一定能找出这样做的原因。

虽然父亲不高兴离开伯尔尼，但他不能对召回进行争论，况且在任何情况下，沮丧不是他的性格。他很快就看到了这个决定的有利方面：

对我来说，我回到重庆能够恢复与领导人的接触，确实要比在国外好。那里的生活和工作将更为有趣。在瑞士的朋友都对我的离开表示由衷的惋惜。

收到这些电报之后的某天，我获悉桂永清将军被任命为公使馆的参赞和接替我的职务的代办。瑞士政府对让桂永清留在伯尔尼不会感到高兴，因为他作为武官未被接受。

1941年9月底，父亲离开瑞士乘汽车经由法国和西班牙前往里斯本。他带着母亲和永匡同行，但允许我和钱家一道乘火车前去，因为我乘汽车时晕车很厉害。父亲的计划是把我们留给他的弟弟世熙，然后我们可以自行安排去美国，在那里等待战争结束。

父亲自己乘船离开里斯本前往美国，在这次的旅途中，他感到并不愉快，他在11月2日写道：

我由于左肩上莫名其妙的风湿病被‘搁浅’在‘埃克塞特’号上我的船舱里。我不知道这个病是从那里得的，这可能是一种风湿病的开端，会折磨我整个下半辈子，但我想也许不至于如此。

我把秀英和孩子们留在里斯本，和世熙及罗世安在一起。有人对我说，她们以不呆在上海为妙；在目前情况下，里斯本是最好的地方。因为它的生活费用比别处低，气候温和，而且有世熙在那里。那里有一所很好的法语学校，孩子们也不至于荒废学业。现在我不知道在甚么时候，甚么地方或甚么情况下，能够再见到她们。倘若两年内我能被派往国外，她们留在里斯本的花费对我算不了甚么。因为我将能省下她们去中国的旅费，这笔钱大约是五千美元，而她们在里斯本，每月有二百美元就已经够用。

父亲终于在1941年11月19日抵达美国纽约，正好及时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之一。日本人在12月7日对珍珠港发动攻击，这个事件最终把美国卷入战争，对民主世界的每个人都是极大的宽慰。特别是对于中国人，他们和任何其他盟国相比，战斗的时间更长，也更为艰苦。

第4章 华盛顿

与宋子文共事——美国参战

虽说父亲对调离伯尔尼的原因感到困惑，但运气似乎又照顾着他。

他在回中国途中，经由美国去谒见新任外交部长宋子文。

宋氏负有从美国租借法案获取战争物资与援助的特别任务而奉派来美。虽说美国对华态度一贯慷慨大方，但他们现在则觉得主要的任务是制服欧洲的敌人。这是为马歇尔和史汀生的外交政策，罗斯福和邱吉尔的交情以及美英间的特殊关系所肯定的。

宋的工作就是要扭转美国的政策，把打败日本列为同等重要。他身边的顾问大都是外国人，全是美国事务专家。我父亲则具有不同于这些人的长处，他通晓欧洲、远东和俄国的事务。宋推荐他任两位外交次长之一，就为的是可以利用他的语言能力和他与欧洲人士的关系。

父亲在他 1941 年下半年的日记中记录了美国人对日态度的摇摆不定。日本派出特使来栖，想在和战的最后关头谈成一项协定。中国人，特别是驻美大使胡适，不相信美日间能谈成这样一个协定，也不相信美国会为了这样一项协定而完全抛棄中国。不管怎么说，日本人轰炸珍珠港倒使人们松了一口气。

父亲在日记中写道：

就军事而言，这是逻辑的必然；从政治观点来看，日本人负有全部罪责。这就排除了来自任何方面，甚至最顽固的孤立主义分子反战主张的可能性。从大街上看，人们面容严峻。没有发生任何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或者热情高涨的示威。然而，日本人的侵略至少团结了全体美国人。他们现在知道必须要从事一场战争了。我可以肯定他们必将抱定胜利的信念参加这场战争，不怕任何牺牲，也不会出现失败主义。

按他个人的见解，他写道：

这是自 1931 年以来，我们第一次发现自己处于国际上对我们有利的局势之中。

在珍珠港遭到轰炸之后，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和加拿大继美国之后对日本宣战。日本也对美国和英国宣战。美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已迫在眉睫。唯一的未知因素是俄国。父亲想：

她会干甚么？参加这场舞会还是允许把海参崴用作空军基地？李维诺夫今天到达华盛顿。

在招待李维诺夫夫妇的宴会上，父亲有机会听到一些令人关注的战争消息：

李维诺夫说，德国人从各地召集他们最后的后备力量派往俄国。如果英国能有两个师在法国登陆，那就会改变这场战争的进程。但是英国人害怕另一次敦刻尔克。他预言，如果日本人夺取了荷属东印度，他们将只在那里采取守势，而从满洲和内蒙抽调一百万军队在明年春季进攻俄国，这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他说夏威夷的负责官员在日本人发动攻击之前三十六小时就得到警报，但他们甚么事也没做。

战争的初期阶段一点也不使人舒心。日本人取得了可观的战果，并使集中在珍珠港的美国军舰和军事设施遭受严重的破坏。父亲还注意到美国人习惯于将发生的一切不加掩饰地公开发表，真有点令人遗憾地不明智。

战争将持续一个相当时期已变得日益明显，父亲又转而顾虑起他的家庭：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排她们。她们将会陷于孤立，来不了美国。即使她们来到美国，我却又有可能离开。而问题还不止于此，我不知道我自己将去往何方？

然而到了1942年1月，他本身的情况明朗了：

战争在进行，盟国的烦恼多于得意。只是我的情况有所变化。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并可能长驻华盛顿。他受命的次日，12月24日，拉西曼（宋的政治顾问）从纽约打来电话，当时我住在格拉德斯通旅馆。他告诉我宋要见我，想让我担任与苏联大使馆的联络官。其时我正因十二指肠溃疡出血而卧床。我答称一俟能够行动就去见他，最后我在1月11日去到华盛顿。这于我是莫大荣幸。当时在美待命的外交官员都向宋请示他们可以做甚么，但无一人见召。是拉西曼和胡适向宋推荐了我。无论如何他可能会找我的。他上次和我见面时对我的印象很好。这次他找我去，我们估计即将召开一个盟国最高会议，因为那时邱吉尔已在华盛顿。我这次去时间正好，虽说一开始我未能前来，但那时会议尚未召开。所以我虽然来得较晚，却甚么事也没有耽误。

尽管父亲对他的新角色颇为满意，但对他与其他外交官员之间含糊不清的关系则感到不安：

我第一次见宋时，他要我起草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报告我的情况和我希望留在华盛顿之事。他坚持要我亲自拟稿，看看我是否会写得一塌糊涂！第二天我持宋的介绍信前去拜会荷兰公使伦敦。他当时问我胡适在哪里。我答称他正在同国务院进行联络。我担心在华盛顿会见外国的正式外交官会引起侵犯胡适独有权限的误会，但我是奉宋之命行事，又有甚么办法？

宋不是一位容易侍候的上司，尽管父亲与他的关系得益于他们共同的西方背景。宋丰彩夺人，头脑敏锐，见识上较其两位弟弟高出一筹。至于他的三位令姐：蒋介石夫人，孙中山夫人和孔祥熙夫人则是二十世纪前半叶最有影响的妇女。他在哈佛毕业后任广东政府时期的中央银行行长，立即取得成就，并在三十一岁时被任命为财政部长。1937年以后他曾同时兼任行政院长，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三个要职。宋和蒋之间常有强烈的不同意见，人们普遍认为宋是唯一能与蒋面争的人。宋之一直能在台上，无疑与他的家族有关。

由于他颇具理财能力，他在1933年曾与美国协商取得五千万美元的棉麦贷款，这无疑是有利于中国的。1940年他从美国获得五千万美元的战争物资和信贷，其后又得到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援助。另外，在1941年他又从美国获得五亿美元，从英国获得五千万英镑的贷款。早在1932年他任代理行政院长时，就是第一个做到国家预算平衡的人，这显示出他傑出的理财能力。顾维钧博士对他的印象是“一个说话不多而非常务实的人”。和宋说话不能旁敲侧击。按他的一位朋友，为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工作的乔·艾尔索普的话说，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的虚荣心。

宋的确对他手下的人要求很高。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处设在马萨诸塞大道上的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但他喜欢在家里办公，会在一天的任何时候打电话找他的下属，并要求他们不论白天黑夜，随时应命。

宋和我父亲的脾气截然不同。宋很内向，不喜欢社交，从未因为是政治家而真正快活过。而父亲的性格则是外向的、爱交际，这与他的职务十分合适。父亲的一些老派同事，也许还有受过美以美会熏陶的宋子文，都和我父亲的那种奔放热情不大协调。不过他们在工作中都颇能互相尊重，并对国家同样忠诚。他和宋也有共同之点，他们的中文，尤其是笔下工夫，都不甚高明。宋平时喜欢用英语交谈，这更方便他和外国人打交道。

1月19日宋子文的弟弟结婚。父亲不能分身去纽约参加婚礼，因为他正等候蒋介石关于英美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指示。蒋复示要求提供援款五亿美元。2月份美国国会顺利地通过了这笔援华贷款法案，“就像在邮局寄一封信”那么容易，父亲写道：

人们普遍感到，没有中国和俄国的参战，盟军赢不了这场战争。如果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比现在为好，我们获得这笔贷款就不这么容易。这里的人们生怕中国人会单独议和。顾维钧在演说中指出，现在太平洋地区不如大西洋地区受重视。接着孙

科也在讲话中问道，中国为甚么还要打下去。这些话对人们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这宗贷款是要用血来偿还的，因为今后一有机会，我们就要采取攻势了。

蒋在同一封来电中同意父亲留在华盛顿，这使他感到宽慰：

现在我可以放手办事了，租房子和买车。我已逐渐开始得到对我适合的工作。我虽未负全面责任，但总能完成交给我的任务。任务总是重要而机密的，又常常是紧急的。如今我负责与荷兰方面的联络。我再次会见伦敦，并陪宋去会见荷属东印度副总督范莫克。事后我写了一份正式报告，由宋转呈给蒋。我还就国际问题做了一些翻译和撰写备忘录的工作。宋要我为他拟出一项发表演说的计划。近日他热衷于在华盛顿设立一个盟国的军事委员会，至少是关于太平洋作战的军事委员会。邱吉尔原来主张设在伦敦，但今天他在下院发言中也赞成设在华盛顿了。俄国原则上反对成立军事委员会，理由是他们并未对日本宣战，要保持其行动的自由。其余各盟国——中国，荷兰，纽西兰，澳大利亚均赞成设在华盛顿设立这样一个委员会。此事需要密切关注，并肯定会给我带来一些须做之事。总之，宋召我来做的就是这类的事。

到1942年2月，对英国来说，形势变得不妙。新加坡面临失陷，德国舰队在大西洋也占了上风，人们的信心很低。新加坡，连同六万英国，澳大利亚和印度军队的投降引起一阵对邱吉尔不满的浪潮。

然而在美国，珍珠港事件震醒了美国公众，他们决心参战，准备打上二十年。父亲接受了美国无线电台的采访，对美国人的思想单纯进行了评论：

提出的都是一些粗浅的个人问题。美国的普通人民就是如此。在欧洲人看来，显得过于幼稚。

3月，主要由李承晚领导的韩国流亡政府请求美国政府援助他们对自1910年起占领朝鲜的日本统治者发动革命。自1919年起，李一直不懈地努力争取西方各国对其临时政府的承认。随着战事的进展，日本在朝鲜的压迫变本加厉，朝鲜已成为日本的供应基地，朝鲜的大米被用来饲喂日本的牛，朝鲜的金属被征集供给日本生产军火的工厂。

罗斯福徵求中国的意见，宋转而要求我父亲来研究朝鲜问题和援助之事。宋与李承晚的政敌洪南杓进行了会谈，宋委婉地说洪颇长于暗杀。洪回答说，他自己就已杀死了三百多个日本人。就日本人在其占领地区所实施行的残暴行为，和1942年英国人的混乱情况而言，对这种激烈情感就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1942年4月，父亲写道：

昨天走访熊式辉，他说英国人正处于非常混乱的状态，军无斗志的状况非常严重。曼德勒在4日遭到轰炸。7日蒋介石抵达该地，炸后的瓦砾毫未清除，伤者也未送医院救治。在香港，英国人听到日本人打算停火时，纷纷跑到马路上跳起舞来。日本人现在已不再强奸中国妇女，而是唆使印度人去强奸英国妇女。有一名教士闭目不看，日本人把他的眼珠挖了出来。然而，似乎是罗斯福决定现在不为朝鲜人做任何事，宋因此也就对他们不感兴趣了。

1942年6月，父亲接受关于战后中朝问题的采访。他说他个人以为朝鲜在亚洲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正如巴尔干之于欧洲，不应任其处于日本的，俄国的，甚至是中国的势力之下。它的命运首先取决于它是否能组成一个受全体人民信赖并能团结全体人民的政府；其次要依靠有一个世界的集体安全组织。朝鲜可能成为国际警察部队驻扎的地方。然而，去承认一个成立以后马上就有被推翻危险的政府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朝鲜的问题在于其内部的不团结以及其领袖人物们不能协商出一个共同的纲领。

1942年6月14日李承晚访问宋子文，谈话中李责备宋不应该在太平洋军事委员会上说朝鲜人不团结。宋回答说，不讲真实情况无济于事。李说朝鲜人是团结的。过了一会，李又说朝鲜人现在是团结的。宋接他的话说，“既然你说他们现在是团结的，这正证明他们以前是不团结的。”

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李指控洪南杓及其追随者是共产党。这一点还有待证实。在我的印象中，李是希望人们只把洪看成是唯一的持不同政见者。昨天洪前来访问，他说为了抵消这种反对他的意见，他从现在起不再说话。一个月以来他一直在向李靠拢，并提议合作。这是否只是由于李性情顽固，或者是出于他的爱国主义，抑或是洪真的为大多数朝鲜人所抵制？昨天国务院的霍普金斯在电话中问我，我国是否准备一旦朝鲜人

团结一致，就承认其临时政府？我回答说，不团结必将推迟承认，但是团结了也并不意味着立即承认，只是有助于承认而已。他说这也是他的看法。

还存在一些与朝鲜有关的疆土问题，战后也势将成为需要解决之事。父亲写道：

我听说李承晚希望战后把间岛地区划归朝鲜，因为该地区有很多朝鲜人，在过去是朝鲜的一部分。然而即使是日本人也并不是把这一地区当作朝鲜的一部分而加以占领的。至于那里的朝鲜人口，全是日本人人为地移去的。这类少数民族问题遍及全世界，我们必须为他们找到解决的办法。

父亲的看法一贯是，只要可能，国家就应该自主。正是这种信念，使他后来被任命负责联合国托管部的工作非常合适。他认为，即使是台湾，虽然按逻辑说，战后应当归还中国，但是为了国际的安全，也可能不得不放弃。如果其他大国都准备作出牺牲，中国也应如此。

蒋介石最近从印度回来，发表意见说，没有印度人的帮助，盟国打不赢这场战争。所以美国和中国应当对英国加压，要英国人给印度人以政治权利。蒋夫人也公开评论英国人在印度推行殖民主义统治。这使他们不为邱吉尔所喜爱。也使宋子文在1943年访英时遭到邱吉尔的冷遇。

这场大战也有其荒唐的时刻。艾登在下院埋怨说，日本人实施暴行未按人种肤色区别对待。父亲在日记中讽刺说：

似乎日本人如果不残害白种人，他们就可以得到宽恕。日本人的这种行为至少可以使他们以牺牲我们为代价而进行妥协的可能性小了。

然而引人注意的是，英国、美国、和荷兰人遭受失败后，反而激励他们奋进，人们更加要求采取进攻的而不是防守的政策。从波兰人西科尔斯基那里获悉，德军估计损失了二百万人。

3月，根据要求，罗马教皇接受中国在教廷派驻一名代表。父亲的名字也在提名讨论之列。他写道：

对我来说，这好比是在阿尔卑斯山和里维耶拉之间挑选一个新度假之地。留在这里还是去罗马，对我同样有吸引力，不过在这里我的工作更加繁多。秀英会更愿意我留在此地。另外，太平洋军事委员会明天即将开会。说不定我会起什么作用。会议非常机密。只有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以及每个国家一位代表出席。

到5月，父亲又埋怨说，出乎他的预料，他似乎已无事可做，尽管对他关于俄国战时救济问题演说的反应使他感到慰藉。

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消息从不好变得更坏。现在缅甸已经丢掉，科雷希多也失陷了。美国国内已开始实行配给。

看到美国公众对厄运的反应，父亲的态度软了：

他们接受配给毫无怨言。他们心地善良，但不知道怎样做才好。他们是爱好和平的人民，突然身陷逆境，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我渐渐开始理解他们。他们具有两种伟大的品质，一般都高高兴兴和热爱自己的工作。他们总是要尽最大的努力，而一旦认识到最终对他们有好处，就会在牺牲面前毫不犹豫，坚持到底。

甚至他们的轻率，现在也显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诚实：

这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罗斯福由于自我矛盾而受到批评。没有任何国家，即便是瑞士，它的领袖会受到如此公开的批评。

他还说中国人还可以向美国学习他们的宣传方法：

在电影院或广播中总要加演一段以必须增加生产和向国家捐输为题材的短剧。沃尔特·迪斯尼已摄制了若干很好的短片，既有趣又富于爱国精神。这是个年青的伟大民族，富有生气和好心肠。

在他见到的许多有名望的美国人士中，他特别提到：

费城的威廉士，他承认他跟自己生闷气，因为他曾邀请黑人罗伯逊在网球俱乐部晚宴，在他想尽办法使罗伯逊被俱乐部接受后，却被罗伯逊拒绝了。他为此感到烦恼。

还有费城的马萨里克和马利勋爵：

他们被看作是有点疯，而我竟被安排和他们在一起！次日我结识了一个可爱的美国家庭，沃森-斯佩利西一家。显然那位太太是蒋夫人的同班同学。

父亲一生的趣闻逸事都十分引人入胜，因而使他的一位朋友，南斯拉夫人彼得罗维奇一时心血来潮，建议他写一本书。父亲心想：

我一点也没动心。我并无兴趣写自己。我从不记录我所做的事。我的性格非常像俄国人，从来也不像某些外交家那样，为未来写书而系统地准备资料。我一定要查一下席勒以‘高尚的人’为题材的诗。这样的人是以前本来的面目，而不是以其业绩而为人所知。我们在这里的同胞没有充分的工作可做，这可实在不是甚么好事。

1942年9月，有人给父亲送来一份美国人打算用飞机投在中国敌占区的传单。传单中画的是中国人驱逐日本人和汉奸下海，并用中文列举这些人的欺骗罪行，美国的对华援助。还有联合国的原则。

父亲不赞成这样做。他说如果中国的小孩拾了一张这样的传单而被日本人抓住，这个孩子就有被日本人残杀的危险。他并且议论说，如果美国人将传单弄得这么长，并且要冒许多由此而引起的危险，那为甚么不在传单中包含一些鼓动广大民众去行动的话？或者至少应该包括对农民更有意义的话。他觉得美国人在日本投下炸弹要比在中国投传单更为有利。如果美国人要如此进行，他恳切建议美国方面和中国的宣传部门的人员接触，他们能够在传单的文学方面提出建议。他的结论是：

如果我们去做一项工作，就应该做得妥当。

同月，父亲在宋子文的寓所参加了一次宴会，见到了曼努埃尔·奎松。奎松说，是罗斯福使菲律宾人做到忠心守土，拒绝投降，并且在民答那峨岛储存了足够抵抗五年的物资。他又说，是邱吉尔在珍珠港事件以后劝说罗斯福将美国的兵力集中到欧洲。

宴会后，父亲提起了当年早些时候蒋介石的一封电报，电报中讲的是英国不愿意给予印度人政治权利以获取他们的帮助。他在日记中写道：

奎松说，邱吉尔不会对印度人让步。他甚至说，克里普斯的印度之行，不过是为了讨好美国的公众舆论而做做样子而已。

在那样的场合中，使中国人得出英国人不讲信义的结论，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次。后来蒋介石以英国人耍弄两面派手法之事警告宋子文，父亲自己也开始怀疑他对英国人讲求公平合理和君子协定的信心是不是错了。

第五章 重庆

外交次长——战时的牺牲——与蒋氏夫妇相处

与奎松的会见是父亲在那几个月的日记中最后一段记事。1942年11月他忽然奉调回重庆外交部报到。

1937年11月，继日本人占领北平和天津之后，政府从南京迁往重庆。当时上海、苏州在日军狂轰乱炸后相继失陷，首都南京告急。重庆被选定为陪都，因为山城腹地，形势险要，日军无法进犯。唯一的攻击是来自空中的轰炸，但由于气候潮湿，冬季阴冷而多雾，夏季闷热，江上夜雨朦胧，人虽然难受，却有利于防空。坚石为基，便于开凿很好的防空洞。西方国家的援助可以经由连接印度洋和中国的滇缅公路接济。

在西迁之际，中国人采取了焦土抗战的政策以对付日军的占领。毁去一切敌人可能利用的东西，包括粮食和庄稼。这样使日军必须靠从其国内运来的给养支持，从而削弱了它的经济。中国同时也是“以空间换时间”，希望各大国为保护他们在中国的条约和贸易权利前来救援。为此曾派汪精卫去谈和，但他却背叛政府，和日本人达成协议，于1940年由日本人将他立为南京伪政府的首脑。那时许多主要国家的大使馆相继迁往重庆，因为他们是被派驻国民政府，而不是派驻日本人在占领区建立的傀儡政权的。

那时，中国分为三个各不相属的政府：迁往重庆的国民政府，延安的中共政府，以及在沿海地区由日本人成立的傀儡政府。全都指望有朝一日统治全中国。

尽管抗日战争成功地将各党各派联合起来，至少是暂时联合了起来，但中共问题依然存在。即使在保守的英国佬和美国人中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共宣称提高农民生活的话应予重视，但问题在于很难判断中共是否真的忠于其理想，抑或只是用以扩大其影响。父亲以为共产主义的问题实质上是个俄国问题，并不是国际性的问题，大战结束后很容易解决。他认为对付共产党的办法是推行对人民大众最有吸引力的社会改革，以釜底抽薪的办法，从根本上消除他们的号召力。

重庆的国民政府无疑面临很多困难，而且几乎都是难以解决的。它无法制服面积和法国差不多大的四川省的军阀和地主。它缺少革命信心以动员和领导广大的民众。1937年，以学者和学生占很大成分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达成一致，成立抗日的统一战线。但随着战事的进展，国民党本身分裂了，它没有像共产党那样学会在农村生活，它不善于管理战时经济，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公务人员和工人收入过低，营养不足，以致流传着这样的话：“财政部长以下找不到胖子。”官员们发国难财，政府无限制地发钞票，没有任何基本的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贪污腐败比比皆是。有钱的“难民”在重庆周围的山坡上为自己建起了豪华的别墅。收入低微的军官剋扣士兵们原已不足的军饷，当兵的则再从农民那里勒索。中国的商号从沦陷区或者经滇缅路走私货物。

按罗伯特·佩恩在其《重庆日誌》中的说法，尽管许多外交官的住所和生活环境都很湫隘，

但美国使馆官员的房子则算得上是沙漠中的绿洲。在那儿你可以看到穿制服的仆人，上好的黄油，书籍，威士忌和最好的葡萄酒。市区的一些地方，与装饰着一层薄薄门面墙的遭过轰炸的商店和民房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也可以看到带电梯的高楼大厦，和漆黑锃亮的高级轿车有的地方甚至可以让人联想起英格兰：

…散发着潮气、烟味和大麻叶气味的乡村农居，沿江两岸那新伐的松木和木炭的气味，还有大堆大堆的稻草，使人想到康瓦耳。与之相反，公共汽车的气味则使人想起法国的公共汽车，这也许是他们都使用木油的缘故。人们睡在草蓆和竹笆搭起的窝棚之下，聊蔽风雨。乞丐和孩子们在岩石的遮蔽下蜷曲着。在农村的场院里，随着鼓镲的打击声上演着古老的中国戏曲。

在当地，国际报刊的特派记者们都住在董显光博士（战后曾任中国驻日大使）在一个大院中建筑的圆形草房里。看上去好像一个非洲村落，但其中住着许多知名的新闻记者：前《纽约时报》戏剧评论员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伦敦《泰晤士报》的澳大利亚记者科林·麦克唐纳；和路透社的斯潘塞·穆萨等。

重庆到处都是特务。他们属于具有法西斯倾向的蓝衣社，在他们的组织中也包含有黄埔系的青年军官。他们受德国纳粹的影响很深，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本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除其他任务之外，他们还以禁止一切娱乐活动为己任，包括逮捕任何打麻将的人。然而他们也有一定的用处，宋的私人助手施博士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一段重庆特务的有趣故事：

宋子文初到重庆时，很难在拥挤的战时首都找到合适的住宅。他向他在政治上的朋友，特务头子戴笠求助。很快，戴笠就为他找到一处精美有如宫殿的住宅。

戴笠身材不高，貌不惊人，却是蒋介石周围权力结构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之一。他知道自己有权有势，而且周围有一群阿谀奉承的下属，仰其鼻息，满足他任何兴之所至的要求。他那由权势养成的个性之一是他的褊急，有时竟达到不合情理的程度。后来他在1946年因恶劣气候，飞机失事送了命，便是他不顾气候恶劣不可飞行的气象报告，强迫飞行员起飞所致。

在这个失望、窒息和腐败的时期中，共产党做到了在他们军队控制的地区里呈现出团结一致和关心群众利益的形象。共产党的游击队在华北各省抗击日军的行动与国民党政府军队按兵不动的做法相对比，使他们赢得了朋友，并扩大了他们的影响。

国民党政权为不安全感所困扰。在重庆和昆明街角筑起的混凝土机枪掩体，并不是设计来用于对付日本人的。曾经使敌人遭到挫败的1937-1938年间的伟大爱国热潮已经在疲惫、压制和投机中消耗殆尽。蒋介石用他个人的声望拢住大局，但是他不顾载道的怨声，而自慰于幻想。

屡经挫折的国民党早已无力实现其初衷；如同过去的满清，只安于一个目标——保住权力。它既无心，也无力去应付当前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长征》一书中，迪克·威尔逊描述蒋介石是个实干家，毫无疑问是个刚正不阿的人，但是他对人的判断力很差。他不好财富或浮名，他的生活方式简单而朴素，集中精力于主要的工作。但他在身边建起了一支侍从队伍，其中大多是贪污腐化，谄媚无能之辈。

他的一位私人秘书曾描绘他是一个未受过自由主义教育的军人。他具有爱国的志向，领袖的天赋，行事果断而有预见。但他的方法往往失之于粗鲁。他利用上海的地下帮会刺杀政敌，而且当他一旦大权在握之后，他的革命理想便付之流水。共产党原本是国民党的一部分，在权力斗争中被排挤出去。于是，意义深远的社会革命被抛棄了，不再动员学生和农民献身革命，不再普及识字和建设公共卫生系统。尽管一直在口头上宣传孙中山先生的理想，但他从未真心实意地加以实行。在权力得到巩固之后，甚至差不多自1938年起，他就有点变成一个独裁者了。国民党自1925年以后没有召开过全体代表大会，到1938年再召开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党员代表都是蒋的人了。他被选为最高领袖，无须服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如果他需要，甚至可以否决其决定，而实行完全相反的措施。

陈纳德在1943年对中国政治的分析说，政界有两派：一派是传统派，他们反动，反共，排外，并且常常是贪污和没有效率的，其中包括宋的姐夫孔祥熙；另一派是现代派，如宋子文，军队中的陈诚，还有孙科等等，他们了解外部世界，认识到有把中国改造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必要。

不像现代派那样不愿意惟命是从，孔和其他的传统派则心甘情愿像宦官那样顺从侍奉，以换取对其既得利益的庇护。蒋介石热衷于绝对权威，不容许有提出不同意见的自由，因而多次与宋发生冲突。

不开明的领袖作风总是和他不愿意按民主方式实行分权相伴的。甚至父亲也转而评论说，一位真正的伟人必须能倾听各种意见，即使是反对的意见。蒋介石很少能听得进和他意见相反的话，因而他所能听到的只是他乐意听的建议。他的莫大偏好是权力而不是财富。正如父亲在他的日记中预见到的那样：这终将使他失去唯一的伟大盟友美国的支持。

1941年，在中国成立了一个中美英三国的联合军事委员会，自那时起，中美两国之间有了分歧。在中印缅的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史迪威，于缅甸失陷后对蒋极为不满，因为蒋在心中只盘算着如何对付共产党。自负而爱争吵的史迪威对蒋一心要把租借法案援华物资储存起来以备日后在内战中攻打共产党时使用而不是马上用于打日本的意图非常憎恶。按史迪威的说法，蒋是在让美国人替他打赢这场战争。他瞧不起蒋的军事幕僚，并认为蒋夫人总是乱掺合，其实只是为了博得声誉和炫耀她的权力。事实上她仅有的权力就是把问题带到蒋的面前而却又影响不了他的决定。

后来史迪威终因不肯放手租借法案的款项和对该款的控制权而去职。蒋则二者都要。到此时，父亲已充分了解这位中国领袖的弱点而吐露出他的看法：倘若蒋掌握了对华租借法案的援助，这笔钱只会落入他们家族的钱包。

到1942年，遭受了连续三季无情轰炸，又缺少自己的空军力量，重庆已经成了一座传奇城市。所有的居民都在岩穴里挖了防空洞，警报系统则全靠在中国边沿上的瞭望哨传递过来的信号。

父亲的一位好友，后来封为爵士的伯克利·盖奇，于1942-44年间在重庆任英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发现这种“竹笼”报警系统异常有效，警讯常常在飞机来临之前几个小时就传到了。高高的信号杆竖在显眼的地方，全城各处至少能看到其中的一个。初次警报挂一个红球，二次警报挂两个红球，紧急警报挂一个绿色的竹筒，人们用猥亵的话把它叫做“保险套”。

尽管重庆的环境恶劣，盖奇对中国却忠心耿耿，在中英之间起着主要的催化剂作用。1944年要调他到德黑兰去时，他申请留在重庆。他于是留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

这种对中国的忠诚并不是其他许多外交官都有的。父亲后来写道：

据斯坦说，所有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只要在重庆待过，都会转而反对这个政权。

似乎对他们来说，我们不够开明，但这话也有待商榷。我们确实有些当权人士对欧洲人的心理缺乏了解。我们只强调许多无关宏旨的旁支末节，使他们恼火。而另一方面，在那些有关原则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却又因为性质比较抽象，没有涉及我们的疼处，而准备作出让步。正如孔祥熙所说，我们不肯付出五十元现金，但很容易签出一张金额大得多的支票。

盖奇描述他在重庆最后几週时的情况说，那是个恐怖与兴奋交织的可怕时刻。当时出现了从中国其他部分蔓延过来的鼠疫威胁。鉴于重庆有五百万只家鼠，这的确不容忽视。老鼠的数目大大超过人口，达到五比一。盖奇写道：“尤其是它们还吃肥皂，而那是和性生活、好酒同样短缺的。”

特大雷暴雨的闪电火花不仅在家具上，还在人身上烧出小孔。缺少空调令人难以抵挡湿气和高温。然而即便是在他们等待死亡或者最后胜利之际，也不乏各式各样的社交生活。由于仍然禁止公开跳舞，一个可以在那里跳舞的“南北俱乐部”便在一位妩媚的中国太太住宅的隐蔽之处成立了。

这所房子，如盖奇所说，是“由一堵很容易爬过去的墙”和大使馆隔开的，“那也就是我常常进出的路”。这个“怕太太俱乐部”，只有中国人才可以加入，是个喝酒的去处。成员们在饮酒之余，还以迷恋的心情讲述卑顺的日本女人在一次性爱欢愉之后，便爬起来横卧在床脚头，等候着第二次的召唤。”

尽管重庆有这些暧昧消遣，人们通常都不把它看作是‘令人满意’的城市。父亲在那儿的经验证明和他在美国或瑞士的生活经验大不相同，当初从华盛顿前去时的旅程便预兆了以后的状况。

飞行是循着横跨大西洋的航线，从巴西飞往西非。那条更直接的跨越地中海的航线，由于隆美尔在利比亚和埃及的行动，已不安全。旅程漫长而且危险，途中在迈阿密，波多黎各和特立尼达等处停留。即使是在11月份，飞越非洲时也感到难忍的酷热。

重庆的机场是一处位于长江与其支流相汇合处的一个岩石岛屿上的泥滩。机场的设施，包括建在泥滩上的机场房屋，都是临时性的。这些房子都是用草蓆加竹竿建成的。在涨水时，一所所地拆走，最后拆掉的是铺作临时跑道的草蓆。

到达后，他的朋友，也是他的前任，钱泰博士为他设宴接风。父亲颇为其美意所感动。不过他已发现重庆有一种使住在这个城市中的人联想到过去战俘的绝望气氛的趋势。后来父亲对子女们讲述那里的情景时说，不曾在当年到过那儿的人，无法想像当时的环境和人们所遭受的折磨。

重庆是个现代城市，但在倾颓的城墙上仍残留着建于两千年前古城的遗迹。佩恩在《重庆日誌》中描绘那些幸免于轰炸的老房子说，在它的正面上还留有有用白大理石凹刻涂金的鹿、蛇和龟的形象。虽已残破蚀坏，仍可看出其线条之美具有清朝早期的艺术特色。

炸后的瓦砾随处可见，颓垣处处，让人联想到的不仅是物质的脆弱，也是一个伟大民族受到屈辱的迹象。超常的额外战时人口，挤进原来简陋和超负荷的设施，使重庆成为世界上最不舒服最不卫生的首都。到处是死狗，死老鼠，垃圾堆。明沟里流淌着脏水，街道上的污物经常散发着臭气。城市一点改进也没有。父亲回忆说：

夜里，人们因老鼠扯他的头髮而惊醒。即使在旅馆的浴室里也有老鼠做窠。弄

来一些猫对付老鼠，但那猫被老鼠吓得直跑。疟疾和痢疾蔓延，药物短缺，或者根

本找不到。蝇，蚊，臭虫每个房间里都有。不管你消灭多少，总有更多的进来。

习惯于西方文明生活的人感到重庆肮脏，缺乏最基本的设施。毫无先进的事物，生活苦闷，男人们总在想念他们的妻子和家庭。人们都尽可能避免去重庆，一旦到了那里，就设法找借口离开。

父亲住进一处为外交部不带家眷的高级官员准备的招待所。给了他两个房间。招待所是一座二层的砖瓦住宅楼，盖在一个小山顶上，有一个小院子和邻近的防空洞。父亲去招待所每天要上下两个来回，每趟要上一百多级台阶。

招待所每层楼有五个房间，餐厅设在底层。外交部的许多高级官员都住在这个招待所。如张谦，梁龙和吴南如等。在那里父亲有机会和谭伯羽重温友情，谭的俄罗斯夫人和女儿是我母亲和我们小一辈的好朋友。

父亲到达后，曾给他派来一名男仆，但他很快就怀疑这名男仆是政府的特务，总是在他进屋时便中止谈话。

在不多的社交活动机会中，父亲不久就加入了一组经常性的桥牌活动。熟能生巧，到战后，他在美国居然是有名的桥牌好手了。那儿还有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偶尔也有跳舞的机会，父亲总是愉快地参加，认为是很好的消遣。由于没有网球场，他发起组织了乒乓球赛。他的好脾气和把不得不做的事变成自愿去做的人生哲学给了他信心。尽管环境恶劣难堪，他在重庆还是找到了各个方面的，感情很好的老朋友。

这些人中有：杭立武博士，当时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1944年曾参加访英团访英；前重庆市长吴国桢，后来曾任上海市长。在他的欧洲朋友中有英国大使薛穆，和法国大使保罗-彭古。访问重庆的英国人士有亚历山大将军，蒙巴顿勋爵和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克里普斯不喜欢蒋夫人是人所共知的。

每到週末，父亲很快就习惯于和盖奇一起到南岸的山区远足。在距重庆不远的地方有两处风景宜人的山峦，陡峭出奇，犹如中国山水画中所绘。在第二处山区，有一位欧洲朋友的住宅，经过气吁力竭的攀登之后，可以得到主人许下的一顿美餐作为补偿。

父亲又利用这段时间提高了他的中文读、写水平。这二方面都经受了应邀所作的多次演讲和广播的检验。到重庆一个月后他用中文作的报告要比他前此一生所作的还多，题目从他对美国的印象到法兰西外交史，都有。一次十五分钟的演讲可以显示出一名外交官毕业时所需的所有品质。

他发起一个为年青外交人员开设的“西方文化与礼仪”课。他认为中国外交人员只懂得外语是不够的。他们必须知道西方的生活方式，这样他们才能在与西方人在一起时能像在家里那样自如，并且不致因不了解外国习俗而弄出笑话，丢自己国家的脸。他们对他们讲了西方国家的历史和外交的背景，教给他们西方餐桌礼仪；例如，怎样用刀叉；怎样吃干酪、芦笋、洋葱；主人提议大家为你乾杯时你该怎么办；在中国，这位客人一定要站起来，在西方，他仍然要坐着。中国人大都不喜欢干酪和各种奶制品，该怎样对付你不熟悉的这道干酪呢？你是不是用刀子和叉子来对付它呢？在法国餐桌上这是最失礼的行为了。就像用刀子对付沙拉

一样，是大忌。

在重庆没有甚么复杂的外交谈判要办理，他的工作主要是处理各部与各使馆间的通讯，常常是与外交事务无关的事项。有些更为微妙细致的问题则需要向上级请示，这种时候他常为缺乏主动权而感到不快。他写道：

事实上，这里的工作仅仅是提出问题，尽管提出的方式往往能够影响决定。最重要的问题是有关条约的事项，例如废除治外法权。

一个世纪以前，列强将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给予在中国的外国人以种种权利和特权。包括限制中国未经有关各国同意而自主调整海关税率之权；外国人在中国只遵守其本国的法律而非中国法律之权；给予外国商人特权的旧条约继续具有法律效力；以及某些特定地区的外国属地；等等。这些权利和特权都不是互惠的。

这些屈辱的条件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在1919年的和会上未能改变，成为中国向一个现代国家发展的障碍。所有中国人都痛恨这些条约，父亲尤其认为应该向广大青年宣传改变这种状况的必要。

当时的其他事项有：俄国人从新疆撤退问题；处理与法国的复杂关系问题以及和他们在越南的共同利益问题，等等。为了维持和越南的接触，中国对与维希政府断绝关系一事颇为犹豫。他们反对中国接收滇越铁路云南段，因为害怕日本人借口此事对越南施加压力。

维希政府给予南京傀儡政权特殊权利一事，造成外交关系上的紧张，最后他们将上海法租界于1943年交还给南京。

中国政府随之决定与维希断交，并接管了云南境内的滇越铁路。时机似乎正好，因为法国的解放委员会尚未被承认，而维希已没有代表在中国。

然而代表戴高乐和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夸法尔自居为法国在中国的权益保护人，向中国提出极为强烈和讥刺的抗议，以致中国拒绝再和他见面。父亲记道：

此事对我方造成的损害可能远远超过那段铁路之所值。那条路一直在亏损运行，而且至少在目前对我们没有多大用处。

父亲到重庆时正好顾维钧博士也到了重庆，当时他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改进中英关系。和通常的情况一样，两国的合作要基于相互信任、尊重和友谊。父亲了解到顾曾在蒋面前对他评价甚高而感到受宠若惊。尽管他私下对国民政府的作为有保留意见，但始终是它的忠实公仆。在重庆，人们习惯于颂扬蒋委员长，这是在逆境中抓住随便甚么可以指望的东西以避免绝望的一种倾向。

重庆政府，特别是顾维钧博士，相信我父亲对苏联事务的建议。他是苏联问题专家，尽管有的人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他过于主观，看不到俄国人的意图。他了解斯拉夫人的高尚情操，以致认为斯大林也是那样的人。

顾维钧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胡博士对俄国的看法很重要。他自幼在俄国学习，俄语流畅。我建议他在外交部特别注意俄国问题，并希望他用较多的时间研究俄国报刊以有助于蒋委员长了解情况。我还说，我和许多人都指望他能在不远的将来掌握对俄关系。

重庆对当时俄日间的暧昧关系甚为怀疑，父亲认为如果俄国对英美不满，就会更向日本靠拢，这将不利于中国。中国和英国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将起重要作用。

当1943年正式徵求他对此问题的意见时，他说他认为日本人不会进攻俄国。他以为日俄之间甚至有可能存在密约。就中国而言，问题在于一场日俄战争是有利还是不利于中国。他认为如果俄国战胜日本，它势必占领中国东北。而如果战败，也削弱不了多少它在欧洲战线上的力量，因为它可以很容易地后退，并在西伯利亚地区抗击日本。

在他1943年的日记中有一段记述他与冈瑟·斯坦的谈话。斯坦认为盟国在战后可能十分侧重于确保欧洲的安定秩序而在军事上不能在远东全力以赴。这就有利于日本人完全占领中国，防止盟国建立基地。

斯坦认为，由于我们食物短缺，经济恶化，日本人能够做到这点。确实，日本人的轰炸更凶了。

由于对俄国的态度焦虑不安，蒋希望改善与英国的关系。有人建议蒋夫人访英。以她的聪颖智慧和美丽动人，使她成为政府所能派出的最佳使节。蒋夫人犹豫了很长时间。她感到在她和委员长访问印度时，英方没有按重要国家元首的身份接待。这次尽管有英王和王后的邀请她觉得她并不为英国人所喜爱，而且她对遭到英国人的批评非常敏感。另外，罗斯福也劝她

不要去英国，这可能是出于他希望在和英国商量战后对亚洲殖民地的处理问题时有更多的行动自由。

1943年蒋夫人访美之行颇为成功，她以其善于弥合双方分歧意见的技巧给予罗斯福以极好的印象。不过英国是另一回事。邱吉尔对战后形势的声明，立论于不把中国当作大国看待。他仍对蒋夫人公开议论印度独立的问题感到恼火。英国报纸认为这是干涉他们内政的公然冒犯，有的甚至公开敌视中国。

由于害怕不友好的接待，蒋夫人终于以身体不适为藉口，谢绝访英的邀请。如果她真的成行，很可能使英国人倾倒，使相互关系有所改善，并能为中国博得他们更大的重视，也有可能影响英国把对日战争摆在更优先的位置。然而结果是，1943年宋子文访英，邱吉尔并未表示出很好的友善态度。他们二人继而在华盛顿的太平洋作战委员会上讨论缅甸和西藏问题时发生激烈争吵。

直到1944年7月，我父亲才终于获准离开重庆。在此之前，宋子文曾召他到华盛顿帮助准备访英事宜，但两个月后又调回重庆。1943年下半年，诸大国频频召开国际会议，商讨结束战事和为和平作准备的事宜。莫斯科四国宣言的签字和当月晚些时候的开罗三巨头会议标志着中国在外交上的胜利。开罗宣言，事先曾经斯大林同意，第一次提到中国是四大国之一。

尽管对开罗会议感到欣慰，蒋依然对英国存有戒心。在英国国会访华团访华之始，蒋就关照宋，我方说话要特别小心，因为英国人一贯怀有别有用心动机，当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时，很难弄明白他们的动机是甚么。

在开罗会议上英国反对将中国的东北和台湾归还中国，只是经罗斯福坚持，会议的公报才得到英国人的同意。邱吉尔私下对宋说，他很高兴法国人在1940年就投降了，假如他们不投降而将政府迁到北非，则德国人将会攻占北非而不是进攻俄国，这样，整个大战的进程就会改变。

英国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往往和中国人不一样，这是父亲经常评论的事实。他倾向于赞同约翰·普拉特爵士在《中国的政治与战争》一书中的结论：“中国人的政治以其纯真完美，道德高尚和天人合一，而比西方的各种思想体系具有更坚实的行动基础。”日本人则以其“狭隘的部族意识”，也是与中国的人道主义和宽容迥然不同的。

在蒋夫人访美后，宋蒋之间发生了争吵，结果，宋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之职，由他的姐夫，也是政治上的永久对手孔祥熙接任。宋不再参加各种会议，而是与两位次长密切合作，专务于外交部的工作。父亲很高兴有了确定的职务和职责。不像在华盛顿，宋在家里办公，使他有时闲得无事可做，有时职责不明。

在重庆，谣言、闲话、妒忌盛行。与父亲同任次长的吴国桢是个野心人物，这已为他后来的行事所证明。父亲起初并未发现吴是个居心叵测之人，虽说有的朋友已经警告他注意这一点。直至最后，他也不愿意谴责吴为人恶毒。然而有件事很可疑，曾经为好几个人所提及。顾维钧博士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曾谈到。有一次委员长设午宴，吴出席了，而父亲，不知何故未接到请帖。原本他们二人要就法国维希政府提出归还华租界的问题，合上一份条陈，提出因应的对策。因为如果接受维希的提议，就等于在事实上承认南京傀儡政权，而如果与维希断绝外交关系，又会招来它的报复。父亲认为此事很简单，他本应出席那次午宴，说明他的意见。

另外有两件意外的事，使他的道德观念和理想主义受到打击。一件事是，一位部里的参事，本答应当吴南如到部时他就搬出他的办公室，但他随后改变了主意。父亲写道：

这是第一次我信任的人不守信用。

第二件事是由哈里·安斯林格来信要求父亲调查一桩走私毒品案引起的。

宋对我说，我是和他一样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我没有他受过的那些焦头烂额的经历。而如果一个人要丧失生命，理想主义可救不活他！他断言，牺牲一条性命，丝毫也改变不了大局。

1943年冬，正当父亲因支气管炎卧病在床之际，他的弟弟世勋和弟媳谭明德来到重庆。他的小弟世平，二十二岁，早几个月也从北平来到。世平在前来自由中国的半路上困在宝鸡就是在这个小城，从报纸上得知父亲当时在重庆。

那年冬天，全家接到父亲的继母逝世的消息。她单独和她最小的女儿世惠住在那所宅子里，晚饭前，她忽然感到莫名其妙的头疼。她上床去睡，就没有再醒过来。后来世惠的学校从北平迁到内地，得以和她的哥哥们在重庆相聚。父亲和他继母的关系多年中有不少变化。从最初那种曾迫使他捨去初恋情人的孝道，到对一位在艰难岁月中尽力维持一个家庭完整的妇女的衷心同情。

在祖父去世和抗战开始后，家庭的财产逐渐耗去，祖母不得不将部分房屋出租，卖掉汽车，辞去仆人，只留下一位老看门人和一个兼充厨娘的女仆。

她在丈夫死后写给父亲的信中，闪耀着真正的关心和感激之情。父亲除了充当她的顾问以外，还分担了家庭的责任。特别是他的兄弟，全家为之焦虑的世熙，更成了父亲的一份负担。

在他的诸弟之中，父亲觉得和世熙最亲。父亲的同学老友马戈·瓦尔鲍姆告诉我，他简直不知道父亲还有其他的兄弟。但是他知道世熙的英文名字奥古斯丁是因为当年父亲在钢琴上执着地练习乐曲“啊，你爱奥古斯丁”而得名的。

两人的兄弟之情终生不渝，尽管世熙的生活方式放荡不羁。但也许是因为父亲的年纪大得多，对世熙有着父亲般的关切，或者是他认识到世熙只不过是他的更走极端，更不受约束的翻版。两人都有爱寻欢作乐之心，但父亲由于具有自制能力和道德观念，能够自我约束，而世熙则娶了一位好赌成性超过他自己的妻子，注定他们一辈子要过着债台高筑和名誉扫地的生活。

父亲不止一次把他从债务中解救出来。我的祖母在一封充满怒气的信中表达了她得知世熙夫妇状况后的痛苦心情：

世泽，你务必告诫他们清偿债务，如果他们置若罔闻，就切勿再给予帮助。

她对家中其他人向父亲索要钱财，也对他同样阿护。1939年她在信中写道：

我的收入已减少一半，而家中其他人则已失去一切，处境困难。

尽管父亲出于慷慨的本性，不时接济家用，她总是对此频频表示由衷感谢：

——你又将接济家用，并汇来一百二十元，甚为高兴。

——你提出支持世勋攻读博士学位，如此盛意使我感动，不禁泪下。

她总是考虑各个方面，审慎而周到：

你寄来的五百元，我已交娣娘一百元，大嫂一百元，二百元家用，留一百元

为明年开支。我已将你的近况告诉他们，要他们不要年年指望你的接济，也不要写信去打扰你。一个人如果略有独立精神，就不致如此依赖成性。但有此精神的中国人实在不多。

当她的长女寿菊在1939年因伤寒病死后，她的负担加重了。她要照顾寿菊的两个孩子，直到他们的父亲能够续娶。这时她的精神开始崩溃。她在给父亲的信中承认她甚是疲倦，烟抽得很厉害，“这是个坏习惯”。她的手发抖，记忆力衰退。

1941年她对世熙的焦虑达到新的顶点：

一年来我们没有接到世熙的任何消息。告诉他，想想为他担忧的母亲。即使他不能从钱上接济我，写几句安慰的话也能略解我忧。

1943年她突然病逝，在她和父亲相处的一生中，这大概是比其他任何阶段都更为亲近的时候了

第六章 战争结束

布雷顿森林——敦巴顿橡树园——雅尔塔及中苏会议 ——旧金山会议和联合国的诞生——罗斯福逝世——蒋退往台湾

父亲在饱受战火摧残的重庆任职两年之后，1944年6月得到通知，指派他为出席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罗斯福称为“国际经济合作之基石”的货币及金融会议。父亲大喜过望，因为可以在一个和平安适的环境中与家人团聚了。这也表明他将回到他最喜爱的生活，在国外代表自己的国家，和别国的代表们进行交往。何况，世界现在正瞩目于结束战争和重建和平的前景。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时刻，依然困处重庆的僚们对他羡慕不已。

布雷顿森林会议聚集了四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其中最杰出的是英国的财政大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战后的现代经济后来都是以他的学说为依据的。这次会议在“国际贸易和发展是世界经济繁荣的主要因素”的前提下，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世界银行，并创造了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其他手段。

起初，宋子文没有让父亲去布雷顿森林，因此他未能在这次会议上作出贡献，然而直接指派他参加1944年夏末召开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这次会议是创立世界安全组织，后来发展成为联合国的第一个具体步骤。它也标志着中美关系走下坡路的开始。

敦巴顿会议的会场是一所大厦，距白宫只有十分钟的汽车路程。这所大厦所在的庄园被誉为“美国最文雅的一平方英里，是一处人造的伊甸园，有花草、喷泉、桥梁、树木和溪流。为一个人希望能标志新的和平世界之开端的会议选择会址，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门楣上镌刻的铭文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这个会议不得不分为两个部分召开，因为苏联代表拒绝和中国代表团坐在同一张桌旁开会，藉口是他们在中日战争中处于中立地位。但更恰当的解释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中国和其他大国处于同等地位，同时也不愿惹恼日本人。

早在1943年，由美、英、苏、中四国外长出席的莫斯科会议已有意于及早建立一个以主权平等原则为基础的全体爱好和平国家的世界组织。

当时，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坚持邀请中国在联合宣言上签字。他说他可以安排这次会议分成两部分同时召开。后来又决定分为两个会议，一个接一个开。

8月中旬，顾维钧博士奉命会同我父亲及魏道明，代表我国参加会议。父亲提醒顾博士，

第二个会议的开始可能推迟，因为俄国代表事事都要请示莫斯科。他认为重要的是，中国须在其他国家公布其商定的任何内容之前提出本身关于联合国宪章所持的基本观点。因为存在着俄国一旦和英美达成协议就可能不再考虑中国意见的危险。

这份称做中国建议的文件是在很仓促的情况下，在顾博士到达之前草成的，甚至未经重庆政府批准。但这是得到外交部和蒋介石本人点头的。

在顾博士到达之前，父亲目睹了孔祥熙和魏道明如何活动争当代表团团长的花招。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开会时，罗斯福曾告诉孔他打算召开一个促进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会议。孔当即电告蒋介石，说他愿意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这个会议。蒋未同意他的要求，他便提议委派时任外交次长的父亲为团长，因为英美两国是分别派他们的外交次官和副国务卿为代表团团长的。父亲随后受到委派。

和历来一样，人品和个人权利之争会损害代表团的工作。魏道明原由蒋委以宣传之责，父亲平素对他并不甚推崇，这次也成为代表人选之一。他已然对外公布一份名单，把自己的名字列在首位。但结果还是以顾为首，率领中国代表团。父亲写道：

我们不知道谁应是第二位。按重庆的指示我是第二，但据魏说，他是第二。其实，我并不在乎。

魏在进一步表示异议后，藉口生病提出辞职，此事使父亲很是痛快。然而，就在谁任代表团团长的问题解决之后，孔又邀集代表团主要人员，招待早餐，宣称这个代表团由他指挥和监督，他才是代表团的真正团长。

顾博士超脱于这些没有价值的争竞之上，召开会议讨论在中国建议中应列出的要点。他认为原先的文件过于死板，可以写得灵活些以便于谈判磋商。讨论的内容包括有关“侵略”一词的定义。孔和我父亲对是否要具体列出构成侵略的行为，意见相反。父亲对当年在国际联盟为国际侵略的定义热烈争论印象很深，故认为应予列出。

苏联由于当年曾被国联开除，不想和旧国际联盟有任何牵连。顾赞成与苏联大使接触，并送给他一份中国建议的文件，以表示中国并不忽视他的作用。但魏反对此举，恐怕被拒绝而难堪。

8月31日，顾偕同他的同事夏晋麟、梁璠立和关小姐离华盛顿到蓝岭我们所租的夏季别墅和我们一家共度三天。在那里，顾起草他要在开幕典礼上演讲的讲稿和阐明中国观点的备忘录。记得当时我被允许给他们开会的人送去食品和冷饮。即使是在宾夕法尼亚的群山中，那也是一个很热的夏天。有时我感到我是在不恰当的时候闯进去打搅了他们，但他们都很和蔼对我挺好，特别是顾博士。我虽不明白他们所谈论的是甚么，但我知道那是个重要的时刻，这些人正在重建和改造未来。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第一阶段是由美英苏三国参加，自8月21日开始，在9月27日结束，尽管原定的是9月5日以前结束。正如父亲所预料，中国代表团不得不因其拖延甚久而坐等；在此期间，代表们力求与其他国家的代表保持接触。

突出的癥结之点是表决权 and 否决权问题。英美坚持主张，涉及到有关和平与安全之争端的国家，对该案没有表决权，而俄国则坚持有表决权；葛罗米柯还宣称，苏联的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在全体大会上个个都有表决权。最后不得不将这个特殊项目推延到四大国会议上解决。

与此同时，英美另在魁北克开会，讨论如何加速对日战争，并制定为达到此目标的新战略。孔希望中国也能与会，并向罗斯福提出让中国参加。孔曾于8月24日在美国参议院演说，但当时美国报纸正对中国发表一些不友善的批评，对孔的演说也很少宣传。

9月28日父亲应召立即返回重庆向蒋汇报。会见历时二十分钟。父亲记道：

在我之前的人只有五分钟的会见时间。

蒋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不友好。父亲在日记中写道：

我向他解释，美国报纸上的批评是从长沙陷落开始的。这是他们的运气好转以后自然会表现出来的反应；而当初美国人倒霉时，他们是捧我们的。现在他们打胜仗了，就觉得有本钱可以批评我们了。在美国，事情就像电影情节似的，有高潮，有低潮，有顶峰，有谷底，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皆大欢喜的结局。报纸对弗丽达·乌特丽写的一篇文章：“为甚么挑中国的毛病？”甚至不予刊登，因为现在只时兴批评。

虽说罗斯福基本上依旧对中国忠实，但无疑他的态度也冷淡了。一部分是由于蒋在指派一名美国人指挥他们部队的问题上和史迪威反目，一部分是由于英美急于把俄国人拉进来对

日作战，以减少伤亡并更快地结束这场战争。美国人似乎已准备不惜用任何手段来讨好俄国人，这时他们认为没有中国的帮助也能打垮日本。

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国成功地被承认为四大国之一。敦巴顿会议则从这个地位退了一步。显然会议的第二阶段只是个形式，关于未来国际组织的所有重要事项都已经成为“既成事实”。在整个第一阶段中，美国人的政策始终是迁就俄国人。

第二阶段会议一开始，顾就接到其他三国在第一阶段会议中制定的一套建议。中国代表们审阅了这些建议，并讨论了第一阶段会议中未曾议及的中国建议，特别是与中国的利益有关的各项问题。

10月2日，顾在全体会议上提出了准备好的十四项问题。会议是由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主持的。美国代表团对中国方面深入探讨问题和充分理解其主旨表示赞赏，尽管给予他们审阅的时间很短。中国代表团无疑从以前参加巴黎和会的经验得益不少。当年顾曾代表中国参加草拟国际联盟盟约的委员会。现在讨论的问题有许多与当时类似。而且国联的失败显示了在未来国际组织的运作中将会遇到的许多问题和困难。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结果至少对这项共同事业作出了相当的贡献，这是大家公认的。

尽管罗斯福和蒋之间的分歧增多，他仍然对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和亚洲领土最广的国家而加以支持。而且中国有史以来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所以他决心使中国成为负责维持世界和平的四大国之一。有中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盟国，他就能在一心维护欧洲和平的同时，维持住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

但是中国代表团很快就看明白，在苏联的坚持下，英美对某些问题一再退让，例如安理会的否决权和额外给予某些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表决权。英美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意图是，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也要保住苏联在与轴心国作战上的合作。其结果则是削弱和抵消了中国的贡献。苏联的坚不让步态度不仅使中国代表团被贬低和实际上被忽视，而且因此拖到9月29日才开始第二阶段会议，只给中国留下短短一个星期的谈判时间。

美国人告诉中国代表团，第二阶段的会期要尽可能短些，因为会议已经开得很长；而且第一阶段商定的意见不宜多所更动，因为如果再作重大改变就需再和苏联谈判。看来他们经过第一阶段会议中和苏联的激烈斗争之后，觉得第二阶段会议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为了“维持中国的声望”，而不是听取甚么认真的建议。英国实际上和俄国一样，并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大国。美国人之所以要和另外两个国家达成一致，也许就是由于当时美国一般公众舆论都要甩开中国的缘故。

在中国代表团内部，对如何维护他们的主张也有许多争论和不同意见。顾博士采取现实主义的观点，表现出要为新的国际组织实事求是地做出真正贡献的真诚愿望。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父亲对国际形势和苏联政策与态度的深刻了解。最后决定不把所准备的建议全部提出，而只提出那些关系到新国际组织之根本的最重要建议，不管美国和英国是否赞同。

得到中国，英国和美国一致同意并获得苏联赞成，提交给旧金山会议的建议包括：

- 1、宪章中应规定，解决国际争端必须充分尊重公正及国际法之原则。
- 2、全体大会应负责就有关国际法之规定与原则的发展和修订，着手研究并提出建议。
- 3、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对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文化合作专门作出规定。

与会各国同意在第一阶段会议结束时不作公开声明，而于第二阶段会议结束时发表正式文件，在四国首都同时公布。五千字的公告阐述了联合国的基本内容，给全世界以希望。有的国家仍在交战。他们都同意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三十九位代表制定的结构方案。新的国际组织将由全体大会，安全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组成。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均得成为会员国。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各项重大决议都借鉴了前国际联盟失败的教训。安全理事会要比前国联行政院更强有力，更起作用，它的决议可以以国际警察行动来执行，旧的条约将加以修改，抵御外来侵略以维护政治上的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将得到保证。教育、文化、经济和社会事宜的促进与提高将优先提上日程。旧国联的全体一致同意规则被放棄，这是一项重大的改进。

在重庆时，父亲曾对学外交的学生作过一次四小时的专题演讲，然后阅读了三十篇对有关国联的规定和敦巴顿会议的建议进行比较的论文。学生们对他所作报告的理解水平使他印象很深：

令人惊奇的是，所有学生无一例外都认为美国未参加国联一事十分重要，并

认为这是国联失败的原因。这表明他们对美国的信赖，不仅认为美国是最强大的国家，而且是能对其他国家起良好影响的最公正的强国。

中国代表团为构筑和平采取了积极的步骤，不顾英国的反对，提出了若干符合公正和法律原则的处理国际争端的准则。这些准则都成了联合国宪章的一部分。

顾博士和他的代表团尽管经受了种种重大困难和挫折，但通过巧妙的外交折冲和坚定的决心，使他们的建议受到各方的认可，他们所作的贡献受到大家祝贺。无疑，中国代表团的卓越表现对各国一致接受中国为四大国之一作出了贡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结果是，在发出旧金山会议的邀请时，中国被列为四个发起国之一。中国成功地取得了和英、苏、美同等的地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艰难赢得的成功却正与和美国的关系恶化处于同时，而美国正是诸大国中唯一真正支持中国的国家。虽说两国代表团的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和热诚相待，然而蒋介石和罗斯福的关系却急转直下，分歧日益扩大而严重。父亲尽管向蒋做了一番解释但他自己则为美国报刊上的苛刻评论而深感沮丧。

当时中国军队的装备和武器供应已消耗一空。美国的政策是只有国民党和共产党能够合作共同抗日，才对中国军队实施军援。这一条件蒋不能接受，他在绝望中通过史迪威向罗斯福作了坦率的说明，这一情况代表团毫无所知。蒋和史迪威最终因不和而分手。尽管美国根深蒂固地不相信共产主义。但随之而来的则是美国实际上终止了对蒋政权的支持。到1944年11月，他们看到优势正转移到中国共产党一方。这一情况发生在对日战争最微妙的时期，国民党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尽管蒋很固执，孔也多少如此，顾博士在父亲和其他同事的支持下，吁请采取温和路线。理由是美国是我们唯一的真正盟友，我们需要美国以打赢这场战争和战后重建家园。如果中美两国间的摩擦任其发展，我们很可能被摒除于对日战争之外，并丧失我们战后的地位。

然而蒋继续不听劝告，丧失军事时机，并依据对他个人是否效忠而不是才能来选拔军事指挥官。他不习惯于让步，他不懂西方人的心理。

当父亲还在重庆期间，他于1944年12月5日晚参加了蒋为祝贺宋的生日而举行的宴会。与宴者还有赫尔利，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和蒋的大儿子。气氛沉郁，父亲描写当时的情景说：

这是我们历史上最低沉的时刻。昨天我们不加抵抗就丢掉一处本来是易于防守的要地。人们怀疑日本人会不会打到重庆来。蒋在今晨宣称他有信心，重庆和昆明必能坚守，我们正在采取紧急措施巩固必守的要地。现在已有两营美军在昆明。这是个危险的时候，人人都明白。谁也高兴不起来。只有赫尔利还能讲个笑话：他说他吃饭像他的双亲，吃得像他母亲那么慢，像他父亲那么多。蒋递给他一支烟，他说他年龄太小还不可以吸烟。这就是所有的玩笑话了。并没有谁垂头丧气，但心情都很紧张。

宋子文又重新得宠，此时是宠儿。只是人们怀疑他在决策上究竟有多大权力。在他失宠的时候，有一次我对他说，在关键时刻他总是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

饭菜可口而不奢侈，甜食是哈密瓜。目前新疆正发生叛乱，将来还运得过来吗？也许这次危机能使老头子看清楚一些，给我们的政府带来一点新气象。

近来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人的英雄主义的文章，和他们情愿为祖国献身的感人事迹。而在我们这里，一般平民都只想逃生，兵士们则饥寒交迫无心作战。我们本有充分时间训练我们自己的军队，却要靠外国军队来替我们支撑，真是耻辱！供应我军军需的款项都到那里去了？真需要当头一棒使我们清醒起来。

然而三天后，父亲又乐观地写道：

今天人人都高兴起来。我军的措施正在产生效果，敌人被包围在独山和都匀之间，我们有可能收复独山，这将使我们能更有效地抵挡沿此方向继续推进的敌军。贵阳和昆明的民众信心十足，因为他们看到大批的部队和武器陆续运到。士兵们吃得也比较好，所有卡车都被徵来作军运之用，军运的飞机也为数可观。据传，一部分从缅甸调回来的精锐部队已经开到独山附近。

不过他又简要地加上几句：

孙中山夫人仍然悲观。在宴会上我和她打了赌，我说日本人不会再转回来打重庆了。她是受到某些方面的影响，这些人兴高采烈地散布坏消息，藉以证明政府事

事腐败，需要改革和成立联合政权。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的报纸不发表收复独山的消息，而在其失陷时则曾在头版用通栏大字刊登！

在国际上，父亲注意到欧洲各处的共产党都已进入政治舞台。在法国，他们似乎比戴高乐派更有力量，尽管戴高乐本人得到英国的支持。

他观察到：

欧洲正在迅速恢复，欧洲因素必须加以重视。美俄关系比英俄关系好，但人人害怕俄国。有两种趋向：或者打击俄国，但鉴于各国的共产党势力，这是一种危险的作法；或者追随罗斯福和邱吉尔，设法向俄国证明，它是可以和别人合作的。

美国正在等待俄国加入对日战争。但是中国人知道俄国人肯定是要索取一定的回报的。为了防备此事，中国希望和罗斯福达成关于俄国参加对日战争的条件协议。如果俄国人先走一步，中国方面担心的是，英国人会准备接受任何条件，而美国人则可能被劝说承认俄国要求的在我国东北的各种权利。

即使不是对历史作事后诸葛亮的评论，也会把1945年2月的把中国排除在外的雅尔塔三强会议，看作是中国的十足灾难。对外宣称的会议目的是根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制订的路线维护和平与安全。虽说罗斯福一直将中国作为平等的盟友对待，但他已接近死亡，而且对斯大林意图的认识过于天真。从雅尔塔会议的建议看，这是十分明显的：

- 1、外蒙古的主权问题，留待与中国解决。
- 2、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属于中国，但成立中苏美联合委员会进行管理，以提高其效率。
- 3、苏联租借旅顺港，以保证其在远东有一个不冻港。

罗斯福提出，对以上诸点，中苏应直接谈判以取得一致意见，他并敦促解决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罗斯福看不到苏联对远东的图谋，除了尽快结束战争和苏联参加世界和平组织之外，一切盲无所知。他以为他的盟友都和他具有同样的思想，他相信民主政治是政府的最佳形式，各国都嚮往于此。然而正如迪斯累利所曾说过的，民主是最难的政府形式因为它需要有高水平的民众以及个人的智慧与道德才能成功。它还依赖于人民在确保了基本生活需要之后所发展起来的热心公益的精神。

在1945年，美国的自由主义人士开始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的政党，并开始予以支持。罗斯福建议中国政府应与中共合作。顾博士向政府建议，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应有各共产党的代表参加。蒋则继续反对和中共在任何方面合作，而共产党人则只听命于在延安的政府。

1945年3月，父亲离开重庆前去参加旧金山会议。旧金山会议是雅尔塔会议安排召开以制订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这个名称最初是由罗斯福提出而在旧金山会议上一致通过的。会议原本要中国和法国均作为发起国，但法国回绝了。

与父亲结伴同行的还有顾博士和王宠惠。行前三人与蒋会面，蒋仍表示他不同意中共的人员参加代表团。罗斯福关于此事的来电使他焦躁不安，为甚么罗斯福对此事如此重视。他疑惑不解。

顾博士向蒋解释说，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可能已成为国际上日益对我们不利的棘手之事。已经邀请中国青年党的领袖参加代表团，但迄无回音。经最后的分析研究，代表团中列入了一名共产党人董必武。

1945年4月在华盛顿开始对旧金山会议进行准备。会议要设多少主席以及怎样轮换已成了数理逻辑问题。中国代表团奉命支持美国的提议，但不要刺激英国和苏联。当时蒋正直接掌握中国的外交政策。顾博士就其自身而言，渴望促进国家的统一，而且在中国问题评论家们看来，他正是这样做的。

新的联合国必须处理的，仅次于维护和平的重大问题，是人类更大的敌人：贫穷，疾病，无知，饥饿和夭折。在旧金山草拟宪章的工作中，代表们认识到有一项基本需要，那就是广泛的国际经济与社会合作。在最后的宪章文本中，单是这些合作事项就占了整整六条。

与此同时，父亲被派参加法学家委员会，为拟议中设在海牙的新国际法院草拟规约。对设立一个有十五名法官的法院，而不是一个较小的法院，中国投了关键性的一票。英、法和俄国都赞成较小的法院。美国在该委员会中没有代表。

4月12日从佐治亚州温泉镇传来噩耗，罗斯福因脑溢血突然逝世。这对每个人都是沉重的打击，特别是中国。假如他能再活四个月，看到对日战争的结束，将会明白他过高估计了日本进行战争的能量。罗斯福的全部外交政策都是基于和苏联协调合作；有人把这看成是姑息。为保证苏联参与对日战争，甚至可以牺牲一个盟国的权益，答应他们的不合理要求。结果是俄国人在日本投降之前一个星期参战。依从公众舆论，罗斯福向疲于战争的国民许诺，美国的孩子们很快就可以从战争中回家了。为此，他向重庆施加压力，要他们马上开始中苏谈判以争取俄国人参加对日战争。

1945年6月父亲随宋子文到莫斯科出席中苏会议。此事是由宋筹划的，名义上是加强中苏友好关系，并讨论任一方提出的议题。希望由此不但与俄国达成协议，也能达成与中共的协议。父亲的正式职责是专门委员和官方译员。

1945年6月30日斯大林和宋第一次会面，父亲在场。当时没有讨论任何问题，但气氛显然是友善而合作的，双方都表示，中苏间传统的相互理解要继续下去。

斯大林竭力强调现在俄国已由新人掌权。过去俄国要和日本结盟以分裂中国。现在俄国要和中国结盟以遏制日本。

但两天后的第二次会见，斯大林的态度就变硬了。对宋和父亲的第一个震动就是斯大林坚持要求中国给予外蒙独立。

在二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三大国表示理解和同情中国，在长期抗战之后却接着要让出国土，特别是如此广大的一片国土，必将十分为难。因此各国同意，用根本不加讨论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问题被搁置。诸大国同意对外蒙维持“现状”。

现在斯大林提出他对此“现状”的理解，就是给予无论如何不愿仍然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国家以独立。他的主要论点是外蒙的地理位置威胁苏联在远东的地位。日本现在虽被击溃，但二、三十年后它将得到恢复。俄国人对此有权防护自己。他们已打了四年仗，流了很多血。现在又期待着俄国去打日本。参加一场战争，只能是在因此能够得到加强的情况下，才有理由那样做。

宋说，关于外蒙，俄国不必管它。在战争期间，俄国军队通过外蒙将不会引起争议，而且从孙中山的时代起就唤起了中国人民保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意识。斯大林拒绝了宋的要求。

斯大林的“解决办法”是现在就签定承认蒙古独立的条约，但保密到日本被打败，中国收回其他领土的时候再公布。

租借旅顺口和在大连建立自由港作为苏联的一个出海口，是另一场不可避免的极端重要的主权斗争。

当宋要求斯大林更明确说清他的意图时，斯大林重复说，他对经济上的利益和特权并不感兴趣，他只是为了保卫俄国的地位。这话，他在以后的几天中曾重复多次。

在向蒋报告了第一次会谈内容之后，7月7日宋和父亲再次回到会议桌边。宋用尽可能婉转的措辞向斯大林重述了蒋的决定，中国不能承认蒙古独立，因为这必将导致中国政府倒台不过他们同意雅尔塔所确定的办法——维持“现状”。

斯大林继续盛气凌人地对宋谈这个问题，暗示如果中国此次不肯承认外蒙独立就会损害中苏关系。话中已带出威胁的音调。他暗示，和苏联结成盟友全靠“消除所有抵触的缘由”。

辩论激烈进行，双方都无意退让。斯大林提出，要苏联的港口设施和铁路建设达到足以支持他们抗拒日本，需要三十到四十年。因此和中国的同盟是必要的。蒙古问题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

当发现不能说服宋，使他屈服，斯大林突然中断了会谈。

两天后，宋声明他已向蒋报告会谈陷入僵局。他再次强调中国人对其领土主权之强烈感情是一种天性，鼓舞他们即使面对超强的日本压力，也拒绝让出东北三省。这种天性胜过政府的安全和稳定。

宋于是宣读蒋的来电，开头说，他希望斯大林能赞赏中国政府准备为中苏永恒友谊的神圣事业所作的牺牲。

基本上，中国在维持蒙古的主权不变下，已准备在大连和旅顺问题上让步。作为回报，蒋要求苏联，鉴于中国国内的不统一，将所有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全部限定给予中国的中央政府。还特别要求苏联帮助消除新疆的动乱，以使商业和贸易得以恢复。最后，关于外蒙问题，由于这是前进中的梗阻之点，蒋同意在打败日本，并经过一次公民投票之后承认外蒙独立，以避免日后的争端。

斯大林依然拒绝。宋恳商说，要蒋同意外蒙之事，蒋必须对经受了如此长期苦难之后还要作出这样牺牲的中国人民有所交代。

斯大林还是不为所动。在其后的日子里，一个方案又一个方案地讨论，常常夜以继日。对苏方提出的各种要求和对其协议事项的解释，宋不得不屡次向蒋请求指示。

最后到7月12日，宋提出他必须回去亲自向蒋汇报，即使这将使最后的定案推迟到斯大林的柏林之行以后。同时双方商定保持沉默，对外不发表任何消息。

会谈结束时，多少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宋感谢斯大林的坦诚相待，并表达蒋的谢忱，以及他本人对斯大林和国民政府维持友好关系的意愿，表示谢意。

斯大林重复表示俄国不再想分裂中国，而希望中国成为繁荣富强的国家。目前不是所有中国人都相信他，但总有一天他们会……

斯大林在会议桌上的胜利都得之于防备日本现在的，和将来的侵略这个藉口。他坚持说，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他们就没有必要要求中国让步。俄国到头来还是要为中国的主权而作战和流血的。

宋向斯大林保证中国渴望达成协议。中国人已经在外蒙问题上屈服，将旅顺租借给俄国，并在大连问题上让步……

1945年8月10日斯大林宣称日本人有意停止抵抗。如果他们不投降，就会由于装备低劣，军无斗志，和显然害怕俄国人而在一星期内崩溃。

宋表示中方急于在日本投降以前签约，这样在向中国人民宣布条约内容时会更容易些。

斯大林回答说，关于大连和铁路，还有问题没有解决。宋再次指出中国在外蒙问题上作出的重大牺牲，“几乎有半个中国么大。”

斯大林答道，“那是一片沙漠。”

“是的，但这在地图上看不出来，”宋反驳说。“学生们只从土地大小判断，不论土地的价值。”

如何在中国人民面前阐明中国代表们向斯大林作出的巨大妥协是一件极不好办的难题。宋多次运用他的外交能力审慎周到地拟定条约词句，使之既能满足斯大林的要求，又能使中国人民易于接受。

到最后，俄国人几乎在每件事上都达到了目的。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得到的是苏联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而作为回报，中国人则不得不承认外蒙独立，中国长春铁路和大连港中俄共有三十年，旅顺港变成中苏共同使用的海军基地。

温文尔雅学者型的宋子文不是坚持己见，咄咄逼人的斯大林对手。不过最后在条约上签字的则是当时的外交部长王世杰。王和他的伙伴蒋经国在一个星期前参加会谈，并出席最后的谈判。

即使是王的朋友蒋经国也不理解为何王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接任外交部长，并在中苏条约上签字。此约必然会在后世受到谴责。王的一位老同事张忠绶对此作了解释。王曾对他说过，签订中苏条约犹如壮士断臂以保全性命，因为此约将保持两国间三十年的和平。

然而，中国作为战胜日本的主要大国之一，却必须向苏联捐弃领土，并作出经济上的让步，就像是一个战败国，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个条约是和外国签定的最苛刻的不平等条约之一。中国为了要和俄国加强友好关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中苏条约似乎标志着国民政府的命运在走下坡路。在布雷顿森林，敦巴顿橡树园和旧金山诸会议期间，中华民国作为五强之一，威望达到了顶峰。

然而到1945年12月，继中苏条约之后，美国人觉得中国的对立两党之间首先应该达成某种妥协。杜鲁门声称需要扩大中国政府的基础，停止内战，创造一个统一的民主国家。随后马歇尔被派往中国，企图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进行调解。

这项工作开始时进展顺利。他安排了一次停战，并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监督停火，同时，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2月，国共间达成协议统一两党军队。在伦敦，维辛斯基，顾维钧和斯退丁纽斯会商安全理事会事宜。

3月间，马歇尔飞返美国向杜鲁门汇报。但是4月里，中共违反停火，他被迫返回中国。

整个5月6月内战继续进行，同时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在东北开始停火。7月，两名民主同盟成员在昆明被暗杀，中共袭击了一支美国海军陆战队，而民主同盟则抵制了国民代表大会。任何乐观的看法似乎都为时过早。

司徒雷登，这位在中国生活了半个世纪，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应付当时局势的人，受任美国驻华大使。但是到了8月份，他和马歇尔两个人都为无力解决国共之间的争执而感到烦恼。国民党方面一次次丧失良机，一次次拒绝协商，已经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1944年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通过参谋长陈诚要求蒋介石实行政治改革，以实际行动消除贪污，并通过慈善事业改善人民生活。

蒋从来不是纳谏之人，即使在这种紧迫关头，他也不准备真的和共产党妥协。美国为了它本身的利益，愿意进行调解，但不愿卷入中国内战，尽管它已将九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卖给国民党。

1947年1月马歇尔被召回华盛顿，从而结束了作为调解人的活动。蒋以其顽固拒绝调解，行将付出重大的代价。

以后的六个月期间，在学生抗议内战和经济紊乱的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被列为非法。11月，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举行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国民党取得大会的绝大多数代表席位。

然而到了9月，中共已取得重大进展，就在同月，蒋介石夫人到华盛顿谋求更多的美援。

为时已经太晚了。到1948年底，中国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极其惊人的高度，国民党最坚定的拥护者也陷入失败主义，而不再抱任何幻想。

然而尽管批评来自各方，实际上蒋介石仍属无人可以取代。在1948年的那些日益衰败的日子里，对他个人人格的最高赞扬之辞，也许就只有司徒雷登所说的一些话了：

在最后几个星期，当他的天下在他周围破碎之际，蒋介石的沉着勇敢和不屈意志是一般人不可及的。对他来说，区别他个人的和国家的利益从来是不容易的，但他从事他所坚信是国家最高利益的事业则是忠贞不渝的。八年抗战他成为人民意志的化身，在各阶层联合一致的拥护下进行治理。他没有中国传统官僚的贪婪，受贿，懒惰与怯懦，他的高尚品格使他成为突出的例外。

这是对一个受到的惩罚超过其过失之人的一段动人的赞颂。

1949年1月15日天津落入共产党之手，国民政府迁都广州。1月21日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作为代总统继位。这是最后一幕的开端。同月，共产党取得北平，中共的士兵4月进入南京的美国大使馆，5月，占领杭州、汉口和上海。6月，蒋重行控制国民党，但是已经无可作为了。

8月，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继而美国发表白皮书，宣布停止对国民党中国的一切援助。国民党中国的崩溃是由于国民党领袖们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无能，这些人一直在倚靠美国的帮助来赢得这场战争以保住他们的权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正式宣告成立，1950年2月，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

父亲在50年代曾数次与蒋会晤，并于1954年向陈诚献策进攻大陆：

我建议他一定要在进攻以前作出一份政治计划，联合全世界不是共产党的中国人，并筹到进行有效宣传所必需的款项。最后，如果要举行公民投票的话，一定

要和台湾人结成同盟。

父亲晚年进行的一项重要的战斗就是力阻北京进入联合国。1971年10月，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时，他把那天描绘为“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一天。”

第7章 托管部

理想主义者的职务——特吕格弗·赖伊的副手 ——拉尔夫·本奇参加联合国工作

大西洋宪章保证尊重所有人民选择其自身政府形式的权利，决心采取行动以使那些被强制剥夺了主权与自治的人民得以恢复其权利。其公开宣称的宗旨是：世界上一切地方的人民均能享有自由和自治。

因此，不仅是出于人道而且还有军事的目的，经共同商定，联合国宪章必须含有托管制度一章。因为除非附属国人民得到帮助，能以最终达到自治，他们必将成为今后冲突的癥结。

尽管在雅尔塔已就这一问题进行协商，但在敦巴顿橡树园则决定，对托管的地区不须提及。然而有一个人坚决认定，托管定会成为新的联合国中很大的一个部分，此人就是不久即被父亲从国务院挖来主管联合国托管部门的拉尔夫·本奇。

本奇是位美国黑人，满腔热情地献身于托管这一理想主义的构想。他出生于一个种族隔离和充满种族偏见的时代，一生都为其肤色受到伤害；就是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也总被人称为“头号黑人”，“头号黑种人”，“头号有色人……”。这个标记常常遮蔽住他在聪明才智和仁慈博爱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极为杰出的人品。

国际社会要对殖民地负起责任的想法，不是很容易地就能为大国，特别是英国和法国，所接受的，这些国家更愿意他们的属地不受干涉。虽然在正式场合它们不得不支持自决的理论，但对联合国的卷入十分敏感。英国人的观点是，平等不是立法所能达到的，而要使人们形成必要的认识和在各方面达到成熟，则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邱吉尔批准了大西洋宪章但拒绝主持对大英帝国的清算。人们清楚地看到斯大林是有意不让东欧得到自由的。法国和中国当时仍在占领之下。这就得由美国来支持托管之事。但即便是罗斯福，这个在理想主义立场上热情赞成托管制度，并宣称美国不想从这场战争谋求任何领土利益的人，作为一名海军人

士，也认为美国在太平洋和其他地区需要保有基地。

本奇日以继夜地工作，为美国代表团将于1945年4月在旧金山会议上提出的各项托管建议作准备。这些建议不但必须不误在会议上提出，并且要得到罗斯福的批准，而这时他已经病得很厉害了。

罗斯福于4月10日原则上批准了国际托管的计划。他于两天后故去，但杜鲁门仍按罗斯福的批准行事，而出于对深受国人爱戴的已故总统的敬仰，海军也未表示异议。

本奇和他的一班人马共为美国准备了十六份向旧金山会议提出的托管建议草案。法国和英国仍然维护他们的殖民特权，而中国和俄国则支持殖民地的解放。就在这时，欧洲战争结束了。

托管理事会，一经成立即与联合国的其他五个部门处于同等地位。开始时人员只有十五人，后来增至一百二十人。这主要出于本奇的努力。十五年内托管部门要为三十三个民族铺平通向自由之路，其人口总计几达十亿。

托管部是一个全新的创造，这在国际联盟的盟约中是没有的。托管领土人民的利益第一次被提到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被赋予许多新的，包括请愿权在内的权利。实际上，托管部是联合国中唯一能受理个人申诉的单位。那些值得考虑的请愿书由理事会进行处理。个人甚至可以亲自向理事会陈述。如有需要，联合国即向当地派出工作组就地调查并提出建议。大多数问题都涉及政治，社会和经济，关系到数以千万计的人类生命，而这些人的声音以前在国际场合是从来听不到的。

就父亲本人而言，他满腔热忱地深信各殖民地有权自决。1946年3月他被任命为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负责托管和非自治领土事务。

秘书长赖伊之所以作出此项任命，如他在其自传中所说，部分地是“因为胡先生当时正在伦敦，可以说这无疑是他适逢其会的有利条件。”不过父亲的外交背景，身为中国代表团团员和出席筹备委员会的代表，均为他胜任新的职务准备了充足的条件。除了多年来作为代表参加国际联盟的各次会议以外，他最近还在直接促成联合国之创立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上发挥过积极作用。此外，他能讲联合国五种正式语言中的四种（后来又加上了第五种）。后来，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在联合国的对华政策上，父亲与赖伊的观点产生了分歧，但他在其自传中仍对我父亲的“睿智而客观的建议”赞誉有加，并高度评价他们之间继续保持的诚挚友好关系。

五大国曾要求赖伊从每一国中任命一人为助理秘书长。其他几位为安德鲁·科迪埃，亨利·洛吉耶（后于1951年由纪尧姆·乔治-皮科继任），约翰·赫特森（1947年辞职，由拜伦·普赖斯继任），艾德里安·佩尔特（后由沙马尔达列·拉尔继任）和阿尔卡季·索鲍列夫（1949年由康斯坦丁·津琴科接替）。

这些人组成了秘书长的正式“内阁”，提供关于所有事项的建议，尤其是那些有关其本国所在地区的事项。他们也是其各自分管部门的首脑。

尽管父亲若能有所选择，或许更愿意负责会议事务部，但既然他自国际联盟时期起就经手各种经济及社会问题，他倒也乐于心甘情愿地服从工作的需要。在日记中，他承认这项任命使他的自尊得到满足：

所有的工作都是外交性质的工作，都需要勇于想象。我不需要浪费时间去取悦和讨好那些政客。事实上我发现托管事务较之社会事务更加令人精神振奋。它的性质更单纯，秘书处对它也比对社会事务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可以对各大国的政策施加影响，以造福于各非自治领土……

父亲于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时即已与本奇相识，对他不顾其本国政府企图保留在太平洋诸岛的决定而赞成托管制度的宏论印象深刻。1946年1月，二人又在伦敦苏联大使馆的招待会上见面。回去以后，父亲就要求他出任托管部的主任一职，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业已找到两位很好的合作者：本奇和本森，二人都很开明和具有独立性。我还可能延致比利，他也很有资格，尽管并不那么开明。这三个人合在一起实力就很强了。有我迄今与我的同胞们共事的经验，我想我能够和外国合作者相处得很好。

这个职位特别具有挑战性，当时正值大战刚刚结束，有几十个在战时与盟国共同战斗的小保护国都正在要求独立。

这时整个世界都寄厚望于联合国。在此之前，父亲的事业完全是以本国的政府为中心。现在，成为一名国际官员，令他十分高兴。他一向欢迎艰巨任务，并总能做出成绩，天真得像

一个小学生，为自己的成绩沾沾自喜。

如果说1946年的气氛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愉快的话，对我父亲而言则是令人十分兴奋的。在国际外交的坛场上冠盖云集，他进入那个环境如鱼得水，颇有应付裕如之感。

他原以为本国政府不会放他去联合国任职，后来证明这种担心纯属多余。这一任命使他成为秘书处中职位最高的华人，从世界各地发来如潮的祝贺。

仅在十天之前，他经历了一次切除十二指肠溃疡的手术，不得不将他的胃割掉三分之二。他在1946年4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

中断这许多月之后，我终于能在这里写日记了。今天下午，我来此就医，切除胃中的息肉。他们告诉我说，我有三块息肉，是三重息肉！自从上次写过日记以来，要记的事太多了，今天一次是不能全写完的。老实说，我也懒得写，感到全无兴趣。如果我每天都把我所有的印象记下来，我可以在年事已高而又很穷时，出版我的回忆录来赚钱。如果命中注定我会参与重大事件，我的回忆录将不会比其他任何人差，也不会像某些美国人的回忆录那样天真。再说，每天写日记，我可以保住我的法语，我现在已经开始将它忘却了。

但是，尽管他热心于阅读，写作则并非他的第一爱好。那时，本是他的社交生活可以极其丰富多彩的时刻，而他却不得不入院等待康复。这颇令他有些失落感。小礼服本是外交家的战袍。有些国家每年都要庆祝几个类似于国庆日的节日，而大多数大使馆每当他们的内阁部长或其他显要人物来访时，也都要举行招待会。本来一个星期的六个工作日中父亲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被邀参加几个鸡尾酒会，而这时他却不能像通常那样借助这种场合来进行游说，不得不依靠电话来和人们谈话。所幸他生性开朗，能够非常成功地挺过这次外科手术，精神上还是满不在乎。

然而，尽管他本人生性豁达，遇事乐观，但是选定一个中国人来领导托管部却不免有人心怀疑虑。中国一向鼓励殖民地独立，这当然不会使那些力图保住殖民地的列强感到高兴。

问题还不止于此，随着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和毛泽东的政权垮了国民党中国，父亲的亲国民政府的关系使他在联合国会员国中越来越不受欢迎。

虽然毫无疑问，他愿意博得人们的好感，然而对在政治方面的不受欢迎他倒也并不感到郁闷。他作为国际官员的第一次使命是1946年9月前往巴黎，作为观察员代表秘书长出席和平会议。

在那里，他计划就托管事务会见法国官员。关于10月份即需提交联合国大会的托管协议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也有一大批文件和资料有待取得。他决定请他以前的秘书南妮特·巴丹前来帮忙。她曾是他在日内瓦时的左膀右臂，现在已经退休，嫁给了一位著名的瑞士牙医。但她接受了这项要求，来到巴黎为父亲工作；这就使他得以脱出手来集中精力做代表的工作，而由她来对付那些新闻记者。

在有喷气式飞机以前，从纽约飞到巴黎需要二十二个小时，包括三个小时的中间停留。父亲需要坐一整夜，一下飞机马上就开始访问那些在纽约已经约定的人物。

他在9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

由于一夜难以入睡，我到达巴黎时感到相当疲惫。幸得钱泰和我国代表团的帮助，在乔治五世饭店为我找到一个房间。联合国全然无能为力。从来都是你自己的国家向你伸出援手。

9月21日他写道：

我到达后的次日，往访和会的秘书长富热·迪帕克。我送给他一支“永锐”牌钢笔，是他从未见过的，令他感到打心眼里高兴。和往常一样，他对我非常和气，并答应给我一切方便。我并未要求像对赖伊，索鲍列夫和洛吉耶一样，拨给我一辆专用汽车，但我已请大使馆的朱先生为我安排用车。迪帕克认为和会将在联合国大会开幕之前结束。当天下午，我往访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肖维尔，他似乎不那么乐观。

这些天每个人都对杜鲁门—华莱士事件比对和会本身更感兴趣。杜鲁门使自己显得全然是个无能之辈。我不记得曾经见到过使自己成为如此可笑人物的政治家。起初，他批准了华莱士的有关对苏关系的演讲，接着他声称他只同意华莱士有权作一次演讲，后来他与华莱士商定，在和会结束前不作演讲，可接着他又迫使华莱士辞职。

我越来越得出这样的印象，即和会不会在联合国大会之前结束，尤其是由于

有的里雅斯特问题。在发生了华莱士事件之后，俄国人将更加不会让步，而贝尔纳斯也将更为坚决。莫洛托夫的意见是，我们可以在纽约于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继续讨论的里雅斯特问题。

父亲在日记中还附带提道：

我终于在今天得到一辆汽车。昨天我很不高兴，因为他们使我感到我没有希望得到汽车。我说，我并不是在要求给我个人甚么好处，而是把它看作是对联合国的一种礼貌。幸好富热·迪帕克站在我一边。

和会开始，四国外长相聚，一时成为重大新闻。报纸头条谈的是关于的里雅斯特的妥协，多瑙河、西班牙问题，德国以及伊朗海峡问题，不过按父亲的说法，这第一次会议简直是“小题大做”。

他在9月24日记下的是：

一位新闻记者告诉我说，四国都互相作了让步，俄国人在的是里雅斯特问题上，而英美则是在多瑙河问题上。西班牙共产党人指责俄国人用推迟联合国大会开会的手法来阻挠他们，因为大会原定是要讨论西班牙问题的。

9月27日他记载说：

巴甫小姐昨日由瑞士来此，这肯定会对我大有帮助。明天我要去会见皮杜尔。昨天我在大厅中向莫洛托夫表示我想和他会晤，他说他会通知我的。巴甫洛夫告诉我说，我在莫斯科的司机常常提到我，对我倍加赞赏。所有的司机都喜欢我。那些在伦敦的司机们同样也说我的好话。

第二天，在会议厅外，父亲见到了法国外长皮杜尔，一位他在求学时就认识的老朋友。这次见面使他更加自鸣得意：

当我和皮杜尔分手时，他说，“我妻子很喜欢你，她仰慕你的鉴赏力和政治家的品质。”昨天，郭泰祺显然已邀请莫洛托夫和苏联代表团共进午餐，并说，“我们已把最好的人给了联合国，因为我们考虑这很重要。”

他也曾会见负责殖民地事务的主管秘书蒙泰，他和蒙泰的父亲是老朋友。除其他事务外，他和蒙泰讨论了任命法国政府和托管部之间联络官的问题。10月2日，他会见了法国国民会议员莫内维尔，此人是托管问题专家，后来当了上院领袖。他们的谈话是坦率的，开诚布公的，两人都彼此非常尊重。他们一致认为托管领土可以成为法兰西联邦的一部分。有些属地希望成为法国的一个省。他写道，“开始他相当拘谨，但在我恭维他一番之后就变得放松了我说他是殖民地议员中最了解情况和最有权威的人士。”

他从一位叫涅马诺夫的新闻记者那里获得了几项重要情报：

涅马诺夫说，俄国人的政策是支持四大国所同意的一切。至于其他，则在以后由四国谈判。在欧洲，苏联感兴趣的是德国问题和伊朗海峡问题。在海峡问题上，所有的俄国人都意见一致，而苏联政府所追求的，就是要得到一个受全体俄国人欢迎的外交胜利。在海峡问题上他们是不会让步的，并且要把它和在多瑙河上的航行问题联系在一起。至于伊朗，苏联要像在沙皇时代一样，分得一定的势力范围。

关于海峡，如果苏联认为英国人不会以诉诸战争来加以保卫，海峡就会发生一场战争。我与波斯南斯基在多米尼克街二十二号一家饭菜做得很不错的小酒馆共进午餐。他说和会并不重要。莫洛托夫并不准备在这里解决重大问题，因为在纽约他可以讨价还价，他已答应在那里和其他三大国讨论德国问题。

波斯南斯基更为担心的是苏联就海峡问题向土耳其发出的照会。那是可以像1939年对波兰一样引发一场战争的。他确信美苏之间早晚要打一仗。我告诉他我不认为在最近的将来会有战争，我认为也许这份照会的发出是在斯大林前来开会之前决定的。令人关注的是那个问题是在华莱士辞职之前还是以后讨论的。他说戴高乐反对法国宪法的演说是出于他相信六个月后即将发生一场战争，法国将遭到入侵，法国政府必将流亡，而按照当前的宪法事情就不好办。这部宪法规定，在组阁前，人选要取得上院议长的同意。如果宪法仍将以大多数通过，戴高乐就要冒失去其地位的风险。现在不管怎样，已有20%的人反对这部宪法。至于超过20%的部分就要看戴高乐的影响程度了。

父亲是在他最老而又最亲密的朋友凯肯比克的晚宴上认识洛里丹的。洛里丹是比利时政府中处理托管问题的主管秘书。“通过宴会”自然是处理官方事务的最佳途径，而且事实一

再证明父亲所受的欧洲教育是建立联系的最有用，最轻松愉快的手段：

斯帕克说，比利时的立场和法国海外部洛朗赛的立场都是，托管协定不应以联合国大会为一方。它是有直接关系的各国之间的协定，不是与联合国组织的协定，就像国际联盟时的情况那样。

总的说来，关于托管事务的进展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

11月10日他写道：

除南非以外，所有的委任统治国均已为其前委任统治地（除巴勒斯坦外）递交了托管协定。它们自然都力图尽量少承担义务，但又害怕公众舆论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意见。他们一方面对可能削弱他们在当地土人中的特权和威信的任何事情都非常敏感，同时又像一个窃贼隐藏赃物那样紧张不安。尤其是当着苏联的面，他们就更有这种感觉。因为这一回苏联可以掌握主动，用这些论据来支持它对这些国家的批评态度。

不过，父亲总的感觉还是，“所有有关的国家都想表现出对联合国宪章的忠诚，”就这一点而论，他仍然是乐观的。

联合国的选址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关于永久地址的讨论十分热烈。也存在着对联合国与泛美体系相对抗的毫无根据的忧虑。

这些早期的讨论有一次因父亲对何以迟到的解释变得活跃起来。曾有一份留言要他去第五大道六百一十号参加会议，这是联合国新闻处的地址，但父亲误以为地址是华道夫饭店六百一十号房间。在初期，大家常一起在这家饭店工作。他按指定的时间到达并敲了房门。应声出来的是一位老太太。当她看到父亲的东方人面貌时就对他说：“呕，今天没有可洗的衣物。”在赖伊的自传中，他对我父亲活跃“内阁会议”的幽默谈吐极其赞赏，这种幽默在他谈起与自己不利的故事时，效果尤为突出。

联合国成立之后的最初几个月，是以纽约市亨特大学的布朗克斯校园为其临时办公处所，那时新闻界的孤立主义者仍不时发出反对成立联合国的呼声。以后迁到长岛成功湖的斯佩里工厂。该厂属于联邦政府的战时财产管理局，该局是为从事战时生产而建立的。工厂有一半地方已不再使用，而且和亨特大学不同的是，它全部装有空调设备。这是一个理想的处所，离纽约市只有几英里，是临近北岸小镇格兰特内克的一个风景宜人的地区。我就是在那里上中学的，一同上学的还有其他联合国职员的孩子。我们都感到非常特殊和受欢迎，在小年纪就发现了美国人的宽宏大度精神。

作为大会堂，纽约市市长提供了建于法拉盛梅多斯世界博览会场地上的前市府大礼堂，条件是秘书处迁至斯佩里工厂。纽约市愿意无偿提供，再拨给一百二十万美元作为修理和改造的费用。联合国签了占用斯佩里工厂一半的租赁合同，为期三年，从7月1日开始，并有权延长合同两年。

联合国永久地址的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政治皮球，按冷战的阵线分为两派，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这种为办公处所而进行的热烈的讨论也是权力斗争的一种反映。

对父亲而言，那不过是他经常出行的一个基地而已。他对去海外访问一向引以为乐，简直是一种癖好。他不在乎在旅馆里住宿和经常打点行装，不过总是小心翼翼不为行李付出超额费用。有时我还帮他做假，在他往称盘上放行李时把重物拿在手中，然后在别人看不见时塞入他的手提行李。他总随身带一个小秤，放在一个塑料小盒子里，这样他就可以在整个行程，有常常是十几个国家，检查自己的行李不超过规定的限额。

1947年间，除了正常工作和海外旅行以外，父亲还作了十几次演讲。他对媒体关于他的报导甚是得意，这也使他得到托管事务专家的声誉。当时新闻界对联合国是非常尊重的。联合国不允许它的演讲者接受报酬，但允许他们接受贵宾待遇，这也一样令人满意。我记得有一次在联合国随父亲去塔里敦，我们乘坐一辆轿车，有警察开道，警笛长鸣着穿过这座小城，午餐是盛宴招待，父亲受到的是和来访的国家元首一样的待遇。

他用各种语言作有关托管事务，联合国一般情况和世界大事的广播讲话，在许多会议的午餐会上发言，还在各大学作演讲。他对这一切都感到兴奋。他从来不会手足无措，总是为人们都对他友好而引以为慰。终其一生，他总是愿意看到人们所表现出来的良好意愿。

为联合国秘书处工作意味着要和各有关国家的政府在政治上打交道。良好的人事关系是大有裨益的。当他于1947年初去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们讨论托管事务时，被招待在布莱尔大厦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他在那个场合了解到美国的政策和想法。参加宴会的是政治处非洲科的人员。父亲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他们都非常熟谙托管事务，这一点着实令人吃惊。他们对殖民大国的倒行逆施有他们的看法，对托管领土问题也极为重视，并且会支持他找到最好的人员到他的部门工作。

他在伦敦也受到同样待遇。然而在法国，他发现那里的官员都不太了解情况，虽然他在海外部也受到很好的接待，他们却没有表示出坦诚的欢迎。父亲对他们的冷淡很不高兴，因为那些人都是他在大学时的熟人。很显然，法国人对于任何人干涉他们的殖民地事务都是有反感的。

3月初，他去加拿大参加在魁北克、蒙特利尔、渥太华、京斯敦和温莎举行的九个会议，并代表联合国在各学院和研究所发表讲话，前后历时十二日。回来时非常失望。他发现加拿大人“非常小气，令人厌恶”。从未有人请他赴宴，也没有人请他参观城市；他们没有为他支付旅费，除一次外，他的听众都只不过有十到十五个人。

1947年3月27日秘书长离开纽约出行，请父亲代行其职务。他在日记中表示担心，因为这样一来就意味着他将不能参加托管理事会的会议。除此而外，代行职务并没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因为“没有人希望我过于主动”。只有在出现危机时，他才会被要求采取行动。他的例行公事是代赖伊签署信件，并在联合国以外充当他的代表。

4月1日，他以代理秘书长的身份召开了一次助理秘书长会议。提出了两项建议，都顺利为大家接受：一个建议是每两週定日定时召开一次会议，另一个建议是各人就自己主管部门的工作作一次口头汇报，这样，会议的内容就不致于只是发牢骚。

就在次日，父亲以代理秘书长的身份在记者招待会上露面。他运用了他的全部经验和外交手腕使记者们都站到他的一边，结果颇为成功。赖伊是以语言枯燥，墨守成规出名的，完全是他在国内担任工会领袖时的典型作风。至少在这一层上父亲是无人可比的。他写道，“我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包括两个令人尴尬的问题，但我想我是给了人们一个好印象。事后有几个人向我祝贺，一位新闻记者说他们发现我很有魅力和颇为诙谐。”

他的外交手腕即将在联合国派往巴勒斯坦的代表团中受到重大考验。

第八章 以色列

危险的使命——与恐怖分子的一次会议 ——巴勒斯坦分治

犹太人的家园问题由来已久。自 1917 年贝尔福宣言以来，犹太人，尤其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直为恢复巴勒斯坦而战斗。的确，在第一次大战中犹太复国主义者即心存此念而站在协约国一方作战。

1922 年，国际联盟按贝尔福宣言形成决议，将巴勒斯坦委任英国统治。但由于英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传统纽带使实现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的允诺复杂起来。这个问题一直在酝酿之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大量犹太人逃离俄国和德国，使问题尖锐化了。

毫无疑问，内疚和同情对 1946 年改变对犹太人的态度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对犹太人没有作出甚么帮助，而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作出公开承诺的政策导致后者在追求实现其要求时暴力行为的增加。1946 年，这种行动以爆炸英国大使馆和设在大卫王旅馆的英国政府机关及陆军总部而达到顶点。

在此时期，所有持不同政见的犹太人都被英国人视为非法，甚至儿童散发传单也遭严禁，最高可判死刑。两个秘密组织伊尔根和斯特恩的成员，一经发现，可当场击毙。

巴勒斯坦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全部犹太人，即使是反对恐怖活动的人，都参加了不合作运动。英国的二十五年统治终于酿成动乱。

最后，英国请求联合国托管部提供实施委任统治的意见。

1947 年 5 月，由十一个公认为客观的较小国家的代表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联合国巴

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这十一个国家是：危地马拉，乌拉圭，秘鲁，伊朗，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典，印度，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父亲奉命代表秘书长参加，并且规定委员会的秘书处应当不仅在技术事务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做到完美无缺。计划要在巴勒斯坦进行调查工作，同时，英国寻求美国在一个“双方一致的政策”上进行合作。

在得到美国同意英国继续统治巴勒斯坦的情况下，英国外长贝文表示他将犹太移民之事让步。从而一举消除了犹太代办处施加的压力，平息了杜鲁门总统的疑虑并安抚了美国和英国国内的公众舆论和良心不安。

温和的犹太代办处表示他们准备认可本计划，尽管其中还提出分治这另一种选择。在此阶段，似乎不论以前的进展情况如何，现时仍有妥协的可能。

父亲很重视这项工作的微妙性质和选举调查委员会主席的特定责任。切望不要选上南美的代表，他认为那些人纪律松弛，具有野心，又缺乏经验。他和他的好友伊朗的纳斯罗拉·恩泰扎姆同意推举前瑞典最高法院法官埃米尔·桑德斯特伦为主席。此人经验丰富，智慧超群，殷勤的礼貌和冷静的外表下面隐藏着坚强的意志。这是最佳人选，但其他代表中有人疑心选举事先做了安排，因而一开始就不顺利。

在委员会的秘书处内部还出现了其他重要问题，特别是委任犹太人成员的事。父亲曾和秘书长谈过话，主要的一点是爱波斯坦可以参加在日内瓦的委员会起草阶段工作；但在巴勒斯坦，则秘书处内不应有犹太人或阿拉伯人，因为他们可能与外界的犹太人或阿拉伯人有联系。

还有其他的内部问题。父亲领导着一个大约有五十五个人的秘书处，其中包括助理，打字员，翻译，行政管理人员，财务人员，和新闻发布官；是一个微型的联合国秘书处。1947年5月2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希望减少秘书处的人数，但未能减少到五十五个人以下。秘鲁代表坚持秘书处要有一名秘鲁人，但这个人甚么事也不能做。为了不惹恼秘鲁人，我们留下了他。

不过委员会也真是走运，得到几位能力杰出的好手，尤其是拉尔夫·本奇，现在是主任秘书。本奇以其智慧和精力，很快就成了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运作的驱动力。毫不奇怪，犹太人不断地培养与他的感情。

关于父亲本人的职务，赖伊事先并未和他商议就委派他为驻特别委员会的秘书长代表。不过他还是欣然出任了此职。他写道：

人人都向我道贺，说再也不能有更合适的人选了。中国的报纸说，这保证了公正无偏。其他报纸则说，派去一名助理秘书长，更足以说明特别委员会的重要性。我的工作自然是十分微妙棘手，但也饶有兴趣。此事要碰运气，如果能与各方处好关系，我会受到称赞，否则，我将与他人一同受过。

特吕格弗·赖伊亲为特别委员会主持了第一次会议。没有一个人低估他们所面临的工作困难；这项任务充满着感愤和激情，为众多关于人道与公平的呼吁所包围。

委员会于1947年6月10日起程前往巴勒斯坦。途中曾在伦敦作一次停留。按一位代表，加西亚-格拉纳多斯的话说，联合国的人员们受到轻视。英国人似乎是公开地表示联合国不具备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的国际或外交身份。从一开始英国外交部就以冷漠的态度对待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

相反，巴勒斯坦管理当局则在飞机场上很有礼貌地接待联合国特委会。没有阿拉伯显贵或新闻记者在场。从利达机场到耶路撒冷的二十五英里途中，委员会乘车通过一系列阿拉伯村庄，令人联想到《圣经》中描述的景象。房屋是些简陋的草顶白墙的方形黏土或水泥平房。身穿白色或棕色长袍，头带无檐便帽的阿拉伯男子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乡村旷野一片荒凉，不曾耕种的干旱土地，石头裸露的丘陵和小群的山羊。

接近耶路撒冷市区，经过的是一片破败的单层建筑和小商店的贫困地区。而耶路撒冷的中心市区则展现着令人惊奇的古老与现代的混合。宏伟的四十英尺高的城墙保卫着老城。穿着时髦欧式服装的人和背负着装满了水的山羊皮水袋的阿拉伯运水夫混杂在一起，汽车响着喇叭紧跟在负重的小驴之后，还有配备着机关枪和装甲车的英国兵。

俯瞰耶路撒冷的是建有碉堡和炮楼的斯科普斯山，罗马王提图斯曾在此集合他的骑士们对犹太圣殿作最后的攻击。山顶上建有希伯来大学和哈达萨医疗中心，从那个有利的地点可以看到奥玛尔清真寺，圣墓教堂和犹太大教堂的穹顶。传说耶稣升天处的升天教堂和一处穆

斯林清真寺的小塔相邻而立。早晨7时伊斯兰教的宣礼员站在宣礼尖塔上发出音调悦耳的礼拜召唤。

离市中心一段路程的喀迪玛大厦是代表团下榻之处。四周围以矮墙，进口是一个铁栅大门。昼夜有三名阿拉伯警察守卫。

赖伊曾警告过代表们不要期望生活上有多少方便，但他们发现喀迪玛大厦相当舒适，服务供应也不坏；父亲还发现特拉维夫，海法，死海等地的旅馆堪与西方的饭店媲美，尤感心满意足。

委员会的成员也为耶路撒冷的气概赞叹不已，私下一致认为巴勒斯坦唯一的“不幸”就是那里的政治局势。

从一个秘密电台播出一位妇女的声音，传达了伊尔根的欢迎信息：

这里是战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之声。联合国的各位先生，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被占领国家。我们向你们保证，当你们在这里的时候决不会受到伤害。一切相反的传说都是英国人的恶意中伤，是不真实的。我们对你们的工作和成就不抱幻想。但是我们将同你们合作。欢迎你们来到巴勒斯坦！

这是来自一个最富有战斗性，最残忍无情的恐怖主义集团的声音，他们公然以从事爆炸，绑架和杀戮作为驱逐英国人的必要手段。

无疑，地下活动者到处都是。父亲注意到委员会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十几封由伊尔根或斯特恩签署的信，内容都是针对英国的要求或者谴责英国当局，或者是在报纸上受检查不准刊登的关于警察虐待犹太人的报导。还有许多申请救助的信件。

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的当天，耶路撒冷军事法庭判决三名青年死刑处绞，因为他们参加了一次暴力攻击。他们并没有杀人，在其他任何地方他们都只会被判处监禁。

这种对人道主义法律的藐视使特委会的成员们对英国人深为反感。委员会主席接到三名被判死刑青年的父母的吁请，请求干预，停止执行处决，并对死刑给予减刑。委员会某些成员，如加西亚·格拉纳多斯，他自己曾为其国家的解放事业坐过牢，被流放，深怀同情地介入了。

经过热烈讨论，特委会决定干预，阻止执行处决。字斟句酌的决议提出，正当特委会首次开会之日，判处此项死刑，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

英国人为遭此意外的干涉而恼怒，但特委会所采取的立场在犹太人心目中大大增加了信任感，他们给委员会发来大量的感谢和祝贺信。

父亲写道：

在特拉维夫到处都是对我的赞扬声，使我既高兴又不安。因为阿拉伯人会认为我是亲犹或反阿的，而我则希望作到不偏不倚。我的同僚们开玩笑说人们要在特拉维夫建个胡氏广场，而我的名字应改为本·胡里安！我向他们说，我宁愿被人叫做“雅迈勒·本·胡里安。”¹

从一开始阿犹双方就采取截然相反的方式为达到各自的目标而努力：犹太人致力于让委员会得到尽可能好的印象，而阿拉伯人则拒绝在任何层次上给予合作。

父亲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曾作过数次巡视，本想藉此机会听听群众的证言，然而都变成了纯粹的观光。很难和群众交谈，因为我们被成队的记者所包围，他们拿着笔，记下每一句提问和回答。

在一次巡视中我在奥玛尔清真寺前脱了鞋，然后又走到另一座清真寺。人们把我的鞋带到第二个清真寺，而我仍以为鞋还在我原先脱下的地方，因而我徒劳地不穿鞋走向第一个清真寺。新闻记者们于是制造了一个我丢了鞋的故事。又有一天，秘鲁代表萨拉加戴走了我的巴拿马草帽，我的帽子对他说来太大，但他并未觉出来。

在那里也有很多社交活动：

¹由于胡世泽深受犹太人欢迎，因而模拟犹太复国主领袖本·古里安的名字戏将胡世泽的名字改称作本·胡里安，而胡世泽本人则再加上一个阿拉伯人的名字雅迈勒，以表示其不偏不倚的立场。

这些日子我成了巴勒斯坦犹太人中最有名的人物。每到一处咖啡馆他们都要敬我一杯。在特拉维夫，皮尔茨咖啡馆的老板请我在午夜以后到他的套间去喝香槟，他还找了几个有趣的女人，其中之一唱起一支关于一个女人调情的歌，我加唱了最后一段。

那是个容易让人喝醉的日子，到了10月，父亲很惋惜他的日记中在巴勒斯坦使命这一段本应内容丰富的时期，却大部分是空白。

我实在太懒，以致未能每天用几分钟记下我的一些想法。也许有一天我会补上本应在前一段日子里记下的那些空白，不过我想大概是做不到了。

如果让他选择，父亲是宁愿追求那种富于社交的生活的。他在1947年6月23日写道：

今天我和魏茨曼及他那位出生于俄国的夫人一起吃饭。我很少有机会享用这样一次有趣而条件完美的午餐：天气，景色，历史名胜所在，全新的德国式住宅，家具，菜谱，烹调，尤其是魏茨曼的谈吐，都令人满意。他的夫人一直鼓励他讲各种各样的故事，这也有助于阐明他的主张。他具有丰富的领导人物的特殊魅力，而他的七十四岁高龄看起来就像六十岁。本奇记下了他的谈话。我只是感到他对某些事件的解释当时听着很有说服力，但事后发觉也并不全是实事求是的。他说只有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才陷于囚犯一般。他说每一艘运来犹太人的船都是一艘“五月花号”。他还说犹太复国主义意味着在全世界人的心目中为犹太人昭雪。他说对犹太人的敌对情绪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行业中干得出色。

在餐桌上，总是无休止地谈论政治，但父亲感觉有受到犹太人讨好的危险。为此，他常常拒绝一些他认为具有政治动机的邀请。

当时双方都提出了基于历史的权利主张。二千年来犹太人一直将巴勒斯坦认作是他们的祖国故乡。一位阿拉伯高级会议的成员敏锐地指出，如果国家的问题要按《圣经》上的许诺来解决，那末全部世界地图就都必须重绘。

然而犹太人的存在使阿拉伯人得到不少好处。犹太人把贫瘠的土地转化为良田，他们教会了阿拉伯人新法灌溉，庄稼轮作和科学施肥。他们还设立免费的医疗机构向阿拉伯人开放。从1920到1939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增加了一倍，这不仅是由于健康水平的提高，而更是由于许多正在发展的城市为临近国家的阿拉伯人提供了新的工作，以及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前景。

但最重要的是，许诺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家园的《贝尔福宣言》为犹太人增加了无可争议的分量。多年以来各届英国政府似乎都受到阿拉伯石油压力的影响，丢掉了原来委任统治的宗旨，实际上一直把巴勒斯坦当作英国的殖民地来统治。

英国政府坚持认为他们并非放弃委任统治，而只是请联合国对如何管理巴勒斯坦给予建议，并不意味着妥协。同样，这也是英国的巴勒斯坦管理当局的首席部长亨利·格尼爵士的态度，这是个典型的英国文官，他冷冰冰的礼貌掩盖着强烈的优越感。

阿拉伯人方面则不仅由于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土地这个事实，再加上多年来英国官方和非官方对阿拉伯人许下的无数承诺，因而更加强调他们的主张。

委员会面临的选择有：

- i) 一个全阿拉伯人国家。
- ii) 一个全犹太人国家。
- iii) 一个双民族国家。
- iv) 分治。

委员会的调查工作由于合众社记者卡特·戴维森安排的与伊尔根最高指挥部的秘密会见而出现转折。

假如英国人得知此事，这些伊尔根领袖人物无疑会被判处死刑，因此桑德斯特伦为了防止委员会的同僚中有人不能保守必要的机密，决定先不告诉大家，事后再说。

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英国间谍和新闻记者们获悉委员会的按小时安排的时间表，桑德斯特伦和戴维森必须小心翼翼，甚至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谈话，有一次竟是在雅法的英国体育俱乐部进行的。

父亲和本奇是仅有的联合国特委会参与秘密会谈的其他两名成员。父亲一直怀疑委员会成员使用的房间里偷装了窃听器，在他的浴室里一个松动的插座被他当成怀疑的佐证，虽说此事后来成为一段笑料。

当他们三人在雅法的下午游览节目结束后，便在附近的特拉维夫花园旅馆开了房间。他们休息后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到晚上8点钟夜色降临，闲步出了旅馆。数步以外停着一辆小轿车，等着接他们（只有桑德斯特伦知道）。车子弯来拐去穿过市区，最后停在一个街巷口。

一名少女从阴影中走出，司机交代他们跟着她走。在小巷的另一端，又一辆汽车等候他们，车中已有一位年青的妇女，脸用面纱遮住，魁梧的司机带着手枪。车在弯弯曲曲的街道上开了半个小时，然后停在一幢公寓门前。那年青女子领他们上了一道黑暗的楼梯，然后用希伯来语轻轻对一个房门说了几个字。她向他们告别，并说明将于晚上11点30分回来接他们。

房门开了，一名青年男子领他们进了一间灯光很亮的屋子。他们发现这套公寓属于诗人雅各布·卡汉。桌旁坐着梅纳赫姆·贝京和其他两人。贝京是伊尔根的领袖，英国人谴责他是谋杀者，亡命徒，是应对数十名英国士兵之死和数百万英镑财产损失的罪行负责的狂热份子。他曾经好几次陷入英国人之手，但总能在英国人弄清他的真实身份之前设法逃出他们的网罗。

在父亲和他的同事眼中，贝京看起来很像一位温和的学校校长。他的狂热激情只能偶尔在他的神秘目光中闪现。他和他们和气地握手，并对他们前来表示感谢。酒，水果，饼干端了上来。

贝京用仔细准备过的，掌握分寸的口气讲述巴勒斯坦的现状，犹太人的苦难和流血牺牲，英国人就像对待殖民地的土人那样对待他们。

他论述了委员会可能提出作为这片多事土地解决方案的各种选择。本奇有些倾向于分治，贝京强烈反对。他说，“请不要忘记，先生们，《圣经》上所说的巴勒斯坦地区早已被英国人分割了。1922年他们依据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来管理这个国家，不是让他们不经和任何人商讨就把其中的四分之三给了约旦。剩下下来的这片土地仍然叫做巴勒斯坦，但这只是原来犹太人家园的四分之一。伊尔根反对再进一步分割这四分之一。”

桑德斯特伦问道，“是否如我所理解。伊尔根所要求的就是现在称作巴勒斯坦的全部地方？这将成为你们的新犹太国？”

“不，”贝京说，“我们要的是我们载在《圣经》上的家园：全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毕竟已有七个国家，几乎三百倍于巴勒斯坦的领土。那些领土上绝大部分人口稀少。阿拉伯人决不会无家可归。假如犹太人在1933年就有自己的家园，六百万人的性命就会保住。”

他说了三个小时。最后桑德斯特伦说，“我们已听到了你们所希望的。你能不能听一听我们的希望？应该在巴勒斯坦停止恐怖主义活动。我们正在为这些非常严重的问题设法求得和平解决的方案。但是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动只会损害我们所力求达到的目的。”

贝京答道，“我们将会尊重联合国停止暴力行动的要求，如果政府当局停止他们的暴力行动，如果英国人实施原委任统治决议中关于移民的条款，以及如果停止把来到这个国家的犹太人关入监狱。但是如果政府当局继续扣留我们的船只，继续将到达这里的犹太人遣返欧洲或送入设在塞浦路斯的集中营，那末我们就必将继续我们的斗争。”

领路的女青年回来说车已备好。贝京要求此次会议必须保密直到联合国特委会离开这个国家为止。双方同意由本奇作会议记录为会议完成一份正式的报告，由伊尔根在日内派专人到喀迪玛大厦他的房间去取。双方约定了时间和暗号。贝京还提出两项要求，第一，他们不要对他作任何具体描绘；第二，不要透露其他在场人的姓名。

会见的气氛确实是诚恳的，就像是处在具有真诚意愿的人们之间。伊尔根方面原先听说桑德斯特伦是一位前英国统治下的埃及法官，仍受到英国影响，但他们发觉并非如此。本奇作为一个在本国也是受迫害的少数民族成员，表示了他的同情。仅有的政治方面的暗示来自我父亲，他提了一个带有刺激性的问题。巴勒斯坦，即使将约旦河两岸都算在内，也是一个小国。引入成百万人势将造成人口问题。三百年后会发生甚么情况呢？贝京把这个问题反问我父亲：他认为三百年后中国会出现甚么情况呢？

当他们离去时，父亲热情地说：“在独立的巴勒斯坦再见。”

特委会的其他代表们回到他们住的旅馆已近午夜。感到需要喝点甚么，他们去了附近的皮尔茨咖啡馆。不幸的是加西亚·格拉纳多斯看到了街旁这辆无牌照的汽车，里面坐着桑德斯特伦，我父亲和本奇。不久，就开始有了对他们这三个多小时到甚么地方去了的猜测。我父

亲早已有了“像个花花公子”爱过夜生活的名声，可以假定他又在想嚐试一番特拉维夫的更刺激的生活。也可以理解本奇作为父亲的好朋友伴他同往，但是桑德斯特伦这个顽固的正派瑞典老头子却让人不好解释。

一份希伯来文报纸的号外在大街上出现，宣称这三个人曾和伊尔根的杀人暴徒头子一道秘密聚会。桑德斯特伦、我父亲和本奇坚决否认一切谣传。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新闻官员乔治·西蒙奈德斯也正式否认这个报导。这项秘密一直保守到彼此同意的时候才由卡特·戴维森发表了一条关于此事的独家新闻。

虽说他们对这次秘密会谈的诚挚态度印象甚深，但正如本奇在报告中所说，他们深知“在造成好印象和形成正确意见”二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不管怎么说，委员会建议分治和终止英国统治的态度很坚决。即使苏联，三十年来一直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主要的异端邪教，现在也赞成建立一个犹太国家。

自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工作开始之初，就好像犹太国业已存在，有如本奇所谓的“一个发展变化中的实体”。巴勒斯坦是来自全世界的犹太人的熔炉。来到后用不了几个月，这些习俗各异的犹太人就会互相融合，结成兄弟般的集体，为统一的意志与决心所鼓舞激励，使他们能够以超乎常人的力量去工作和经受磨练。

1947年7月25日特别委员会撤回到日内瓦去撰写呈送给联合国大会的报告书。临行登机后，飞机不能起飞，不得不卸下二千磅的行李。在中途飞越地中海时，一部发动机吐出火焰。飞机前俯后仰，上下颠簸。飞到雅典时已没有足够的高度能在上空盘旋，而径直从海上飞向跑道降落。如果起飞前没有卸下那些行李，他们无疑会葬身于大海之中。

委员会开始撰写他们应在9月1日交出的报告，极尽疲劳。这个工作集体不像是一个由十一人组成的委员会，倒像是各有一人的十一个委员会。只有两项重要的内容得到全体一致的同意：一、原委任统治未达目的，必须废止；二、巴勒斯坦必须独立，但既不是一个全犹太国家，也不是一个全阿拉伯国家。

这个独立国家的形式是最大的争议课题。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从所谓中立不偏的国家中挑选的。即使如此，生就的偏见此时也露了头。僵局坚持着，只有出现奇迹才能解决。父亲在他的日记中说，委员会的秘书处必须更加主动。否则按现时的进展速度他决不能在八月底按原计划回到纽约。

主要地多亏本奇的努力，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力求解决问题，委员会在最后的时限之前五分钟完成了报告。

由七人赞成的多数通过的建议是在巴勒斯坦实行分治：分别建成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二者以经济联盟为纽带结合在一起。耶路撒冷作为三种宗教信仰的圣城将另外成立一个联合国托管当局进行管理。

此项建议由联合国大会于11月29日以三十三票赞成十三票反对十票弃权通过。第二天从耶路撒冷传来消息，那三名伊尔根少年被绞死了。

联合国创造了一个新的阿拉伯国家和一个新的犹太国家。不管有哪些威胁，许诺，贿赂；不管有哪些保护阿拉伯事业的集团的势力，分治终于实现了。毫无疑问，力量最大的集团是曾有六百万人在大浩劫中被屠杀的犹太人。正如加西亚·格拉纳多斯所说，犹太人已经证明，突破一切可能出现的险阻，对事业的忠诚信念和为理想牺牲的精神一定会取得胜利。

联合王国虽然没有对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的议案表示反对，但他们在表决时弃权，因为他

们深信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求得意见一致是不可能的。结果是英国人拒绝移交和合作，并在幕后阴谋破坏分治方案。然而最后英国人也只好同意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让联合国的使团和维持和平部队进驻巴勒斯坦。

全世界都感到高兴，尤其是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们。然而这正是巴勒斯坦历史上更难以应付，更令人忧虑的一个时代的开端。

在一种爆炸般的气氛中，愤怒的阿拉伯领袖们威胁说要起来消灭犹太人，“用他们的尸体填平大海。”伊斯兰教大穆夫提组织了一个圣团去攻击犹太人定居点，爆破输水管，商店和犹太会堂，并杀害平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胁迫犹太人不得宣布成立其国家。尽管出现这些暴行，停火协议遭到破坏，英国人不合作，美国人不坚定，以色列国还是在1948年5月14日诞生了。

当年9月，福尔克·贝纳多特伯爵和他的司机一起被暗杀。他是联合国派往巴勒斯坦的调解员，他在那里一直不知疲倦地为谋求在战斗的双方间达成停火而努力工作。

由贝纳多特被害引起的震惊与愤怒难以名状。败坏双方共同事业的恐怖主义者终于攫得了他们最高贵的牺牲者。拉尔夫·本奇受命继任为调解员，后来他因这一使命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停战协定最后于1949年2月24日签定。

到头来，犹太人在抵抗武装进攻得不到援助的情况下，仅靠联合国分治协议的道义权威，被迫自己成立了他们的国家。这个国家不是送来的礼物，他们为建成它曾经进行，并且还将继续进行艰巨的斗争。

联合国分治巴勒斯坦的决定产生了一代代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受其影响的后果。父亲和本奇都十分清楚这一地区所面临的无穷问题，尤其是大量巴勒斯坦人口的流徙。

然而在联合国，大家都为一个原已无望解决的问题的获得解决而庆幸不已。尤其是父亲，更为他事业中最光荣的一刻而感到高兴。自此以后，他在犹太人社会中的影响大为增强。而正是由于这同一件事，阿拉伯人认为他们被出卖了，他们的愤恨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因为父亲曾参与谈判，于是向他提供了耶路撒冷长官的职位。不过在他的事业中，巴勒斯坦这一段已经告一段落。他的好动精神，已促使他寻找新的挑战。建立犹太人家园的任务非常艰巨，他深庆已予谢绝。他在日记中说：

我对被埋葬在那儿不感兴趣。我宁愿旅行或谋求一个直接为我的国家服务的职务。宗教和圣地对我没有吸引力。

此后不久，他应邀组建朝鲜问题委员会，担负起事实证明是他一生事业中最有意义的一件工作。

第9章 朝鲜

李承晚梦想之实现——政党纷起

很少民族像朝鲜那样在外国统治之下苦难如此深重。作为大陆和日本群岛之间的链节，朝鲜半岛成为四千年来争夺的目标。事实上只有当相邻的强国都衰弱得无力争夺它时朝鲜才有真正的独立。

自1910年起朝鲜处于日本的直接统治之下，日本人对朝鲜的压迫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而更甚。1945年，驻朝鲜的日军共有三十万人。当年8月，这些日军分向三十八度线南北的美俄两方投降。这条纬线成了两国占领军的分界线，这对于朝鲜的未来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

在大战期中，父亲以外交部次长和宋子文副手的身份曾在华盛顿参加美国国务院与以李承晚为首的韩国临时政府之间的磋商。其时，尽管李承晚的努力并非经常得到美国官员们的支持，甚至也不为在美朝鲜人社会所一致拥护，中国驻外人员和李承晚的代表之间仍保持着相当和睦的关系。这是两个具有推翻日本占领的共同意愿和仰仗美国军事及财政援助的共同要求的国家。

李承晚多次要求与赫尔面谈，希望能积极参加战争，但未得回应。当时阿尔杰·希斯是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为首的美国代表团的高级成员。后来在审判希斯叛国一案中，一般认为他的亲苏观点曾在国务院占优势，而美国的主要目标则是不惜牺牲一个小国的独立要求来

迁就克里姆林宫。还有谣传说在雅尔塔曾有秘密协议，把朝鲜置于苏联控制之下。斯大林同意参加对日作战，而期望得到某些回报，其中包括朝鲜。

从过去的记录完全可以看清，早在西方世界尚未发觉苏联帝国主义的危险日益增大之前，李承晚就已看出俄国的野心指向朝鲜，而美国国务院则实施一种偏袒的政策，尽管是勉强的然而却默认俄国人的这项目标。

李承晚不得不等待，直到1943年11月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邱吉尔，和蒋介石同意正式承诺通过“适当的时间”给予朝鲜独立。实际上是鉴于苏联在亚洲持何种立场尚不明确因而使用了“适当的时间”一词，显示出相当勉强和含糊其词。

1943年夏，李承晚在华盛顿的韩国委员会办事处准备了一份朝鲜的地下组织计划送致罗斯福。在一次太平洋作战委员会开会时，罗斯福询问宋子文对这个朝鲜独立运动的评价。宋将此问题转给了我父亲。父亲询问李承晚和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员，他们是否准备和受国务院宠信的洪南杓合作，以统一他们分歧的力量。李回答说，洪只代表极少数朝鲜人，以李的判断，和洪联合，除了鼓励朝鲜共产党以外没有其他作用。在随后太平洋作战委员会开会时宋报告罗斯福说，朝鲜人太不团结，以致不能形成一个起任何作用的力量。

然而到旧金山会议之时，李承晚已竭尽一切可能以求得朝鲜独立的保证。他把分散的各派领袖召到一起，吁请他们联合一致提出一项简单的独立纲领。至于领导人问题可留待以后决定。

当时大约有六十个政治派别，大部分是由从日本集中营放出来的政治犯和流亡在外的前临时政府的领袖人物，以及社会主义分子和共产主义分子所组成的。李承晚以韩国联合委员会的名义请求给予观察员的身份代表朝鲜出席会议。此项请求被拒绝了。

当李承晚在1945年11月回朝鲜之际，他在美国国务院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在大战时曾极力谋求对其临时政府的承认，并非非常固执地拒绝与北朝鲜合作。他不是狂热者，但自1919年以来就一直为获得西方各国对临时政府的承认而奋斗。他在政治上得到广泛的同情，他的激情由于他的幽默和个人魅力而显得温和。朝鲜人民几乎把他当作传奇式的领袖，他的不屈不挠精神鼓舞着人心。他的名字在两代人中象征着改革，民主和独立。各派政治领袖人物都请他担任他们政党的主席，包括共产党的主席朴宪永在内！李承晚统统拒绝了他们的推举，为的是要把三十八度线以南的所有党派统置于他的“迅速实现独立协会”之下，由他自己来领导。

美国人对李拒绝担任各党派领袖感到惊异，他们认为其中必有个人野心的动机。此外，国务院急于和苏联人达成某种协议，以期加速从朝鲜撤军。而李则一直拒绝与共产党达成默契。这就使得李和美国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困难不稳。

朝鲜爱国者们为摆脱日本的枷锁而感到的振奋心情遭到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议的沉重打击。当时盟国议定朝鲜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将朝鲜交由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监督托管五年。由占领当局和朝鲜人民会商成立一个过渡的朝鲜管理机构。

朝鲜人民完全震惊失望了。对这个方案一致抵制。李承晚和朝鲜独立党党魁，流亡重庆的朝鲜临时政府总理金九，对此方案发出强烈谴责。在汉城，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商店停业以示抗议。朝鲜报纸也力求发挥他们的影响。后来，北朝鲜在苏联的指示下，于1946年1月2日表示赞同托管方案。

李曾受美国军政府的邀请担任顾问职务。他能看出此项计划将使苏联的作用延伸到整个朝鲜半岛，从而违反了开罗会议对朝鲜独立的许诺。

李得出的结论是只要让苏联以某种借口进入南部朝鲜，那就等于拱手让出这个民族的独立。他的固执给他戴上了“极右分子”的标签。1946年1月，李承晚夫人由于已不能在美国发挥多少影响，从美国来到朝鲜与她的丈夫会合。李夫人是出生在奥地利的奥籍人，但她总是身着朝鲜民族服饰，在社交场合同李承晚相伴，以其出众的丰彩来配合李的平常衣着和平易近人的外表，为他争取到高度的国际声誉。然而，此时此刻她也难以起更多的作用了。

苏联无意使朝鲜的南北两方统一。假如他们不能取得整个朝鲜，他们也不打算放棄已经到手的这一半。北纬38度线似乎已成为永久性的分界。

托管的争议起了分清左右的作用。美苏双方形成僵局。朝鲜的经济由于日本人的过度剥削和在北部的重工业被共产党人控制，已经陷于混乱。二百万难民从北方流入南方，而且由于缺乏技术和管理能力更加甚了南方的困难处境。美国占领当局接管了矿山并实施改革，但他们缺乏地方行政管理知识，常常只不过是添乱而已。霍奇将军得到国会法案的拨款，授权他

在朝鲜南部“与疾病和不安定作斗争”，实际上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具有更广泛的影响。1946年12月，李承晚决定越过霍奇迳飞华盛顿。此时北朝鲜的局势已逐渐明朗，五十万军队出现在分界前沿，准备好向南方进攻。

然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向马歇尔保证他同意朝鲜的重新统一和独立。显然在此处对“朝鲜的重新统一与独立”一语有不同的理解，就如同对外蒙古的“现状”一词有不同的理解一样。俄国出于战略原因贪婪地将朝鲜视为其势力范围。它的帝国主义意图被日本人在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和其后对朝鲜的并吞所遏止。结果，在整整一代的时间里，俄国的威胁被推到了幕后。现在他们又要在前台露面了。俄国人的参战条件之一就是占领朝鲜北部。美国人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措施。俄国人对此的看法则不同。

到了1947年9月，人们都认为诸大国对朝鲜问题已达不成一致意见。9月23日将此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1947年10月美国提议所有驻在朝鲜境内的外国军队一律撤离。此项提议由大会通过，并得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将军的同意，不过美军迟到了1949年春，苏军撤离北朝鲜后六个月才撤出。1947年11月14日通过一项决议：在联合国委派的委员会监督下，在朝鲜进行自由选举并建立独立政府。与此同时成立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对新政府提供建议和咨询。

父亲由赖伊委派作为他的个人代表，与一个荷兰人彼得鲁斯·施密特一同去启动朝鲜的工作。在长时间低迷的僵持以后似乎出现了一丝曙光。在汉城的苏美会议上，李承晚与美国政府的主张完全不同。李一度被置于实质上的软禁之下，这是在他的事业中所经历的最黑暗时期。

在联合国总部，除了苏联集团以联合国主持的选举为不合法加以谴责之外，其余各会员国一致同意选举至迟应在3月31日以前举行。苏联集团认为根据宪章第104条，不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的问题联合国不具有裁决之权。然而那些日子里，美国在大会上享有压倒多数的支持。

1948年1月8日，联合国委员会的第一批代表，包括来自印度，菲律宾，澳大利亚和叙利亚的成员抵达汉城。他们受到李承晚和二十万左右朝鲜人的欢迎。父亲的早期通讯中说明了他在到达时感到的气氛和他面对的潜在危险：

所有政治党派，除了共产党以外，都热诚欢迎我们。很多朝鲜人说我们是们最后的希望。在汉城，有十到二十五万群众在寒风中排列在道旁等候我们的到来达数小时之久，当然他们并不全是自发前来的。但这也显示出警察总监和李的政党的影响。他们组织了全部欢迎活动，尽管官方宣称这是由一个有全体党派参与的欢迎委员会组织的。

从朝鲜北部传来的无线电广播则对联合国的委员会大肆诽谤。说委员会的成员是美帝国主义的雇佣，意图将朝鲜殖民地化；说连我和施密特也都是美国人；还说不准委员会进入朝鲜北部。甚至谣传共产党有暗杀我的阴谋，美国当局向我提出要为我配备一名保镖。我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这将造成不良印象。我设想委员会现在有一位主席，他也许会代替我充当暗杀的目标。

这位主席就是印度的代表克里希纳·梅农。1948年1月28日，梅农大使从汉城向朝鲜全国广播，他说明委员会的严肃目的是在朝鲜举行真正的自由选举，他说：

联合国委员会之下设有三个小组委员会：一个研究为即将举行的选举营造自由的环境氛围的途径和方法；另一个调查研究朝鲜人的意见；还有一个研究选举的制度。

在1月12日委员会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上，父亲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个人代表致辞。霍奇将军表示他全力支持。苏军司令部对会议的进程则置之不理。

1月14日父亲在日记中写道：

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正直明智之士。代表们经常来找我，征求我的意见，这也许是因为我在重庆时就认识他们中的四位：梅农，刘馥万，帕特森和保罗-彭古。没有其他的助理秘书长具有我这样的优越条件。一切运作顺利，只有苏联不合作。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到朝鲜北部去。

我曾在东京会晤过麦克阿瑟将军，这次谈话很有意思。他发表的意见和李承晚的一模一样。他说只要在朝鲜南部建成全国性政府，朝鲜北部迟早会参加进来。此外，美国人的意见是，不管苏联人怎么做，朝鲜南部的选举照常进行。

父亲在提到他自己的个人领导能力时，并不故作谦虚。他觉得他是担当此项任务的最佳人选，不论今后是否徒劳而无功。

…我在朝鲜人中声誉颇佳。他们似乎信任我。就在这个星期，警察总监赵炳玉博士在酒后对刘驭万和帕特森说，委员会的人除了我谁也不顶事。另一天，我和梅农以及玛丽恩·毛女士在一起，梅农向我咨询某事，毛女士对他说：“没有胡博士，你甚么事也不敢做。”由于我认为自己能对委员会有所助益，决意一直待到任务结束。我能在南朝鲜的诸多领袖人物间进行斡旋，但我也看到即使能开成会议，也得出任何成果…。对朝鲜人来说，问题在于，是愿意见到一个完整而不流血的共产主义朝鲜；还是愿意分成两个朝鲜，至少南部朝鲜不是共产主义的，不过有发生内战的可能。如为前者，他们应要求外国军队从南北两方撤走，并和北方谈判，尽可能多地保住他们的权益。如为后者，南方的政治领袖们必须在他们自己内部协商一致，进行选举，尽快组成政府以便获得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

然而，尽管在当时的任务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父亲似乎又在考虑下一项工作：

梅农告诉我，克什米尔将要有一个联合国委员会，他表示希望我能参与其事。我当然乐意去，因为此项工作相对地要容易一些，而且也不会像迄今的两次使命那样费力不讨好。克什米尔是印度的瑞士。然而，如果我去那儿，甚么时候才能再回到我现在不愿意离开并结交了许多新朋友的纽约？

事实上我现在很幸运：在联合国，人们对我很尊敬，有着很有意思的工作，并且有比我所期望的更多的旅行。这个夏天我甚至还有机会去坦噶尼咯。至少在联合国的聘任合同期满以前我还能积蓄一些钱，赢得声誉并且有一个稳当可靠的未来。在这里，报纸上老是有我的名字，因为联合国委员会的主席在最初的一些日子里还没有来到，人们把我当成委员会的领导人。因此，在这里就和在巴勒斯坦一样，我变得很有名。但愿能一直如此！

在接下来一些日子的日记中，显露出困扰当时工作的种种问题：

我们还在等候苏联方面的回应，这回应可能是否定的。委员会主席写信给两位司令官（美国的和俄国的），说他准备对他们作礼节性的拜访。给俄国司令官的信是由俄国信使从汉城带往平壤的。同时我们又用电报把信发到成功湖，请科迪埃转交葛罗米柯。几天后接到葛罗米柯的回信，重申苏联对联合国委员会的否定态度。

…把朝鲜问题提交给一个临时委员会去处理的主张占了上风。如果委员会决定这样做，梅农和我就要前往纽约。这是我给科迪埃打电话的时候他说的。我虽然高兴由他提出这个意见，但这打乱了我回中国休假藉以和秀英及孩子们团聚的计划。

…我们必须再次确认梅农的委员会主席职位，并选出一位副主席。帕特森和刘驭万都不想担任此职。保罗-彭古虽然愿意担任，但他说如果出差津贴不增加，他至多只干两个月。其他的代表们都当不好副主席，更缺乏当主席的能力。

…这里的各政治党派都力争对我们施加影响，做出有利于他们一派的决定。韩国独立党的金九和代表中右政党的金奎植似乎要联合起来以排挤掉李承晚。他们看不到这样做恰恰在削弱他们自己。内部不和只会有利于真正的敌人，这是耳熟能详的常谈。二金正在建议与北方的领袖们开会共商大计。这就把他们自己送进共产党的掌握之中，使共产党得以将条件强加给他们。

在和李承晚的政治竞争者们会谈之后，父亲写道：

我们和金九及金奎植都进行过一次会谈，在恰当的时刻提出适当的问题，使他们同意我们的意见。金九同意在外国军队撤离以前举行一次会议，而在此以前他坚持这样的会议只能在撤军以后才能举行。

…和金奎植单独会晤，我对他说，如果南朝鲜人打算并且能够抵抗朝鲜北方的共产党人，他们就必须迅速进行选举并成立政府。如果他们拖得太久，美国人可

能迫于公众舆论，突然撤离朝鲜，而他们既无政府又无军队，那就可能会大祸临头。

至此，委员会已面临这样的情况，如果要进行一次选举，那就只能是在南部朝鲜单独进行。但如果要在南部朝鲜单独进行选举，必须先得到小型联大（代替大会的和平与安全临时委员会）的授权，而此项授权又必须保密以免妨碍一次南北会议协商成功的可能。这是一个时间安排上的问题。南北会议拖得越久，局势就对北方越有利。而到那时，进行任何选举都将会为时已晚。

…通过我和刘驭万的努力，我们总算把李和二金拉到一起，并说服他们接受一项共同的行动纲领。经过的情况是：在和金奎植谈话以后，我打电话给李，告诉他委员会注意到朝鲜南部政治领袖们之间不和，使代表们对在这里举行选举之事产生犹豫。李热衷于实现选举，要求会见梅农和我，以便使我们相信南朝鲜各党派之间的不和算不了甚么。李和二金到我的住所来开会，并留下吃饭。在详细向他们提问并引导他们趋向一致后，三人最后同意：

1. 设法举行一次南北两方领袖人物的会议。李不再反对这样做，而且如果苏方同意，他甚至会支持此事。如果5月以前未能开成南北会议，或者达不成协议，则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单独在朝鲜南部举行选举。
2. 南北会议的目的旨在为朝鲜南北两部分的统一作最后的努力，而如果会议不成功，则咎在北方。

这次三人会商造成很大轰动，因为他们已经两年没有在一起商谈了。此事也在朝鲜人的心目中增加了委员会的声望。

2月14日父亲和梅农飞返纽约向小型联大汇报。行程费了三天两夜，父亲在日记中抱怨说因时差而感到不适。在飞机上梅农将他预备的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的报告稿拿给父亲看。父亲提出三十处修改意见，梅农全部接受。

在纽约，父亲感到美国坚持在朝鲜南部举行选举，是否能够得到足以影响小型联大的充分支持，尚难肯定。他获悉英法两国在美苏有分歧的一切问题上都不愿支持美国。他们实际上不认为朝鲜之事是重要的优先问题。法国的一位代表曾说过，美国不应把它的钱稀薄地分散到全世界。父亲对此写道：

这是一种十分乖戾的观点，完全牺牲朝鲜。

在成功湖，父亲会见了秘书长和科迪埃。两人都表示希望他回汉城，尽管赖伊说此事由父亲自己决定。然而科迪埃则强烈表示，为了联合国的威信，父亲应回汉城；同时这也是因为梅农即将离去。科迪埃还提出，我父亲可以接替梅农担任委员会主席。父亲则回答说，他打算待到委员会的工作结束，因为他已经到了原定回上海休假之期，并且希望去巴黎参加联合国大会。

梅农关于朝鲜局势的报告被完全接受，并为他赢得其他代表们的交口称赞。在一篇文件中把他说成是具有充分的机智、理解力和坚定性。

待到表决时，三十一个代表团赞成，两个代表团投票反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3月6日，父亲再次从纽约回到朝鲜。紧张的关系和意见分歧仍然存在于各个层面。最明显的是存在于南北之间，而南朝鲜人自己的政治主张也仍然支离不一，大部分出于个人的恩怨和野心。美国人正在施加压力，促使选举不再推迟，不管北方参加还是不参加。

当选举临近之际，李，金九和金奎植交恶日甚。在相互间深刻猜忌的气氛中，指控和反指控飞向各方。

在低迷的势态中，北方由苏联建立起来的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首相金日成发出邀请，请所有朝鲜南方的爱国政治领袖们到平壤开会，讨论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

2月21日，金九宣称他反对联合国的选举方案，认为势必使朝鲜南北两方永久分裂。各政治党派的意见分歧之焦点在于是否应当等到全国重获统一以后再进行选举。二金访问了北方，幻想破灭而归。但他们仍然正式公开反对定于5月在南方举行的选举。

及至选举来临之际，北朝鲜已用金钱渗透到南方，控制了大量报纸、传媒、电影院，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赞成选举的只是全体人口中的一个大的少数派。联合国委员会到来之后，

宣佈大赦，释放了几百名计划实行罢工，纵火，暗杀和密谋造反的共产党人，煽动者和恐怖分子，使情况更加混乱。现在已从监狱里放出了所有曾因不法行为而逮捕的共产党人，使他们得以重新进行反对联合国委员会的宣传，并威胁打击任何敢于在“美国通过其傀儡联合国所计划的选举”中投票的“卖国贼”。

不管怎样，朝鲜四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民主选举终于按计划于 1948 年 5 月 10 日举行。198 名代表被选进国民议会，另外保留 100 个空席位留待北方可能在未来进行的选举。选举当天，由于共产党进行示威引起暴力冲突，结果造成一百人死亡；不过选举是公正的。李承晚经说服作为制定宪法和选举总统的立宪会议议员候选人，获得他所在选区全部票数的 95% 而当选。此次参加投票的总人数达到选民总数的 92.5%。宣传甚广的抵制选举活动未起实际作用。

朝鲜人由于他们新的民主实验竟然如此吉祥顺遂地实现而大为高兴。联合国委员会撤到上海草拟观察员报告。报告肯定当地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由气氛，能够实行言论，出版和集会等自由的民主权利”。选举“充分表现了选民的自由意志，是在共产党人也可以存在，其人口组成约占全朝鲜总人数三分之二的地区”进行的。

霍奇将军对选举未能在三十八度线以北的地区进行正式表示遗憾。美国和联合国都表示希望有朝一日南北双方能联合成为一个国家。

父亲回顾他一生的业绩，认为最有收获的一章就是在朝鲜的这一段。他深信一个国家最渴望达到的目的就是实现民主，他自幸在朝鲜对这个进程起了作用。对因此而给予他的荣誉和尊敬深感快慰。也许朝鲜人感到更容易向另一个东方人倾诉心声和加以信任。他们的历史书上肯定会给他一个可以引以为荣的位置。

5 月 31 日，国会开会选举议长。议员中有八十五名独立党人，四十八名李的追随者，三十名民主党人，和三十七名小党派的人。李以 189 票赞成 8 票反对当选。其后的几个星期中致力于起草一部宪法。

7 月 19 日，宪法获得通过。李承晚以 180 票当选为大韩民国第一任总统，金九得 16 票。8 月 3 日，李承晚提名的总理李范奭在国会以 110 票赞成 84 票反对通过。

美国军政府向新政府移交权力用了几个星期，但其过程有条不紊。8 月 15 日，并在解放三週年纪念日向全世界宣告新的大韩民国成立。麦克阿瑟前来参加典礼。七十三岁的李承晚在就职演说中强调民主的重要性及保护人民权利和个人自由的必要。他知道人们期待他解决所有存在的问题和创造奇迹。

新共和国很快得到美国和其他约五十个国家的外交承认。12 月，联合国宣称它是朝鲜半岛上唯一的合法国家。

当时还有一些与北方进行和平统一的微弱表示，但结果都告失败。在北方成立了朝鲜人民委员会作为建立永久的共产主义政权的第一步。俄国人允许南北双方的代表于 1948 年 4 月到平壤开协商会议。此事最后弄明白只不过是站在北朝鲜一边所进行的洗脑行动，结果一事无成。局势的发展已远超过用协商来取得统一的可能。

在北方，不顾联合国的决议，1948 年 9 月成立了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宣称它代表整个朝鲜。很快就开始对南方进行游击武装骚扰，并进行宣传活动和酝酿暴乱。到 1949 年 6 月，苏联和美国的军队全部撤离。大国按照各自的目的任意处置了朝鲜，于是一个微型的冷战局面在朝鲜被复制出来。

在南方，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困难，使人民群众明显地对政客们不再抱有幻想。必需品的短缺，通货膨胀和维持公共秩序的困难，更导致共产党人鼓动暴动和罢工。1950 年 6 月，朝鲜北方的军队不发警告，一举跨过三十八度线，其时南朝鲜的军力远逊于北方。北方入侵者一路推进到大邱附近的洛东江才被挡住。

朝鲜陷入战争，直到 1953 年。

第10章 托管部—1951

秘书处内的麻烦——朝鲜停战有望——麦克阿瑟与杜鲁门的较量 ——台湾等待美援——东非视察团

父亲置身于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和插手朝鲜问题以后的那些年，工作缺乏连贯性，尽管也时有精彩场面，如1952年出使东非，但由于秘书处内部在薪给与合同上纠纷不断，以及其他一般原因，以致显得劳而无功。

在1951年的日记中，父亲抱怨道：

赖伊在助理秘书长合同问题上的迟迟不决是不近人情的。他对待我们还不如对待仆役。

终于，赖伊在一次庆祝他自己新一届任期的助理秘书长会议上，宣布了他的决定，将高级主任们的合同延长五年，助理秘书长们的合同则延长三年。

父亲在日记中写道：

赖伊告诉我，他想延长我的合同，但是如果毛政权被允许加入联合国，则他就愿意任命一位中共的人担任我的职务。这就是他为甚么要给我一份可以随时终止的合同的理由。我回答说，他应当给我一份和其他四位常任理事国人员任期相同的合同，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了那一步，我自会递上辞呈。不管怎么说，似乎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再在联合国呆上三年。

1951年2月，父亲和其他助理秘书长及主任们参加了在华道夫饭店为赖伊和他的家人举行的赖伊五十寿辰晚宴。

我们送给他一个银盘，当场还有几个人出来致颂词，我和本奇都认为这些演讲极不得体，既无内容也缺乏油然而生的幽默。赖伊即席演说，表示他深信不会发生全面战争，因为各国领导人都是明智人物，不似希特拉那样疯狂，或是像墨索里尼那样是个梅毒患者。他还说就目前而论，他的看法是，在国际局势中各方都在约束自己。这是当晚最好的一篇演讲。

然而，就父亲本人的任期是否可靠而言，赖伊仍在拖拉。

昨天，在一次助理秘书长会议上，他说，关于我们的合同他仍未作出最后决定在此期间我们仍支原薪。

到了三月份，他们仍在等待。父亲在其日记中抱怨说：

他甚至还没有签署主任们的合同。这样一来，联合国的最高级别官员反不如他的下属那样值得令人羡慕。事情变得越来越可笑了。

关于他们在秘书处内并不被人放在眼里的猜疑，由于有些官员们的吝啬态度而加甚了：

本週我们开过一次助理秘书长会议，会上审查了普赖斯拟定的两份文件。令人不解的是他对其他人，尤其是对外国人的心理以及其他部门的工作，竟然一无所知。他只看到预算的一面，其余就全不加以考虑。就是因为他，才使我们在新楼没有安装新的设施，而我们办公室的设备与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相比，简直是糟透了。

如果不是父亲出于天性，一向勤于工作和热心参加一切活动，1951这一年是不吉利的。当发觉赖伊曾试图取消这些人的汽车时，不快的感觉就更深了。

他们说1946年的时候，他们想为赖伊买一部凯迪拉克牌轿车，为助理秘书长们各买一部别克轿车，赖伊说他就是联合国，所以他们只为他买了一部车。他总是想方设法贬低我们。

在这段时间，父亲几乎每天都写日记，这也多少为他提供了一些他极其需要的消愁解闷的机会。

就国际而言，朝鲜仍然是联合国注意的焦点，同时还有人猜测，困守台湾的国民政府军队有可能入侵中国大陆。

1951年1月，中共的军队再次攻击试图固守汉城以北一线的美军，汉城业已疏散。父亲在白硫磺泉会见了塔夫脱的顾问麦克亚当斯，此人明确表示，美国公众并没有为一场朝鲜战争牺牲一切的打算。

关于台湾如果遭到大陆入侵，美国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也是美国国务院内争论不休的题目。1951年，这方面的意见分歧导致美国政府内杜鲁门与麦克阿瑟将军之间一场最公开并且最有争议的冲突。

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由于朝鲜事件，不可避免地复杂化了。1951年1月父亲写道：

我前往华盛顿和钱泰夫妇、刘锴及于焱吉盘桓数日。气氛是压抑的。我们谈的只是政治，特别是关于三人委员会设法促使中共同意谈判的最后尝试。

也曾有过尝试，要召开一次关于远东的会议，把四大国，包括中共，聚在一起。“重点讨论台湾和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这些原则已经得到美国同意这一事实表明，他们既已同意与中共共同参加会议，就是有意予以承认。然而美国的公众舆论认为，举行谈判的这个最后努力不会被毛泽东接受，这样就可以使联合国合理决议谴责中共为侵略者。麦克亚当斯认为联合国的命运不久将达到决定性的时刻，如果毛政权被接纳进入联合国，美国人就会转身离去。

在过去，我会愿意在将中国定为侵略者的国际会议上代表中国，因为这将证

明有一个强大和统一的中国。而今天，1月20日，美国将提出这样一项决议，但糟的是，情况与我所希望的完全不同。中国甚至不是在玩国际共产主义的游戏，而只是在玩苏俄的游戏。为了一桩并不符合中国人民真正利益的事业而把自己的儿女派去遭受杀戮，也许，使得全世界都重视她的实力，但也引起敌意。

1月24日，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一致通过决议，要求联合国将中国共产党人定为侵略者。父亲写道：

美国人这样做，至少向世界表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团结一致。

这个决议在联合国得到通过，尽管有些国家表示他们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支持决议的，并坚持认为这项决议并不排除谈判。苏联人和周恩来自然是抓住这个机会谴责决议是美国强加给其他国家的。

然而，到了三月份，美国人在朝鲜已恢复了信心并正在向前推进。父亲写道：

美军在朝鲜的数目比我想象的要多，不包括海空军就有25万人。麦克阿瑟今天发表了一篇演说，将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与朝鲜问题分开，这就和杜鲁门唱的不是一个调了。那些实行绥靖政策的人现在可以争辩说，没有理由不在解决朝鲜问题之前先解决台湾问题。

后来国务院声称它与这篇演说无关，理由是演说向中国共产党人发出的威胁妨碍了停火的机会，是有意破坏谈判的可能性。麦克阿瑟与政府之间在观点上的分歧正在加深，令人震惊。

三月底，《纽约先驱论坛报》上有一系列陈纳德的文章，特别强调美国应援助台湾实施在大陆的登陆作战。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他指出台湾缺乏装备和战争物资。士兵们每月只有一粒实弹用于训练。我们在登陆前需有六个月的准备时间。依我看，要美国人支持登陆，只有在国民党战败和他们在朝鲜的情况危急，或是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美国认为自己足够强大，足以挑起一场全面战争以在全球打击共产主义的时候。在美国这里，大部分人，除了中国教授们以外，都恨蒋介石。他们愿意看到共产党被打败，但不是用支持蒋介石的办法来达到。

电视用于政治带来了一些微妙的但是相当大的变化，对杜鲁门政府具有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它处理与麦克阿瑟的分歧当中更是如此。父亲写道：

他们说杜威在1948年的总统选举中失败是因为公众在电视上看到他的那副狼狽相活像一位新姑爷。美国公众喜欢葛罗米柯，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过他，但是他们恨马立克，因为他们看到了他，并发现他不可理解，不像奥斯汀那样，从脸上一看就知道他在想甚么。对杜鲁门政府来说，这将是一场灾难，这届政府被认为是哈丁以后最腐败的政府。

这几个月中父亲的日记之所以非常之多，得益于4月间母亲送给他一支派克钢笔。他兴高采烈地写道：

…是最新的样式，蓄墨水的部分是塑料的，且让我们看看它能够用多久，也看看我用它有多么频繁。

他不需要多久就有了藉口，通过维施霍夫传出了谣言，说他正设法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要与他们修好，这使他大为恼火。

这真是愚蠢。如果真的是那样，我为甚么不在更有利的时刻去那样做呢？如果谣言不是出于有人要毁坏我的名誉，就是那些人自己有这样的意图而栽在我的身上。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和现在的许多小人一样是变色龙。六个月前赖伊会对我与赤色份子关系良好感到高兴，但现在则可能因此而对我不信任，原因也许就出在这个地方。

在秘书处内部，个人之间的倾轧和妒忌是很普遍的。父亲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与维施霍夫还有更多的麻烦。维施霍夫暗示说他去非洲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日用补贴和巩固他的地位。父亲愤懑地写道：

像维施霍夫这样的人想到的只是耍手腕和个人利益，他们并不理解别人是出于责任感而去做一些事情。他自己可能就是很想为了他强加于我的那些原因而去出差的。

在美国，麦克阿瑟建议应该帮助台湾在中国大陆登陆，这又一次令他的政府震怒。

麦克阿瑟说，是他用在亚洲进行战争的办法来为欧洲打仗。看来美国又在为朝鲜的军事形势担心。每当他们担心要打败仗时候就想到我们在台湾的部队，而一旦情况好转就把我们忘掉。麦克阿瑟的这次新的内心思想的流露，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了。我们不久就会看到反应。英国人是不能容忍他的。

明天赖伊要去近东一个月。他有一种直觉，可能会发生甚么事情。我也有同感。我认为在朝鲜我们的共产党军队将会重新采取攻势。问题是俄国人会不会参加进来。我对赖伊说，按照规定我现在可以回国度假了。但我将等他归来。

第二天，4月7日，赖伊在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后离开纽约前往巴黎。他在会上说，希望能在朝鲜停火，但他不能预言一定如此。父亲写道：

赖伊极力主张我们使用全部力量来结束在朝鲜的侵略，这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有把握做到的。他不相信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说我们必须往最好处希望，而往最坏处准备。在他外出期间津琴科将担任代理秘书长，这无疑是在向俄国人讨好。

白宫对麦克阿瑟信件的反应是，它无意改变使台湾中立化的政策。然而父亲在4月11日记录了一项惊人的消息。

今夜一时，白宫宣布杜鲁门撤消了麦克阿瑟的职务，由李奇微接替。中国人完全惊愕了。所有大国，特别是英国和印度都兴高采烈。只有澳大利亚感到遗憾。这将在美国引发一场可怕的争论，然而一切都取决于共产党。如果他们继续推行其侵略计划，杜鲁门就完蛋了。美国舆论就会像法国在德雷福斯事件上一样产生分裂。杜鲁门拒绝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主席卢克会面，此人刚刚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公开声称他同意麦克阿瑟的立场。这其实是无足轻重的。

到4月中旬，有关麦克阿瑟的争论在全美爆发了。父亲写道：

举国上下分成两派。尽管所有的人都承认总统有权撤消一个不服从命令的下属，但多数站在麦克阿瑟一边。那些头脑清楚的人，像沃尔特·温切尔等人，则认为最令人反感的还不在于麦克阿瑟的撤职，而是那使这件事终于成为不可避免的外交政策。迄今为止，新闻界还从来没有攻击过杜鲁门，因为美国人通常是尊重总统这个职位的，但是这次他们却不得不这样做了。《芝加哥论坛报》说，美国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比这更大的危险，整个国家“是由一个被一群无赖包围的白痴在领导。”

一般说来，两派是以两大政党为线划分的，共和党支持麦克阿瑟，民主党则支持杜鲁门。但在社会公众的场合就不总是这样了。今天的无线电广播说，一位支持杜鲁门的丈夫被他的娇妻劈头盖脸打了一巴掌！

接下来还有更糟糕的事，到了8月，杜鲁门的模拟像就在公众示威中挂了出来。《时报》报导说：

一个很不得人心的人撤了一个很得人心的人的职，这种事实属罕见。他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狂妄、性情暴躁的总统顽固地包庇一群狐朋狗友，一个在充满挑战的时代未能给国家提供明确领导的人。他的亚洲政策似乎是兼有辩解性抵抗和介于希望与祈求之间某种聊以自慰成份的混合物。

杜鲁门在4月份的一篇演说一开头就断定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人正在从事一项阴谋，要在全世界消灭自由。父亲的评论是：

…演说显得比通常聪明，但其中含有一项根本性的矛盾…

杜鲁门说共产党人的目标是通过兼并统一亚洲来打败美国。在这方面他的所见似乎与麦克阿瑟一致，但他认为，仅在朝鲜制止侵略，我们就可以使共产党人不致走得太远，于是就可以避免一场世界战争。只要共产党人真能就此止步，这样一种理论当然是很吸引人的。然而杜鲁门承认，很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尽管他们作出了最大努力，共产党人还是要扩大战争；于是他说，要是他们首先这样做，那就是犯了可悲的错误。

因此，他一方面认为共产党人要霸占整个亚洲，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如果在朝鲜的抵抗足够强，他们也许就不想这样做。他并不是说在另一种情况下我们得一切从头做起，特别是如果民主国家意见不一的话，而一旦和平得以恢复，这种局面就肯定会出现。反之，如果战争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就将发生使民主国家再次分裂的经济危机。在某种意义上说，麦克阿瑟的撤职也可能是塞翁失马，因为这样一来反而会激起公众舆论，指明美国究应采取何种政策来对待亚洲和当前

的局势。

此后不过几天，最后的看法就得到了证实。原本反对援助台湾的国务卿艾契逊宣布，美国毕竟还是要给以军事援助。三天之后的4月21日，美国官方消息来源宣布，将派出一百人的军事使团去台湾帮助其保卫自己。父亲评论道：

这一消息肯定会使所有反共的中国人精神为之一振。我想从今以后我们的情况将会好转，而在毛插手干涉朝鲜之前我们在国际形势中达到的最低点将不会再现了。我们的命运现在又与美国的命运真正地休戚相关，这样，在逻辑上，在地缘政治上，我们就又重新和我们的盟友结合在一起了。

秘书处内部，和外界一样，在麦克阿瑟问题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父亲写道：

在我这个部门，本奇，本森和亚历山大都是反麦克阿瑟的。在助理秘书长会议上，本奇反对让秘书处成员按自己的意愿参加支持麦克阿瑟的游行的建议。他真的是十分偏执。我从未见过他在与己无关的事情上如此激动。他是毫不掩饰地痛恨麦克阿瑟。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围绕这一事件的争论竟是如此地情绪激昂。一些天来这是唯一的话题。我怀疑在罗马史上是否有过同样情况，一个遭贬的将军如此凯旋般地受到群众欢呼。

然而，仍然还有许多美国人相信，杜鲁门更为审慎的政策会在更长的时间内保证和平。父亲记录如下：

我昨天与乔治·夏普共进午餐。他认为朝鲜战争可以再延续二十年，但宁愿这样也不要世界大战。他认为美国应该为了欧洲而保存实力。一句话，他在为杜鲁门的理论辩护。

昨夜在法国大使加罗的晚宴上，我们就局势有一番长谈。德·凯利里为杜鲁门的政策作了有力的辩护。他认为美国人现在缺乏武器、飞机和教官（这些现在都正用于朝鲜），从物质上看，美国无法做麦克阿瑟想做的事。按照他的说法，麦克阿瑟是在强使美国政府承认其弱点，是犯了叛国大罪。和夏普一样，德·凯利里也认为欧洲比中国更重要，我们必须想到首先保卫欧洲。我回答说，俄国更有可能设法取得亚洲、东北和非洲，而对欧洲碰都不碰。

他也认为要是1938年在慕尼黑不退让，我们本可在更好的情况下进行战争，那时要不是抛弃了苏联，让希特拉去对抗它，我们也许能保持与苏联的合作而不是把他们推向他们现在的政策。

5月，父亲写道：

麦克阿瑟每天去华盛顿在参议院的两个委员会作证。随着事情的进展都及时向报界发表官方公报。不讲别的，单说麦克阿瑟对政府的坦率批评，就足以显示出美国民主的力量。

父亲一直认为，他的同胞从麦克阿瑟事件和参议院委员会所公布所有事实中，只会得到好处。

在公布了这些之后，共和党人觉得已经和国民党中国联合一致，并且会对我们好些。中国和美国将为了一个共同的和平与自由理想携手前进，这一天将会到来，我希望我能看到。

然而实际上，所说的将来并不是那样一种十分简单的理想。虽然联合国大会在5月19日投票表决对中共和北朝鲜实施经济制裁，而且随着共产党人在朝鲜的攻势美国对蒋介石的同情也在增加，但国务院却在不到一周之后宣称对华政策不变。父亲写道：

这好似一盆冷水浇头。这种事只会在这里发生。赖伊认为国务院是不敢表示有和解之意的，因为它担心会表现出绥靖的倾向。而在台湾问题上，赖伊认为联合国可以使它成为一片托管领土，把蒋驱逐出去（就好像真能是那么容易），并在五年以后举行公民投票，看它是愿意重新归属中国还是日本，或者独立。我告诉他千万不要认为北京会为了中国的利益而确定自己的态度，是俄国人在对中共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作出决定，只有能为俄国接受的解决办法才有成功的希望。

6月，朝着停火有了一些进展。苏联代表马立克演讲之后，共产党方面北京报纸的一篇社论和《真理报》的几篇文章都跟着赞许杜鲁门对停火的有利态度。在美国驻苏大使与葛罗米柯的会谈中双方同意，交战各方可在无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开始谈判。结果就出现了谨慎的乐观气氛。父亲写道：

一开始，马立克的声明被认为是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就像一个经常遭到丈夫背叛的妻子忽然听到她的丈夫说将对她忠诚一样。声明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在各地都燃起了希望；只有台湾和朝鲜例外，在那里，他们所要的是体面的和对将来没有危害的停火。艾契逊第一次声称，台湾问题和中共加入联合国之事不是解决朝鲜问题的要素。

虽然从一开始我就说，马立克的手段有些新意，但很难看出这是否就意味着俄国人有了新的态度。在加罗家中的一次晚宴上，索尔达托夫对我说，我的心找错了方向。我告诉他，我父亲没有带我去日本是因为他认为俄国的将来大有希望。索尔达托夫回答说，我似乎与我父亲的意见并不一致。我的回答是，我也许更了解俄国。

美国人现在对促成停火所表现出来的热情颇有点孩子气。赖伊的举止则很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不断地发表对和平乐观的声明。我觉得这就是他所扮演的角色，在世人面前只有这样才会对他有利。

他[赖伊]对李承晚极不友好，认为他是反动的，并要求科迪埃在朝鲜收集情报，看看他是否可以被人取代。

他[赖伊]对蒋介石的看法可能也是如此。在一次垂钓集会时他对我说，如果我当权，他会支持我的。像他那样的人对远东政治是抱有幻想的，就好像你只须诚实和开明就可以组成一个政府。他忘记了在那里，政府不是由普选产生的，个人的性格比施政纲领更为重要。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不论是作为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艾森豪威尔都能当上总统。

共产党人的停火要求是否有诚意仍然是个问题，不过父亲倾向于按其表面价值来看待马立克的演讲：

今天和我国代表团团长蒋廷黻共进午餐，他和我一样，认为共产党人想要诚实地“好好表现”一段时间。他说，就经济而言，中共已经消耗殆尽，再打下去就将无法保住中国。然而，他认为，他们将进攻缅甸，这就会使所有反对共产党的人团结到一起，这是外交上的大错。一旦朝鲜战争得到解决，中共的最佳策略是进攻台湾，因为进攻将使民主阵营分裂，在联合国就无法取得进行集体制裁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

次年3月。关于在朝鲜停战的乐观情绪渐渐消失，看来这将取决于对两个美国政党候选人的选择。

赖伊认为共产党人不要杜鲁门或艾森豪威尔，而是想要塔虎脱。因此只能在得知正式候选人之后他们才会决定是否停战。

看来只能坐在一旁等着瞧，别无他法。

7月，父亲得以脱开秘书处的争吵和政治上及内部事务上的失意，享受一番变换环境的生活。本奇在4月份即曾徵求他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参加非洲视察团。联合国有一项职责是视察托管领土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机构的各个方面情况，以验证托管国家是否真正在为那里的民众取得完全独立和自治作准备。

父亲很愿意前往。

…但不是作个可有可无的人，我也不愿他们说我在利用我的地位来一次作乐的旅行。我只会是为了联合国和我所在部门的利益而前往，如果我能发挥有益的作用的话。

5月份，赖伊同意父亲参加，而这个视察团却把用心险恶的维施霍夫排除在外。父亲记下的是：

他一定会大发雷霆，虽然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我想我在所有的事情上都会比他做得好。现在这个视察团应当是令人愉快的，因为所有的同事都很好，没有一个捣乱份子。赛尔已为卡戈所替代，他既活泼有趣，又为人谨慎。莱金也不错。马切纳可能有些别扭，但如果手法得当也容易摆布。

成员最后定为马切纳（团长），莱金，卡戈，吉达恭，达尔蒂格，罗吉埃和安茹小姐。

他们于1951年7月22日由布鲁塞尔飞往乌松布拉。

尽管安茹和罗吉挨之间有些摩擦，这次出行一般说来是顺利的。父亲认为，安茹和罗吉挨的摩擦只怕是睡在一起就解决了。

在乌松布拉，他们听过一位名为贝蒂伦的殖民者的一次演讲，讲的是在十年之间使这个城镇都市化的计划。父亲记录道：

他的眼光开阔，这在殖民者中是少见的。他对工作很有魄力和信心，其为人也颇具品味，这从他办公室的色调和家具可以看出来。他想沿一条大道栽种棕榈树，因为这些树在有风吹动时煞是好看！

然而从乌松布拉到基特加就使参加者都很不好受了。

净是尘土，到达之时已经筋疲力尽。施密特完全不顾他的旅行者的死活。我们像沙拉筐一样地被颠来簸去，而且不能入睡，因为马切纳白天睡不着，不停地说话。在路上我们经过一座比利时人在坦噶尼喀湖上的豪华别墅，此人是教士，但他把他的别墅献给了一个有两名教士被残杀的法圣（Phasam）。

沿湖有嗜眠病流行。在一所医院中，我看到一名男护士为一个十岁的男孩作静脉注射。男孩偏过头去，忍痛退缩，然后把手臂曲起夹紧二头肌走开，因为竟然没有药棉花！对每个人都施行抗嗜眠病的注射。在别处我看到两辆车为所有居民拍X光片，用的是约为明信片三分之二大小的微型胶片。每照一张的费用是五十法郎。我不相信在其他领地也这样作。

由于其海拔高度，这里的气候与瑞士相仿：

景色同样美丽，但因水土流失山上少树。

在实际工作中，视察团发现它的任务总是遭到当地官员们的掣肘。8月1日，他们接待了涉及那里一般情况的第一位请愿者：

…这是一名行政机关的职员，尽管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害怕当局的报复，但他有足够的勇气出来请愿……

马切纳的多嘴多舌继续成为众人的笑柄，且又令人讨厌。父亲写道：

马切纳常常在人们周围逗趣，说些有伤大雅的故事，例如说罗斯福夫人有一次在旅途中斥责一名在肚皮上做甜饼的南美女人，这个人回答说：“明天我做面饼圈，的时候请你再来！”

虽然马切纳让每个人看他妻子和孩子的照片，在他床旁桌上却摆着一幅美丽的年轻女郎的照片，他说他在离开纽约前的晚上是和她在一起的。晚餐时，他告诉我们，他父亲曾劝他绝不要在下午做不忠实于老婆的事。他说这就是他父亲之所以有三十年快乐婚姻的原因。

当我告诉他长期禁欲后头一回可能要失败时，他答道：“我回去要先同我妻子试一试。”

有一天他告诉我，这里的叫驴打架时都袭击对方的睾丸，这就是为甚么他们当中最终会有一个没有生殖能力的原因。他就是这么一天到晚琢磨这个！

8月4日，他们到达卡布哈伊的非洲传教会所在地。父亲记下的是：

我住的是一间简朴的房间，但很乾净，床垫虽硬却睡得很香。今天早晨的气温是六十二度，空气非常清新。昨天有电报来，说已为我们两日后到达坦噶尼喀作好一切准备。昨晚我和卢安达的国际象棋冠军对奕，赢了一局，他是一位块头很大的非洲神甫，使我想起青年时代的保罗·罗伯逊。最后是一顿丰盛的晚宴：浓汁炸虾球，银鱼汤，椰枣火鸡，酥煮水果，咖啡，亚耳沙斯白葡萄酒和酒心巧克力，是离开欧洲以来最美的一餐。饭后有文艺表演——预备作修道士的一群本地男孩，身穿白袍，用拉丁语和法语演唱宗教歌曲和当地歌曲。所有这一切都品位很高。

总的说来，父亲对比利时在卢安达保持的状况留有很深的印象。

我们在阿斯特里达看到了为土著设立的医院，管理得极好，这是在别处从未见到过的。医院的管理者是帕尼耶大夫。床上有带颜色的床单，使环境显得舒适宜人。每个人都有带乾净枕套的枕头，接生室还有消毒机。

我们也参观了供欧洲学童就读的圣·让学校。这座学校甚至比欧洲和美洲的某些学校还要好，有质量很好的课桌和椅子，一间学生们用的屋子里还有洗手池，自来水，等等。

昨天，8月2日，我们去谒见卢安达的太后——姆瓦米（国王）的母亲。她在她的什约吉尔府邸大门口迎接我们。那府邸类似一个小型城堡，有由围墙环绕的塔楼。太后年近七十，但从她的体态看来，年轻时一定很美丽。她的头饰很大，有长长的鬃毛，更使她显得身材高大，仪态万方。他们说她年轻时曾叫人把一个臣民的眼睛挖出来，因为她不喜欢他看她的眼神。

午餐后，团长当着姆瓦米的顾问和比利时官员的面问姆瓦米有甚么要讲的没有。那位姆瓦米说没有，同时两眼望着派驻当地的专员！他们都不敢说甚么，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不想影响到他们的地位，特别是因为行政当局待他们都很好。

在加比罗国家公园，我们夜间待在丛林中，听到袋狼的嚎叫。第二天，乘一辆敞篷车在公园中穿行时，我们看到了野牛，野猪，斑马和猴子，距离还不到一百米。这是这些天来最快活的一日。因为我们不必去访问医院或学校，或者接见请愿者。

在比温巴的办事处，父亲发现了更多的证据，说明当地当局做了手脚：

我终于发现一张通知视察团到达的佈告，但奇怪的是其中最后一段，也是当地民众最感兴趣的一段，被另一张招贴覆盖起来，因为那一段说视察团是来看望他们和听取他们的意见的。如果这个佈告是到处可见的，这或许是出于偶然，但考虑到这是我们看到的唯一一张，就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了。

从基特加起，视察团的成员们看来显得越来越疲倦，他们在设法减少所去的地方。基伍湖畔的吉塞尼，除了常有尘土飞扬外，是个颇具魅力的地方。从宾馆外出，我们前往刚果境内的塞克，观光火山熔岩，还为一个讨人喜欢的阿拉伯混血女郎拍了一张照。女郎头顶水罐，美丽的胸部外露，那是应马切纳的要求摆出的姿态。

安茹和其他人的摩擦到这时已令父亲难于应付。他写道：

安茹真是惹人生气。我未曾想到她在工作上会如此糟糕，而性格上又如此难处。今天我们回到乌松布拉。她本该知道她会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她竟在六点半时走开，直到晚饭后才回来。当我对她的工作提了几点意见之后，她却哭了起来。

8月31日，我收到了她第二封辞职信，尽管在前一天我曾为她好而将她的第一封辞职信退了回去。这位女士真叫人没有办法，我把她的情况在一封信中向本奇谈了。

在坦噶尼喀，他们发现他们的主人更乐于给他们提供帮助。

英国人尽量帮助我们会见非洲人，比那些比利时人要开明得多，比利时人只让我们见了两名顺服的巴米人。从姆旺加起，部分视察团成员去了布考拉，那里的哈加妇女是以在这块领地上做妓女出名的。据说她们既美丽又好虚荣，可是丈夫懒惰，要她们干活，于是她们就离开布考拉去作妓女。我们收到了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请愿书，很可能是那些戴绿头巾的丈夫们写来的。他们抱怨英国当局不限制这些妻子们的行动，还打算给她们发移动证。视察团本该像听取男人们的意见一样也听听那些女人们的意见，但没有人想到这一点，而我又不在那里。

在另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了瓦格格人的舞蹈，那是在原地轻轻跳动，不向任何方向移动。他们非常自豪又很原始，身上有赭石彩绘，长髮编成小辫，抹以琥珀味的油脂，耳朵眼上穿有木扦。

父亲的舒适感除了要看以谁为伴而外，还总是以饮食的好坏为转移。

这里大量出产咖啡，可惜煮得不佳，以致马切纳每次都要大发脾气。只有一次在一所英国人的疯人院中，我们喝到了好咖啡。

抱怨并不仅限于咖啡，父亲在日记中吐露说：

马切纳惯于和第一次见面的人谈些不得体的故事。在鲁安达和乌隆地还不要紧，但英国人则大为震惊。一天马切纳向贝伦德森提出一个非常明确的问题，怎样对付女人。贝伦德森答道，“团长先生，如果你能换一个话题，我就求之不得了！”吉达恭和我都笑得要死。

然而，在托博拉，马切纳在洛莱亚学校为学生们举行了一场钢琴演奏会。他很有天赋，那次演出非常成功，因为学生们从未见过甚么人弹钢琴。

在基塞尼，我们遇到一位名叫拉博的很会应酬的人，此人属保卫人权同盟，是位革命的工联主义者，任性而又充满生活的乐趣。他告诉我们，比利时人为了要破坏他的名声，说他吃儿童。他喊道，“我，一个没有牙齿的素食主义者！”

日记中有些有趣的记载说的并不都是政治和他们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而是一些获得的新经验。

又有一天他们拿给我看一件用于捉当地老鼠的捕鼠器。是一弓一箭。有一根绳子在一根木管某一点上的凹处穿过，将弓固定。管中有饵。当老鼠弄断绳时，箭即射入老鼠的脖颈，因为它的头是被固定在木管的凹处的。

视察团从亚洲人和非洲人听到的问题之一是在使用厕所上也有种族歧视，通常是按三个种族分成等级的。父亲对此问题有他自己的解决办法：

由伊林加去多多马时，我们的汽车须在有这种厕所的地方停下，于是我就当着众人的面在院中小便。

我们在坦噶尼喀看到一个舌蝇实验站，雇有 200 个黑人，他们所做的唯一工作就是在丛林中捕捉舌蝇，作上记号，再将它们放走，看它们能飞多远和寿命多长。他们能用三种不同的颜色，以成三角形的三点，在 25000 只舌蝇的背上作出不同的记号。在同一个实验站内，他们有秤舌蝇的天平，看它们的体重是否减轻！实验站的站长杰克逊是用他自己的血来喂养这些舌蝇的！

9月16日，视察团乘专机离开坦噶尼喀。父亲记道：

飞行颠簸得非常厉害。有很多垂直气流，我第一次呕吐了。这也是由于前一天晚上在阿鲁斯卡弄糟了。在那里我们宴请了坦噶尼喀总督爱德华·特文宁爵士和他的一些同事。我们在喝了很多的烈酒之后在凌晨一点半就寝。第二天全团的人都头疼恶心。

在坦噶，我注意到良好的私人关系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般看法。到坦噶以前，视察团对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是不很同情的。但在三兰港和坦噶，我们受到了克里马吉家族的邀请。这个家族在坦噶已有 150 年，非常富有和有势力。坦噶的印度人联合会以他们两位代表（克里马吉和胡笙）的才能给了我们极好的印象，他们的观点所表现出来的稳健与智慧令我们大为感动。

另一方面大多数英国官员给人的印象则不佳，好像是他们在那里只不过是食俸禄而已。他们对我们说，“花生计划”部分地是出于为战后在他处找不到工作的英国复员军人谋求一份工作而制定的。

在莫斯科，我们在月光下看到了乞力马扎罗火山，其形状并不出奇，平顶山峰上覆盖着积雪，很容易攀登。其巍峨之处在于其高大，并且是中非唯一的长年有积雪覆盖的山峰。

我在莫斯科遇到一位卡塞尔夫人，她是俄籍，嫁给一位澳大利亚上校。她为我们举行了一次俄式宴会，让我坐在马切纳的上手，还饮伏特加酒。俄式菜肴做得并不好，一些鱼子酱味道亦差，但气氛极为愉快。她像我了解俄国一样了解中国。从她那座房子的露台上我们在月光中可以看到乞力马扎罗火山。我们在露台上跳舞。我手指夹着香烟拿望远镜看火山，灼烧了前额的正中，于是有好几天看上去像个印度人。

我们从莫斯科出发去山里看帕雷部落，这个部落是这里最进步的部落之一。他们在消除印度商业广告方面做得很成功，具有文明责任感，极为难能可贵。例如，他们自己在山间修了一条汽车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穿欧洲服装。那里有一位名叫梅森的英国人，很关心普及大众教育。我们看到一群群的男女坐在露天地里学习基士瓦比利语。课程终结后有证书发给他们。

在阿鲁斯卡，一个兴旺的欧洲殖民者小城市，坦噶尼喀欧洲人委员会主席赖登的妻子在她的镇外别墅招待我们。赖登夫人因其亲土人的政策而遭到政府的批评。从她的别墅可以看到壮丽的湖光山色。我们也见到了坦噶尼喀的总督，此人看上去很像电影明星查尔斯·劳顿，他的和蔼可亲与开明大方出乎我的预料。他告诉我们，可以在阿鲁斯卡附近看到头埋在沙中但不下蛋的鸵鸟。他指的是那些殖民者。

在坦噶尼喀，我们看到了一名黑人妇女，两个乳房硕大如牛的乳房。马切纳开始大笑，高兴得尖叫起来。

在乃洛比，我们受到了总督菲利普·米切尔爵士及其东非高级专员公署同事们热情友好的欢迎。他们说，我们这个视察团大大优于前一个，我们的观点和他们不同，更为客观，不怀有敌意的成见。我们所住的旅馆从服务和舒适程度看，令人想起欧洲和美国的旅馆，但他们不招待亚洲人，因而我们不得不与经理交涉，请他们接待印度委员潘特。

视察团在乃洛比参观了东非科研机构——东非农林研究组织的新楼。

我们看到了许多以前从未看到过的事物，如测定土壤肥沃程度的摄谱仪，其所需时间比化学分析的短；白蚁实验室，酒精中的白蚁长达一指；从飞机上拍摄的地图；还有能由两眼看到三维图象的放大镜。土壤的肥沃程度及与之相适应的种植方式可以由土壤的颜色和构成来断定。

我们又醉醺醺地离开乃洛比。马切纳找到一个美国女人，他只睡了两小时，但我和其他人都自己早早上床睡去。

在摩加迪舒，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意大利人比那些英国人和比利时人更有艺术欣赏力。在这里，建筑风格是阿拉伯式的，然而没有任何建筑不与城市总的风格相融洽，即便是那些现代建筑也不例外。索马里人是个非常优越的民族。我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地方还没有看到过这么多漂亮的男人和美丽的女人。这里最常见的疾病是性病。梅毒甚至是先天的。女人都崇尚虚荣，全戴着珠宝、琥珀或者镂空金饰，甚至小女孩也一样。与此相对照的是，欧洲女人都显得苍白和无精打彩。气候不很令人满意，我自己在那里也感到不舒服。

这个国家的政党之多犹如雨后春笋。组织得最健全的是索马里青年联盟，它对当局的一切作为均持批判态度。它有着和共产党一样的纪律和组织，人们怀疑它和亚的斯亚贝巴的共产党有联系。索马里青年联盟说，在英国人统治下一切都好得多。人们怀疑他们的动机是：只想看到英国人回来，或者在索马里获得独立时扮演支配一切的角色。在两所学校中，孩子们向视察团发出对当局的抱怨。有些成员想，是不是索马里青年联盟对视察团的来临没有事先做好安排。

视察团于1951年10月17日返回纽约，正好是出发后的三个月。

视察团任务完成，众人皆大欢喜。但我们已开始彼此感到厌烦。此次索马里之行最为有用，因为如果不去，我们就发现不了我们现在所得知的一切，如协商委员会成员之间互相仇恨的关系，有的百分之百地亲意大利，有的百分之百地亲索马里青年联盟。我们也看透了索马里青年联盟的不讲理和妄自尊大，使我们对意大利人愈加宽容。意大利人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可谓是徒劳无功：这个国家贫穷，没有石油可以创造出奇迹，在经济上是十分贫瘠之地。意大利人在阔别了十年之后，刚刚在一年以前才回来进行管理，而又不得不在九年之内给予独立。视察团认为意大利是想在十年期满之前即行离去。在罗马我们得知意大利管理索马里不过是为了在非洲事务上有发言权。

虽然离开非洲使人感到欣慰，但返回欧洲也并不完全令人愉悦。

在伦敦我一个人去辛普森饭店吃午饭，真是好不令人扫兴。没有人点烤牛肉，在我一再要求之下，他们给了我三小片，非常之薄而且样子也不好看。我要的生蠔也不新鲜。我想英国人的标准是大大地下降了。他们对外国人的态度倒是好了些，而在以前他们是颇为高傲的。

在罗马和布鲁塞尔。殖民部长们都以午宴或晚宴招待视察团。而在伦敦，他们只给了我们一杯咖啡外加几块饼干。

11月15日，父亲去巴黎出席联合国大会，尽管视察团内部的争论和麻烦使他无法完成他的报告。莱金和卡戈为所有的报告定了调子，使会议拖得无止无休，而马切纳则一味讨好大家，未能维护他作为主席的权威。

莱金和卡戈是客观的，把他们认为对的都谈了出来，这就占去了很多时间。然而我敢肯定报告会是很好的。

11月20日他仍在“法兰西海岛号”上。

刘虎在我离开之前从中国休假归来。他说共产党政权在中国已稳稳站住了脚跟，如果没有一场全面战争国民党是颠覆不了它的。青年学生都支持共产党。中国民众一般只在三个方面责备这个政权：压制自由、在朝鲜进行战争和在他们自己不够吃

的情况下把食物运往苏联。至于其他方面，他们认为共产党人比国民党人好：在上海已没有乞丐，火车运输情况良好，没有贪污腐化，等等。

我在船上遇到一名在新几内亚呆过二十一年的人。我将托管理事会有关新几内亚的报告拿给他过目。他很喜欢那里的土著，但是说他们仍处于石器时代，要自己管理自己还得再等上一两个世纪。他们有几百种不同的语言，但没有一种能表达抽象概念。例如，他们没有一个表示森林或树木的字。要说“我爱你”，他们说“我比你先死去”或者“我的内脏在追随你。”

在某些原始部落中，第一次分娩的女人和其他妇女还有一头母猪一起藏在洞穴中。在分娩时，其他妇女打她。然后她们就不再触摸她，由她自己割断脐带。她抱起婴儿摔向一块石头，接着让母猪去吃。

父亲的有些最令人神往和使人耳目一新的遭遇是出于巧合的。他于11月21日写道：

我们今天到达法国的哈佛港。昨天，“法兰西海岛号”的船长在他的房舱内设午宴招待挑选出来的几位乘客，包括两位教士，还有迪佩拉和我。我生平第一次嚐到一种比利牛斯山中出产的有泡沫的葡萄酒，味道极佳。我将在巴黎买一些送给赖伊，请他嚐嚐。

布泰谈到他曾于1943年2月与贝当共餐，当时贝当已回忆不起布泰几个月前对他说的话。布泰认为贝当只在午前头脑清醒，但甚么文件都要在下午签署。他说贝当夫人对他讲，犹太人被迫害得还不够。

迪佩拉神甫谈到他在新几内亚的经历和两例令人无法解释的巫术：在第一例中，一个名叫沙维里翁的土人皈依了天主教，但梵蒂冈认为他六岁时的一桩婚姻仍然有效。土人失望之余就成了巫师。一天晚上他走了十六英里来到丛林中看望迪佩拉神甫。在他到来之前，迪佩拉听到一种酷似大鸟的脚步声，走后也一样。从走过的距离推断，迪佩拉相信土人已将自己变成了一只大鸟。

他说巫师们要想杀某人，就将一件属于受害者的物品以及某些东西置入一个竹筒。在预定的一天，他们将竹筒破开，受害者就会死去。但如果他是个基督徒，这个方法就不灵验，除非巫师取得一些他的精液放入筒中。迪佩拉将这件事与天主教的信仰联系到一起，即，有了不洁的行为，你就会失去神灵的保佑。

他还告诉我们巫师是如何将毒蛇连同受害者的一片衣服放入竹筒中，然后给竹筒加热并敲打它来使毒蛇难受，再将竹筒放在受害者必将走过的地方，到时候将竹筒打开，毒蛇即窜向受害者。

迪佩拉已将他对托管理事会关于新几内亚的报告的意见写下来给我，他认为我们在巴布亚人的发展方面，行动应该非常缓慢，而且教给他们手工艺只会有利于雇用他们的欧洲人。另一方面他更主张在田间实行强迫劳动以教会他们如何耕种。

他是个很好的人，总是热情洋溢。他承认自己对三位一体的教义并不理解，而向巴布亚人解释为一个有一只手臂和三条腿的人。我们成了好朋友。他总是放量地饮酒和抽烟。

到12月初，父亲已在巴黎安顿下来，住在雅吕夫人的豪华公寓里：

…我在那里有一间浴室，一间卧室和一间书房，并可使用其他房间招待我的朋友。我想在这儿住到1月份联合国大会结束，但赖伊，科迪埃和普赖斯都催促我在圣诞节前结束我的第四（托管）委员会的工作。不管怎么说，巴黎不如从前那样好玩。说来奇怪，我是唯一被赖伊要求这样早结束委员会工作的人。亚历山大和我都认为这后面有本奇作祟，因为他想回纽约过圣诞节，于是想方设法尽量缩短讨论的时间，即使工作差些也在所不惜。

由于他看到我并不太热心，并预料如果每天讨论两次，代表们必然会起来反对，他就告诉赖伊和科迪埃说是在我拖延工作，想藉以迫使我加紧结束。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本奇对待同事会是如此自私。

正如父亲所料，第四委员会到圣诞节还远未完成工作，不过本奇并未被要求在以后重返这个委员会工作。即使裂痕在表面上已得到修补，这一件事已令人更加看清了本奇的人品，

而两人之间已趋于不睦的关系就再也不能像当初一样亲密了。

第十一章 托管部—1952

重返台湾——麦卡锡政治迫害——艾森豪威尔取代杜鲁门 ——赖伊辞职

1952年3月，父亲决定回台湾休假，这也多半是由于他所写的一篇陈述休假问题的文章在秘书处引起热烈反响所促成的。秘书处所有一定级别的高级成员和他们的妻子每隔一年均可享受一次“回国假”。总部既设在纽约，人们感到回国休假乃是一种权利而不是甚么特别

照顾。来自中国大陆的成员不能或不愿返回其家乡的，可以享受一次报销旅费去台湾或香港的休假。

他以其一贯的率直记录下了围绕这次访台的一些事件：

在东京候机去台北时，我去看了一场日本脱衣舞——两个日本女人的舞蹈，穿着性感的三角裤，乳头上戴着闪光纸做的亮星。这种场面在战争结束前是见不到的。整个大厅只有一个主题——性，表演的是日军士兵在一个岛上的野蛮行径。这样的主题在战时是这里所不可能出现的。这全是由于美国的影响——脱衣舞、色情表演，是和美国军队一起来的。有些这类表演即使在芝加哥也有可能遭到禁止的。一名只穿小内裤的女郎手持一个硬纸筒，在观众中穿来穿去，允许他们用纸筒往她的无袖宽内衣里面窥视。另一个则背向观众作出各种性交的动作，她的臀部只挂着几缕丝线。更令人激动的是一名身着传统和服的日本女郎最后全部脱光。它表明欧洲服装已使我们习惯于看到肉体并引起兴奋。女郎都很年轻，高挑的身材，有着运动员的体态——这是在与西方文化接触中出现的一种新型日本女人。后来我又去到国际联合剧场观看“东京舞蹈”表演，300名艺人全是少女，甚至男角色也由少女扮演。

飞机在台北降落前，窗帘都被拉上以防止旅客拍照。令父亲吃惊的是，有一群摄影师和记者以及来自外交部的其他人士集合在那里迎接他。

这些天报纸上尽是有关可能在朝鲜停火的消息，由于他们知道我是处理托管事务的，有的人就认为我是前来安排把台湾作为托管领地之事。我声明自己是来休返乡假，这才消除了一切怀疑。

外交部特为父亲安排了一位秘书，一部汽车和一家旅馆，那是位于城市边缘山上的一座旧的日本庙宇。（台湾有许多日本五十年殖民统治的痕迹。）秘书就住在紧邻他的一个房间内，他很快就对那位秘书的过分热情感到厌烦。

…他几乎和我寸步不离，因此我怀疑是不是在对我进行监视。不通过他没有谁能见到我。可另一方面，我处处都得到方便；连最小的愿望也能得到满足。最后我发现他从未去过国外，只不过是没意识到他在碍别人的事。

看来每个人对父亲的到来都很高兴，这令他感到满意：

…也许由于我是第一个不是为了享受和谋求甚么好处而来此的人。也许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好兆头。他们在台湾发现了少许石油，并正在和美国人一同继续探查。如果我们能找到大量石油，我们的经济问题即可得到解决。

虽然由于父亲的国际身份，不能对政治问题发表公开评论，但还是安排了许多让记者与他见面的机会。有一次在这样的会见时，父亲问起记者中有多少台北本地人，结果五十人中只有一个。

于是我说，台湾的人民应当多参加中国的活动，这样他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的问题就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当我问到是否有新闻检查时，他们回答说没有，但每一家报纸都自加小心不刊登某些消息。我不断提出有关台湾人与大陆人之间关系的问题。这对于今后显然是很重要的，而我对这种关系也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一般说来，台湾人比较愉快，特别是在陈诚推行土地改革之后，这项改革使台湾农民获益不少。然而他们瞧不起大陆人，认为大陆人的效率和组织能力都不如日本人。

关于征召台湾人入伍的问题，孙立人确认他们是好兵，但他们需要全面提高士兵的生活水平。他们说可以征召人口的百分之十，达到80万人。可惜我没有得到机会和台湾人直接谈话。我遇到的一些台湾人，如黄朝琴，都是些受人尊敬的和我们合作的人。

4月23日，父亲应邀赴吴国桢招待外国外交代表的宴会。印象不佳：

我能感觉到这些并不是亲台湾的外交官。他们不是那些高级人物，不属于人们在大的首都所见到的世界级外交官一类。

两天之后，他参加了蒋介石夫妇招待美国国会议员的宴会。席间发生了一件有关外交礼节的事，是有关美国人而不是有关中国人的事。一位共和党议员，威尔逊，抱怨说他的座次被安排在一位资历比他浅的民主党议员之后。父亲指出：

显然他是在每次宴会上都提出同样的抱怨的。蒋说他们就是像些孩子。然而在纽约，美国人并不理解赖伊为甚么在安排座次上总是那样坚持己见。

父亲已有些时候没有见到蒋介石了。

他身体并没有甚么变化，尽管背更驼了些。人们现在可以当他的面吸烟了，愿意抽多少就抽多少——他的太太抽得就像个烟筒。他已学会当美国人引他发笑时拍拍他们的肩膀。有人讲了一段有趣的往事，说美国人有一天在早晨六点半当蒋正在祈祷时向他报警，告诉他雷达发现有一艘国籍不明的潜艇。蒋说在那个海域这是不可能的，而事实上原来是只海豚。

蒋夫人体重增加了，面孔看上去有些发福。有一次我和她单独用午餐时她解释说，那是由抗过敏注射引起的。宋氏全家都患过敏感症，宋子文和宋子良尤甚，而她则全身都是药液了。她已见老，越来越像她的大姐孔夫人。在那次招待美国国会议员的宴会之后，议员们将她围了起来，执着她的手，恭维她的美丽，说她“像一朵花”。过去一年中她在学画中国画，非常用心。她说她绘画的速度和力度与男人一样。

几天之后我被蒋召至他的办公室。他独坐在长桌的一端，两位秘书站在他的背后作谈话记录。他问了我几个简短的问题，一直都是我在说话。这次会见历时十五分钟，这在蒋已是很长的会见了。他问起国际局势如何，我有甚么要告诉他的，有何建议，以及联合国对我们的态度是否已好些。

我告诉他，外国的对华舆论正在起变化，因为他们认识到我国的共产党人并非农村改革者，毛泽东也不会像狄托一样。在海外，他们认为俄国人不会发动一场战争，但整个自由世界都在期望着军事、财政或经济援助，因为他们不能无限期地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彻底枯竭，而到了那个时候，就会发生变化。我的感觉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而被人看重的，那是由于在必要时我们可能在战略上和军事上作出贡献。一旦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我们有用的那一刻就会到来。美国人正在各处找朋友，甚至是那些他们曾经抵制的，如佛朗哥和狄托，也不放过。至于就联合国而言，他们的趋向对我们比较有利，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何长处，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曾是如此难以对付。是朝鲜战争使每个人都认清了形势。

我对蒋的建议是，做好登陆准备，但在政治上也要准备出登陆以后的必要措施，这和军事上的胜利同样重要。第三，我们必须团结一致。

他问起赖伊如何。蒋料想他是不会喜欢我们的。我解释说，赖伊想讨美国人的欢心，并不是在为中共进入联合国进行工作。我离去时，蒋表现得很友好和愉快，给我的印象是，他认为我们在联合国的外交官都工作得不错。

蒋夫人邀我共进午餐时，我猜想她是要我捎些东西给她的哥哥宋子文或她的姐夫孔祥熙，而她确实给了我三个大包和一封给孔祥熙的信。她向我问起美国的总统选举和各个候选人当选的可能性。

午餐是欧洲式的，但她有自己的食谱，有从她的花园中采摘的蔬菜。她以与宋子文同样的速度很快吃下了一份大牛排，而我还没有来得及吃完我的那一份。午餐后我拿出我的全景望远镜朝花园瞭望。她很好奇，问我是不是甚么新玩意儿。我请她留下作为一个纪念品。她高兴地说那正是她出遊时所需要的。这种望远镜我在1949年送了一个给喀麦隆的王子杜阿拉，现在送了一个给蒋夫人。

董显光早上来访，我和他边用早餐边交谈。因为有迹象表明美国人想在远东重新采取主动，他说最理想的办法是避免一场全面战争，但俟机登陆，占据长江以南的中国。他说我国的红色政权原以为我们在朝鲜战争开始后就会登陆，已准备从沿海后撤，退至兰州。

人们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从朝鲜战争中获得了两大好处，即从俄国得到了免费的武器，和在战争中使用前国民党军队。台湾的国防部次长说，如果实现停火，毛将不会攻打台湾而是攻打越南。1950年时，俄国人显然同意他攻打台湾，但那时毛还未做好准备。

尽管有许多缺陷——“清洁和秩序还远不够理想，自来水总停水，而龙头关上时水却又流了出来，”——但在某些层面上台湾还是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启程离开的那天，参观了一个糖业实验站。他们向我显示，从糖的一种副产品，他们能制作出纸张，塑料，糖蜜酒（我们尝过，味道并不很好），青霉素和火药。

父亲对人们给予他的接待也印象很深：

人人对我都是那样亲热，令我深为感动。在一次外交部长叶公超为我举行的有外交部全体高级官员参加的冷餐会上，我真是十分动情，以致三句话后我已两泪双流泣不成声。我不知道别人会怎样想。在台北，我到达旅馆时，房间内甚至早已摆上了威士忌、干邑白兰地和‘好彩’香烟。

5月24日，父亲返回纽约。在随后关于在台湾所了解情况的报告中，他指出，不仅军事力量有所增强，经济情况也有所好转。这主要是由于政府的开支减少了浪费，和因为有了美援而增加了信心的结果。

在秘书处内部，老一套的摩擦继续令人不快：

亚历山大告诉我，赖伊即将提出一项改组秘书处的计划，只留三位助理秘书长：一位法国人，一位英国人和一位俄国人，各辖几个由一位主任领导的部。按赖伊对其副手的使用情况看，当然不需再设副职。他本可以自己担任一切而不必有副手。

当赖伊问起我的意见时，我说最好讲求助理秘书长的品质而不是数量，办法是对人数较少的副手给以更高的薪水，尽管薪水不是衡量工作能力和声望的尺度。赖伊回答说，如果付给一个人高薪，就会提高他的声望。但是我说，我们会为这种高薪遭到人们的非议。

关于计划本身，俄国人会希望保有一个主管安全理事会事务部的“副职”，但主持行政的大国绝不想让一名俄国人掌管托管部。同样，他们也不会考虑将非自治领土的业务置于政治事务部之内。我们可以将它们置于经社事务部，但不能将这个部门与托管部门分开。此外，新闻部门从来都不带有政治性质，要将其置于主管政治的副手之下实在不是上策。我们不能将更多的部门合并在一起，如果我们说我们能这样做，定会遭到批评。最好的办法是设一个“副职”，下设几位主任，而不是将所有的部门都由三个副职分管。

赖伊警告我们说，如果我们对计划说三道四他将“饶不了我们”，但如果协商委员会或第五委员会徵求我们的意见时，我们可以表示自己的看法。

亚历山大告诉我说，在秘书处内只是对秘书长有些看不起，但接着又说，本奇个人对我很有好感，会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我。今天，9月26日，是克尔诺（伊万·克尔诺，法律部主任）的六十岁生日，也是他在联合国任期的终了之日。赖伊对他实行了年龄的限制而对普赖斯和佩尔特则又另作别论。多好的一份生日礼物！对赖伊独裁作风的不满扩大到了他在政治方面的表态：

在今天举行的助理秘书长会议上，他说共产党人在不择手段地谋求控制世界而全不守信用。我几乎要当众向他指出这就是中国人自1946年以来所一直在讲的论断。当我在为克尔诺举行的鸡尾酒会上向他说起这一点时，他似乎不太喜欢我的说法。

今天早上的《纽约邮报》暗示赖伊将于1954年2月1日不再担任秘书长而改任挪威总理。午餐时他告诉我们说，他没有说过那样的话，并说他还可再干两年，因为他知道如何拉到表决的票，但是如果有比他更好的秘书长，他就会离去，等等。我还从未见到过像他这样自高自大的人。

就当时而言，至少父亲自己的一生看来还是无可非议的：

亚历山大的话是对的，那天他说我一点烦心的事也没有，因为我一生都很幸运，而且事业有成。

至于父亲在婚姻中的不幸，则并未令他感到苦恼，反而是有助于他事业上的成功。

在美国，一桩有关尼克松的醜闻竟使他乘机作了出人意料的说明：

尼克松被民主党人指控曾自一个美国集团得到一万八千美元。人人都认为继续让他作副总统候选人对艾森豪威尔不利，因为艾森豪威尔的竞选被认为是一次整肃腐败的进军。然而尼克松在电视上长达半个小时的一番解释，对美国公众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效果。演说并无法律上的推理，他避开了主要问题，但是巧妙地利用了普通美国人的感情。他谈到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谈到他的狗，谈到他的妻子没有貂皮大衣，谈到阿尔杰·希斯，谈到华盛顿的腐败，等等。看来结果倒使他更受欢迎而且比以前知名度更高了！

在10月2日的一次鸡尾酒会上，父亲的自负得到意想不到的奉承：

法国代表皮尔翁忽然提出我应当得到三级荣誉勋位勋章，并说他会去想办法。我告诉他，作为一名国际官员，我是不能受勋的，并告诉他我在与马泰尔谈判之后得到三级勋位勋章的故事。在那一次，我婉谢了三级绶带荣誉勋位，竟使我的后任得到二级荣誉勋位勋章。

在华美协进社于华道夫饭店举行的慈善募捐宴会上，父亲对杜威和一位莫里斯·穆尔夫人的演讲之精彩倍加赞扬：

演讲既令人有些压抑也令人欣慰——令人感到压抑是因为当时的气氛和演讲本身的调子使我们不能不感到现在中国已只剩下台湾和海外的华人；令人欣慰是听到美国人对我们仍抱有信心。穆尔夫人的结束语十分巧妙，她要求美国人不要对我们行善，或者为我们难过，而是径直打开门户，向在这里寻求庇护的中国知识份子伸出援手。

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为来自非洲托管领土的部落酋长们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他们是来联合国参加托管理事会的一次会议的，于是为他们举行了一次招待会。这些酋长们穿着色彩极为鲜艳的服装，对参加这次集会显然是颇为激动。他们中有些人在自己的部落中是被奉为神明的，因而除通过他们的中间人外，不准与凡人交谈。我和我的哥哥毫无拘束地混在他们中间，并设法让这些“神明”忘却他们的身份，不久他们就撇开他们的中间人直接与我们交谈起来。

到1952年底，麦卡锡的政治迫害使联合国像美国生活中的其他机构一样大受影响。越来越多的联合国官员被找去为他们的政治联系作证。那年父亲带哥哥和我去本奇家与他们全家共进感恩节晚餐。他们住得离我家不远，我们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和儿子十分友好。本奇表示对政治迫害有些害怕。虽然他从来也不是一名共产党员，但当时那种歇斯底里狂潮很可能把一个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学生时代与社会主义沾边的人牵连进去。父亲记述到：

杰克·哈里斯被麦卡伦委员会²召去问话。他令奥康瑙尔大为震怒，因为他对他提出的问题，问他是否是共产党员，拒绝回答。于是奥康瑙尔说他肯定就是。并说联合国已经受到共产党员的渗透。我们有二十位以上的官员在等待被委员会找去问话。这将使联合国对美国人留下很坏的印象。美国人总爱夸大事实并对事情一概而论。

迫于公众舆论，赖伊决定对那些根据宪法有权不回答委员会讯问的官员给予特殊假期。后来在10月份，赖伊又宣布对他强令休假的十人中的三人予以解除临时合同，说他已得到了有关这三人的机密报告，以之作为他作出此项决定的根据。父亲有段记述说：

金利赛德送给赖伊一份备忘录，建议他将此问题提交大会。赖伊退回了这份备忘录，批语是：金利赛德是个好人，但从未涉足政治。他说：“如果我听从了你的建议，我知道我现在会是甚么处境。”

后来，乔治·皮科（负责社会事务的助理秘书长）解释说，赖伊的转向是受到普赖斯威胁的结果，普赖斯说如果赖伊不采取行动，他就得公开辞职。普赖斯又说，那样一来他就要看看参议院对提供联合国资金会如何投票！普赖斯后来问我是否知道被委员会提名签订永久合同的中国人中有没有共产党。我答应就此问题去了解情况。这些日子对联合国有一波进行无端指责的浪潮。

美国选举的结果令人多少感到满意：

曾预料，如果艾森豪威尔当选，那会是压倒多数的胜利；而如果史蒂文森当选，则只能是一个微弱多数。对艾森豪威尔的投票结果显示，美国人民对杜鲁门政府及其对朝鲜及中国外交政策上的丢脸已感到厌烦，想看到改变，即使是牺牲其当前的繁荣亦在所不惜。甚至那些农民和工人也都投票赞成改变。这是民主实践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也曾预料所有的人都会团结起来支持当选的总统而不管他是谁，事实正是如此。我还认为美国人比较容易团结一致支持艾森豪威尔，他已使他的政党团结起来，并将取得南方民主党人的支持，而史蒂文森则办不到。每个人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史蒂文森在智力上较为优越，但艾森豪威尔名气更大，更接近普通百姓。妇女们投艾森豪威尔的票，因为她们更凭她们的直觉。艾森豪威

²为防止对美国政府的忠诚有问题的美国人在联合国工作而设立的委员会。

尔主张的是改革积弊的运动，史蒂文森主张的则是‘艾契逊式’的遏制政策。而这是不受充满活力美国人欢迎的。自然，对选举结果中国人是感到高兴的。

1952年11月16日，又有了惊人消息，赖伊宣布辞职：

这些天来在联合国真是人心激动！当赖伊宣读他给我们的信时，他动了感情，竟至落下泪来。乔治·皮科料定他是个很好的演员。当他读完信后，我第一个发言。我说事情来得这样突然，由于不了解背景，很难发表意见。赖伊说他不是在徵求我们的意见，因为他的决定已经是最终的。

起初，我以为他的辞职是使他自己得到重新确认的手法，因为继任者还无法找到。然而，我接着就听说他已经与一家美国公司签了一份合同，出任报酬丰厚的荣誉职。赖伊对俄国人对他的态度，对得不到其他大国的支持，对麦卡伦委员会、第五委员会和协商委员会，对美国施压解聘某些美国官员以及对解决这些问题时遇到的困难，都抱有反感。由于他有了新的职业，所以在此危机四伏的时刻离开联合国，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并且他还可以被尊为英雄，因为他提出的所以要辞职的原因是希望此举能有利于朝鲜问题的解决，好像这样会对苏联的态度产生一些影响。如果五大国不能商定一位继承人，他还可以同意留任，那样他的地位就得以加强。在联合国了解候选人情况的人多属意于恩泰扎姆（伊朗外交部长，是父亲自大学时代以来的朋友）。中国当然要投票反对任何印度候选人。

一位遭到麦卡伦委员会指控并被解聘者的自杀使秘书处乱成一团：

本奇全然不知所措，脸色极为可怕。他曾协助赖伊起草宣布自杀事件的文件，内中明白地攻击麦卡伦委员会肆意诽谤。此项声明显然不会令委员会感到高兴，有三位参议员后来说这个声明是不负责任的。我不认为美国政府迫使赖伊解雇三名美国人之事错在委员会，赖伊决定解雇他们也无错误可言。麦卡伦委员会是想处理温特劳布、法勒和本奇，但只想有了百分之百的把握之后再动手。也许法勒听到了甚么，宁愿自杀也不使联合国受到损害，只不过照一般老百姓看来，自杀本身等于是承认自己有罪。

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实情。今天要为法勒和魏茨曼举行追悼会，但我不想在自己的生日这天前去参加。另外，法勒一向赞成接纳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当决定请我们的共产党政权出席第一委员会和安理会发言时，他高兴得像个孩子。而，有人告诉我，他也赞成联合国在朝鲜进行干预，这样说来他本人并不是一名共产党员。

11月底，赖伊宣布他已决定调本奇从事为他起草演讲和声明的工作。父亲记下的是：

他问我有何意见，我说，我认为他会做得很好，不过他那咄咄逼人的口气不太适合于秘书长，而更适合于美国选举的竞争场合。有关法勒自杀的声明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本奇在法勒死后情绪低沉，认为共和党也许与他作对，但艾森豪威尔最近对他的夸奖——“政府怎么能让你走呢？”——又使他恢复了信心。他或许现在已认定他在联合国将控制一切！

秘书处内部的动荡也使父亲感到自己的前途未卜。他在1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

昨天，在我为外交部长叶公超举行的家宴席散之后，刘锴说他曾告诉叶外长我已为报效国家做好准备，一有需要即返回台湾。叶外长答称，我应接替他的职位。刘告诉他我并无意任外长，但很可以当驻法大使。我想刘是愿意取代我的助理秘书长职务，但他不是那种背着我要阴谋的人。至多，他的解决办法能引起各有

关方面和国家的注意。当我告诉他与本奇有些难以相处时，他看上去很不高兴！一个美国黑人和一个有着老传统的中国人竟是如此不同。我真想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下去。

在父亲看来，他在联合国的前途取决于赖伊的去留：

如果他留任，要我离开我并不介意。如果恩泰扎姆入选，我宁愿留下。

有的时候，他的遐想会比他天性中更为实际的一面对他起更大的作用。他在日记中表白说：

我想如果我有足够的钱供作开销，在巴黎我会干得很好。我能成为自清朝的曾纪泽钦差之后最受欢迎的一位中国大使。而且在法国，私人关系在官方工作中是大有裨益的，不像在莫斯科那样。我是在法国开始我的事业的，也许我会在那里走到我事业的终点！

然而他又一次成为赖伊事事拖延的受害者：

一天他对我们说，如果他们决定不了继任人选，他将留任。另一天，当报纸发表俄国人将提名波兰外交部长作为他们的候选人时，他又说他宁愿离去！由于大会到2月才休会。那才是决定他的继任人选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我将无法与视察团一起去太平洋地区，因为如果有新秘书长上任，我必须在场。

在美国，麦卡伦委员会使在联合国总部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现在，由于委员会揭露的种种问题，使美国国内的反联合国情绪如此高涨，以致唯一接待联合国总部高尔夫球手们的高尔夫俱乐部已来信通知我们不能再去了！

就在这时，重返台湾的可能性看来已略有端倪：他在12月份写道：

我与叶公超在伏牛花饭店共餐，他要我接任他的职务。蒋介石对我的台湾之行颇感满意，我走后曾对他说起，如果我已不在联合国秘书处，应该回台。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叶公超已不想再干下去。我回答说，我愿意在任何地方为国家效力，对回台我并不反对，只要在我离开纽约之前任命一位助理秘书长即可。我又说我不想作他的继任人，但会很高兴担任另外一个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职务，比如说一个混合委员会；我还说，如果是临时职务，我可以向联合国请假。但叶公超除了请我继任他的职务外，并未提出别的建议。他告诉我，如果内阁改组他不打算留任。他似乎认为我将留在联合国直到合同期满。

父亲终于坚持他的决定，未与视察团同去太平洋地区，这部分地是由于他始终认为如果秘书处有甚么变化他应该在场，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参加视察团，依靠管理国来进行工作已不再是一件愉快的事…

…这些管理国想控制一切。视察团的成员现在已越来越成为管理国的工具，或至少是人云亦云的老好人。

秘书处内的生活也许并不舒心，但至少在1953年一些事件发生时，他是身临其境的。

斯大林之死——哈马舍尔德出任秘书长——朝鲜停战

整个1953年麦卡伦委员会一直在进行调查。有些在实施第五次修正案之后被解聘的美国人要求上告行政法庭，并在秘书处内募集捐款以支付有关的诉讼费用。

问及父亲的意见时，他未置可否。一份建议捐款可以不记名的传阅函件也未能说服他：

我之所以未捐出一分钱有如下理由。就哈里斯一案而言，有些证据表明他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若是帮助他岂不成了笑话。第二，我出席了决定解雇那些拒绝回答某些问题之人的会议，因此我现在不可能再去捐助反对这项决定的上诉。不管怎样，如果我对哈里斯进行捐助，我就得捐助我的部门中的其他人，谁知道还会有多少这样的人。不论怎么说，他比我富有。普赖斯认为这件事完全是共产党的花招。

父亲为他的决定找出了理由，并消除了任何不安的心情。他的论点是，那些捐款者所持的理由是有问题的，他们要么是犹太人，表示与哈里斯休戚相关（哈里斯的名字是1938年从哈克维茨改过来的），要么是心存恐惧，急于想以此作为试探。不然的话，就是亚历山大迫使他们捐的钱。

好像父亲还需要进一步让人们相信他的理由，他在后来的几个星期中刻意记下了他所遇到的每一件“美国不安定”的事例：

勒斯伯爵夫人告诉我，她的儿子朗，每年收入达十万美元，自得了脊髓灰质炎后必须拄着拐杖走路，但性能力是完全正常的。他不得不与他那美丽的，出身名门，修长而年轻的妻子离婚，因为她酗酒、殴打他，并跟一个黑人音乐家有一个星期消失得无影无踪。显然艾森豪威尔夫人也嗜酒如命，常常大醉。在东京，曾发生一起美国军官的妻子用刀刺死其丈夫的案件，而最近有无线电广播报导说，有个儿子要用啤酒瓶杀死他的母亲，就因为她拒绝给他六美元以支付一间屋子的房租！

二月间，由于出现了一个不祥的新情况，“秘书处内产生了极大的骚动”。美国人忽然都被要求填写长长的调查表，说明他们的过去经历，并提交指纹。父亲担心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会照此办理，这样一来，只有那些经其本国政府批准的人才能得到任命。

经验告诉我，像亚历山大之类的人，并不遵从其秘书处上级的指示，而是随心所欲，藉口这是为了联合国的利益。按照普赖斯的说法，秘书处内所有持反对意见的人，均系受到外部共产党势力的操纵。红色份子与非红色份子之间的斗争是无处不在的，甚至在我们这里的日常生活中也一样。上次助理秘书长会议上，赖伊反对了一项认为忠于自己的国家不会与忠于联合国产生矛盾的修正建议。这样的矛盾在美国人中也许并不存在，但就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公民而言则是极可能

存在的。

2月初，有好消息传来，报纸宣称美国对台湾采取中立化的政策已告结束。父亲写道：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允许中共前来接管，只不过说明我们已不再被禁止对大陆发动进攻。麦克阿瑟对这一消息感到高兴，不过艾森豪威尔的决定和态度上的改变正在引起不少的争议。

在秘书处内，父亲感到这项消息加强了他本国政府的声望。他写道：

秘书处的成员似乎对我更加尊重，而赖伊尤其变得异常友好。美国报刊在多年给我们抹黑之后，现在对我们的态度也显得有些好转了。史蒂文森去了台湾，对我们取得的进步表示钦佩，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意义最为重大的客观事实。这同他在竞选运动时的演讲大不一样，那时他主张忘掉中国，由印度取而代之。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所取得的进步可能是远东若干世纪中最重要的历史成就，而台湾则是自由世界的太平洋防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53年2月，斯大林逝世，不过俄国官方声明他的继任者们将不折不扣地奉行他的政策。全世界都在等着瞧，斯大林之死是否能使毛泽东有更大的独立余地，以及他是否会结束在朝鲜的战争和终止援助越南，以换取中共进入联合国。

父亲的感觉是，就联合国而言，苏联不会放弃其在任何事情上的立场，而且很可能比以前“在国际上更难对付”，以此来表示并不软弱。

然而，到了4月份，人们清楚地看到，俄国人正处在其历史上的十字路口。父亲宣称他还从未见过一个国家如此之快地改变了它的对内对外政策路线，尽管他已预见到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侵略行径，“因为共产党人向来是以征服世界为其目标的。”

然而在当时，俄国的新领导人马林可夫似乎正有意取悦于其国人和世界其他国家。对被击落的英国驾驶员之死表示了歉意，在裁军问题上也正在提出修正案。在苏联内部，食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已被降低；对某些罪犯也实行了大赦，有九名犹太医生获释，并对其审判进行了谴责；马林可夫辞去了共产党书记之职，任命了另一个人担任此项职务；贝利亚已被逮捕。正如父亲所记，俄国将军们开会批准逮捕贝利亚表明军方的势力日益增强，克里姆林宫正存在着权力之争。他还说，“在我的记忆中，这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会议在俄国举行。斯大林是绝不会容许这样做的。”

1953年当人们提到本奇的名字与一个研究南非种族隔离问题的委员会有关时，父亲就与他有了进一步的龃龉。后来他们又问父亲本奇的离去会不会影响他的部门的工作。他在日记中抱怨说：

赖伊和本奇就是这样。当他们需要我时，他们就记得还有我这个人我的权利！他们十分清楚，在我的部门中，没有本奇我也一样能照常运作。自从他由巴勒斯坦载誉而归并赢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他对这个部门就已不感兴趣。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会见重要人物，准备讲稿和答复信件。他的下属遇有和本部门有关的紧急事务时，要见到他已不可能。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树立自己的形象以便于日后担任天知道的甚么角色，因为他不会再为其本国政府，也不会为黑人的事业效力。他无疑是在为出任另一个国际调停人的角色作准备。有一天曾有人说，他现在为黑人的事业所做的只不过是这个人仍然存在。赖伊有一天对我们说，秘书处只有两个美国人将阿尔杰·希斯列为介绍人，这两个人乃是本奇和富特！

父亲并非是唯一一个批评本奇的人。他在5月间写道：

亚历山大对本奇的行为感到很不高兴。他私下对我说，他认为本奇是在妨碍本部门的工作。他已有五年不曾阅读任何文件，然而如果有任何不如他意的事，他还大为嫉妒。他外出作演说旅行，亚历山大几个星期都和他说不上话。他想贬低亚历山大的工作，以使自己显得更加重要，好像这个部门缺不了他，而实际上有他在，反而做不好工作。亚历山大真倒霉。

在秘书处内，哈马舍尔德终于被任命为秘书长。赖伊把他描绘成非常一本正经和有贵族气派，是个精明的人，但和人们并不接近，对经济比对政治更感兴趣。那些属他直接领导的人则说他精神高尚，富有智慧和孤高不群。他似乎患有忧郁症和有孤独感。父亲写道：

有传言说他还是个同性恋者，因为美国人不能理解他到四十五岁竟还是个单身汉。赖伊还暂留在联合国以俟哈马舍尔德熟悉工作。他向哈马舍尔德建议应将他带来的林特任命为主任秘书以代替科迪埃。赖伊的为人就是这样，能够如此对待

科迪埃这个对他如此忠心耿耿的人。

8月份父亲又记下：

我们正处于一个蜜月时期。秘书处就像是一个为了娶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而与所恨的妻子离婚的男人，这个女人具有他的前妻所缺少的所有良好品质。也许哈马舍尔德只不过是在设法给人一个良好的印象。与赖伊不同的是，他在食堂排队买饭并和大家一道乘电梯。他与每个人进行个别谈话，为的是像他所说的了解我们的问题和个人的处世哲学，并建立一种集体精神。他说我们已在联合国的共同理想下团结在一起，并说，就秘书处的工作人员而言，他将保持秘书处的自治。这在从未被当作人来看待的秘书处成员看来，简直是好得难以令人相信。

昨天他将我叫去，我们谈了有半个小时。在会见结束时他说，他的办公室随时都欢迎我去。他要求我对他坦率，我答应一切据实相告，即便是对他进行批评。我劝他一切听其自然，而如果他有某些特有的作风，我们就应该去适应，因为我们人数众多，不能要他来适应我们所有的人。他说他对赖伊的重组秘书处计划至少在一年内无法作出决定。他还说瑞典人和中国人一样，有古老的文化，都必定花时间去思考之后才会采取行动。最好是慢慢来，但要看得准。

我告诉他我和赖伊已达成谅解，如果共产党中国被接纳进入联合国，我即不会再待下去，这项谅解在他与我之间仍将有效。他说赖伊曾向他谈及此点。报纸上有传闻说艾森豪威尔解决远东问题的条件是，在目前分界线以北八十英里一线将朝鲜分开，在印度支那停火和台湾由联合国托管。父亲写道：

对我们来说，这将是侮辱加伤害。与往常一样，美国人在看到我们已不大有用时就开始往我们身上抹黑。在华盛顿，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已没有机会再次征服中国，蒋的政府也不好。联合国大会已为我方李弥将军在缅甸的行动通过了对我们的谴责。我们完全陷于孤立，只有中国投了弃权票。

除此之外，又加上越共在中共的帮助下，朝着泰国的方向，对老挝采取了攻势。有些报导指出这是与共产党人在朝鲜的和平攻势同步进行的。

然而至少在秘书处内，事情在继续朝好的方向发展：

这里的气氛真是大有改善，新秘书长与赖伊竟然如此不同。他坚决主张我们在助理秘书长会议上可以讨论任何有用的事情，并要求我们提出共同关心的问题。赖伊已两年没有这样做了。秘书处内每个人都感到鼓舞，要好好工作。我认为个人的忠心会使我们和哈马舍尔德连结在一起，并将进一步加强我们已有的对联合国原则的忠诚。他谈到的有两点与我个人有关，即，他只在考虑成熟之后才作出人事变更，和年满六十岁的人如若有用并且无人可以取代的可以留任。因此，除非中共进入联合国，我的地位似乎比赖伊领导的时期还要稳固。

6月，父亲记下了一次与马克斯·比尔及乔治-皮科共进午餐的情况，他们二人刚刚和哈马舍尔德一起由日内瓦返回。

他们二人对他赞不绝口。乔治-皮科说，哈马舍尔德自己撰写讲稿的和即席发表的几次演讲，在日内瓦很受欢迎。瑞士人恨赖伊，他自高自大，曾经劝说不要在日内瓦举行联合国大会，理由是日内瓦太小，街道太窄，等等。比尔说新闻记者们也恨他太自高自大，并说，哈马舍尔德是同性恋者的谣言是赖伊本人散佈的。他的话暗示那对哈马舍尔德来说，反而有好处，因为谣言出自赖伊之口就没有人会相信。乔治-皮科的感觉是，哈马舍尔德完全没有性的需要。比尔和我同样认为他是现有最好的秘书长，因为他是绝对地无党无派，秘书处内他一个人也不认识，而其他人选则不是这样。

7月间，哈马舍尔德手法高明的声望，由于他最近在一次欧洲记者招待会上的表态，而受到了玷污。当时有记者问他是否将接受赖伊关于在必要时接纳中共加入联合国的备忘录。而在六月，美国参议院曾一致通过反对准许其加入。哈马舍尔德答称，他会接受赖伊的建议，但就心理环境而言，有个是否可行的问题须加考虑…

秘书长还发表声明谴责李承晚释放战俘，说他不能总是保持沉默。父亲写道：

我个人认为，他发表的这第一次声明，题目选择得很不恰当，因为他所作的一切都不过是根据联合国的官方意见去找出解决最薄弱环节问题的方法。而且从

道义上讲，他的说法也并不高明。李承晚以他的英勇精神和不可动摇的坚定态度已经变成一个世界人物。他现在受到人们，甚至敌对阵营中人们的敬佩，他们称他为“七十八岁的老总统”。吴国桢昨天告诉我，艾森豪威尔本人曾对他的贴身随从说，他理解李的态度。对于那些捍卫已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业已失败的事业的人们来说，这总算是一种慰藉，并且常被用来与1938年慕尼黑事件时捷克斯洛伐克的态度相比较。我不知道如果蒋介石对马歇尔使团采取了同样的态度，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否会好些。

像往常一样，父亲对一些小的不如意常常是与大问题同等看待的。在同一段记事中，他抱怨生平第一次不得不多付了关税：为进口一支瑞士造的手枪付了三十八美元…

…而这把手枪还打不响！如果我是去欧洲，我可以把它放在行李内而不须付这笔关税。

在他仅有的闲暇时间，父亲正在学习西班牙语。第四委员会的主席，一位委内瑞拉人，只能讲西班牙语，父亲预见到如果辩论变得激烈时是会出现问题的。尽管他长于掌握语言，阅读和理解均无问题，但由于年龄以及他需要考虑进去的其他问题，他第一次感到很难取得进步。

这是我第一个不得不间接学习的语言，不是如我幼时那样，在讲这种语言的国家的环境中吸收它。

1953年8月，朝鲜停战签字，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为召开政治会议进行安排。父亲写道：

盟国以前还从未在某些问题尚未解决，他们之间还如此意见不一的时候签署过停战协议，而且是在对敌方的诚意如此缺乏信心的情况下签署的。美国和南朝鲜签定了一项共同防御协定，杜勒斯与李承晚的一项共同声明说，如果发现共产党一方缺乏诚意，他们将在九十天内退出会议。我个人认为共产党人将会反对不把印度包括在内的关于会议组成的决议，于是我们又将回到原来起步的地方。

杜勒斯的轻率言行与人所共知的错误对美国是帮了倒忙。由于美国的重要地位，即使是些无关宏旨的言语也会影响其他国家。最近就有四件事：在一次新闻界的晚餐会上轻率地提到将台湾置于托管之下的可能性；在德国大选前支持艾德诺；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有可能改变政策，引起了意大利人的不满；以及劝告日本人致力重整军备，这也惹恼了日本人。

然而，面对苏联在朝鲜政治会议的组成问题上的反对态度，杜勒斯保持了“坚定但温和”的姿态。

他在演讲中提出了一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计划，这比艾契逊的任何一个计划都更富于建设性。

尽管维辛斯基在联大的演讲证明苏联的政策并未改变，父亲注意到美国公众本身对他的敌意似乎有所减少，并已愿在他试图幽默一番的时候笑上一笑。很可能有一天美国公众对苏联的看法将会改变，由敌对转为安抚，但这种改变将不会像欧洲公众那样快和彻底。当然，他对我是极为亲切的。逢到有人问起我们是否相识时，他说，“当然，我们是老朋友了。”

11月，父亲去听了一位卡洛热罗普洛斯教授的演讲，题为“联合国法律的形成”，并得到机会指出他对联合国宗旨的一项基本误解。

演讲完毕后我起来发言，并成为唯一受到听众热烈鼓掌的人。演讲者把自己的理解局限于解决国际争端和侵略。我指出宪章的范围要更广，它还试图通过解决所属人民的经济问题来防止冲突于未然。如果宪章能得到全面实施，这些冲突就不会存在。

那年秋天还有两位访问联合国的国际人士也未能令父亲满意：

日本皇储明仁前来看望哈马舍尔德，在饮香槟时各位助理秘书长受到引见。他看上去过于有教养，已全无个性。当我告诉他我父亲曾两度出使日本时，他几乎没有反应。

后来，当蒋经国（蒋介石之子）来此时，哈马舍尔德要我领他在大楼内四处看看，但没有邀我参加他们的会见，藉口是他想给助理秘书长一个国际身份。我

怀疑他实际上是想要显示他在应付所有情况时的独立自主和处理能力，并像赖伊一样，贬低助理秘书长的的重要性。

看来与新任秘书长的蜜月好像已处于动摇之中。在秘书处内部，父亲已听到传闻，正考虑由他去日内瓦接替佩尔特的职位，担任联合国办事处主任，代表秘书长行事。父亲对此事的记载如下：

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哈马舍尔德确有重组秘书处之意，并减少助理秘书长的数量。当然他对我迁就也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愿在此时与国民党人断绝关系，并使日后有可能以一个中共的人取代我在日内瓦的职位，而不让他控制托管部。

在这个问题上哈马舍尔德不想表明他的想法，他太聪明了。他会等待，要到最后一刻才作出影响整个秘书处的决定。当我见到佩尔特时，我告诉他我与这项谣传无关，也没有任何一个处于负责地位的人对我提过这件事。他显得很感激而且放心了。

哈马舍尔德的多重性格开始在更大的程度上显露出来。当父亲为他准备一篇在托管理事会开幕式上的演说辞时，哈马舍尔德将父亲提到托管领土人民福利的一段删去。父亲在他的日记中评论说：

…这正好支持了拉尔对哈马舍尔德的看法，他不是一个关心殖民地问题的人。

…

还有一篇哈马舍尔德在为他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的演讲，父亲也认为讲得不好并且过于深奥，令人难以理解。他与秘书长之间的隔阂正越来越深。

他总好旁徵博引许多作家的话来显示自己的博学，确切点说是显示他的文化，然而接着就解释错了。他过于喜欢制定各种各样的计划，以致当他被选为秘书长时，瑞典的人们显然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再也不必花上所有的时间来研究新建议了！

改组秘书处的计划复杂到如此程度以致父亲说哈马舍尔德是在小题大做：

看来是要取消八位助理秘书长而代之以一位副秘书长。忽然间可怜的助理秘书长们像在赖伊时代一样，又都感到前途未卜了。今天本奇被任命为外交政策协会主席。我怀疑这是否能与他在秘书处的职责相配合。这当然会占去很多时间，而不管怎么说他所剩的时间本来也就已经不多了。

终于，在11月7日的一次助理秘书长会议上，哈马舍尔德宣布了他缩减秘书处编制的计划。这项计划，至少就取消助理秘书长而言，是受了其前任计划的启发。父亲记下的是：

说完后，他笑着补充一句，说这不是讨论而是命令。只有科迪埃不感到意外，而接下来他成了改组中的主要受益者，至少是仍居于现职不变。

几天以后，哈马舍尔德表现出真不愧是善于编制计划的老手，他又提出一份修改计划，将某些助理秘书长保留下来，定为副秘书长。

我的感觉是他想安抚一下助理秘书长们。11月17日，他与我单独谈了一个小时。开始时他说，在人员问题上他还从未遇到过像这样无法收拾的局面。至于我的职位，他重申可以超出年龄的限制保留我的职务，在1954年里无论称谓和职责都不会改变。我提醒他，在他最近的备忘录中，他曾允诺节省一百万美元，但他说这笔钱可以从紧缩某些联合国机构的全球性计划和不填补空缺职位上节省下来。

至于中共进入联合国一事，他认为这个问题在1955年秋季以前不会出现，因为关于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正在进行。然而，他认为在那之后，他们可能要加入。我告诉他，如果他们果真如此，我即将离去。哈马舍尔德说，受托大国不会让一个共产党人领导托管部门，所以他将把会议事务部交给中共。他问我由印度主持托管部门如何，我说他们曾显得过于反对殖民主义。

他计划任命本奇与切尔内切夫（主管政治安全事务的助理秘书长）代表两个大国出任不管部副秘书长。我个人怀疑共和党方面是否会让本奇在秘书处内成为主要的美国人。他的任务将是充当美国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联络人。昨天本奇听到这一计划，并得知哈马舍尔德正考虑让一位南美人负责托管事务，对他必须离开托管部很不高兴。他说他一生都在处理殖民地问题，认为我们的调离托管部是由于那些受托国的挑拨，他们想安插一名听他们使唤的南美人。我一点也没有向他

提及有关哈马舍尔德建议由博哈里主管托管部门的事，然而如果哈马舍尔德真的在考虑博哈里，则本奇的有关受托国的想法也许是对的。有趣的是，一有了他要调走的说法，本奇马上又对托管部门的事积极起来，这在他去巴勒斯坦和获得诺贝尔奖以来还是第一次。

本奇和亚历山大都认为哈马舍尔德将保留我直到中共加入进来，而那还得要有很长一段时间。加罗估计我将待到长出很长的鬍鬚，一直留在秘书处终此一生。我对他说，那实在没有甚么意思，因为我会失去其他机会。既然我的命运全靠台湾的好运，我宁愿出任驻外大使，也不留在秘书处，在这里，除了保住中国的声望和保护中国官员的利益以外，我所做的工作对我的国家没有甚么用处。

江季平（托管理事会中国代表）告诉我，不仅是阿拉伯集团，就连它们的朋友也都对我担任托管部门的领导表示敬重，他们不认为任何别的人会做得更好。一位南美人士将会取得人们的信任，因为南美国家能够改变它们的态度，而如果是亚洲国家，则会受到其它亚洲国家的猜忌。中国代表团认为，如果负责安全部门的苏联助理秘书长不调动，而只将我调离，以便于应付最终任命一位中国共产党人的局面，它将出来反对。

虽然哈马舍尔德说他明年甚么也不会加以改变，并且这样一来我将仍是一个部门的首脑，我总怀疑事情是否会是他所想的那样。亚历山大确信哈马舍尔德早晚不得不辞职，因为他正在用他的计划为自己制造麻烦，那些计划过于学究气而不切实际。许多人都说哈马舍尔德仍然显得太嫩！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即，他已用他的计划把自己置于一个马蜂窝之中，只要大会批准了某种计划，他马上就会作出让步。他常常使用“这样我可以不丢脸”的说法，而那就暗示他知道自己可能丢脸。

12月19日，哈马舍尔德的计划为大会通过，只有苏联集团投了反对票。不久以前与赖伊的重聚丝毫也没有减轻父亲对他的反感。哈马舍尔德也许有过失，但与他的前任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我再次见到赖伊，并与他一起去打猎，他自然是对哈马舍尔德遇到的困难感到高兴，甚至还充满自信地说：“你瞧，有一天我会回来的。”他真是白日做梦！我从未见过像赖伊这样粗俗和自高自大的人。在玩桥牌时，当我问他在叫完剩下的几轮而把自己的牌都暴露之后如何打法，并向他指出记录罚分计算错误时，他竟发起火来。只是由于我的克制才避免了引起可笑的争执。本奇私下告诉我，当赖伊还是秘书长时，他曾设法使他承诺提名他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这一次赖伊单独请他吃午饭以提醒他他以前的承诺。真有这样的事！

吴国桢的反叛——重返台湾——日内瓦会议 ——接纳共产党中国加入联合国受到攻击——一个时代的终结

哈马舍尔德改组秘书处的计划一直持续到1954年，这期间不无一些过火的动作，有人听本奇说，他希望秘书长能够结婚，也让他的同事们缓一口气。尽人皆知哈马舍尔德不管是晚间、夜里还是週末都在工作，有时他的秘书被搞得筋疲力尽时就借来其他人的秘书口述文件。

在政治方面，俄国人正在施展计谋要召开一次包括共产党中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并暗示这样一次会议能够为印度支那带来和平。父亲在他的日记中评论说：

我敢肯定共产党中国参加这次会议不会带来甚么实质性的变化。唯一令人高兴的事是遣返反共的战俘。第一批中国战俘在台湾受到英雄般的欢迎。

2月里，父亲注意到自斯大林死后，俄国人至少在社交场合已变得较易相处。

例如，去年夏天在托管理事会，苏联代表佐洛夫就来参加我的鸡尾酒会，而在以往索尔达托夫是从来不来的。维辛斯基也变得更加随和。有一天晚上哈马舍尔德设宴招待土耳其总统拜亚尔时，维辛斯基正好和我一起离开餐桌走向客厅。我们一起走过整个大厅。我和他谈及俄国文学，他竟然熟记那些寓言和谚语，实在令人吃惊。他接着说蒋廷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团长）是个聪明人，尽管在政治上他当然与他意见不同。我后来将此事告诉了当晚也参加宴会的蒋廷黻。几天后，菲律宾代表团为罗慕洛举行晚宴，维辛斯基也参加了，尽管在巴黎召开大会时他还把罗慕洛称作是个空桶。在为拜亚尔举行的晚宴上，维辛斯基对我说，我看上去像四十五岁，并问我他是否看上去像六十岁。我说像六十三，他回答说他已经七十了。

2月间在一次博哈里举行的鸡尾酒会上，父亲又一次与维辛斯基和他的夫人交谈：

格拉德温·杰布当时在场，他告诉维辛斯基我是个“白卫军”。我几乎要回答说我们是受到一个英国人的出卖。维辛斯基当然知道我是拥护哪一方面的。

在朝鲜和印度支那出现的僵局令父亲感到忧郁，但当那里有些进展时，在他看来又只会是对他们的事业不利。

柏林四强会议达成的唯一协议是与中共于4月份开会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如果西方各大国不作出新的让步，这次会议就自然不会有甚么结果，而即使作出让步，他们也将是遭到欺骗；但这个决议将使法国更愿意安抚共产党一方并延缓批准欧洲防务条约。显然是法国的公众舆论迫使杜勒斯接受这一决议。法国会想尽一切办法从印度支那的困境中脱身，我们从与共产党人交往中所取得的教训似乎并未使其他人受益。

3月1日，在印度代表团于印度大厦举行的一次冷餐会上，父亲遇到了苏联代表察拉普金，这个人使得他比往常更加直言不讳：

察拉普金走过来与我握手，并夸我的俄语说得好，举起他的威士忌酒杯为中国人民祝酒。我也同样举杯为俄国人民祝酒。就在这时他说：“如果你支持中国人民，你一定也支持中国的新政府。”我回答说我不能支持一个杀戮了上千万人民的政府。他说那是外国报纸的宣传。我回答说这一点是他们自己的报纸证实的。察拉普金争辩说所有的革命都有其受害者，但新政府给了人民土地。我说，“还不够”，他回答说，“还将给予更多”。我告诉他不会有足够的土地，谈话就此结束。这是我第一次向一个苏联人公开表示我对毛政权的反对。然而他们应该知道，除非他们愚蠢到了极点，才会认为我会站到他们那一边。这样一来，至少他们就不会产生可能会有的误解了。

当哈马舍尔德将去欧洲十天，要求父亲代行他的职务时，情况就不一样了，起初父亲有点受宠若惊：

这是他第一次要求一位助理秘书长这样做，但也是一项明智的措施，以防万一有紧急事务发生，或者他会碰上甚么意外。

然而，再也没有提起过关于父亲代理的事，甚至在哈马舍尔德临行那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未提及。父亲弄不清自己到底是个甚么角色，就给科迪埃打电话，问他该不该参加招待会，科迪埃告诉他应该参加。第二天，“每日公报”提到哈马舍尔德的起程，但对父亲代替他的事又只字未提。

第二天克尔诺要求代理秘书长为他的新审查委员会致开幕词。他打电话给哈马舍尔德，哈马舍尔德说由我代理。于是我打电话给科迪埃问我到底算甚么，他半嗔恼半开玩笑地说，他会发一份传阅函件给各助理秘书长和主任，告诉他们我是代理秘书长。

次日，安全理事会将要开会，为了不冒犯切尔内切夫，我打电话给他，问他我是否应该代秘书长出席。他说随我的便，于是我决定不去，因为那个座位常常是空着的。科迪埃后来对我说我本该前去，因为哈马舍尔德一向紧密注视关于巴勒斯坦的辩论，并说切尔内切夫不鼓励我去是为了不降低他自己的身份！真是莫名其妙！

在国际局势方面，消息还是令人担忧。

据报导，莫洛托夫在柏林会议上告诉杜勒斯，苏联已将一大批原子弹给了中共。我一年前就预见到中共很可能向台湾投掷原子弹。这对美国舆论的影响当然要比原子弹扔放到他们自己的头上小，并甚至会使西方列强更是打算接受一项不利的妥协。

甚至在美国的报纸上，也有新的呼声要求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一名《纽约时报》驻巴黎的通讯员暗示，在法国有许多人会愿意接纳他们以换取在印度支那的和平，就像是他们不知道共产党的诺言是一文不值似的！

3月20日，哈马舍尔德自伦敦返回：

他看上去气色很好，非常愉快。他一定是对他的秘书长职务十分满意，这个职位使他感到有权有势，并使他能够进行那种他一心嚮往的狂热活动。作为秘书长，他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独裁者，可以比一个民主国家的首相更容易地任用和解聘人员。当他不在时，我能意识到科迪埃是多么珍惜他的秘书长执行助理的地位，这个职位使他控制秘书处内所有的一切。当哈马舍尔德忙碌和不在时，他可以完全享受作为秘书长的酣畅。

在伦敦，哈马舍尔德与格拉德温·杰布在英美联谊会作过一次演讲，他们在那里都表示支持中共加入联合国。昨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批评哈马舍尔德的社论。他的回答是，如果我们要有一个世界组织，那么所有的强大中心就都应该有代表参加，但他已说过，他们的加入是有条件的。这说明他对批评是敏感的，在必要时他会退却。

中国政府与吴国桢之间的争吵在美国也成为头条新闻。被中国报纸斥为与王世杰同谋的吴国桢被蒋介石免职。在反击中，他指出政府独裁和不民主。父亲记下的是：

在台湾，人们都大为震动。吴被开除出国民党，被称作叛徒，说他是利用赴

美之机攻击他已侍奉了二十年之久的蒋介石，等等。这就引起了一阵轰动。我很了解吴国桢，确信他的声明是有意图的。当我在10月份与他谈话问及他抵美后的印象时，他对我说，美国人都同情台湾，但在目前情况下，他们不会帮助我们进攻大陆。

他时下的声明表明他要么是想把这些批评意见作为进行活动的资本，要么是不打算回中国，而希望以他的声明作为政治避难的藉口。不然的话，他就是希望得到美国人的同情，以期有朝一日政府改组，他再以一个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回去。他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中国人不会忘记他对有恩于他所玩弄的卑鄙伎俩。如果他真的成功了，能够以这样一个身份回去，那就证明中国已经病入膏肓，虚弱无能，只不过是美国人手中的傀儡。

在中国政府和秘书处两个地方所出现的阴谋诡计引起了父亲的许多反思。

我听说秘书处内中文科的人们都在谈论，说我是特意要在内阁改组的时候返回台湾休假的。至于他们是认为我有政治野心，还是政府要我回去任职，则不得而知。余作民（父亲的中国私人秘书）在政治上对我寄予很大的期望，他向我建议，如果政府要我出任外交部长的职务，我应该接受。这和传说的我在自己谋求这个职位，仅是一步之差。有可能余作民亲自为我张罗，只不过是希望，如果中共竟尔进入联合国时，他自己可以进入外交部。这次回去他安排在我去台湾的全部时间他都待在那里，而上次他只在我去台湾的头几天待在那里。实际上这不是个令我真感兴趣的建议。现在出任外交部长已没有甚么意思，将会有更多的内外事务令我烦心。

3月28日，父亲在日记中进一步强调了他先前担心的法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意图：

美国报章坦率地披露其忧虑，担心中共会对法国人提出有吸引力的建议以换取被承认和被接纳进入联合国，因为法国人本来并不是必须促使这些实现的。而这样一来，美国就会受到她的盟国的责备，把会议的失败归咎于她，使她陷于孤立。

尽管法国后来照会国民政府请其放心，表示他们将在日内瓦降低中共的重要性，父亲仍然心存怀疑。

他们可以这样说，但是一旦中共在日内瓦向他们提出实质性的东西，他们就会第一个向他们低头。

3月里，杜勒斯向海外报业俱乐部发表讲话，明确了美国对共产党中国及对日内瓦会议的政策。父亲评论道：

这篇演讲当然使反共人士得到安慰，特别是在亚洲，而赖斯顿昨天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也说蒋介石的行情看涨。他的主要论点是，承认中共将会对一千二百万海外华人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些人既没有任何其他的中国政府可以依附，就将会成为中共的第五纵队。我同意他的观点。

在美国和俄国报纸中影响更大的是氢弹的可怕破坏力。父亲写道：

这些报导一篇比一篇更吓人。尼赫鲁感到惊恐，英国人也一样，并建议禁止这些氢弹的试验，因为试验已使危险区以外的日本人中有了受害者。

1954年4月8日，父亲离开纽约回国休假。他记下的是：

我安排去马尼拉和曼谷访问。伯克利·盖奇在那里当大使，而吉达恭又几次从曼谷写信给我表示希望我去看他。

当时，在中国外交界的人士中公开猜测父亲是否会出任外交部长。但父亲并不相信会有此事，他写道：

无疑这说明他们对我的极端关切。在马尼拉陈质平为我举行了宴会。显然抗战时期他在滇缅路发了一笔大财，因为他当时掌管运输。这可以用来解释他的生活为何如此豪华。似乎他在最近已与他的妻子离婚，娶了他三个孩子的保姆。

我们的大使告诉我，海外最富有的中国人是那些移居菲律宾并从事高级职业的人，如银行家与制造商之类。他在高尔夫球俱乐部指给我看第一球座的四位中国人，说他们加在一起就有家财一亿美元。

我得说在这里生活于外交团中间是最愉快的，只有特别热的那几个月不好受。他们经常互访，一起玩桥牌和打网球。不巧的是，我来马尼拉正赶上复活节前的

星期五和星期四，那里的人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有的店铺，酒吧和影院统统关门。大多数人都去了碧瑶。我们的大使只是由于我的到来才从那里返回。

复活节的星期日父亲是在吉达恭的姻兄弟家中度过的。他记述道：

…那天在海边过得极好，从曼谷前往只需两个小时。天气炎热，我们只好站在游泳池中喝威士忌和吸烟。联合国驻泰国的新任大使伯克利·盖奇也在那里，因而我得为他与吉达恭沟通，吉达恭是外交部的欧洲部门主管。盖奇邀请我去大使馆居住，那倒是既令人愉快又可节省费用，但是由于政治原因我不能接受邀请。有天晚上我与吉达恭同去拜访盖奇，他正穿着睡衣，我们喝了不少威士忌。这使盖奇与吉达恭益加亲近。

泰国外交部为父亲提供一艘摩托艇任他随意沿河游览，于是他邀请盖奇同游，而盖奇又带来两位女士，一位霍姆斯太太和一位阿尼鲁·德布那夫人。后者的在场激起了父亲对女性风韵的敏感。他记下的是：

…那是一个广东女子，十二岁时被国王的一位宠臣带到暹罗。人们说她出身于茶馆，后来与那位宠臣结婚，生有子女二、三人。后来他日益变得有同性恋的癖好，于是二人分居，不过仍住在一起。后来他死去，为寡妇遗下一大笔财产，使她可以任意与所爱者来往。这些人中的一个爱上了她的女儿，当即遭到暗杀！安妮（人们都这样称呼她）颇为世俗，穿着讲究，首饰华美。尽管年近半百但看上去仍相当漂亮。可惜她的英语很难令人听懂。我离去时，她着人送来一个银质打火机，上面有王室的纹章，这表明她的见识很广。而且这个打火机是最新型的可以在大风中使用。她眼下的爱侣是在警察界供职的，伯克利和我取笑她说那两艘护卫我们的警艇是来保护她不受我们侵扰的。

在所有的方面，曼谷都适合父亲对优裕生活的爱好：

那里有两个赛马场，几个高尔夫球俱乐部和一些用作妓院的小别墅。换句话说，生活是随随便便的，没有人遵守时间。

若不是《纽约时报》的到来投下了一片阴影，这里的生活可以说是完美无缺。那是一篇有关秘书处内人事变动的报导。

报导透露了在我离开以前大家就已经在说的情况，即，本奇将出任不管部副秘书长，博哈里主管新闻部，科恩任托管部主管，但另外有一点是不曾听说过的，即我将于11月16日达到我的年龄限期，“预计将会离去”。这本来并没有多大关系，不过在我到达那天，有关这篇报导的简介已经发表，所以我在曼谷所遇到的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年纪！

5月12日，父亲在离台去东京的前夕，与蒋介石在台北有过一次会见。

他请我坐在他的对面，但没有与我握手。我说能在他再次当选的时候亲自向他祝贺实感荣幸。他问我能否参加就职典礼，我解释说，我必须赶回去参加托管理事会会议。

正是蒋介石在那时对父亲在自尊上所受的打击有所弥补，他问起父亲有多大年纪，并说他看上去比实际岁数要年轻。

当他问起联合国有何消息时，我告诉他，美国人现在对共产党人的威胁比两年前更加清楚了，而且已认识到如再退让就等于自杀。我还告诉他，所有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的人士都希望政府给他们以服务的机会，并且，如果我们回到中国大陆，我们是应该得到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的。

他说他清楚这一点，而且现在已有许多非国民党人士在政府供职，蒋廷黻就是一例。他说他希望我继续留在联合国。

在香港，对蒋介石政府的批评已更加直率：

我在香港听说，如果蒋介石不反对，胡适同意出任副总统。总统与副总统同为军人和国民党人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正如我向蒋提出的，如果政府不全是国民党人就更有威信。在香港，人们感到政府的政策常是那样愚蠢，以致未能引起一般中国人的赞成和热情。他们要我将这些看法向蒋介石转达，我照办了，但未说出是得自何处。有个人建议应当有更多的政党以便得到人民的支持。我的回答是，中国人恨政党，只关心政府的所作所为。我的印象是，他们认为政府太过于独裁了。他们仍然认为我们只有拥蒋才能得救，但他们希望有更自由的政策。

在香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最富有者，像利荣根和李树藩那样拥有一切的人，与广大贫苦者，尤其是那些逃难来到这里的人之间的鸿沟。难民中有许多年轻女子在夜总会中当舞女。在有些夜总会，并无入场费，你只须每小时付给一个舞女八元钱。那些成功的舞女只与客人待上十到二十分钟，所以走红的女郎可以很容易地赚上八元钱的十到十五倍，当然其中的一部分是给了夜总会。有一名年轻女郎，大概还是个处女，任何事情都肯做，因为她必须寄钱给她在北京的姐妹。她是个良家女子，告诉我她上过大学。

抵达台北时，我父亲及其他旅客已不须再像两年前来那样拉下窗帘。关于到达台北时的情形，父亲记述如下：

包括叶公超在内的一群友人前来接我。这一回外交部没有安排我住在旅馆，也没有外交部派来的人作我的秘书。他们把我当作来自远方的友人加以接待，没有像1952年那样，当作一件大事，因此我可以比较自由地活动。

在香港，有位王太太邀请父亲到台北住在她的住宅里。原来这是台北装饰得最好的住宅之一。父亲由此猜想，今后这位可怜的王先生恐怕要抵挡不了众多友人要借他的房子一用的请求了。

父亲在日记中写道，黄朝琴颇为他的再次当选省议会议员而自豪，这是台北第一次民主选举，选民投票率达百分之八十。

黄告诉我他并无竞选纲领，而只是周游所有乡村。他的名字的读音有点像是“少青”。据他说，正是这一点符合他的选民的想象，给了他们以深刻的印象。说实在的，我觉得有点像是耍马戏。

台北的新市长也已选出，国民党的候选人惨败，也许并不全因为他是国民党，而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候选人。有些顽固的国民党人想要宣布这次选举无效，但蒋表现出他政治上的明智，没有同意。这也许是吴国桢那些信引出的好后果。

父亲看到他的有些朋友和同事，包括王宠惠在内；看到王比他两年前来台时明显见老，颇为伤感。

王宠惠很少外出，精力已大不如前，去办公室时需要用椅子抬他。他现在已很少看书，烟也抽得少了。芳泽的变化并不大，他还保有全部牙齿，打高尔夫，并在来台湾前又结了婚。他还很清楚地记得我和我的父亲。

在5月1日蒋介石为美国人举行的招待会上我遇到陈诚，他要我去看望一下王世杰，他说王世杰被蒋免职时表现得胸襟宽畅，并无怨言，也未发表任何声明。他们赞成这样的行为，尤其是在吴国桢的长篇攻击之后。

当我对王世杰说，看上去在台湾每个人都比1952年更显得愉快和镇定时，他说那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他认为一年之后我们就将捲入战争。他认为蒋经国是廉正的，但不如他父亲开明。我们在台北的军人告诉我，越盟想要占领莫边府就能占领，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为了在日内瓦会议上有一张讨价还价的牌。

陈诚设宴，在座者只有他，他的妻子，叶公超，行政院秘书长和我自己。我们坦诚相对，我对他说，我们应当有个政治计划，以便有朝一日登陆时取得在大陆的所有中国人的支持。其次，我们必须将所有非共产党人士团结起来支持我们，而不仅是只任命国民党员担任要职。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钱用于宣传，并且要与台湾本地人联合在一起，因为如果事情不妙时，联合国将会坚持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

不论走到那里，父亲似乎都听到同样的怨言，反对蒋的领导。

和1952年时一样，这次我与孙立人的谈话还是最为诚恳和最饶有兴趣的。他对老头子一向是很有意见的。这一次，有一天晚上他和叶公超一起来看我，我们一边饮苏格兰威士忌一边谈话。他说军中已有五百起自杀事件，士气也不如1952年了。他指责老头子只任用唯唯诺诺之辈，并且总想要控制一切。在回答我的询问时，他说军队中并不存在性的问题，因为一个人吃不饱和疲惫不堪时是不会想到那些的。

一般说来，台湾的经济状况已有改善。那些中国太太们认为比在战时的重庆好多了，因为币值稳定，可以量入为出。在台湾，每两千人有一名医生，并有七、

八百名牙医。

蒋在这里对卖淫不像在重庆时那样严厉。经历了多年日本文化的影响，风俗已比较随便。在重庆郊区，有硫磺泉浴室，花七十元就可以找一名按摩女，但她并不会按摩。她们只不过是娼妓，不过必须有医检卡。有一个这样的浴室就设在一座天主教堂的隔壁。

父亲最不愿支付超重的行李费，这一回倒是没有出现这个情况，然而他对这次台湾之行愉快印象的最后一笔则是：

在离开台湾时我有五十磅超重行李，并被允许携带超过规定的二百美元。我的行李也未被打开。在中国，只要当权者肯合作，总有办法绕过一切。我记得战时在重庆，为了出国，实际上还可以找人代打防疫针。

在台北，人们常常向我提出的两个问题是：苏联在制造氢弹方面是否有了进展？中共将会于何时以及如何被接纳进入联合国？

返回纽约时，在所乘的“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上，父亲又和往常一样，和美国的女士们尽兴相处……

……她们在一位美国老人讲联合国问题时，喜欢我对她们所提问题的解答。当时她们问我罗斯福夫人与潘迪特夫人能如何相比，我回答说，潘迪特夫人当然更加美丽。她们都笑了。接着坚持要我也作一次演讲。我讲了托管制度和非自治领土问题，并无讲稿，令听众大为欣赏。我的听众比我前面那位演讲人的听众多。在这以后，我变得非常受欢迎，但和讲拉丁语的人们相处就不一样了。由于种族的不同，总有一些矜持。

在纽约，父亲正好与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同时到达。他写道：

美国人把他当作一位他们衷心崇敬的人物来接待：沿百老汇大街抛掷彩带欢迎，在市政厅举行招待会，与市长共进午餐，由哥伦比亚大学授予荣誉学位，等等。回想他在遭受意大利入侵时是如何遭到诋毁，这对我们来说自是一种鼓励。他曾被指控是奴隶主和盗用公共资财（就像康纳利指责蒋介石一样）。而现在他的正义事业取得了胜利。我们愿意看到有一天蒋在战胜共产党时也会受到同样的盛大款待。

然而，印度支那的局势正日趋恶化。父亲绝望地写道：

艾森豪威尔似乎已经忘掉了他所说的失去印度支那的危险。美国人现在说他们不会单独进行干预，失去印度支那并不就是失去亚洲。日内瓦会议毫无进展，英国人似乎愿意与美国人在亚洲防务条约问题上协调一致，但是法国人则并不这样做，他们遇到了另一次内阁危机。简言之，民主国家正在又一次犯同样的错误。所有这些，令我想起日本侵略我国东北，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和希特拉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最坏时刻。美国人自然是比1939年以前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更有活力，但他们都可能在感到厌恶的时候决定退缩回去。

柯满告诉我，在日内瓦会议时，中国共产党人和俄国人在周恩来或莫洛托夫入场时都起立，但不为其他人起立，甚至对主席也一样。他认为红色中国的声望已因会议而提高，许多欧洲人，甚至西德人，也乘与中共接触之机来探讨发展贸易的可能性。

会议显示，反共各国之间并没有一致的意见，而共产党一方则显示出形成了统一战线。法国完成了内阁改组，国务会议主席许诺争取体面的和平（这已被所有的人理解为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否则即于7月20日辞职。

迹象表明美国人也准备抛弃印度支那。柯满大为沮丧。他和我同样认为，如果我们失去印度支那，即使美国人愿意提供军援，战争也会在他的国家泰国进行而不是在印度支那。许多人认为，就军事而言，泰国并无强大的战斗力。美国人必然感到不幸和孤立，但除非有政府的有力领导，美国公众是不想在印度支那打仗的。俄国人的友好姿态使父亲猜不透他们对他打的是甚么主意。他记述道：

察拉普金对我非常友善。他邀请我参加为俄国象棋选手举行的招待会，并向我问起台湾的情况如何。他提醒我要当心，说台湾有可能被从中国分离出去。我答道，在台湾，我们想的是将中国与台湾重新合在一起。他笑着说，那就如同将衣服钉在扣子上。他还对我说，不要忘记俄语，因为那会对我有用！共产党就是这

样来对我表示友好。我听说，就像在香港所听到的，中国共产党对我和刘锴的印象都很好，认为我是忠诚的！

在美国，吴国桢的反政府宣传对国民政府没有好处。

柯满对我说，吴的文章对菲律宾和泰国也都有害，因为那些文章令反共的台湾名誉扫地。他甚至怀疑吴是否蓄意在打共产党牌。我告诉他，我不认为吴是亲共的，他只不过是想给人以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印象，以便在美国的支持下重返台湾。

人们在越来越多地谈论中共不久即将进入联合国，尽管杜勒斯说美国能够予以阻止，而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不得不开联合国。不论怎么说，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在极力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因此看来，至少在今年，大会不会通过接纳他们进入联合国。邱吉尔的华盛顿之行勾起了美国人的担心，怕英国想让共产党中国加入，但美国的反应如此强烈，而且是自发的，以致邱吉尔不得不宣称他的政府在目前情况下将反对接纳。这一点表明美国人真的发怒时，英国人就会让步。

7月21日，。父亲记下了日内瓦停战协定的签字…

…在目前情况下可能争取到的最好条件。不幸的是目前的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钱泰和我都认为，我们的共产党眼下不会采取军事行动，因为越南两年之内将进行选举，共产党会尽一切努力来赢得这场选举。为此他们将在分界线向南越渗透，而在北方装得规规矩矩。当选举使他们得到所要的一切时，取得印度支那半岛的其余部分对他们来说就是轻而易举之事了，因为到那时，那些地方就没有甚么士气可言了。

8月里，他写道：

我终于找到了美国改变印支政策的解释。根据艾尔索普兄弟在他们的社论中的说法，美国军方人士都主张进行干预，但财政部长汉弗莱和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则极力主张谨慎从事，且占了上风。我怀疑如果是杜鲁门处在艾森豪威尔的位置，他会怎样做，或者，1950年时如果是艾森豪威尔处在杜鲁门的位置，他又会怎样做。对政策改变的官方解释是，法国政府未曾要求美国政府进行干预。

令父亲感到有意思的是，当南韩总统李承晚来拜访哈马舍尔德时，他注意到哈马舍尔德对李的待遇是与其他国家元首不同的。

对其他国家元首，哈马舍尔德都正式设宴招待，饮香槟酒。对李则没有这一切。哈马舍尔德是位偏激的中立主义者，可能是对李并不同情。在韩国领事馆的招待会上，当我见到李时，他似乎没有认出我来，但是他的夫人却直呼我的名字并与我亲切交谈，还问起秀英和孩子们，她与她们于1942年在华盛顿时是常常见面的。

4月14日报纸上发表，周恩来和共产党政府提出要解放台湾。周说这是内政，外国不得干涉，否则一切后果自负。父亲评论道：

依我看，这是一种策略，首先是旨在离间美国与其他国家，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想保卫台湾，尤其是现在中共已公开宣告其占领的意图；而且，他们是想以这是爱国和保卫民族的行动为藉口，将中国团结起来一致反美。

8月里，事实证明父亲是对的：

正如我所料，英国人已声明他们不会保卫台湾或将其包括在东南亚条约组织会议所保障的领土范围之内。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则宣称，对台湾的进攻将产生严重后果。因为对澳大利亚而言，当然对纽西兰也一样，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将是对其自身安全的威胁。不论怎么说，英国虽然不保证台湾不受共产党的攻击，但也从未暗示应将其放棄。他们宁愿将台湾置于托管之下，不过没有明确谁是管理国。邱吉尔一年前曾经说过，我们不应听任台湾遭到侵略，听任蒋介石及随同他去到台湾的那些人遭到屠杀。

在秘书处内，有一种说法，说父亲将于次年调往会议事务部。父亲写道：

我与哈马舍尔德商定，如果远东政治局势发生变化，我的问题即将重新考虑。哈马舍尔德认为会有三种可能：中共取代我们，或出现两个中国代表团，或者一个也没有。我问道，如果中共再有十年不加入，那又将如何？

然而他的预测是，主张接纳的压力会越来越大，而在美国，意见可能会突然间改变，就像美国的对德和对日政策的改变那样。我认为情况是不同的，因为美国是战胜了日本和德国，故而有理由改变其政策，而对中共的政策改变则意味着美国的投降。

9月，中共开始炮击台湾近海岛屿。父亲写道：

我们已用空中，海上和陆上的轰击进行报复，美国人没有说明他们是否将协助防御各岛，为的是让敌人摸不清底细。多亏我们的反击，共方的炮击程度已减弱，也并无集中舰只进行登陆的企图，因而我方并不了解其为何开始炮击。也许只不过是神经战的一部分。

尽管周恩来本人已声称有解放台湾之意图，美国人由于担心战争升级，于10月份要求台湾停止对中共的进攻，以使局势不致恶化。父亲在日记中抗议道：

这样一来中共受到了保护！甚至在美国，他们也开始安抚他们。

到10月底，有传言说，即使没有美方相助，台湾也将在翌年在大陆登陆，认为如果共产党行将入侵台湾，最好还是采取主动。

11月，父亲记下一次与叶公超的谈话，叶公超断言美国人主张国民政府占领海南岛，但这要损失部队十万，而蒋介石则想保留这部分兵力，用于进攻中国大陆。

叶公超认为如果我们占领海南岛，中共即无法帮助越共，因为我们可以炮击他们的交通线。他不认为中共会入侵台湾。

11月间，与父亲时而为敌时而为友的维辛斯基在纽约逝世。父亲写道：

维辛斯基逝世那天，我正与德·凯利里共进午餐。因为我有由司机驾驶的汽车，遂同往苏联代表团签名吊唁。有一群摄影者在入口处为我们拍照，凯利里大惊，因为他一向惧怕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我希望我的中国朋友们会理解，一位须与苏联代表团打交道的国际官员做出中国代表所不能做的事并不为过。

同月，北京电台广播宣称，有十三名美国人，包括十一名朝鲜战争的战俘，已被中共判处有期徒刑。父亲不无讽刺地评论道：

这是自中共进攻南朝鲜以来发生的对我们最好的事。美国人大为震怒。甚至连英国人也称之为暴行。这肯定会减少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机会。英国人将停止逼迫美国以谈判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可惜在被判刑的人当中没有美国妇女。那样更会煽起美国人的怒火！

11月5日，他写道：

叶公超已与美国签定一项没有期限的共同防御条约，附则规定双方均可提前一年通知对方予以废止。然而，即使在美国，报纸已开始谈论可能在联合国中有两个中国。

12月中旬，在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要求秘书长设法使被判刑的战俘获得自由后，哈马舍尔德致电周恩来提出要与他在北京会晤，并携胡世泽前往。这一次父亲并不希望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我告诉他，如果我去北京，我就再也不能回来了。我肯定哈马舍尔德明白我是最不适于和他一起去北京的人选。我的出现只会引起共产党人不必要的恼怒，而在我则将是后果严重的。我的朋友们将永远不会原谅我，而我甚至也没有可能见到我在北京的朋友和亲属。

在11月与佩尔特的一次谈话中，他们二人全都认为，尽管有其种种局限，哈马舍尔德仍不失为一位比赖伊强得多的知识分子；他还有个优点，认为自己和其他人一样，都是可以牺牲的。父亲记下的是：

相比之下，赖伊总是过于自高自大，不肯牺牲自己，只是在指望能留下时才辞职的。

然而，一週之后，哈马舍尔德就在秘书处的成员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他写信给所有的高级官员，详细列出了他们薪金和补助金的清单。

根据透露的情况，每个人都加薪一至四千美元，只有我、切尔内切夫和科恩，不但未加，反而减了两千美元！我们当然是大为光火。切尔内切夫第一个去找哈马舍尔德谈话，但无结果。科恩未受到接见，而我还没有要求去见他。如果哈马舍尔德不接见我们，就不但证明他不负责任和缺乏办事经验，而且是个懦夫，毫无

心肝和不懂礼貌。

我有种感觉，但也许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即到头来那将是一大丑闻，要么是由于暴露出他是个同性恋者，要么是由于他的态度或某些决定使人对他的精神状态不无怀疑。我现在理解到为甚么在有些国家这种人是不准担任行政职务的，并不是因为那些行为本身，而是因为他们精神上的失衡。

每当我参加一次联合国的活动，父亲总是警告我，在礼仪上的问候之后，不要靠近哈马舍尔德。他对女人敏感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父亲对秘书长之不抱幻想，显然是在不得不接受降低相当的薪金之后而达到空前的低点。

由于我对他那种对我们任意而为的不公平待遇很是反感，我想到辞去现职，以便另有他就，从而更好地为国效劳。我将此意首先告诉了余作民，然后是叶公超和蒋廷黻。叶、蒋二人，尤其是叶，希望我为国家着想，还是待下去，因为他们怀疑，如果我离开，是否会有另一个中国人得到任命。我于次日见到胡适，他也持有同样想法。叶说我是最有资格担任秘书处内这项职务的中国人。有我在那里，不论我做甚么工作，都对国家有用。不在乎有没有热情。

12月大会结束时，父亲离开了他的那个部门，“心存遗憾但没有不安。”他在告别演说中说：

首先，我有幸与二“本”（本奇和本森）以及其他的人共事。我们组成了这个部门，现在它已经平稳运作。我要称赞他们的忠于职守和对我的帮助。当你们对翻译、解释、记录等工作有所抱怨之际，我在各代表间所蓄积的友好关系则将在我另就新职时对我有用。我要向你们说再见，而不是告别。

就在这时，当我将皮尔翁称赞了一番之后，他提议对我和本奇表示感谢。附议的有将到会议事务部担任阿拉伯语翻译的黎巴嫩人伊塔尼，和委内瑞拉人副主任李瓦斯。

周恩来回复秘书长，同意在北京接待他。如果谈判成功，他将在美国和全世界大出风头。此外，这也能改变美国对中共的舆论。共产党人很可能比希特勒，东条或墨索里尼聪明！也许这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第14章 会议事务部

学习第五种正式语文——苏彝士危机——伊丽莎白的访问 ——赫鲁晓夫在联合国——蒋介石坚不妥协

1955年1月4日父亲出任新的职务——负责会议事务的副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前往北京会见周恩来，争取释放被共产党监禁的十一名战俘，一星期后返回。显然，他对所看到的情况，特别是共产党对艺术的提倡，印象很深。父亲在日记中评论说：

我对他讲，所有的独裁者都是如此。我怀疑他此行是否取得了甚么成果，不过他们至少并未当场把谈判的门关上。艾森豪威尔为了竞选希望人们相信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而联合国则希望藉此挡住美国人的指责。

任何乐观的看法都是站不住脚的。1月20日中共占领了一江山岛，美国被迫采取行动。这次行动虽然具有一定的威胁性，但据父亲看来，更像是一种外交策略，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进攻态势。于宣布愿意接受在中国海域停火的同时，美国舰队驶向台湾，国会并且授权艾森豪威尔在保卫台湾需要时宣战。

这听起来满好，然而实际上不过是促使美国公众舆论接受共产党中国这一既成事实的一种手法。美国人民肯定会气得用拳头槌桌子，而不会认为让步之举合乎道义。

蒋廷黻告诉我，我国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撤出大陈两岛，而保住金门、马祖，并且我国将不对在联合国与共产党中国进行停火谈判行使否决权。不过，如果谈判有所进展，则英国和其他一些盟国在压力下可能会制造两个中国，由共产党占领大陆沿海岛屿。今天，报纸上第一次刊出艾登大意如此的计划。

昨天，纽西兰就沿海岛屿停火问题要求安理会采取措施。人们怀疑中共是否会来出席安理会。我们的命运取决于他们的做法。如果他们在谈判中像和我们谈判时同样机敏的话，他们最终可能会成功。

在中共进攻一江山岛之前，法国的《巴黎竞赛画报》发表了一个星占的大事预测，预言英国女王将于1955年死亡；同一年，美国在和中共关于台湾的战争中将使用原子弹。局势肯定是变化多端的。

安全理事会1月31日要求中共前来商讨停火的邀请遭到周恩来的断然拒绝。父亲在日记中说：

人们从报纸上得到的明确印象是，如果中共同意停火，美国准备放棄沿海诸岛。钱泰估计金门将会在一年之内丢给中共。

父亲所负责的会议事务部虽然政治任务较少，但却是预算最多的大部门。其任务是安排大会以及在全球各地召开的会议，并负责文字翻译、口译、招聘职员、

管理文件、图书馆和印刷。

在会议事务部，父亲除执行一个部门领导人的正常任务外，还得处理一些出乎意料之外的问题。他在3月的日记中写道：

我打算分七十批邀请全体同仁（一千多人）来我的办公室举行鸡尾酒会。沃恩（总务处处长）说那会弄坏我的新地毯和家具，我可以把酒会开在新闻酒吧。他说那也不会让我多花钱。我们倒要看看他说的是不是对。我听说我这个部门的人都非常重视我的邀请。沃恩认为我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表明我是在开销我的业务津贴。我对他说，我完全不是那个意思，我在托管部的时候常常这样做，都和这一点毫不相干。

4月，父亲不得不处理他到任后的第一件严重内部事故。会务处处长米歇尔失踪了三天，最后发现他在一间酒吧里喝酒。父亲记载说：

人们告诉我，他惯于像这样一次酗酒好几天，连他的太太也不知道他的下落。这一回他的失踪之所以受到注意，是因为他手里拿着一些我们需要的文件。由于他一直是一个很不错的工作人员，我安排好人事处长罗伯逊的面前严厉地批评他。米歇尔发誓彻底戒酒，起码暂时戒掉。哈马舍尔德同意不再追究此事，只要医务室主任证明这是一个偶然事件。这个证明在经过体格检查之后开了出来，不过罗伯逊坚持这个证明必须纳入米歇尔的个人档案。作为一种妥协办法，我建议，如果到当年年底米歇尔没有再喝酒，并且表现良好，就把这个证明从他的档案中抽出来。罗伯逊同意了。

7月，父亲到墨西哥休假三个星期。由于感到自己的西班牙语还很不流利，就设法介绍到一位墨西哥女士那里学习，她是个西班牙语教师。他写道：

她在一所大学的教室里给我上课，这使我觉得自己又变得十分年青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穿了一件很不好看的外衣，这次则穿了一身浅灰色的套装，头髮做得很漂亮，裙子的下边露出里面穿着的粉红色衬裙，行动起来显得十分高雅优美。换句话说，非常迷人。

在墨西哥的时候，他挑选住在一个寡妇的家庭公寓里。她有两个女儿，都曾在美国上学。一般说来，他的时间安排得很松闲。他在7月18日写道：

日子过得很快，虽然有点单调，但很宁静。每天早上8至8:30起床，9至9:30早餐；然后学习两小时西班牙语，有时是在房屋对面园子里的长凳上。间或在午饭前到镇上去购物。午饭（两块三明治）是在下午1至2时，午饭后午睡1小时。3:30至5点到大学去上西班牙语课。而后在镇中心的公园散步，买一份《宇宙报》，并且常常是在最有名的博拉德咖啡馆阅读。然后回家吃晚饭；饭后在自己的房间看书，或者去看电影；要不就和两个姑娘及她们的同学聊天或打扑克。我的西班牙语进步很快，不过遇到复杂的事仍然表达不好，而且常常出错。如果我在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待上六个月，像现在这样学，我就能讲得很流利了。

在离开的时候，他发现每天多要了他一块三明治的钱，他很生气。

…每天午饭，即便是她们给我的两块三明治我都不够吃。照她们的意思我大概只应该吃一块。

途经墨西哥城回到纽约，在一次大使馆的宴会上，对人们称赞他的西班牙语讲得好而非非常高兴。他得意地写道：

他们说这简直让人难以相信，是个了不起的成绩；还有一些其他的谀美之词。

所以我此行还是颇有收获的。

回到办公室他立刻就被一些问题所困扰。7月末，宣布了毛泽东的大使和美国的大使为遣返美国战俘和中国留学生的的问题将在日内瓦举行一次会谈。某些报纸猜测他们也可能谈到台湾海峡停火的问题和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之事。

周恩来突然决定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引起了对会谈取得进展的希望；不过这希望很快就由于飞行员们遭受折磨的报告，和传说中共要求有权通过第三国管理所有在美国的中国人所破坏。父亲写道：

尽管周恩来打电报给哈马舍尔德，祝贺他 50 岁生日快乐，并希望保持良好关系，毕竟看上去共产党中国还不可能在年内被接纳进入联合国。

9 月，艾森豪威尔的心脏病发作，虽然这对他下一年的总统选举会有所影响，但父亲认为就台湾而言，倒可能是件好事。他考虑到：

艾森豪威尔越来越变成一个绥靖主义者。如果尼克松当权，对我们来说可能会好些；但作为一个真正的总统候选人，他还太年轻。假如他在大选前有机会执政，并表现出是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将会对我们有利，因为他曾经访问过远东，甚至还制定过中共进入联合国的明确条件。

在联合国内，父亲注意到 1955 年 11 月正在进行的“大宗交易”：

印度代表团团长克里希纳·梅农成功地说服了大会在本届会期内不提出阿尔及利亚问题，这意味着法国将会回转。由于阿拉伯国家不再反对它，法国可能在安理会投票赞成接纳包括蒙古在内的十八个新会员国的一揽子交易，这样就可以使几个新阿拉伯国家进入联合国。他们现在要接纳蒙古并且逼迫我们不行使否决权；然而在台湾，各家报纸都正在大声疾呼，要我们使用。

随着新会员国的加入，接纳中共入会的压力将会更大。因此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俄国人依仗他们的不妥协态度，总能得到一些让步。美国人则不知道怎样做才能在大会选举时不丢失选票。一切都处于飘忽不定之中。俄国人的宣传做得非常成功。而凌驾于其他所有事情之上的则是他们刚刚爆炸了一颗威力极其强大的氢弹。他们肯定懂得如何把这些效果结合到一起！他们可真有一手！

直到最后一分钟他们都在期望中国投弃权票。蒋廷黻针对蒙古的否决是本届会期中的第三张否决票，并由此引出了嗣后俄国的一系列否决。大多数代表团都对我们的否决表示愤怒，并且有在 1955 年驱逐我们的议论。这时，苏联忽然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并提议除去蒙古和日本。于是暂时解除了危机，还把反对日本的否决转给了俄国。不管怎样，自此以后直到秋季大会，我们的地位加强了。这一次，尽管他们还在责备我们，但事情变得对我们有利了。美国是最为烦恼的一个，因为他们一心想帮助日本。

昨天柯满曾建议我们在蒙古的问题上投弃权票，以便能够接纳日本。他说那会得到所有国家的好感，不过我认为这种让步没有用，最好还是等待。原先日本对我们很是恼怒，但是由于苏联在安理会对美国提议接纳日本入会，三次行使否决权，日本的意见就转向了它。

1955 年 4 月，哈马舍尔德受联合国之命前往巴勒斯坦，设法阻止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爆发战争。父亲深知：

……大多数人，特别是在美国，都认为如果有甚么人能在这样的使命上获得成功，那就是哈马舍尔德。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调解人，知道自己需要的是甚么，并且不说冒犯他人的话。苏联人以前支持阿拉伯人，最近也声明拥护联合国在中东维持和平的行动。这进一步加强了哈马舍尔德的地位。

当他到达之时，战争已经加剧，但他从埃及和以色列取得了自我克制的承诺，从而稳定了局势。父亲写道：

对哈马舍尔德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提高了他个人和联合国的威信。

目前已经在议论委之以设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使命。

哈马舍尔德随后接到了此项使命，并委托父亲担任他的“代表”，主持联合国总部的事务。这招致了父亲自己在外交上的问题，保加利亚的代表拒绝和他打交道。哈马舍尔德所面临的乃至中东的有些问题，都有可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父亲记载说：

有一个引起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毫无价值之纠纷的例子，几只山羊从阿拉伯方面越过边界进入了犹太的领土。犹太人扣留了这些山羊，要求每只羊每天付 50 先令以允许它们在那里吃草。帐单高达 251 英镑，比维持一个阿拉伯难民的费用还高。

10 月，父亲去到台北，在那里，话题仍然集中在中共是否打算进攻沿海岛屿，以及他们

如果这样干，美国人将会如何行事等问题上。父亲写道：

如果中共轰炸我们的岛屿，我们就会轰炸大陆，于是他们就来轰炸我们在台北的空军基地，而这就会迫使美国人加入这场游戏。如果我们早先就安排保住我们的岛屿，胜利早就到手了。这就是我们之所以随时准备打仗的原因。我1952年到台湾的时候，曾责备我的一些朋友，为甚么不建设饭店以吸引旅游者。他们回答说，他们待在那里的时间不会很长。昨天，我们的新闻公报宣布我们将开始进行一项建筑饭店的全面计划，并且将成立一个发展旅游业的委员会。这表明在台湾，人们在精神上已经有了变化，他们现在认识到他们将会无限期地待下去。

父亲于1956年1月3日回到纽约，正与英法两国为苏彝士运河问题突然袭击埃及的日子相合。他写道：

我不知道出了此事，当时没有去到我的办公室，而这正是联合国开会直到凌晨5点的那一天。

他对这次危机的评论是一针见血的：

这次袭击是史无前例的；两个大国对一个小国采取行动，事先并未做好充分准备，假借的是一个荒唐的藉口，而且没有达到目的。由于害怕俄国人的“志愿军”，他们又突然停止了。他们所希望的是纳赛尔的垮台和苏彝士运河的航行自由。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反而巩固了纳赛尔的地位，使他比以往更加顽强，同时运河也将封闭好几个月。苏彝士冲突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世界上所有的矛盾——东方与西方，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等各种矛盾的集中表现。在过去，只有地方利益的矛盾，而在苏彝士则所有利害攸关的方面都捲入了。

台北于6月间发生了一起事件，迫使美国人重新估价他们在那里的地位。一名士官射杀了一个偷看他太太淋浴的中国人，该士官被宣判无罪，从而引发了一波骚乱的浪潮。父亲写道：

暴乱是自发的。有一万到三万人抢劫了美国大使馆的各个建筑，撕毁美国国旗，等等。虽然美国人认为那些聚众闹事的人是共产党的蛊惑者，但中国当局则肯定骚乱不是有组织的。迄今为止，台湾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游行示威反对美国的国家。这次事件使那些认为整个台湾毫无疑问是站在他们一边的美国人大为震惊。事件还将使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那些主张重新评估美国对华政策的人更加坚持他们的立场。这对我们是生死攸关的。他们会强调说，由于他们不能依靠台湾的人民，而且蒋介石也不可能永远存在，所以最好采取现实一点的行动，寻求其他的政策。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蒋介石昨天在无线电广播上说，他对事件负完全责任，并且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纪律。

1957年11月4日，父亲在日记中记录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的情况：

他十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不像是个君主而更像是一位普通的英国年轻妇女。我赞美她的法语讲得好，因为我曾经听到过她在渥太华的议会用法语宣读一篇演讲。她显然很高兴，不过说话很谦虚：“但是我不像加拿大人那样能说两种语言。”我对她说，我以会议事务部负责人的身份请问她，他是否讲西班牙语。她说，不。对菲利普亲王，我说，二战时我在重庆曾经见到过他的表兄蒙巴顿和夫人，他纠正说，他们是他的姑母和姑丈。

在1957年的一次鸡尾酒会上，哈马舍尔德和父亲商量，延续他们的“君子协定”，要他留在秘书处。

他问我继续留在秘书处有无困难。我说没有。他还说，自我接任这个部门以来，士气整个地变得好起来。我说，侥幸能够如此，但是这不能完全归功于我个人。然而事实上，除了谋杀，在我们的部门里，甚么事情都发生过：伪造支票，婚外孕，私生子，一个高级职员进了精神病院，负债累累，在大街上抢劫，还有自杀！

第二天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说，鉴于我的年龄，他不能再给我一个五年的合同。他可以给我一个两年的，他知道这不能使我满意。不过他将会琢磨出一个好办法，我们将在1月份再谈此事。他说没如果我不想留任，他能够理解，并且有可能任命一个日本人来接替我的职位，但是由于我的工作做得很好，他愿意让我留任。

1958年的5月对美国政府来说是一个背月，父亲写道：

就民主国家而言，当时的一切事情都发展得非常不利；俄国的三颗人造卫星

在所有方面都比美国的卫星强，尼克松一行在加拉加斯所受到的对待简直糟透了，而且还有黎巴嫩以及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局势。

国际上的反映和父亲的看法一致：

俄国的人造卫星对美国的威信和盟国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从一开始我就料到其影响会比小石城事件还要坏。在加拉加斯发生反对尼克松的示威游行之后，作出向加勒比海域派遣伞兵部队的决定，简直是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却伤害了所有南美人的感情。

当年晚些时候，父亲的健康问题成了他最为忧心之事。7月，在从横滨到马尼拉的“胡佛总统”号邮轮上，他发现得了胆结石。

在一次和马尔特·布吕塞一起吃饭后十天，我开始胃疼。当时我们吃的是烤麵包和骨髓，第二天马尔特和我都消化不良，她疼了两天，我虽然不严重，但却不舒服了好几天。在招待黄少谷的一次宴会上，我的胃疼又犯了。疼得非常厉害，而且出了一身冷汗，以致不得不退席。联合国的欧文大夫让我做X光透视。透视表明没有溃疡，但十天后，上一次那样的痉挛在凌晨五点又犯了，一直持续了五个小时。每次犯病之后都要发烧两天。

很幸运，我在马尔特举办的鸡尾酒会上遇见法林夫人，她建议我去看斯纳珀大夫。我在1946年做胃溃疡手术之前曾去看过斯纳珀大夫。法林夫人说她也得过胆结石，但不做手术就能治愈。经过四天的X光透视，斯纳珀发现我有两三块大的结石，每个都有25美分硬币那样大。如果是些小点的石头会好些，不会堵住胆管。他建议我调整膳食并开了一些药丸。他说我的这些石头肯定已经有了很多年，但是以后就不会再发作了。且看情况如何吧。

1958年父亲去到香港。

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来欢迎我，两个小姑娘献了花。这是由于联合国通过决议向在香港的中国难民提供援助，我才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他们认为我能够做一些事情来加速或增加这项援助。在一次欢迎我的宴会上，我说明我不过是秘书处的一名工作人员，援助的决定是那些有关的代表团和国家作出的。在参观难民营的时候，我赞扬了那些负责救助的人员，并且说，要不是我已经知道是在一个难民营里，我简直猜不到这是难民营，因为精神面貌和物质条件看上去都非常之好。墙上的标语把我当作是难民的救星。我不知道几年以后他们是不是还会这样热情地欢迎我！

父亲在日记中还提到我的母亲，尽管不过是顺便提及；这在他的日记里是很少见的：

秀英今年冬天要一直住在香港。她正在进行针灸治疗和吃中药，我希望这对她有益。

随后一年的三月，杜勒斯经诊断患有癌症。父亲写道：

现在，甚至反对他的人也都认为他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了。《纽约时报》政论家艾尔索普说，当人们看到他对马祖和金门的坚定政策奏效时，他的威望提高了。当时艾奇逊、史蒂文森以及其他一些人则都力主放棄这些岛屿。他是一个知道自己需要怎样做，并且在共产党面前坚定不移的人。只有哈马舍尔德仍然反对他和他的政策。在我和艾尔索普共进午餐时，他开始谈论中国的局势，他说，他最近访问印度、泰国、老挝和阿富汗时所遇到的人全都反对蒋介石，不过都没有明确说出为甚么。他认为大多数中国人是接受共产党政权的，中国的难民只代表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另外的五亿人则拥护共产党。

艾尔索普不相信郑宝华的判断，说甚么共产党政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正在崩溃，还说侨居在柬埔寨的华人是支持中共的。我回答说，这些侨民是亲共的，因为柬埔寨政府已经承认中共，而且在其他承认中共的国家里，情况也是如此。这就是为甚么美国不打算让北京进入联合国的原因。我对他说，反对共产党的中国人远比十分之一多。他应该亲自到台湾去看看。

他认为一个可能发生冲突的根源是柬埔寨侵略越南。在他看来，中共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共产党中国取得了比印度更大的经济发展。所以他反对杜勒斯和杜威，而且和缅甸的总理一样，给人的印象是，只有共产党中国成为联合国的会

员国，他才能睡得更安稳。

1959年10月，在和王世杰的一次谈话中，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和失去美国援助的机会，他讲了一段有趣的，并多少有点令人伤感的往事：

似乎是在1948年的某一时间，美国政府鉴于局势的急剧恶化，通过马歇尔将军的中介，询问王世杰，我们是否愿意接受麦克阿瑟将军作为中国的总司令。王电告蒋介石，但是蒋担心麦克阿瑟难以驾驭，在那个分秒必争的时刻，做了一个含糊其词的答复。王还曾建议由亨利·鲁斯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但由于共和党在大选中失败，鲁斯未能派出。王认为麦克阿瑟和鲁斯的结合将会挽救败局，因为他们可以从美国得到更多的援助。

再有，珍珠港事件前，英国曾提议和我们缔结一个十年的同盟。蒋介石拒绝了，因为他支持印度独立；而从此英国就总是对我们的事情横加阻挠，并且支持中共。

1959年9月，哈马舍尔德组织了一次欢迎赫鲁晓夫的宴会。此前，在7月，父亲曾去参观苏联人在体育馆举办的第一次国外时装表演。他写道：

自然，这是对在巴黎和其它地方举办的同类表演的模仿，不过没有那样好。模特儿都是年青女郎，身材匀称，但缺乏优雅气质。第二天，我不禁对赫鲁晓夫评论说，苏联是在重新实行阶级制度。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些时装和貂皮大衣不是人人都能买得起的。他说，在俄国没有阶级，不过仅仅一些极富有的人才能买这些东西。他没有领会到我的意思。难道进行一次杀死无数生灵的革命，只是为了在人民中重新引进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平等？据说在俄罗斯，人们现在希望继承他们父母的遗产。

当蒋廷黻告诉新闻记者他已经谢绝参加招待赫鲁晓夫宴会的邀请时，记者问他，如果胡世泽被邀请，他是否会参加。他回答说，作为一个国际公务员，他参加苏联及其卫星国举办的所有招待会；如果不出席，不但会破坏他与苏联代表团的关系，而且会破坏和本部门中苏联籍部属的关系，他们是必须友好共事的。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胡世泽不得不走这种特殊的外交钢丝。

在戴维营举行的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的会谈，虽然只不过粗略地讨论了中共的问题，但在会谈结束时，赫鲁晓夫说：“尽管你们支持蒋而我们支持毛，但是我们仍然是好朋友。”父亲写道：

问题是艾森豪威尔现在已经前往十一个国家访问，会谈和平与民主。如果他提到苏联的宣传所大事渲染的戴维营精神，他此行的结果就将成为在那些没有成功希望的地方传播那种宣传，而花的全是美国纳税人的钱。

父亲的这种怀疑被几个月后俄国人以U 2事件为藉口而取消最高层会谈所证实。他记录到：

将来，这件事会成为国际法手册上的一个典型案例，因为这是第一次一个政府和国家的元首公开承认进行了间谍活动。赫鲁晓夫说艾森豪威尔在苏联不再受欢迎，而艾森豪威尔本来是预定要前去作正式访问的。其后不久，由于难以控制的学生示威，艾森豪威尔对日本的访问也取消了。为填补这段时间，艾森豪威尔最后访问了台湾和菲律宾，如果他去了苏联，这些访问是不会有。他一定非常失望，因为他原以为自己是东西方和睦的缔造者。然而很明显，他正是赫鲁晓夫拒绝与之谈判的人。真是莫大的讽刺！这意味着中共将会心满意足。赫鲁晓夫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在戴维营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对他说，要称他为“我的朋友”，赫鲁晓夫说他差点呕了出来。

另一方面，自从刚果在联合国提出反对比利时军队的存在以来，哈马舍尔德的威信大大地提高了。和往常一样，在各国政府及其政治家们都无所作为的时候，他就不论是好是坏，自己提出主张并策划行动。在当前的情况下，他认为苏联以军事干预支持卢蒙巴是严重的威胁，他那个已被安理会通过的行动计划，据他说，实际上是出于担心可能会引起世界大战。

刚果的局势毫无疑问是十分复杂的，哈马舍尔德需要使出他的浑身解数去应付：一方面是俄国人支持的卢蒙巴，另一方面是比利时人支持的琿比。刚果人自己则是分裂的。我们必须看清事情会怎样发展。无论如何，联合国的成功将大大提

高其威信，而且哈马舍尔德也可能从中受益。但俄国的报纸则把他称作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的工具。

到1960年末，冷战似乎在变本加厉。父亲在日记里说：

赫鲁晓夫不顾他的和平宣言，中止了最高层会谈，他想把联合国架空。在将卢蒙巴强加给刚果的企图失败后，俄国人现在攻击哈马舍尔德。赫鲁晓夫甚至想把裁军问题和它连在一起。他说裁军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要使用由哈马舍尔德领导的联合国武装部队，而哈马舍尔德是站在西方一边的。这样，我们就势必要首先接受赫鲁晓夫的建议，用三个人来取代一个人的秘书长来解决裁军问题。

联合国大会从来没有过在一开始就如此激烈地争论。赫鲁晓夫公开攻击美国、秘书长、殖民国家、以及联合国在纽约的会址。这就招来了美国代表沃兹沃思的回击；这个人可不是好惹的。

我越来越感到有一个中立集团正在形成，它能够在所有的问题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两个对立的集团将日益孤立；而在联合国，将是那些中立国家具有最后的决定权。这次大会的特点是第一次有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古巴，承认了共产党中国。

10月以后，世界局势继续恶化。父亲表明了他的看法：

我觉得就像1932至1938年我在日内瓦时对那个不起作用的国际联盟的感觉一样，一切事情都不对头。然而在国联，只是由于那些控制着它的国家不能或者不愿作出必要的决定，事情才变得很糟糕。而在联合国，美国的控制正日益削弱，因为中立集团正逐渐扩大，并且有时是和苏联集团联合在一起的。这种局面自从1960年接纳那些新会员国以来尤为明显。

赫鲁晓夫的举止简直像个小丑，不过即便如此，那些新兴的非洲国家，虽然谴责他的行为与联合国极不相称，但还是认为那是一种力量的表现，是对自由世界的蔑视。

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国际会议上看到过这样的景象：用拳头砸桌子以表示不同意发言者的见解，打断麦克米伦的讲话，脱下鞋来敲桌子。苏联对哈马舍尔德个人以及秘书处之结构的攻击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只有那些卫星国支持他那个要同时设置三个秘书长并且每个人都有否决权的提议，他进行攻击的结果似乎是使卢蒙巴重新掌了权，因为非洲国家已不再是全体一致地支持哈马舍尔德的行动。哈马舍尔德虽然仍在坚持，并且对赫鲁晓夫的非难答复得非常得体，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可以不丧失其原则的情况下做出一些让步。

父亲对东西方关系恶化的悲观情绪并没有妨碍他对偶尔受到的恭维感到高兴。在哈马舍尔德招待丹麦国王和王后的宴会上，国王问到胡世泽博士属于哪个中国，当他听说是蒋介石的中国时，就要求介绍给他。父亲回忆道：

我是唯一一个被请去和他坐在一起的人，他对我说，1930年他曾在中国停留过三、四个月。我记得他们当时曾经推倒南京的贫民窟，孙中山夫人还曾提出过抗议。我告诉他我曾经到过格林兰。他戴上眼睛来看我佩带的勋章。我禁不住对他说，我还没有一枚丹麦勋章呢！可惜蒋廷黻没有接受这次邀请。否则，就将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中和国王谈话了。其所以选中我是因为我是那次宴会上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1960年12月15日，父亲头一回在一架飞机上度过圣诞节，并且是第一次乘坐喷气式飞机飞行。这是一次全球旅行的头一段。从里斯本开始。他的日记记录了许多有趣的、偶尔也有近于桃色的巧遇。他写道：

在里斯本，弗拉曼柯舞的舞蹈者开闭他们的口而不唱出声音来。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喊的是：沙-沙-沙，借以表示他们所使的劲。我说他们在作爱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做！

在日内瓦的萨夏·德·莫菲塞尔利先生家中，我遇见了几位迷人的女士：德维尔莫兰夫人，巴雷伯爵夫人，范德泽夫人。后面这位想用他的金烟盒换我的日本烟盒，结果她把我的香烟盒拿去，却甚么也没有给我。巴雷夫人则设法逗引我。她很可爱，并且有中国血统。在巴黎，多亏韦尔若，我得以向荣誉勋位团查询，并发现我自1944年就以三等荣誉勋位获得者而记录在案。太秒了！

在罗马，我参加了于焜吉大使举办的一次有趣的自助餐会，一些中国学生唱起“蝴蝶夫人”。另外两个人演奏了萧邦和拉维尔的乐曲，还有人表演了一场一对中国夫妇离婚的戏，其中有由中国电影名字编成的台词。又有人唱了一首美国和意大利的爱情歌曲，唱道：“有多少人的嘴唇亲吻过你，我实在不想知道。”出席的其他一些客人来自台湾，是应联合国之邀到比属刚果去教书的中国人。

2月里，父亲经由新德里前往曼谷和香港，他写道：

在这次旅行所到过的国家中，我发现印度人最不讨人喜欢。旅馆的侍役呆在那里好像只是为了等小费。我感觉到他们的敌意。旅馆配备有成群的侍役，但你却一个也看不见；可是会一个跟着一个地前来对你说明天他不来，意思是希望您立刻给他小费。那里的人们没有责任观念，做甚么事都不经心；拉尔夫妇倒是挺热情，照顾我十分周到。然而，在我离开的前一天，他要我给他买500发子弹，他用一些印度产品作补偿，而这些东西我并不需要。

3月12日父亲回到纽约，虽然他的日记里写的大都是些零散感想，但也有一些有关政治的和具有哲理性的内容：

有一次当我对共产党的威胁发牢骚说，在世界历史上总有一些危险行为来破坏世界的现状，危害人类的生存，那位和我谈话的先生则解答说，不断的威胁是生存所必需的。例如，就洄游热带鱼来讲，在它们游到洄游地的时候只有一定比率的鱼能够成活，而实验则证明，如果引入一条会吃掉一些热带鱼的鲑鱼，其成活率却令人惊奇地大大提高了。

在台北，父亲两次见到蒋介石。一次是在蒋的别墅，他应邀和蒋与危地马拉公使一起饮茶。当时他私下向蒋表明自己的看法，可能有必要在联合国接受两个中国的建议，否则会被迫退出。蒋引用一句中国谚语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很明显，蒋的这种不妥协立场是一辈子不会改变的。

其他人走了以后，他问我对台湾的形势有甚么看法。我对他说，我们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完全要看英国是否和美国投一样的票。他说，是这样。当我说如果我不再在秘书处工作就回台湾来时，他说，他会有许多事要我去做。他还说，我们在联合国的工作很重要，必须坚持不懈。他认为如果情况继续如此，我们一旦登上大陆，共产党就会在中国失败。然而，他没有详细说明怎样才能在那里登陆。

我单独和蒋夫人在一起饮茶一小时，她向我问候秀英和她的健康。她说秀英应该祈祷，她自己每个星期都和大约三十位妇女去祈祷。我们没有谈政治。她送给我三本书，包括她自己的一本画册。

1961年5月，可以看到俄国和美国之间开始了航天竞赛，父亲以极大的兴趣密切关注着那个竞赛的发展，并仔细研究他们所采取的方法的不同之处。

在宣传方面美国人和俄国人的做法迥然不同。俄国人只是在事后才宣布他们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我们并不确切知道尤里·加加林是怎样环绕着地球航行的。俄国人曾向新闻记者们预告有一个或两个人即将出发，其他的则一概不谈。有谣言说那第一个人一定是伊柳辛的儿子，他回到地球就疯了。美国人则相反，事先就宣布起飞的时间，以及所有的延期。很幸运，他们的飞行成功了。

尽管肯尼迪之出任总统得到广泛的支持，但父亲则注意到，新政府的事情，总的看来进行得并不顺利：

肯尼迪的威信正在下降。部分是由于入侵古巴的失败和老挝的事件。他许诺的很多，但是兑现的很少。美国政府为帮助入侵做了所有需要做的事，然而随后在史蒂文森和国务院的建议下又半途而废。美国的支持和俄国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而且未能坚持下去。据宣布，肯尼迪曾相继会见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胡佛等人，可能就是为争取他们对古巴叛乱者的支持。接着佐林举行记者招待会，声称如果有外援提供给反卡斯特的古巴人，俄国将进行干预；自那以后，美国方面再没有提供任何东西。颠覆行动完全失败。肯尼迪最后发表的都只不过是些夸夸其谈的空话。

6月3日肯尼迪第一次会见赫鲁晓夫。父亲观察到：

和杜勒斯时的外交形势相比，变化是如何之大。在那时，这样一次会晤是肯

定会引起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应的。在英国，人们说，肯尼迪好像体现了两个英国人的特点：邱吉尔的讲话和张伯伦的行动！

美国的报纸说这次会晤很有用，给了他们两个人一个衡量对方的机会。然而，赫鲁晓夫在对付人上更有经验，所以在衡量对方上，他肯定会获益非浅。会后，肯尼迪说这是一次沉郁的会见，而赫鲁晓夫则显示出从未有过的兴高采烈，依然像往常那样在地板上打滚和开玩笑。

6月20日哈马舍尔德把父亲召到他的办公室。

我想这可能是关于我的合同之事。我猜对了。他说他现在正处于强大的压力之下，不能把我的合同延长到今年年终以后。我说我并不在意，但他必须和蒋廷黻谈谈。他说他会去谈，不过他愿意事先通知我。他还告诉我他不会任命一个中国共产党人。

哈马舍尔德显得如此急切地改组秘书处，我怀疑他是否是为了争取第三次连任，希望能够被苏联接受，或者至少得到大多数会员国的支持。然而为甚么不可以把某些合同，像科迪埃的和我的，延长到他自己的合同期满？赖伊就会这样做。

父亲在内心里怀疑哈马舍尔德实际上是想在父亲的这个职位上物色任命一个中国共产党人。这一点被蒋廷黻证实了：

事实上，哈马舍尔德虽然向沃恩和我本人表示他不会任命一个中国人，却请求蒋廷黻给他推荐一个人。他在玩甚么把戏？这不会使中立的或亚非的国家满意。我对蒋廷黻说，一定要做到让我的继任者在我离开以前签署合同。蒋廷黻告诉我，美国将不会在接纳外蒙古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上投赞成票，而且不会赞成两个中国的主张。

9月18日星期一，正当16届联合国大会开幕的前夕，父亲早晨醒来打开收音机，新闻广播说，载送哈马舍尔德前往罗德西亚去会见琼比的飞机恐怕已经失踪。

当天晚些时候，一架搜寻飞机在森林里看到一架飞机的残骸。

12点15分，我们终于从电传打字机上收到消息，哈马舍尔德的尸体已经证实是在飞机残骸之旁，和他同行的一共有15个人，包括维施霍夫，法布里，比尔·罗纳洛和兰德小姐，一个加拿大籍秘书。只有一个生还者，是个美国警卫。他说飞机将要着陆的时候哈马舍尔德决定不着陆，随即在飞机内响起几声爆炸，飞机被炸碎。

他们认为爆炸也许是子弹击中油箱所致。这就意味着谋杀。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不知道失事的原因。温尼琴科昨天告诉我，有人从刚果回来说，在哈马舍尔德的飞机最后着陆的机场，为他奏乐的印度军乐队误奏了一首葬礼进行曲。他的死发生在贝纳多特死于巴勒斯坦的同一天，9月17日。

全世界没有哪一个人的死曾引起过如许哀伤，即便是斯大林和罗斯福之死也都比不上。哈马舍尔德是死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死在神秘的环境里，而且他的逝去产生出许多难以预见其后果的问题：他的继任人选，考虑到苏联会坚持要特里斯卡，将是件很难解决的事；加丹加和刚果的局势，如果缺少能够协商出如何去做的明确指令的联合国组织，可能会变得非常危险；而在秘书处，由于许多迫在眉睫的紧急事务原先都是由哈马舍尔德个人独自做出决定，情况只能是一片混乱。

本奇随后以秘书处的名义发表了公报，并没有和其他成员商量，这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在原有的问题之外又加上了一桩。本奇作为秘书长出差到刚果期间的特别代表，认为他能够代表秘书处的全体人员说话，而且他决定不和其他副秘书长商议，父亲写道：

第二天我和本奇谈了一次话，我对他说，我是他的朋友，愿意帮助他，但是我们的同事中有几位对他的做法很不高兴，所以他最好事先和他们商议。两天以后，他在晚上11点半给我打电话，告诉我9月28日在联合国将有一场纪念哈马舍尔德的音乐会。费城爱乐乐团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那是哈马舍尔德最喜欢的乐曲。当时我对他说，我们必须考虑派谁去参加在瑞典举行的哈马舍尔德葬礼。

9月18日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秘书长的逝世。第二天大会开幕，在默哀一分钟后休会。

调查发现，哈马舍尔德的飞机在从利奥波德维前往纳达尔的途中曾经绕了一个大弯子以避开加丹加的战斗机。然而几天之后，联合国和咯坦加当局达成了一项停战协议。父亲评论道：

由此证明这件事即使没有哈马舍尔德也能办成。他总想一切事情都由他自己做，而这就是为甚么这个空缺难以填补的原因，我们似乎不可能再找到像他这样活跃，聪颖，忠诚，而且有主意的人。

30日维斯霍夫，罗纳洛和朱利安（这位唯一的幸存者几天以后死去）的遗体由飞机运抵艾德威尔德机场，秘书处全体人员参加了一个简单仪式。棺材覆盖着旗帜，放在输送车上，死难者的家属站在他们的后面。父亲特别提到：

最后那次出发去刚果以前，维斯霍夫曾拿出一张金额很大的人寿保单，并要求把他埋葬在距纽约五小时路程他的小乡村住宅里。与此同时，哈马舍尔德写了一封信给皮尔·伦德，请他在“必要时”整理他的文件，保存起私人文件，其它的送交联合国。哈马舍尔德在他最后一部著作《标志》中，曾七十三次提到死。好像他们二人对死都有预感。

特别令人感到凄惨的是，后来得知哈马舍尔德可能在飞机坠毁后并没有立刻死去。他的尸体是在失事地点很远的地方发现的，他的手指甲已经撕裂，而且很脏，使人猜想他曾经从机身爬开。关于失事的原因虽然有许多说法，有的甚至是些怪诞的推断，但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解释。

父亲虽在联合国工作，但对它日益失望：

联合国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衰弱。即使是国际联盟，虽然做任何事都虚弱无力，可它从不背离盟约的原则。联合国也是衰弱无力，但是它牺牲它的原则。它在接纳新会员国的问题上已经搞过一次一揽子交易，而在外蒙古和毛里塔尼亚的问题上，在声称反对接纳它们的同时，再次搞这种交易。实际上苏联已经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一切，只不过他们更希望中国在蒙古的问题上行使否决权，以便他们在毛里塔尼亚的问题上也来行使。由于中国没有参加投票，俄国于是在毛里塔尼亚问题上投了弃权票。至于那些新会员国，他们之所以同意只是为了表示谴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他们在其他问题上没有甚么主张，因而常常弃权。这就是共产党会员国在要求俄国不爆炸其五千万吨级核弹的决议上得以使之推迟表决的原因。1961年11月5日，联合国大会最后全体一致选举吴丹为代理秘书长。父亲写道：

这是一个极大的胜利。在国际联盟时代谁能想到有朝一日一个亚洲人会出任秘书长！这表明世界已经有了何等的变化。吴丹比哈马舍尔德更好交际，参加各个国家举办的所有鸡尾酒会。女人们喜欢和他说话，他总是以极大的耐心倾听。

他还没有通知我是否留在秘书处，这使我很为难，如果他甚么都不说，我就不得不在12月31日以后离开，而我则需要时间收拾东西。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我是继续留任，我就不可以开始收拾东西。科迪埃和我的情况一样，他对我说他需要时间料理他负责的那些事情。那时他们正在讨论我国在大会的代表权问题。自然，大多数的发言都对我们不利，但他们并不是攻击我们。美国则受到了指责，特别是那些共产党国家的指责。如果不是美国反对，中共无疑会顺利地接纳进入联合国，不过不会有一个多数票驱逐我们。

12月12日父亲得到吴丹确认，他的合同将不再续签：

他说他要和蒋廷黻讲，并问我将去做甚么。我告诉他我将回台湾。

一俟父亲要走的消息传出，会议事务部的同人们纷来看望，表示惋惜，特别是那些白俄人员。

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盲人打字员，她来到我的办公室表示遗憾。总共我不过和她说过两三次话！送别招待会订在1月3日举行。皮塞尔问我喜欢要点甚么做为礼物，我对他说，一个便携式收音机和一台打字机。

然而，12月28日，就在为父亲举行送别午宴之前，吴丹在蒋廷黻要求他听取我们的意见之后，和父亲进行了谈话。

吴丹认为蒋廷黻是要讨论中国的副秘书长职位问题，并且对蒋廷黻把此事拖

到这么晚感到奇怪。吴丹断定中国政府实际上对在我离开之后是否还要有一个中国副秘书长并不十分关切。

我尽量替蒋廷黻解释，说他因为中国的代表权问题非常之忙，并且还曾生过病；但是中国政府认为要有一个中国副秘书长之事是和中国的代表权问题相关联的。吴丹于是说，如果是这样，他建议我代替厄特马特担任技术合作专员。我回答说，我不了解技术合作的事，我宁可早日离开联合国，到国外去当一名大使。他说，一位新的中国副秘书长已不像过去那样受欢迎或者被接受，而且另外一位新人也可能是不懂技术合作之事的。接着我问他送别的午宴怎么办。他说镌有铭文的银盘已经准备好，午餐还是照样进行，1月3日的送别招待会之后他再给我任命。我建议他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还是先去和蒋廷黻谈谈。

随后举行了送别午宴。吴丹在讲话中说父亲融东西方的美德于一身，在秘书处是大家所仰慕的长者。父亲记载道：

我在答词中说，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待过这么久——十五年。我是一个打猎的人，不是一个爬山者，我喜欢平坦地发展而不是往上奔。我奉行孔夫子的箴言：谨言慎行，诚意正心；即使是对野蛮人也是如此。我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比“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的基督教观念更切合实际，因为按照这种说法，你如果有一颗钻石，就不得不把它送给别人，而遵循孔夫子的教导，你只要不偷别人的钻石就行了。我还说，如果我不能继续为联合国服务，我将在为我的祖国服务的时候永远恪守联合国的原则，因为它们门的理想是一致的：保持和平和维护个人的尊严与价值，促进社会进步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本奇接着发言，赞扬父亲的品德和对托管事业的贡献，他还讲了几个故事，特别提到父亲的那个通讯录，其中有遍布全世界的朋友的名字，尤其是几位有相当年纪的拥有本特利斯和罗尔斯罗伊斯汽车的贵妇人！哈密尔顿（人事处长）的发言只是说，他要对父亲作为一位完美的君子表示敬意。

在送别午宴的兴奋和伤感平静之后，父亲进入了沉思：

现在我要让命运来决定我的未来。我很喜欢旅行，并且肯定能和技术合作部门的人们友好相处，不过现在就离开联合国，对我的未来会更为有利，所以如果吴丹要我留下，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因为是他要我留下。我的这个职位确实无可挑剔，我会感到心满意足。

在这件事情上，秀英得到的两个预言都将应验：一个是佛教的卦籤，说我不会有变动，因为我犹如一颗非常名贵的珍珠，他们没有我不行；另一个来自香港，说我在11月注定要有两个星期的清静，从11月25日起我的情况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然而，关于父亲个人未来的乐观预言，相对于1962年关于世界的预言来讲，就显得算不了一回事了。

他们说五颗行星将会处在同一条轴线上。基督和佛陀出生的那年是三颗行星处在同一条轴线上。今天的无线电广播说，印度的星占家预言，1962年2月2日七颗行星将连成一条直线，要发生可怕的灾难。他们说可能是战争，或者联合国告终，要不就是地球爆炸，像一个熟透了的瓜。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是留在联合国的问题就纯属没有实际意义的事了。

第十五章 技术合作

延期退休——持续旅行——担心未来

1961年10月吴丹之被任命为秘书长预示着，或者说似乎预示着，联合国将会有个较为轻松的气氛。哈马舍尔德冷漠而孤傲，吴丹则平易近人，女士们愿意和他说话，他总是以温柔而同情的表情谛听。

他的基本观点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段总结性的叙述：

我们在人类的进步与繁荣上有着共同的利害。繁荣与和平一样，是不可分割的。最重要的是人类本身的生存。

显然，这就是技术合作的目标，正如联合国的主要目的是以促进社会进步，提高生活水平和缩小贫富差距来根绝民族之间的战争一样。所以技术合作被视为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方法。

这种想法肇始于1947年杜鲁门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那是一个旨在恢复和加强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创造性构想。1948年，他的第四点计划要求其他国家，通过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集中使用他们的技术资源。美国的建议很快就在有类似想法的联合国会员国中引起了反响。这是旨在将技术由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的第一个大规模国际合作计划。

父亲接任技术合作专员以后为其基本目标——创建摆脱外国势力控制，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国家——所作出的努力，不亚于他几十年以前对民主世界梦想的献身。

他转任技术合作工作恰与联合国大会号召人类良知处于同时。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人们还认为有些国家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而其他国家忍受贫穷和落后是理所当然。同样，在每个国家内部，也都认为社会中有大量不幸的人，社会地位低下，营养不良，健康不佳和缺乏教育乃是不可避免之事。

认为这些贫穷的社会阶层也有权分享发展之利益的思想在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中已经有深刻的阐述。宪章几乎完全是由大国起草的，并不是小国想要迫使人们承认他们的权利。

1960至1970的十年可以称作是联合国与饥饿、贫穷、无知及疾病作斗争的进步年代。其目标是使发展中国家的总收入每年递增百分之五。在估计到人口增长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需要极大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

鉴于其国际意义，父亲对此项联合国计划特别感兴趣。到1966年已有120个国家捐献基金和提供设备，提出的承诺达1.46亿美元。

在托管部的时候，父亲的斗争是反对那些不愿意看到他们的殖民体系消失的大国；而在这里，他所面临的则是一个期待改进的世界。他必须有所作为。技术合作的目的体现了他本人的关于人的固有尊严，和有权决定自己的政治与社会命运的信念。他现在的任务就是要说服人们接受这些思想。他的信念和爱默生一样，这些年来他常常引用他的话：

没有任何伟大的事业是缺乏热忱所能实现的。

60年代初期，似乎甚么事都能办到。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进步。人不久就可以飞到月球，疾病正被消灭，燃料极度便宜已不是妄想，知识的领域好像一下子变得没有止境了。未来的前景真是无限光明。

然而父亲对自己则不抱多大期望。1961年他已经超过联合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六年。他明白，别人也都明白，他的继续任职是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秘书处政治上的两便之举。这是那些指望得到父亲那个职位的人所特别不满的。有一些文章非难联合国秘书处，并以尖刻的笔调描绘父亲的地位，尽管没有指名。

不管父亲自己有多少想法与技术合作的指导思想一致，他还是因为知道他终于被降了级而感到不快。此事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业务津贴每年减少2000美元。他实际上处于菲利普·德赛纳的从属地位，也是一个刺激，因为他本来和德赛纳是同等的副秘书长；而哈马舍尔德处理这类情况的那句套话，“并列而不从属”，对他的自尊心也起不了甚么安慰作用。

此外，他对自己缺乏技术和科学的经历也深感不安。虽然已经在联合国工作了十六年，但是他对技术合作的事务并不熟悉。由于工业，贸易和运输等所有不由专门机构负责的事都落在他的头上，因而如何有效地协调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人力物力就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了。不过，他在总部很快发现，真正的工作是由业务局局长亨利·布洛克去做的。关于到各国访问的事，他们答应在他到达访问的国家之前，给他提供充分的有关资料。

他愿意继续工作，而且这个工作不但可以满足他的好奇心和为祖国服务的愿望，还可以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去从事社交活动，并照顾他日益关心的自身健康。由于年事日高和溃疡问题，他深知自己的健康和精力不是没有限度的。他开始注意自己的日常饮食，并且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每天午饭后一定要小睡片刻。每逢接受邀请到别人家吃午饭，他总会把女主人吓一跳，问她能不能躺在她的床上。这往往使她赶紧跑到卧室去清理掉内衣！而其他那些一起吃饭的朋友则不得不去扯上半个小时十分勉强的闲话，直到他重又精神抖擞地出现。

父亲作为技术合作专员的第一次出差，几乎是在他进入到那个部门之后马上就安排了。2月25日他飞往伦敦，然后去罗马和雅典。他在1962年3月2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作为技术合作专员的第一次旅行比我的预料好得多。首先，我感到此行很愉快，不觉得太累。只要有可能，11点以前就上床。不像有几个和我一起去的人那样，我没有拉痢疾，没有呕吐，没有感到不适。

在伦敦，他安排会晤了几位自1946年以后就没有见面的老朋友，并抽空记下他对英国口音，和侍者在接到他给的小费时不马上看钱的礼貌态度的欣赏。

他对英国外交界高层人员的印象不佳：

英国人实在是小气——只要能避免，他们甚至连枝烟都不让。

他曾希望在伦敦见到芭芭拉·卡斯尔，主要的倒不是由于她担当海外事务大臣的能力，而是因为她作为一个女人，他对她可以施展相当的魅力。然而会见之后，他在日记里却后悔地写道：

永宁警告我说她这个人似乎特别地“自行其是”。我曾经力图把她从她正在讲的话题上拉开，可是足足费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办到，只好放弃。无疑，她是一个真正的职业女性。

父亲觉得在雅典的中途停留，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据他的日记所写，这完全是为了那里缺乏好客的热情。：

...几乎和英国人一样糟。在我们的大使馆，他们给了我一碗面条，有一条小鱼，黄瓜和胡萝卜---是我在一个大使馆里吃到的最便宜的饭。大使本想带我去一个餐馆，但他太太却问我，是不是愿意休息，待在大使馆里，不出去。

在罗马，接待较为适当：

奥尔托纳在皇宫饭店设午宴招待我。在巴黎，我拜访了德肖姆和丰塞，他们在杜瓦扬餐厅请我吃午饭。丰塞说我们是属于技术合作的国际组织。法国人渴望在技术合作方面和联合国合作。这肯定是他们唯一的一个渴望合作的领域。

父亲被任命到技术合作部门之时，我正担任伍尔沃斯公司女继承人芭芭拉·赫顿的私人助理，在巴黎的第16区阿龙迪塞芒她的公寓里工作。这套公寓有几样东西极为出色，其中有一套中国瓷器，仅次于蒋介石所收藏的那套。父亲1962年来到巴黎时，芭芭拉正由一个新的随从陪同在远东旅行。我得到她的许可使用这套公寓和料理家务的全班人马请客。这是一个进行外交交际的理想场所。父亲在他的日记中记载说：

我以永宁的名义邀请我在巴黎的朋友在芭芭拉·赫顿的公寓举行一次鸡尾酒会。酒会非常成功，那些未来参加的人在第二天得知我们是在谁的房子里聚会，定会感到遗憾。

在巴黎我和永宁一起去一个叫十点钟的剧院。使我印象极深的是实际上所唱的都是关于戴高乐的歌。这突出地表明巴黎人的创作缺乏多样性。没有哪一只歌唱到每天都在巴黎爆炸的炸弹。这说明歌手们被秘密军队组织吓坏到甚么程度。

父亲在他的日记里没有提到过我在巴黎读书时的事。他每次来巴黎都带我到夜总会，或者去看脱衣舞---常常都是像“疯马”等等那些技艺最高的。他解释说这是一种艺术形式。当时我看上去已经像个成年人，如果我们遇见他的熟人，总是把我介绍为侄女或者是表妹！他的日记接着说：

在布鲁塞尔停留时我见到了我们的大使汪孝熙和他的太太与儿子。下午3时起飞，到达纽约是当地时间下午5时。一路上我们几乎是追着太阳飞，在整个旅途上我都可以看书而无须开灯。

我的新工作很有意思，但是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和我的其他同事一样，我总是处在压力之下。每个人都有两三个任务要同时完成，所以我们的工作总是到最后一刻才能办完，而且办得很不好。我们都十分习惯于按日程办事，没有最后的期限，工作就绝对完不了。

再者，我的职位居于德赛纳之下，在他不出席的那些会议上我就必须是代表他，并在他离开总部的时候代理他的工作。如果我是处在他的位置，我当然就会对技术合作负全部责任，但是他热衷于自己处理一切，亲自去和各国代表打交道。这就减少了我这个专员的责任，而坦率地讲，使我觉得很不是滋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一次德赛纳不在的时候，社会委员会开会，由我致开幕词，提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应当结合一致的新思想。演说包含着全新的观点。尽管这篇讲话是朱利亚·亨德森（社会福利处处长）起草的，我一点也没有参与，而我却受到人们的祝贺。

很幸运，有时父亲能够对提供给他的材料更具创造性地变通使用。

在亚的斯亚贝巴的非洲经济委员会上，我将他们在纽约给我准备的一份讲稿加以裁剪修改，做了两次演讲，并且还在常驻代表的会议上做了另一次发言。在第四次讲话中我说，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去学会在我的新职务中把我的脑袋保持在水面以上，只好一头扎进他们所提供给我的那个充满知识、经验和挫折的水塘之中。

在亚的斯亚贝巴时我拜访了以前在日内瓦时就相识的阿克利隆。他已经成为首相，他告诉我皇帝想要见我。我觐见了海尔·塞拉西，他说中国是唯一没有承认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的国家。

不那么严肃而颇为有趣的是和一位中国餐馆老板的会面，他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执照的中国牙医。他告诉我，埃塞俄比亚人的牙齿都很好，因为他们不吃糖，只在用他们手里经常拿着的长棍子打架打坏了牙齿的时候才来找他。

1962年父亲在奥斯陆待了几天，和他的老上司特吕格弗·赖伊重聚。赖伊当时是一个国际合作“机构”的主席。父亲回忆说：

赖伊真是令人感动。他为我安排了和所有重要人物，包括外交部长兰格的会见。他为没有请我看戏而表示歉意，但却邀请了索尼娅·赫尼来参加一个宴会。饭后我们访问了她的豪华住宅，并参观了其中的抽象派绘画。她确实很美。当然，附带的，还有那些画。

那住宅濒临一个海湾，如果天气晴朗，我很可能会去钓鱼。可惜当时天气不好，不过即便没有太阳，到晚上 10:45 天还很亮。赖伊说他之所以喜欢我是因为在他担任秘书长时，我并不总是说“是”，而在他离职之后，我却对他十分友好，每当他来到纽约我都对他热情款待。

1962年8月父亲做了一个他未来的传记作者将会欢迎的决定：

由于我的手写字体越来越模糊不清，我打算开始用我原先离开会议事务部时他们送给我的那台奥利维蒂打字机打字。这本是为我不再有秘书的时候作准备的，尽管我只会用两个食指打。

欧洲之行进行得十分顺利，父亲计划下一年照样在拉丁美洲进行一轮正式访问。然而，联合国的吝啬鬼插了进来。父亲抱怨说：

我已经把一切安排妥当，包括编写必要的基本情况概要。阿尔迪蒂已经约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我会合。出人意料的是，审计主任认为我们应当节省我们的开支；据他说，本年下半年的经费已经不够了。德赛纳接到吴丹的通知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出差，已经放棄了中东之行。我觉得此事出在达尔曼和柯克布赖德身上。达尔曼做甚么事都要节省，比审计主任本人的手还紧。有一次在电梯上，柯克布赖德批评技术合作部的出差太多。他们不懂，值得考虑的不是它的必要性而是它的益处。不过，我的巴西，阿根廷和秘鲁之行的作用，倒是不如这些国家不处在政治危机之中时那么大。坦白地说，我对失去这次旅行甚觉可惜，因为我对这些国家的情况尚不了解，此行会很有益处，何况那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

作为补偿，我得到两个星期的休假，乘汽车经德国，丹麦前往斯德哥尔摩。回到纽约后又休假四天，因为在一年的这个时候，我们既没有会议，也没有多少工作，而且我们的大多数同事都已经走了。

11月，古巴事件把全世界带到了核战争的边缘，是一个令人精神十分紧张的时期。父亲

写道：

...这至少向俄国和全世界表明，肯尼迪在美国人民的支持下，准备在他们认为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打一场核战争。我知道赫鲁晓夫会退却，但是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让俄国人民看上去，好像是他赫鲁晓夫挽救了和平，而不是几乎挑起了战争。假如再发生两三次类似的事件，瑞典人满可以授给他诺贝尔奖金！从这次事件中得到好处的是肯尼迪，公民复决中的戴高乐，执行调停任务的吴丹，可能还有赫鲁晓夫。当问题所涉及的双方都不想打仗的时候，全世界也就认为联合国有用。

几年以后，在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六日战争之后，父亲做了类似的评论。虽然联合国大会不可能为解决这次危机通过任何决议，然而至少可以看出，这一次，美国和俄国一样，都不想打仗。

那一年希腊和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的冲突证实了父亲对联合国及其在这种情况下所起作用的判断：

首先，我们要看安理会的意见不一致是否还可以让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如果不能，那么联合国的决议可以使有关国家在不得不让步的时候保住面子。这就是古巴导弹危机时所发生的情况，现在又在塞浦路斯的问题上再次重演。

在安理会进行各种谈判过程中的有些逸闻趣事父亲也在日记中记了下来：

阿以战争时那届安理会开会的情况曾在电视上播放，而且常常是在夜间，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家中收看。当届主席泰伯是丹麦人，非常漂亮，曾收到许多美国观众的情书和求婚的信。因为抽烟斗，他还收到在欧洲收看电视的一些男士们寄来的烟斗作为礼品。泰伯担任安理会主席非常受欢迎，以致在那届安理会结束后不久就被任命为丹麦的外交部长。

也许是因为当时古巴事件所出现的危机如此重大，以致嗣后的几个月，乃至几年中就显得没有甚么可记。要不就是，由于父亲在奥利维蒂打字机上练习打字实际上比他原先想像的要难得多。不论是甚么原因，虽然父亲写日记本来就不稳定，不一贯，常常有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间隙，但是最显著的空白则是从1962到1966，一个字也没写。像肯尼迪被暗杀这样震惊世界的事件都没有记。不过其它的迹像表明，这段时间正是他健康状况良好，充满社交活动的时期。他一直在联合国打网球，年年赢得老职员杯，直到再没有人和他竞争这个冠军！有一年，没有经过比赛，他们就把奖杯给了他。其后他就更多地致力于打高尔夫了。

说来也许并不奇怪，据传，他的同事中有些人，特别是那些认为他应该给下一代让路的人议论说，“胡世泽现在是拿着薪水去享乐！”确实，他这个时期的生活似乎完全是到国外旅行，而且常常伴以演讲，宴会，以及和世界各地的老朋友聚会。在这个时期中，也许是出于人的直觉，知道大限即将到来，父亲总要设法去看一看那些他没有去过的国家。没有别的动机，只不过是为了爱好和好奇，一种更像是年青人的，而不像是他这样七旬高龄老人所常有的爱好和好奇。

也是在那时，他开始卷入和比阿特丽斯的瓜葛之中，这个关系一直延续到他的生命终结。这个人给了他无条件的爱。她既不漂亮，又不年青，也不博学。她是一个富有的美国寡妇，在曼哈坦有一套公寓，在维斯特切斯特有一处叫做熊蜂农场的乡间别墅。她无私地，全心全意地爱他，给予他一个男人所需要的一切舒适与安慰；而作为回报她却甚么也不要。她的存在

父亲的所有同事都知道；他常常在熊蜂农场举办正式的聚会。有时他到国外出差，她则以私人身份同去旅行。她明知他对她并不忠实却从来不说。

1963年父亲访问远东，事后前往马尼拉。在那里他会见了老朋友刘锴大使。我最小的姑母世惠嫁的是一位马尼拉的著名商人，父亲常和他们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一起到乡下去。

那一年在回纽约之前他来到我和我丈夫在萨福克的家中；和往常一样，我为他和他的朋友们举办聚会忙得不可开交。那所房子里有一个游泳池，他就撺掇大家和他一起下去游泳，谁要是不下去，他就往人家身上泼水。他的活泼和热情的程度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高，甚至以非同一般的兴致每天早晨天不亮就把我丈夫从床上拽起来去打野鸭。他每次来，我们，特别是我，总要经过好几天才能恢复过来，因为我不但要做女主人，还要当他的秘书和旅行代理人。

1967年夏天，父亲经由斯图加特去到日内瓦；在斯图加特，他买了一辆新车。关于汽车，他和女人们的想法不一样，是一个受习惯支配的人，买的还是和过去一样的浅色梅塞德斯，虽然我母亲曾再三提出换一个不同的颜色，这样邻居们就可以知道他买了一辆新车！

他开车前往日内瓦，途经邻近德国边境的一个瑞士小村庄，去看望我们以前的保姆玛莎。他们回忆往事，共度了一个愉快的傍晚。对他的来访，她喜出望外，一直念念不忘，好像上帝屈尊光顾了她。

回到纽约，父亲和秘书处的其他人员一起应邀到大都会剧院观看歌剧《魔笛》。他带玛塞勒·考特尼和他同去，她和玛塞勒·丹尼萨一样，一度在这齣歌剧中唱过三个角色。父亲回忆说：

她为我请她同去非常高兴，并深为感动，尽管我那些在场的朋友们说他们从未见过我和这么老的妇女一起在公众场合露面。这就是一个人做绅士派头的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不是头一回父亲的豪爽行为招来事与愿违的结果。他在纽约有一个年老的朋友马戈·瓦尔鲍姆。战争时期他曾经把她从希特勒的毒气室里救出来。马戈非常感激，而父亲也欣赏和她交往有讲德语的机会，这种语言在联合国是没有场合讲的。不幸的是马戈也给他惹麻烦。在她的丈夫喜欢上他的年青女秘书而把她抛弃以后，她就更加变成套在父亲脖子上的累赘了。她失去了富裕的收入，再一次依靠父亲来搭救。考虑到她的语言能力，父亲为她谋到联合国礼品商店女经理的工作，一个满不错的差事。遗憾的是她总觉得这个工作让她失身份。每逢看到父亲，她就会喊：“哈罗，亲爱的维克托。来呀，来聊聊。你甚么时候请我吃饭？”

每逢遇到烦恼难缠的情况，父亲就尽可能利用这种和她在一起的机会，小声地用德语咒骂。

尽管他的工作仍然给他提供优越的社交生活，但到1968年就有一些迹象使父亲觉得受到了忽视。1月，他注意到：

只是在邀请某人或召开招待会有了问题的时候，他们才想到我。

在他一生的这个时期，当他比以往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把他的印象写成文字时，他却伤感地承认，对于写任何东西都越来越不感兴趣了：

我难得写信。自从来到联合国我就不再有机会写文件，因为别人比我写得好，而我的演讲又具有很高的技术性，需要一位专家去收集数据和导出结论。阅读哈罗德·尼科尔森的，由他儿子编辑的回忆录，促使我也把我的一些感想写下来，但是没有持续下去。如果有时间我宁愿看书而不是写字。在我的一生中，我只消把我对每日大事的想法记下来，就有了写回忆录的基础。不过我并不那么自负，认为我的回忆录有甚么意思，或者有甚么真正的历史价值。

然而，这种诚恳而坦率的自我评价，并没有因而使他对别人的含蓄批评不那么敏感。

有一天晚上，菲利普·德塞纳请我吃晚饭，他巧妙地暗示说我写得少而且没有甚么主意。他提到我十五年来经常带在身边的彩色卡片，问我那是做甚么用的。我说那是为了记下一些想法。他笑了，并且说“你写下的不是甚么想法，维克托，不过是些地址。”我真的被深深刺痛了。

尽管如此，他一生中其他方面的缺憾是由旅行弥补了。1968年4月他开始了一次世界旅行，包括洛杉矶，檀香山，西萨摩亚，斐济，锡兰，雅加达，巴厘和爪哇。社交往来的愉悦总能使他心旷神怡：

在苏瓦的信风饭店，他们举办了一个鸡尾酒会欢迎我。酒会上有一个极其漂亮的女侍者，除了皮肤的颜色，完全像个欧洲人。很自然，我和她进行了交谈，发现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吉尔伯特岛人。斐济的姑娘一般都很高大，健壮，满面春风，只是脸上毛茸茸的。

作为他正式任务的一部分，父亲要参加在堪培拉，维也纳和日内瓦的三次会议。在他离开纽约的时候，得到了约翰逊总统演讲的消息，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和宣布不再竞选下届总统的决定。父亲记载道：

我们要看看会发生甚么情况。我自己则认为这不过是政治选举的一种策略，这是他最近和从西贡回来的将军们晤谈的结果。他想要彻底改变外交，内政和军事的政策。只要他不打共产党牌，就不会上他们的当！他原订今天上午到达檀香山，计划进行一次大检阅，但是昨天上午马丁·路德·金在孟斐斯被一名衣着整齐的白人暗杀，约翰逊不得不推迟行期。这次暗杀无疑将激起黑人的激烈示威，并且将会加强黑人的力量。

父亲于1968年8月回到美国之后，在办公室里度过了几个星期的安静日子。这个安宁被捷克遭到入侵打破了。他记录道：

这当然是一场大灾难，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它显示了捷克人的爱国精神和行为准则，并且表明俄国人未能制造一个吉斯林政府。他们不得不保留现政府，而强加给它许多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苛刻条件。捷克政府曾经劝告他们的知识分子离开这个国家，并且已经每天有几千人移居外国。在联合国流传着一个笑话：“俄国军队会在捷克待多久？要到他们找到一个邀请他们进来的人的时候。”这次入侵震惊了世界，然而可能会有助于尼克松成为下届总统。不过美国人民对尼克松和汉弗莱都不满意。他们是一个意见分歧的国家；而缺乏协调一致曾经使许多强大的帝国崩溃。

竞选活动的水平日益降低已经变得非常之明显了。父亲提到：

我在美国曾经见过几次总统选举，但竞选人之间的斗争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尖锐激烈和扑朔迷离。起初，尼克松具有竞选活动组织得较好的优势，但现在似乎节节失利。竞选人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讨好公众，许下宏愿，以求得到更多的

选票。而如果尼克松和汉弗莱真的信守他们的诺言，美国可能就毁了。汉弗莱和他的顾问们说他们要把在越南的美国士兵换成联合国部队，这说明他们对联合国是如何地无知，好像联合国的部队是在他的支配之下。

11月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总统。父亲写道：

这对反共的亚洲人来说是何等的宽慰。使汉弗莱受挫的是约翰逊在南越接受他的条件之前就停止了对北越的轰炸。刚刚离开越南的加拿大人约翰·伍德告诉我，俄国人对捷克的占领整个地改变了越南的局势。占领之前，西贡害怕美国在和俄国的交易中拿它当牺牲品。现在这已不再可能，那里的士气好多了。他们认为战争将不再激烈，越南人已准备谴责越共。战争结束后的问题将是弄清对所有的越南军人怎么办，他们是不愿意劳动的。联合国在越南问题上的表决要看美国是如何打算的。南越现在的黄总理很正直，他的政府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不是美国所想要的。

在1968年将近年末的时候，父亲对时间的流逝颇有感触，而且想要记述一生事迹的愿望日益迫切。他的一位同事曾经对他说，本奇看上去比他老；由于眼底出血，不久可能失明。这使他稍感自慰；但是，两个人谁都不能再说自己年青了：

很多人鼓励我撰写或口述我的回忆录；最近柯满和谢夫·阿达博又有另外的说法。柯满说，由于我的品格和个性，我的回忆录会比别人的回忆录更受欢迎。阿达博则说，即便我自己对我的回忆录不感兴趣，别人还是会感兴趣的。在台湾，写回忆录十分时髦；很容易找到一个人来记下我的口述，然后编成一本书。另一方面，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部门，专门收集著名人物的口述回忆，制成录音带。不过，我总得要找出时间来做这一切。

年末的时候，全美国都流行香港流感，父亲一度曾被隔离，这使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优待，不过就他的社交活动而言，其影响则是令人扫兴：

我原计划为戈斯弗莱尔夫妇举办一次宴会，请柬一个月以前就发出去了，可是十二位客人当中有五个人，包括戈斯弗莱尔夫妇，由于流感不能前来。我可以省下这笔开支了！在纽约，五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生病。纽约的一个著名协会的主席在他们年会的晚宴上致辞，在发言的开头竟把到会的人称呼为“流感的幸免者们”。我想我很幸运，可以把我自己算作是其中的一个。

1969年有一次父亲到非洲出差，那里的饮食不对他的胃口，并且第一次受暑。在亚的斯亚贝巴的一次宴会上，一个坐在他旁边的英国代表团团员关于他的议论也未能使他的情绪有所好转。

我告诉他我一年前把烟戒了，于是他转身对他的一个同伴谈论我的这个情况说：“如果像他这样，年近八旬，而仅仅在一年以前才把烟戒掉，看来吸烟并不是坏得那么不得了！”

3月间，父亲去到台北，他觉得在那里特别安适自在，朋友们都高兴地称颂他的良好精神面貌：

每个人都对我非常友好。严家淦对我说我的心依然年青，而这正是为甚么我能和年青人融洽相处的原因。

然而，考虑到退休，他对另一位朋友的见解，倒是颇有同感：

吉米·魏说的一番话很对：如果你要寻求一种生活爱好，最好选择不需要伙伴的那种。这就排除了打桥牌，下象棋，等等，因为这类活动要依靠别人和你一起玩。所以最好是书法或绘画一类的事。

台湾人说在中国人群中生活最愉快，因为他们总是互相帮助。如果你向你的朋友借钱，即使你不还他，他也不会介意。而且你总能找到另外一条做生意的路子。现在这里的生活习惯也正在改变。午餐，他们开始吃三明治，因为那比做饭省事。

文纪洛是我们在社区发展方面的专家，他说现在这里是世界上农村生活水平

最高的地区之一。许多家庭有电视，并且家家都有收音机。显然。印度最差。有一次文纪洛在一个印度村庄里被敬为贵宾，他们给他上了一碟上面有一层黑的面包，而那居然是一层苍蝇！

在台湾的时候，我视察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不能耕种的土地上养牛的事业。他们有一种阉割过的公牛，仍能认出发情的母牛。把一个带颜色的皮圈套在公牛的嘴上，这样它就可以在它嗅出的母牛身上留下记号。他们还给我看了人工授精用的金属阴茎鞘，和公牛趴在模拟的母牛身上性交时用来收集精子的大胶皮阴茎套。我觉得被这样使用的这些公牛实在是可怜。为了防止它们长角，他们在长角的地方点上一种药水。

4月，父亲晋见了蒋介石：

我告诉他我这次回来是两年一次的休假。我打算辞职，但是政府和吴丹都希望我留下。他认为我应该留在那里。

我建议他按照要求增加我们的联合国会费，并说明为甚么有此必要。例如和日本相比，我们交的是127000美元，而他们交的则是一百万美元。他同意增加，并且问可能要增加多少。我没有敢说出霍夫曼提议的750000美元，而是说我将和主管的部长磋商。

他问我美国大选的情况，我说尼克松当选了，这是我们的运气，因为如果是汉弗莱或者肯尼迪一类的人当选，我们在联合国的处境就会更加岌岌可危。当我告诉他我正在台北找一个地方安家时，他笑了，对我说，如果我回来，他会给我一幢房子。我希望他不要忘记，而且长寿！他仍然是台湾的最高当权者，这一点在我给两个穿着民族服装在公园里扫地的妇女拍照的时候也可以看出来。当时为了引起她们注意，我的司机说我是总统的驻外代表。我想他该不至于竟然说我就是总统吧！

父亲于1969年6月3日回到纽约。这次出行历时三个月，从他对这次旅行的记述中可以看出他以往那种如饥似渴的工作热情已经几乎没有了：

回顾起来，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台湾的日月潭和檀香山的怀基基海滩度过的。

一个星期后他到了欧洲，八月是一个人单独在日内瓦的一个设备齐全的单间公寓里度过的。他自己做早餐，有时也做午饭，并且能够睡午觉，那已经成为他每日必不可少之事。他非常高兴地看到，他的简朴生活起码已使他在纽约开始大大膨胀起来的腰围缩小了。

途经巴登和卡塞尔返回，他无可奈何地注意到，自上次出访以来，他明显地老多了，因为他宁可待在旅馆里，而不愿意像过去那样老是去看电影。

和往常不一样，在弗里堡，我竟然阅读起罗丝·玛丽·德斯卡涅送给我的一本《埃马努埃莱》，我既愉快又惊奇地感到了它在我身上所起的作用，倒不是我能从中得到了多少教益，而是因为我在实在是难耐地孤寂。

1970年的许多变化，例如父亲早就预见到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美国对北京政策的变化，再次勾起他的哀伤，他的日记已经多日不写了：

我变得越来越懒散，淡漠，可能还有衰老。我很少持续写日记，然而事实上则有那么多的重要事情正在发生。尼克松批准在美国和北京之间进行有限的商业贸易，旅游者可以有限度地购买共产党中国商品。美国的公众舆论正迫使他撤退美国在越南的作战部队。这些事都将会改变我们的，甚至可能世界的历史进程；而这些本来都是应该在它们发生的时候记下来的。

在父亲1969年，也许是1970年的一份亲笔写的杂记上，记载着他开始失眠。

这种情况是在经社理事会在日内瓦开会时开始的，当时我差不多每天夜间两点或三点就会醒来而难再入睡。我自己服用了一种叫导眠能的药片，到我离开日内瓦的时候就一切正常了。后来在将近8月末时又犯，这次吃导眠能就不够了。我于是开始吃安定和另一种安眠药Lotusate，直到我做疝气手术时为止。手术以后我服用蜂蜜，效果不错，但是昨夜又睡得不好。

去年12月，吴丹问我是否愿意接受把我的合同再延长一年。我说同意。因为自从在台湾见过蒋介石，我就已经决定，如果他要我留下，我就一定要留下。

然而，我觉得有义务向他表明，在我这把年纪，最好还是退休。他说，只要他在，我就必须留下，如果我不能做所有的工作，只好把更多的事交给别人。

他估计中共年内就会进入联合国。美国的政策变化开始使台湾的报纸担忧。虽然美国和北京的华沙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但是他们的会谈举行得更加频繁，这使国民党人十分烦恼。最近我们的各位大使在台北开会，讨论印度支那新局势对我们的影响：战事向老挝扩展，西哈努克被从柬埔寨逐出，柬埔寨与越共及北越的敌对状态，以及美国的妥协政策。蒋经国将于4月20日抵美，会见尼克松，并和他讨论当前的局势。

三个星期后，当蒋经国正要进入纽约的一座大厦时，一名台湾人企图暗杀他。父亲记载道：

他的贴身保镖击中了那个人持枪的手臂，使射出的子弹偏斜。如果暗杀成功，将会使蒋介石的继承问题变得十分复杂。我没有想到台湾人的独立示威活动竟会搞得这么凶。

那一年，还有其他一些事情表明这个世界对一名外交官来说，越来越变成一个危险的地方。4月间，德国驻危地马拉大使卡尔·冯·斯佩蒂伯爵被处死了。父亲愤慨地写道：

外交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这类的事，一名外交官被现政权的敌对方绑架勒索，以换取释放他们的同志。这世界将会变成甚么样子？

1970年5月父亲在意大利时，他的皮夹，两张信用卡，还有工作日程记事本，在旅馆的房间里被窃。

我淋浴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在我那房间的梳妆台上。除此以外我没有离开过我的房间。这种事我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不过我猜想此事可能比一般的偷窃更坏。可是他们偷我的日记本干甚么？

父亲也许会这样理解此事，认为这可以证明有人觉得他的日记本对这个人比对他自己更有用，但是他推断，这个贼在匆忙之中根本没有时间去看清他拿到的东西是甚么。

1970年比亚夫拉战争和比亚夫拉人的彻底失败是国际上十分关心伊博人命运的原因；但是到八月，世界其他地方的局势已有所改善。

终于，情况开始好转。在中东，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军开始谈判。在柬埔寨，美国军队已经撤退，但现政府仍在掌权。乔治·皮科到日内瓦来看我，他认为尼克松决定进入柬埔寨是正确的，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削弱，不再能发动对越南的战争。第三，俄国人和波恩之间关于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似乎已圆满结束。最后，美元的通货膨胀率好像已经降低。一切事态表明，人们大可不必怨天尤人。

在日内瓦的一个关于海牙，凡尔赛和旧金山和平会议文件的展览会上，父亲在一张1899年海牙会议的照片上看到我祖父的中文签名，很是激动。

这件偶然之事竟使他联想到人终有一死的道理。这种意识在过去的两三年里曾使他的精神很苦恼，并最终影响了他的健康。在日内瓦，人们对他说，没有再吸烟使他的健康有所好转，这使他稍得宽慰，但到1970年他开始感到一阵阵眩晕。他写道：

这病也有个名堂，所幸并不说明有甚么问题，而且也不危险。

可能更大的灾祸是我在日内瓦一家药房门前的一次意外事故。当时我是去给秀英买一些苏果茶酚。我刚要从临街的车门下车，一辆车从后面撞上我的车门。我如果出来得快，肯定就被撞上了。那辆车也坏了。幸而那辆车的司机很冷静，很客气，没有找我的麻烦，不像瑞士大使亨伯在日内瓦的那一次。当时我去参加一个招待会，正要泊车，他的车停在我的前面，我的车向前碰坏了他后灯的玻璃。他开始的时候喊叫着骂我，但当他看清我是谁时，冷静了下来。我给了他4.4法郎修灯，随后他交给我10法郎，捐给秘鲁地震的灾民。这真有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不过这可不是募捐的好办法。

8月间父亲和兰德杰尔夫妇在一起待了一个星期。兰德杰尔夫妇是他的老朋友，他常常借用他们的房子，不但是用作离开自己的家，逃避现实的场所，而且事实上是作为和比阿特丽斯共度良辰的托词。比阿特丽斯就住在兰德杰尔的附近。

卡尔·兰德杰尔的太太梦玲是中国人，是于斌主教的侄女。父亲是他们结婚的媒人。这曾经是一桩美满的婚姻。但是那年八月，卡尔提出和梦玲到墨西哥去离婚。离婚的条件很大方。父亲的日记里没有提到的是，梦玲逮住了卡尔和孩子的保姆在床上，这就把本已摇摇欲坠的婚姻推向了破裂。父亲写道：

从来也没有哪一个中国妇女得到过如此有利的离婚条件。他们女儿玲玲的全部费用都另算，不论她是跟她的父亲还是母亲生活。卡尔对我说，他对梦玲最不能忍受的是她的经常撒谎和吝啬。他留给她300套由时装设计师设计的服装，和价值100000美元的首饰。就行动自由而言，对我个人来说，这将意味着甚么，还有待观察。

9月，又出现了另外的问题，进一步限制了他的自由。他失望地写道：

我又要做手术了；这次是为了痔疮。那是在熊蜂农场，大约上午9点半左右，我忽然大出血，持续约20分钟。根据欧文大夫的建议，他们送我到北韦斯特切斯特医院，那里的外科大夫建议做手术。我坐救护车回扬克斯，花了77美元。秀英劝我去看关庆光大夫，当天傍晚我去到纽约，这次是乘出租车。他告诉我没有癌的迹象，确诊是痔疮出血。在这件事中，最糟的一点是秀英以为我当时是在兰德杰尔家，如果发现我长久以来一直在说瞎话，该有多难受。

自1971年以后，父亲所最关心的事，除了他自己的那些问题以外，就是他日益焦虑的可能承认共产党中国的问题了。1970年11月，加拿大承认了共产党中国，并和中华民国断绝了关系。意大利紧随其后，接着，比利时和奥地利都宣布要采取同样的行动。父亲写道：

这就是美国人所说的“赶浪头”。在这种情况下，据吴丹推测，明年或后年，共产党中国就将取得我们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如果我们和所有承认他们的国家断绝了关系，我们的景况将会如何？

1971年4月，他写道：

我和张群谈了一个半小时。他赞成在联合国中有两个中国的主张，因为这样中共就不会进入台湾了。他也认为我们已不可能重新夺回整个中国；但毛死之后，共产党中国在军人之间将会分裂，也许我们能够回到广东或福建，甚至无需美国的援助。在台湾，台独运动并不普遍。在军队中，有一个很大的台湾人政党已经向他们灌输了维持现状的思想，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现状中受益的。

我们的新任外交部长周书楷认为我们切不可离开联合国，因为那会降低我们的国际地位，并且给我们造成更多的内部问题。

尼克松是在明目张胆地和中共调情。他最近的行动是允许美国乒乓球队在新闻记者的陪伴下前往共产党中国。美国的新闻界自然要对此大事宣传。更为不祥的是，周恩来非常高兴，而且他还加上了一句，说他还从来没有到过美国。但愿上帝不许这样的事发生！

7月，尼克松前往北京会见周恩来的决定震惊了世界。父亲写道：

当然，俄国人大为恼火。他们害怕中美和解；但是在美国，大多数人都欢迎这次访问。我从一开始就说，尼克松为要在1972年再度当选，正采取一切办法抓住美国选民的心。这对我们在联合国的席位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我们最好的朋友正在承认中共，而中共就会反过来要求他们断绝和我们的关系。仅仅在大选的几天之前，宣布了基辛格第二次访问北京，去安排尼克松访问日程的细节。这是致命的一击。9月26日柯满私下向我预测，我们将以五票之差失败。

恰值中华民国建国整整六十年。何其难堪的周年纪念！

10月25日，父亲最最担心的事终于出现了：

北京被接纳进入联合国，中华民国被驱逐。

在联合国服务了二十六年之后，父亲终于被要求辞职，而当时的时机则实在是糟得不能再糟：

刘锴建议我写一封辞职的信给吴丹，但是除了遭受必须离开这个打击之外，还使我在家庭问题上处于为难境地。我正为一个新女仆办理从台湾来美国的签证，她是秀英所极其需要的。为此，吴丹答应想办法，并给我特殊的带薪假期，直到我的合同期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帜已经代替了我们的旗帜。没有举行甚么仪式，因为考虑到这不是一个新国家加入联合国。吴丹发了一封电报给北京，询问是列名为中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说，中国。11月2日我到我们的中国代表团访问杨西崐，他很坦率，说台湾的经济将会衰退，北京能够制造我们所生产的产品，和我们的一样好，而且比我们的便宜。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带有政治性，贸易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的经济将会因为我们在政治上的孤立而处于不利的地位。台湾的地价已经下跌。他说阿根廷和秘鲁已被北京收买而投他们的票。刘锴认为基辛格第二次访问北京的时间是周恩来特意选定的。

虽然共产党中国之突然实现其进入联合国的策略并非出人意料，但还是使海外国民党人员的家庭陷于混乱。父亲写道：

杨西崐劝我待在国外。他说他这一生算毁了：他的太太已经离开他和他那二十五岁的儿子而去，这孩子现在在美国，还未上大学。他认为我应该离开联合国，以免和共产党共事。我对他讲了女仆的事。

有人说，我们代表团的人员如果想留在美国，美方可以助他们取得永久居留签证。父亲本人已经有人请他在俄亥俄大学教书。吴丹也曾被这所大学邀请做过研究员。其他的一些机会则是一些出版商和公关人员提出的：

我到特丽·迈尔斯家喝酒，她说我能够写出一部很成功的书，并且可以从出版社得到预付稿费七、八千美元，出版社还将提供编辑上的合作。

这类提供帮助的建议虽然很好，但是并不能驱散已经落在联合国国民党中国代表团身上的阴影。

昨天在联合国的大会上，北京代表乔冠华和苏联代表马立克就苏联提出，而为北京、美国和英国所拒绝的裁军会议，相互叫喊。以往在联合国从来没有过如此粗暴的对话，巴瓦尔迪甚至引用了一句阿拉伯格言：“狂风和海洋吵闹，倒霉的是船上的水手”，要求他们缓和他们的言辞。

12月14日是我在联合国任职的最后一天，下午六时我拜访了吴丹，感谢他对我全部好意。他一再问我，他还能为我做点甚么。

然而父亲从吴丹得到的最后一封信却是令人抑郁地冷淡。

1972年2月12日我接到吴丹的信，感谢我对联合国的贡献。此信是由人事处撰写的，虽说是感谢我的贡献，然而是一篇官样文章，毫无热情。

父亲在1972年的日记里很少掩盖自己的忧愁和失望。上一年12月他发现左肺上的班痕扩大了。医生们主张，即使检验表明班痕并非恶性，也做手术。

2月，就在接到吴丹最后那封信的同时，医生告诉他得了癌症。

这是由各种检验证实的。首先，支气管镜、呼吸和足部测验表明我有癌细胞，而且我的呼吸不能承担做肺部手术的风险。亚历山大大夫给我开了他认为非常有效的抗癌药片 Cytoxan。依照关庆光大夫的意见我去看普尔大夫，他是有名的肺科专家。他建议我到纪念医院去做其他检查：脑，骨和肝的扫描，所有的检验都呈阴性，后来做的骨髓检查也是如此。检验表明我的癌症位于左肺。普尔大夫给我开了每周两剂钴 60。很幸运，我那个星期未患流感。

经过放射治疗，普尔大夫说我左肺上的阴影已经缩小，残留的可能只是一个

班痕了，不过不经预防性手术还没有把握，而就我的情况看，做这种手术又不大值得。在我最初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说过，我的癌细胞用放射和药物治疗比做手术效果会更好。现在他要我等两个星期再进行药物治疗。

那个月的月末，尼克松起程开始他的“中国之行”。然而令美国人失望的是在飞机场和街道上没有欢迎的人群。父亲写道：

美国的新恋情尚称美满，并且受到尼克松与毛泽东意外会谈的鼓舞。周恩来的宴会被描绘为“热情友好，频频祝酒”。总而言之，此行是一个巨大的宣传杰作。

最后的联合公报明确地肯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父亲评论道：

这无疑使两个中国的可能性复杂化了。也许，如果没有台湾这一段，周恩来就不同意任何联合公报，这也可以说明尼克松离开北京时为甚么推迟一个小时起飞的原因。周恩来达到了他可能认为是最重要的目的，并且在由上海回到北京时受到几千人的欢迎。这实际上是他的胜利。

那些了解共产党和世界形势的美国人，以及许多其他人，批评这是“出卖中华民国”。我们的外交部发表了一篇严正的声明，重申我们收复中国的原有主张。报纸上说，这次北京会谈对于世界的重要性不亚于雅尔塔。一点不错，这两次都牺牲了我们，中国。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在一个联合公报中，强大的一方——美国——作出了让步，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美国人高兴的是终于打破了两国之间实际上长达二十二年的僵局，他们可以对话了。——然而，这是多么高的代价呀！

第十六章 后记：徐入黯夜

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事业的结束——失望

父亲的一生无论以甚么标准衡量都是丰富而多彩的。他最好的年代闪耀着成功的光芒，并且理所当然地得到那些随之而来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报酬。

然而对比起来，他晚年的岁月则笼罩着哀伤悲愁、财务困窘、还有对国家的命运及其不能

从废墟上复兴的失望。共产党中国于 1971 年被接纳进入联合国是最后的致命打击，而使他倍加痛苦的则是这同时意味着他个人的事业就此结束。

达摩克利斯的危险之剑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一直悬在头上。尽管国民政府的官方地位是具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但是被准许加入联合国的新会员国绝大多数都是第三世界国家，现在则意味着共产党中国事实上的地位不可避免地变得合法了。

1971 年 10 月 25 日父亲写道：

这是我一生中 most 黑暗的一天。北京被接纳进入联合国而中华民国则被驱逐。人们都认为这是美国的失误造成的：尼克松预期的北京之行，基辛格恰恰在大选的前夕第二次前往北京，美国人为了得到更多选票而不择手段，阿尔巴尼亚决议的通过——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等于中华民国以及美国的失败。

在过去，像凡尔赛和约中的山东问题，九一八事变，乃至我们之撤退到台湾等失败，都还能让我们作为中华民国而存在。现在则破天荒地否认了我们。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忠实可靠的朋友，而且美国的舆论和很多重要的美国人士还会支持我们，但是那个共同防御条约还能维持多久？共产党将想尽一切办法孤立我们，在经济上毁掉我们，在政治上进行渗透。但愿他们还不至于对我们进行侵犯。

共产党中国之被接纳进入联合国对父亲形成了双重打击，不单是因为它彻底地表明了在中国的共产主义并非仅是昙花一现，而且表明他个人职业生活的终结。他在漫长岁月中的所有努力和奋斗似乎都变得毫无价值，使他一反常态地陷入了悲观。

他在联合国的最后一些日子，由于和我们代表团中一些老同事们的一次意外邂逅而变得更加烦恼。10 月 25 日，当北京代表被接纳进入联合国的时候，在场的中华民国代表自然要退出。然而，父亲的合同要到 1972 年 3 月 31 日才到期，而且经济上的原因也迫使他要待到期满。此外，尽管一些中国同事有所非议，他还是觉得， he 可以和秘书处的其他中国人员一样，以中立的国际公仆的身份行事。但是，当人们向他指出他是唯一一个政治性任命的人时，他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理由。不过还是达成了个折中的办法，允许他待到 12 月 31 日，再给他三个月的带薪休假，直到合同期满。尽管有这个小小的收获，这段插曲还是进一步加深了他离开的痛苦。

父亲一直害怕想到退休。虽然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他的生活欲望丝毫没有减退。他有充足的求知兴趣使他的退休生活总是有所事事，并且一直惦记着撰写他的回忆录。然而他的社交生活却一直是和他的工作交织在一起的。他爱好旅行，他的工作给了他大量的旅行机会。他在社会上的要人身份和地位也都有赖于他的官方资格。

在我祖父去世之后他给世熙叔的那些信中所流露出来的不安心情并非不着边际。到了老年，他坚决认为，他一旦离职，世界就会抛弃他。家人朋友们的再三安慰也不能使他打消这种想法。

他不愿意离职还有其他一些微妙而复杂的原因。他和我母亲的婚姻本是爱情的结合，充满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她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一位理想的外交官夫人。然而他们二人在性格和理想上都难以谐和。婚后不久，她就以身体健康欠佳而逃避了外交生活中许多必需要做的事，并安于丈夫对她的忽视。病房变成了她活动的天下。

60 年代中期，在我离家去欧洲留学，永匡已经结婚成家之后，我的父母决定从台湾领养

一个小女孩，永欣。她非常聪明，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条件；反过来，她又陪伴我的母亲，那时我母亲成天躺在床上。到我父亲退休的时候，永欣正上中学，成为他极大的安慰，她也以真挚的爱意照顾他。

退休以后不久，父亲对他的老朋友马戈·瓦尔鲍姆说了心里话。他们早在1922年就相识，战时他还救过马戈的命。他说：

回顾我一生的成就，我在两件事上没有做好——作为一个丈夫和作为一个父亲。

马戈宽宏地说：“没有人能够做到十全十美。”

即使我父母的婚姻美满，在许多方面也很可能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就我父亲的生活热情和他对生活变化与从事活动的持续需要而言，在家庭方面，他永远也成不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顾家的男人”。父亲和母亲达成了相互都能接受的谅解，这个谅解给了他自由，同时免去她作为外交官夫人需要参加一些官方活动的义务，而那正是别的外交官夫人所刻意以求的。确实有许多时候，父亲巧妙地把一些私人朋友带进他的职业生活之中，而同时仍能保持住一个显然稳固的家庭基地。

1971年12月所怀疑的肺癌，第二年的2月证实了。而这无疑是由导致他退休的那个大事件，和退休后到哪里去的纷扰所触发的。虽然他愿意待在纽约，他的朋友们大都住在那里，然而他不打算以减少了的经济条件留在那里。他有许多有钱的朋友，如果他不能和他们保持同等的水平，他宁愿离开。

就他自己而言，他可以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回台湾，在那里，以他的联合国退休金能够生活得像个国王，而且蒋介石将会给他高级的职务，不但地位高，还有进一步为国家服务的可能。虽然这个前景对我母亲颇有吸引力，因为她喜欢热的气候，而且可以雇用几个仆人，但是一想到大举搬迁和长途跋涉，就在她的面前出现了许多重大而又不易克服的难题。那时她已在纽约得到了非常惬意的生活方式。她的姐妹和儿子的一家都和她住得很近，她的一帮朋友也都住得不远。去到一个生疏环境，她势必要去适应那个她并不喜欢，而且左右不了的条件，这是她所难以接受的。

自60年代末期以来，在家里的讨论就热切起来，有时还很激烈，但是谁也确定不了怎么办最好。朋友们在两边帮腔，使事情变得更糟。如果他们决定待在纽约，这是我母亲所希望的，就必须在他们的外交身份失掉之前申请居留。

1971年12月7日父亲在他的日记中吐露说：

这些天是我一生中最为苦恼的时期：担心台湾以及我在那里的朋友和亲戚会遇到甚么问题，担心是否能够以我的退休金和微小的积蓄维持我和秀英及永欣在纽约的生活。这比1918年在巴黎把山东输给日本，和战时在重庆的烦恼要严重得多。那时，我们倒是还有个政府，不管它有多弱、多坏。而现在，我毕生服膺的这个政府，乃至台湾作为独立于共产党中国之外之实体的存在，都受到了威胁。我现在还没有达到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有一个共产党政府而感到高兴与骄傲的程度，因为它尚未证明曾为中华民族的幸福和安乐做出了甚么贡献。

父亲的病确诊为肺癌之后，家中的气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起初大夫们告诉他要做手术。后来，尽管情况并未好转，医生们却又决定不做了。我们于是知道没有治好的希望了。几个星

期之内，他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显著地恶化。发生过几次小的中风，起初还并不十分明显。他对病情的担忧由于顾虑医院的帐单而加剧了。

这时我母亲终于决定依从父亲的想法，搬到台湾去。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临近，她进行了一定的安顿，整理他们的财物，出售房子，安排旅行，如此等等。父亲有三个弟弟在台北都提供了帮助。母亲甚至开始相信，可能这终究是对他们两个人都最为合适的归宿。

从4月到6月，父亲一直在医院进进出出。那时他已开始呼吸困难。回台湾的计划在加紧进行。在扬克斯医院，他的那些忠诚的朋友和亲戚川流不息地来看望他，就在一次这样的看望时，6月9日，他忽然心脏病发作而逝去。情况是那样地突然而急促，说实在的，这样离去要比癌症的缓慢煎熬强得多。

我最后一次看到父亲是在1971年7月28日。他每年夏天都到英国来看我，已经成了惯例，不是在前往日内瓦参加经社理事会的路上，就是在返回的途中。有时他也到我们在萨福克的家中住上两三天，或者在他飞行的间歇中，我们到希思罗机场去看他，一起在机场吃上一顿饭。

1971年7月他和我们在一起待了三天，我们还邀请几个朋友吃烧烤。他仍然是聚会的中心和灵魂，但是我意识到他在脑海里有了忧愁。他知道他的工作任期可能不会再延长，因而他的国外旅行将会终止。

在我开车送他去希思罗机场的路上，他一再地说：“我怀疑我们甚么时候还能再见面。”我答应他，如果明年他不到这里来，我就到纽约去看他。当他走向候机厅，转身向我挥手时，脸上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哀伤表情，自那以后，这景象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

我是从永匡哥哥得知他的噩耗的。虽然并非完全出乎意料，这打击还是非常沉重的。我的父亲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个具有许多特色的人物——一个崇拜的偶像，一个深情的挚友，一个外交家，一个和平缔造者，一个共产主义和腐化堕落的坚决反对者，还有最后，和其他任何人一样，一个在命运面前十分脆弱的普通人。

葬礼是在纽约市曼哈坦东区的一座高级教堂举行的，挤满了前来送葬的人。许多妇女公开啜泣。父亲的许多同事和朋友，包括他那位年迈的导师顾维钧博士以及吴丹，都发表了感人的悼词。人们在他身后对他的悼念，父亲九泉有知当会感到无上安慰。

他一直希望在共产党离开之后，安葬在中国。依照他的这个愿望，他的遗体浮厝在纽约郊外的弗恩克里夫，等待着返回家乡。离他不远的穴位埋葬着著名影星裘迪·嘉兰的遗骸。对这一点他肯定会高兴。他的灵柩至今仍然停在那里，1996年和我母亲的合到了一起。他们二人，生前虽非美满的姻缘，死后终于结合到一起。

如果是他自己而不是我来写这段结束语，他会如何论定他自己的一生，也只能猜测了。和所有的人一样，他也有缺点：爱好虚荣，自我纵容，放荡不羁，追逐名利。然而他的志向是崇高的，有精干的工作能力和为正义事业献身的精神，为那些不如他的人所望尘莫及。他对祖国的热爱和为之服务的愿望一直是至高无上的。如果中国是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他的贡献是足以与之相称的。

照片说明

- 116 页-1、上左、胡世泽之母
上右、胡世泽之父，胡惟德，时任职於清朝
下、 陈秀英小姐，1927 年 1 月与胡世泽博士在上海订婚
- 2、上、 1946 年纽约报纸上的漫画
漫画下的说明：联合国负责托管事务的助理秘书长胡世泽向其同胞，当届安理会主席郭泰祺博士解释问题
下、 1939 年 9 月陈秀英在日内瓦湖
- 3、上、 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1939 年
下左、周末休假，1931 年在尼斯
下右、任驻瑞士特命全权公使时全家合影
- 4、左上、在瑞士全家出游
左下、陈秀英在日内瓦
右、 在联合国与尼赫鲁握手
- 5、上、 伯尔尼中国公使馆接待室
下、 蒋介石及其两位外交次长，1944 年重庆
- 6、上、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桌左为哈里法克斯，桌右为斯退丁纽斯，其左为葛罗米柯，再左为顾维钧，胡世泽在右数第三
下、 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前排自左至右为胡世泽，顾维钧，孔祥熙，魏道明
- 7、上、 秘书长赖伊及其助理们，1946 年
下、 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48 年 1 月 12 日
- 8、上、 托管理事会视察团访问喀麦隆，1949 年 11 月
下、 联合国秘书长宇谭
- 228 页-1、上、 胡世泽(左)与哈马舍尔德(中)及礼宾司长让·德·努伯爵(右)
下、 胡世泽代表秘书长出席安理会，坐於葛罗米柯之右，马立克在葛罗米柯之后
- 2、上、 胡世泽与印度的梅农及比利时的朗恩霍芬交谈
下、 胡世泽欢迎教皇保罗六世访问联合国
- 3、上、 胡世泽欢迎林登·约翰逊和夫人伯德访问联合国
下、 纽约联合国总部
- 4、上、 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祝贺胡世泽六十华诞
4. 下、 胡永宁与顾维钧博士之女顾菊珍，1995 年纽约
封底内侧 作者父女

内容简介

胡世泽的一生和他的外交事业不仅跨越中国历史的，而且跨越世界历史的最为纷扰动荡，最为激动人心的时代。终其一生，他一直身临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前沿：从凡尔赛和约到旧金山会议，从蒋介石由共产主义的新中国逃往台湾到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创建家园，从苏彝士危机到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在那些大事中，他都是实地参与者和出谋划策者中的一员。

胡世泽的事业肇始于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团，后来致力于联合国的事业，使之能够更持久，更成功，因而成为联合国中最受尊敬的人士之一。在世界的大舞台上——从他曾经在其中度过童年的俄罗斯贵族政治到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从蒋介石到毛泽东，从伍德罗·威尔逊到尼克松——胡世泽从容镇定，朴实无华，不屈不挠地工作着。本书所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位外交家的经历，他对世界上的大事发挥过影响，他在联合国曾经和四位秘书长共事，并且赢得最谦虚平易的那位秘书长的衷心赞赏。本书所记载的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然而具体披露的则是那些幕后的活动，有时是对伟大人物的谆谆规劝，或者是鸡尾酒会中的私议闲谈，乃至办公室里的纷争矛盾。这里的叙述如实地描绘出历史的掠影，正如本书的书名所揭示的那样。

到胡世泽 1972 年去世之际，那仅仅在退休之后几个月，他早已超过了大多数人想要撰写回忆录的年纪。

终于，人们认识到他实在太重要，不应让他离开他在联合国的职务；当时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正在酝酿，而那是他所极力反对的。蒋介石命令他尽可能长久地留在联合国，于是他一直坚持到七十七岁的高龄。几个月后，他故去了。因而不得不由他的女儿，亲自进行仔细的调查研究，将构成我们这个时代历史之一隅的一些纷纭往事汇集成传。

作者简介

胡永宁(Mona)生于上海，童年在瑞士度过，当时她父亲是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

作为一个外交家的女儿，从幼年她就意识到她是在受着两种文化的熏陶——由祖先遗留下来的传统中国文化和轻松舒畅的世界性文化，而这种文化则是她父亲所由衷欣赏的。

20世纪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她们一家定居在美国，在那里，她父亲持续担任联合国的各项职务。她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前往巴黎，在闻名遐迩的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Po）完成她的学业。

毕业以后，她在华尔街一家主要投资公司的巴黎分公司担任双语秘书。由此她结识了芭芭拉·赫顿，并成为她的社交秘书。多年以后，她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著作，*In Search of a Prince*，一本关于她追随芭芭拉·赫顿时期的回忆。

受这部脍炙人口的回忆录之启发，她决定撰写她父亲的传记。这个课题是他父亲在临终之时所一直萦绕于怀的。

胡永宁居住在伦敦，但经常广泛地往来于世界各地。她对桥牌情有独钟，并且喜好音乐和戏剧。